欧罗巴并不遥远

——第一届中欧论坛文集

主编 于硕

第一部分：期待中的欧洲与中国.....6
第二部分：全球化中的世界治理与中欧相逢.....20
第三部分：欧洲运行机制：同一与多样的管理.....54
第四部分：中方学者论中欧关系（评论与回应）.....106
第五部分：大会总结 128
第六部分：背景文献.....140

前言

从欧洲经验到人类社会认同

卡蓝默　于硕

如果说有一个口号可以振臂高呼，那就是“把和平变成史诗”。而颇多贬抑的是那句“幸福的民族没有历史”，它将人类的艰难求索化简成某个帝国的官方史书、统一建制，旌旗箭戟中血流成河，胜者王侯败者贼。

欧盟的创立和建设，堪称是一棵古老神奇之树结出的果实，或许也是当代历史最卓著的成就之一。由某种前瞻的激情所推促，带着隐约不定的直觉，也伴随着沉甸甸的妥协，摇摆犹疑，焦虑探索，竭尽全力的坚持。欧洲是一部伟大的和平史诗。

从法德和解到欧洲统一，从战后重建到寻求可持续发展，从欧洲各民族主权国家的巩固到探讨多元统一的动态世界治理，从国家的敌对较量模式到世界社会的责任合作模式，从强制的法律到自主的伦理，正是这一系列的顽强的求索使欧洲走出杀戮和自杀的历史，在短暂的五十年中立下值得被述说的一块块里程碑。作为人类经验可供参照的一种模式，欧洲给未来五十年的世界史的书写留下了一部杰作。

然而，曾几何时，欧洲伟大史诗的馨香似乎淡漠了，品尝和平的时日已久，欧洲人反倒有些司空见惯了，多少失去了对它的热情。那我们为什么不请欧洲建设者们来和世界上渴望和平的人们一起来重温这一历史，来重新唤醒一个深沉的记忆呢？为了直奔主题，免去杂陈，干脆就让他们自己来述说，让他们相互述说，让他们向中国人述说，因为没有什么比得上其他文明的审视，即所谓的镜像效应，更能够使我们摆脱自己的想当然，进而在冗杂的历史事件中梳理欧洲的独特性及其中所包含的普遍教诲，并使后世受益。

一些杰出的欧洲建设者们愿意与我们一起去中国，参加2005年10月在广东南沙召开的第一届中欧论坛，向热情的中国朋友们面对面地讲述自己的经历。他们所见证的欧洲并不难理解：在她纷繁复杂的历史背后，曾有过几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在多元的国属和丰富的文化之上，有着几个简单却坚定的信念。

欧洲和平的史诗在中国获得倾听，从南沙的与会者到人民网、新浪网、新华网上的网友，人们为这一宏大史诗而感动、而深思，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亚洲的和平建设和认同，那又将是怎样的一个艰难的历程！如同法德和平谈判始于如火如荼的战争当中，需要的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它甚至超越了至死复仇的斗志，用人性善的力量将过去的仇恨转化成未来和平的动力。亚洲和平的建设也需要一种超越历史宿怨的伟大宽恕。

不久前，我们出版了法文版的南沙文集，*L’Europe c’est pas du chinois*。大家知道，我们的图书馆里关于欧洲的学术性著作汗牛充栋，何必再加一部？因为该文集的特色在于，言说者是那些欧盟建设舞台上的主角，发言权被交还给了这一伟大历史的见证人。欧洲联盟诞生于二战之后，并一点一点地扩展。它使得欧洲在柏林墙倒塌之后能够重新统一，至今已拥有 27 个成员国。进入欧盟，要求这些新成员国必须放弃某些方面的国家主权，以便建成一个新型的欧洲政治机体。

这些故事在中国引起的热情和反响使所有欧洲与会者深受感动。反观欧洲，正在精神危机中沉闷徘徊，她的奠基者的热情被失望销蚀着。我们出版这部文集法文版的动机之一，就是让欧洲公众重新唤醒曾有过的史诗情怀。我们渴望欧洲读者在阅读这些见证及中国学者的评论时，也能从中体会到我们在南沙感受到的思想的愉悦。该书法文版出版后的反响如此热烈，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书中述说的难道不都是欧洲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吗？我们发现其中的心理镜像效应：因为是对作为他者的中国人讲故事，同样的故事便有不同的讲法，居然生成了让欧洲人感到新颖独特的文本。正是有了对话者，我们才会走出自己；我们所讨论思考的问题才有可能不再只是自我相关的，而是关于共同的生存世界的。只有这时，“他者”意识才会引导人类走向神圣的“我们”。

您眼前的这本《欧罗巴并不遥远》是南沙论坛文集的中文版。它不是法文版精致推敲的笔译，而大都是大会发言同声传译的记录整理。两者差别很大，但却保持了基本观点、亲身见证的一致。娓娓道来的口述，反倒避免了笔译常有的生硬。随着书页的翻动，欧盟建设的几重框架在您眼前构建起来。这虽然是欧洲行动者从自身的问题及忧虑出发构建的框架，中国读者却可以在中国当下的历史性中阅读这些历史经验。

某个未来学家曾说过一句俏皮话：“历史从未如此地无法预料”。这句显得悖论的话却包含着深邃的道理，将我们安置到过去、当下和未来的共时场中。指向未来的当下社会的急剧变迁，使人们对自身质疑，进而对自己的历史或他者经验进行重新阐释。过去的事情吸引我们，固然是因为它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或各民族起源、文明演变分殊的资料，但我们对历史的兴趣不止于此，如同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回顾过去是为了针对当今问题重温历史经验，上下五千年，在中国、希腊或罗马，史家或政治家都很清楚这一点。其实，一个社会、一个政府从过去或别人那里吸取经验教训，向来都是最天然的策略，“他山之石可以功玉”。欧洲经验是珍贵的，尽管有人强调文化差异并怀疑欧洲经验在亚洲的可行性。的确，愿意分享他者的生存经验，需要一种境界，一种相信人类精神共性的超越存在的宗教式情怀。而了解其它民族的历史经验，正在于它可能开启我们的心智和眼界，发现我们的习以为常的或从未进入的“未思”的主题，发现自己和他者竟是息息相通的，发现被忽视了的共同史。

尽管距离遥远、大漠重山将它们分隔，中欧之间的交流却源远流长，两个社会从未停止过相互影响和相互吸引，即便兵火交加，也是这一关联性的证明。而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急速发展所引发的问题，促使我们两个社会重新思考自身和相互间的历史借鉴。

2006 年秋天，中国推出了《大国崛起》的电视片，从二元线性思维出发，讲述了近代以来九个欧洲（西方）国家如何通过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逐渐取得了世界范围的强国地位。影片在中国引起巨大兴趣，因为它暗示出中国目前以其拥有的经济力量，将以“和平崛起”的方式变成下一个世界强国。愿望自然无可非议，然而时代的错位却显而易见。以往的大国崛起都与主权国家的建立同步，而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的逻辑正在发生质的变化，新挑战、新技术、新时空、新环境……人类第一次不依人的意志为尺度地成为了唯一人类。单纯的主权国家间的力量制衡已相当无效，世界的治理从需要创新模式，命运息息相关的各国间的协调以及世界公民的参与治理成为必需。制造唯一大国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而每个大国都必须比其他小国更多地承担在世界社会中的责任。

2005 年的南沙中欧论坛始于欧华学会秘书长陈彦博士的一个提议，回应中国社会了解欧盟建设的愿望，请欧洲人自己谈欧盟建设五十年的经验教训，大家一起想象这一历史给中

国和亚洲的和平建设可能提供的启示。我们当时还只是把它当成一次性的思想交流活动。但是大会闭幕之后，处于高度疲劳的我们两人相互祝贺，喜忧参半地说："看来我们不得不把它开下去了。"它的成功促使我们产生了一个雄心，即把论坛变成中欧社会之间、两个伟大的文明之间的持续对话，一个相互理解、提升智慧的擂台。论坛每两年举办一次，轮流在欧洲和中国举行。它的关注点也不再只是外交逻辑中的双边关系，或者知识逻辑上的相互介绍，而是中国和欧洲的同仁们每两年聚一次，讨论共同面对的精神的、环境的、制度的、经济的危机，发掘古今的治理智慧，以便共同担当我们人类生死攸关的命运，守护我们唯一的地球家园。

值此书付梓之际，第二届中欧论坛即将于2007年10月4日至7日在欧洲的23个城市和欧盟所在地的布鲁塞尔召开。与第一届论坛的代表构成不同，第二届论坛将把各个领域有良知的人们汇聚一起，有总理也有农民，有企业家也有艺术家，按社会职业和重大主题分成46个研讨组，将有大约280位中国的和800位欧洲的各界人士出席。代表们将从各自的生存经验出发，每个与会者都是主发言人，拿出时间说自己，踏踏实实听别人，知晓彼此的感觉和困惑，分享创造的激情和共通的价值。

从中国的角度而言，论坛的象征意义或许更大：参与论坛，是中国人以主体身份参与世界治理思考的一次充满挑战的实践。我们或许不再说"中国和世界"，不再说"走向世界"，而是在"中欧论坛海航专机"起飞前说"重归世界"。

我们期待中欧论坛成为社会与社会对话的持久空间，一个提升人类认同意识的超越的思想社区。

什么将是第二届中欧论坛文集的题目？

卡蓝默 (Pierre Calame) 中欧论坛创始人、欧洲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FPH）主席
于硕　中欧论坛总监、法兰西人文政治科学院未来关系研究会（ASMP-AFR）主任

第一部分：期待中的欧洲与中国

1.1 开幕词

2005 年 10 月 4 日上午，广东南沙新城阳光明媚，海风吹拂。第一届中欧文化论坛正式开幕。是什么样的雄心促成了这一思想的盛宴？论坛的意义和使命何在？它能为中欧乃至世界的未来提供怎样的思考？论坛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欧洲与世界”为副标题，各主办方和嘉宾在开幕式上的致词表达了他们对论坛的关注、思考和诚挚的期望。

★东道主霍英东先生

二十一世纪，在全球化冲击下，人类命运正经受着一场新的挑战。发生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里的事件都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我们每个人，只有用真诚、热情、相互信任和相互支持才能适应新的全球发展势态。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欧洲与中国这两个古老文明的历史经验、深厚的传统资源和当下对全球发展的积极探索，可以携手为明天的世界提供新的精神价值。我为南沙新城有幸成为欧中论坛的始发点，为各位关心未来世界进程的朋友在南沙新城找到一个思想交流的公共空间，感到非常高兴。我希望未来的人类社会是人本的、自然的、公正的、和谐的社会。同时希望我们的大会是自然、热烈、积极、和谐的大会。

★欧华协会会长关愚谦先生

感谢老前辈、老朋友的霍英东先生，为论坛提供了南沙这块宁静的、象征着理想主义的空间。德国前总理斯密特先生也是我的朋友，他因为健康原因不能前来，特地让我向大家转达他对此次论坛的关注和期待。斯密特先生是西方政治领域中最了解中国的政治家，他的著作《未来的世界强国——中国和印度》现在中国各地都可买到中译本。

欧洲华人学会自 1981 年成立以来，一直希望成为连接中国和欧洲的一个桥梁：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欧洲，开拓到西方；而这次大会的目的，则寄希望于把西方的经验带到中国。我们中国要学习西方，学习英国的法律、德国的严谨、意大利的浪漫和美国的进取，但是我们不能照搬。西方也应该学习中国、学习我们中国的和谐和容忍，学习我们中庸之道的思想。中国要成为一个先进的国家、富强的国家，任重道远。首先要整理中国的文化传统，也要整理西方的文化传统。然后在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基于中国五十六年的建国经验和教训，提出自己新的理念。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袁卫教授

此次论坛的召开恰逢中欧建交 30 周年，中欧关系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中欧关系发展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对中国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欧洲的发展稳定也至关重要，可以说中欧关系的发展体现的是双赢的关系。当然中国和欧洲国家之间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贸易摩擦，解除对华禁售武器、人权等等。但是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协商与对话来解决的。本次的论坛正是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非常高兴中国人民大学欧洲中心能够和多方合作，参与到这个论坛的主办工作中来。

★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

2004 年下半年，北京发生亚洲杯事件，当时中国球迷跟日本球迷的一些行为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映。我的一些法国朋友对我说，你们这些球迷的做法太过分了。一个日本球队来中国比赛，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对这个球队进球却不容忍呢？这件事情对我刺激很大，后来我也跟我的朋友郁白先生的前任法国驻华公使燕保罗先生交流了看法。他跟我提出来，能不能搞一次研讨会，请中国、日本、德国、法国坐在一起谈谈，交流一下思想？今年 4 月份我在法国访问的时候，国内出现了反日的游行，15 号我回到国内，16 号接到通知开会，要我 17 号去大学讲话，谈中日关系。从政府给我的要求来看，在出现这样的反日游行的情况下，政府还是希望中日关系能够继续发展下去。4 月 25 号，皮埃尔·卡蓝默先生请我吃饭，提到了论坛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点子非常好。在我看来，欧洲的历史和经验，完全可以给中日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

中日、法德之间能进行对比吗？反对的人可能会说，中日战争对中华民族造成的伤害太深重了。中国和日本按照周总理的说法，“两千年友好，五十年战争”。法国和德国呢？在座的罗卡尔总理可以证实，自公元 814 年查理曼大帝去世后，他的儿子、孙子们就打起仗来，法国和德国打了一千多年。可是现在法国和德国再也打不起来，这个做法和经验，是不是值得亚洲人研究呢？我认为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多少年来，人类一直在祈求永久的和平，但有的却是过去四千年里的一万四千五百场战争，包括最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法德之间定了多少的和约，包括联姻，最后都破坏了，打了一千多年。可是今天法德两国打不起来。欧洲议会所在地斯特拉斯堡，就在莱茵河边上。大批的法国人到德国上班，大批的德国人到法国上班。这说明什么？我认为 20 世纪以来，国际上出现了一个大的趋势，就是双边难题、多少年解决不了的难题，通过多边框架得到解决。我认为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所以举行这个论坛中国人、欧洲人坐在一起谈谈是非常好的。论坛之前我与欧盟创始人之一让·莫奈先生的办公室前主任乔治·贝尔图安（Gerges Berthoin）先生共进午餐，谈了三个小时。老人已经 80 多岁，睿智开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法德之间和解谈何容易！战争刚刚结束，双方之间的厮杀刚刚告一个段落，马上就要搞一个联合！为什么要搞？贝尔图安先生的回答是：“针对荒谬的世界大战提出一种新的做法”。这样的主张在当今世界不是值得研究吗？

2001 年 4 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访问欧洲，说了三句话，‘文化的交流是思想的交流、感情的交流、心灵的交流。’ 他的三句话讲得太好了，得到法国方面的积极响应，包括希拉克总统，很赞成他的看法。我认为在中欧关系进入了一个最好时期的时候，如何把中欧关系的潜力发挥出来，需要交流，更需要文化的交流。所以这个论坛，在中文的翻译里加一个‘文化’，我觉得非常好。我相信在中欧关系进入一个上升的时期，是潜力最大的时候，中国人、欧洲人坐在一起谈谈，交换一下意见，这一定会产生思想的火花，而这种思想火花反过来又可以进一步促进中欧关系的发展。中欧关系的发展不仅对中欧有利，而且对世界有利最后我衷心祝这次论坛成功！

★中国欧盟研究学会会长**伍贻康**教授

南沙新城举办如此盛大规模的论坛，无疑是中欧建交 30 周年的大庆献礼，体现了中欧积极探寻欧亚大陆、东西两极两大力量在多极化世界当中如果协调、共赢的决心和信心。当今世界正处在有史以来最迅猛的发展和最激烈的变革的时期，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全身心地致力于和平发展、探索创新发展模式的关键时期，欧洲也正在处于将欧洲一体化发展模式向更深更广更高方向发展的十字路口。中欧双方都在努力创造有自己特色、对全球和区域治理能够做出贡献的创新发展模式。这一任务意义极其重大，却又非常艰巨，但它的成功必将造福后代，流芳百世。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关键时刻，我们在这里举办中欧高层次的文化论坛，我相信有很多值得关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值得交流。中国从事欧洲一体化研究、热心中欧友好合作的学者，对中欧扩大和加强文化思想交流寄予厚望，期望中欧这两支力量在加强经贸关系

和扩大政治合作的同时，能够进一步加强紧密的思想文化交流。相信我们的研讨能为中欧友好大厦添砖加瓦，丰实基础、扩大视野、开拓创新，追求美好的未来。

★法国前总理**罗卡尔**先生

亚洲尤其是中国，正在世界经济与贸易活动中，扮演着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与他们巨大的人口数目是相适应的，这本身就是一场大革命。经济上中国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世界经济，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改善，这也意味着她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重新找到了一个平衡；同时也意味继贸易之后，中国将在金融、外交政治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其重要程度目前无人能够想象。然而这种变化是最艰巨的，最好以和平方式进行，正如中国政府所宣称的那样。但和平发展并不会自动出现，它必将引发频繁并且深刻的利益冲突。由于人民之间的缺乏了解，无知常常导致怀疑甚至冲突。当今世界，金融状况还不稳定，无法对全球化进行很好的调控，因此全球化带来的益处无时不受到其所带来的不平等加剧而消解。正如97年亚洲金融风暴给人民带来的恐惧。今天的生活可以说存在过多的恐惧。它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欧洲有些人拒绝欧洲宪法草案？出于对未来的恐惧，法国和荷兰对欧洲宪法说了不同时，不受控制的全球化也影响了第三世界，比如一些在历史上遭受蹂躏的伊斯兰国家，全球化下他们看不到希望，而绝望滋生恐怖主义。但是目前中国显然到处充满未来会更好的希望。

我希望双方促进相互了解，交流智慧，逐渐消除和减少中欧间的分歧、误解，不断构建新的合作，在彼此间搭建更多的桥梁，使我们得以跨越将各自分隔的文化差异。中欧文化论坛正是这样一座桥梁。为建起其他更多桥梁，需要时间和双方的努力，需要经常会面和交流才能建立更多的友谊。建设一个和谐社会不容易，也不是必然的，也许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大胆的、或许有些疯狂的想法来改变世界。我预祝首届论坛成功并希望它长期办下去，成为21世纪一个更加和谐社会构建的开始。谢谢！

★澳门欧洲研究学会主席**麦健智**先生

澳门欧洲研究学会的经验告诉我，研究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并进行相互交流，是加强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的最佳途径。在中国和欧洲建立外交关系3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可能处于最好的一个历史时期。正式外交关系和民间的交流都非常重要，后者为我们构造了加深了解和加深友谊的桥梁，通过这种民间的交流，友谊才能持续发展下去。在很多问题上，在广大的民间取得的相互了解，不总是官方关系所能达到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种交流在欧洲使更多的人喜欢上了中国，对中国产生兴趣，尽管许多人没有来过中国，或者只在中国待了很短的时间。同时也使中国人更加了解欧洲，中国人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其他人的文化，但是使他对他文化产生兴趣和了解，这是同等重要的。

★中欧论坛的核心人物，欧洲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蓝默**先生

能够参加这次论坛的开幕式令我非常激动。我的朋友罗卡尔总理、吴建民大使刚才表示他们非常重视这次论坛，这进一步加强了我的信念。罗卡尔先生说到我们二十一世纪的梦想或许有点异想天开，就是建立和平、实现和平。我是相信梦想的人，我知道梦想非常强大。欧洲经历两次大战以后，产生了一个梦想，就是建立一个和平的欧洲，这在当时看起来显得有些妄想。但有很少一部分非常坚定的人，通过务实的活动逐渐将梦想变成了现实。我们这次论坛就是一些人梦想的实现。比如吴建民大使，欧华学会秘书长陈彦，人民大学宋新宁教授以及我本人。霍英东先生在一片荒滩上建成一个城市和我们所在的华丽的酒店，这也是梦想的实现。就我所主持的梅耶人类基金会而言，一个小小的基金能够主办一个关于中欧关系的如此宏大的论坛，或许有些奇怪，但信念令我们意志坚定，秉持着自由与独立的理念，我们在

此次论坛的筹备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当今世界存在一个悖论，那就是无控制的全球化的加速与世界政治共同体的缺席。这其中潜藏着许多危险，我们有责任竭尽全力去促进建立国际社会治理的共同体。我想这些共同体不仅是政府、学术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各自之间的组织，也是由所有这些领域共同参与建立的世界公民社会共同体。我坚信这次中欧论坛是世界性的，迈出了非同寻常的一步。我期待与会代表参与未来的双年论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徐真华**教授

罗卡尔先生谈到 “建设一个和谐社会不容易，也不是必然的”，然而，我们又总是在努力，“在彼此分隔的境况下建立一些相互交流的桥梁”。作为大学的领导者，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我们在日常教育工作中又能做什么？进一步的追问是，我们怎么看待文化我认为文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不是封闭的系统。特别是当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应该更清醒地意识到多元的文化所提供的多种可能性。米兰 • 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告诉我一件事，那就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无限可能性。文化也一样。

罗卡尔先生讲到，‘利益的矛盾’，这种矛盾如何解决？在外语外贸大学近期的讨论中，我提出教育观应该三个转变：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教学生学什么，更应该注重教学生怎么学；不仅仅要教学生做什么人，更应该注重教学生怎么做人；不应满足于教学生实现什么，更应该注重教学生怎么思想。只有对本文化和其他文化及民族具有理性、客观认识的能力，在为人处事有理性的态度，学会在交流中达到共识，才有可能更好地解决罗卡尔先生提到的“利益的矛盾”，才会为世界和平、繁荣、昌盛做出他应有的贡献。而这正是我们这个论坛的意义。

★临时到会的法国里昂第三大学校长**居伊·拉夫海勒**先生

我非常荣幸作为法国大学的学者来参加这次论坛。法国里昂让•穆兰大学是一所综合大学，包括法律、管理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及外语诸学科。我们去年建立了一个中欧文化研究学会，在北京和里昂都有分支机构，最近这个机构还在里昂大学举行了纪念中国诗人戴望舒的活动。而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里昂大学就成立了中法协会，所以我们的交流有很长的历史。我们正在考虑和人民大学以及孙中山基金会在文学，跨文化研究及法律等领域进行合作研究，并非常希望有可能共同指导博士论文。我们在这里的作用就是促进交流，这种交流不仅是贸易的、金融的，更是人与人之间的。里昂城内有三条河流，因此有许多桥，而我们的论坛也正是一座桥梁，希望它能够拉近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距离。。

★法国驻华公使**郁白**博士

法国政府和法国大使馆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论坛。2005 年 5 月 29 号，欧洲的列车已经停进火车站，它的驾驶者包括荷兰和法国等[1]。很多人为火车停驶感到失望，最失望者中出乎意料地包括一名乘客：中国。早在六十年代，欧共体还在构想之中时，周恩来先生就对我们驻北京的大使坦露，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比欧洲更坚定地欧洲化。总理先生还说，不久，欧洲将比世界预想的更好地统一。

中国人是有道理的。因为欧共体的建设为世界和人类的未来带来了三个重要保障，一个强大的欧洲为国际秩序的稳定提供了保障，一个经济繁荣的欧洲为不发达国家，特别是非洲和亚洲贫穷地区的发展提供保障，一个独立的欧洲，在全球化进程中为文化的多元性提供保障。中国人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里我可以说欧洲和中国是被共同的命运连到一起的。中国人说这叫做**有缘分**。我在次转达法国政府和法国大使馆对论坛成功召开的祝贺。

[1] 指法国和荷兰公投对欧洲联合宪章的否定。

★欧华学会秘书长**陈彦**博士

首先特别感谢霍英东基金会、霍英东先生本人以及何铭思先生，何建立先生对论坛的大力支持，如果没有他们，我们是不可能在这里聚会。论坛成功召开，也归功于中方组织者人民大学和外交学院，还有许多未到会的朋友的支持。作为欧洲中国学者的组织，欧华学会特别感谢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对我们在论坛组织动员工作上的全面支持。

第一次论坛的中心议题是欧洲，而非中国。但是有中国参照系的欧洲，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欧洲统一。希望把欧洲的话题，把中国和欧洲关系带入中国，带入中国内部，带到一个公共讨论空间。大家能够聚在一起，讨论欧洲问题，这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从我们一开始的设想中，就努力避免把欧洲和中国的关系问题留在一部分学者的象牙塔中。也不仅仅是在经济、政治的专门领域，而是要进入到中国的公共话题中，打破学科、社会各界的界限，达到在这方面的融合。我们希望，欧洲与中国的关系、欧洲本身的发展和欧洲的借鉴意义等，能够通过论坛成为一个公共的话题。在中日关系上面，我们遇到问题就谈很多，没有问题就谈得少。然而我们希望在没有问题、关系很好的时候也要谈，既要谈好的一面，也要谈坏的一面，讨论可能出现的摩擦、关系僵化等问题。我们希望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讲，让大家有一个认识。在欧洲的经验里面，法德之间的关系能够和解，如果没有公共理论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参与论坛的人员中，不仅仅有学者，还有政治家、有军事家，有公共活动家、有艺术家，这就为我们从不同角度来讨论欧洲和中国的关系提供了可能。论坛的安排也很多样化，有大会、有分组会议，有总结。希望大家能够形成一个会后的互动关系，保持讨论的持续交流。

1.2 欧洲之于中国的意义

陈彦（中欧论坛创始人、政治学者）

近代以降，欧洲之于中国的意义是不证自明的。近代中国的先知先觉者严复、孙中山、陈独秀无一不是从西方寻找灵感的。当然，西方包括欧洲与美国两个不同的地域范围，但严格来讲，谁可以说美国不是欧洲文化在地缘上的延长！如果一定要将二者分开来看，相对于建立于新大陆的现代美国，欧洲与中国的共同点是二者都背负着沉重的历史传统。富有暴力色彩的法兰西大革命为什么对中国精英志士有着持久的吸引力？那是因为，在一块新大陆上平地起家与在积淀深厚的文化梯田上另打炉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欧洲对于中国的长久诱惑正是因为在欧洲冲破传统重负的过程中潜藏着中国步入现代的秘诀。

不过，如果说历史意义上欧洲对中国近代化的借鉴作用甚为明了的话，当今正在行进的欧洲联合工程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意义在中国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重视。从10月4日至7日，我们在广州番禺南沙新城举行首届欧洲－中国论坛，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欧洲与世界”命题，希望通过对欧洲联合进程的讨论，引起舆论对欧洲、尤其是对半个世纪以来欧洲联合的关注。也就是说，论坛讨论的主旨就是欧洲联合事业以及其对中国与世界的借鉴作用。

作为论坛的发起人，我以为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讨论此次论坛的思路：

第一个层面是从最直观的意义上来看欧洲联合。半个世纪以来，欧洲各主要国家不懈努力，寻求欧洲经济与政治的联合。欧洲联合的进程无疑也就是欧洲统一的过程。欧洲统一的梦可以上溯到古代。从古罗马帝国到中世纪基督教在欧洲的一统天下一直到近代拿破仑帝国蓝图都是欧洲统一梦在历史上的反映。欧洲思想家卢梭、康德、雨果等等都有关于欧洲合众国的构想。欧洲绵延不绝的统一梦同中国历史寻求统一的强烈意愿不谋而合。比较欧洲与中国的统一观，能否说明人类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开疆拓土永无休止的统一与扩张的梦？为了实现这一梦想，暴力、征战、外交、结盟，何种手段最为有效？以何名义最为正当？能否为了梦想而不择手段？如果说传统上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统一均是以生灵涂炭作为代价的，欧洲联合所开创的从经济到政治的统合道路则是全新的历史创举。这一统合经验对中国统一有否借鉴作用？二十一世纪的人类能否理性与自觉地驾驭统一之梦？

第二个层面是全球地缘政治版图上的欧洲建设。一般说来，我们习惯于从外部看欧洲联合。外部看上去的欧洲联合是一个以统一为最终目的从分散走向整体的过程，是当今世界上走得最远的地区性整合。这一整合如果成功，将从根本上改变二十一世纪世界的政治分野与战略态势。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略欧洲联合的内在机制。从这一角度看，欧洲联合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以民主方式尝试建构社会制度的独一无二的社会工程。有学者将这一工程称为人类最后的“乌托邦”工程。

将“乌托邦”带入欧洲建设与全球化的框架中去思考，欧洲建设的理性主义特点昭然若揭。二十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曾经梦想过，但又在梦想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但是面对残酷的现实，欧洲没有放弃。欧洲不仅没有放弃，而且仍然坚决地举起了理性主义的大旗。欧洲联合的努力，意味着欧洲人自强不息、不甘听任命运宰割的韧性。不过，欧洲联合中表现出来的理性主义特点是对二十世纪傲慢与强制型意识形态的超越。欧洲建设是一种将传统精神与把握未来的渴求结合起来，和平地、渐进地锻造社会制度模式的磨合、趋同的过程。从全球的视角看，欧洲与美国体现了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不同取向。以法德为主的欧陆所表现出来的以平等为主的温和左翼精神同美国的自由、市场导向色彩形成对照。对欧洲联合的更多关注，能否重新燃起我们的理想之火？能否有助于我们在文明价值序列上更好定位？能否促使我们在自由、市场、平等、正义及我们的文化传统之间有更多的思考，从而作出更为理性的选择？

第三个层面是从历史长程的视角来看欧洲联合。法国思想家莫兰曾指出过欧洲联合上的一个令人回味的悖论：欧洲要走上联合之路，但这条路的最重要的共同基础只不过是因为欧洲有一个冲突、分裂和战争的过去！是的，人类从来不缺乏和平的意愿，人类文明典籍中有关和平的呼唤也汗牛充栋。然而，人类的历史仍然充满残酷、血腥、冲突、战争。欧洲曾经相信，近代以来从欧洲发源的民族觉醒的潮流，可以将人民、族群带出专制、强暴、帝国、霸权的魔掌。然而，民族兴起至今的历史表明，暴力和战争不仅仍然同人类如影随形，而且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相互激荡，酿成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苦果。回望历史，人类寻求和平，为什么获得的却是战争？难道和平与战争本身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有没有可能从战争与和平的漩涡中超越出来，构筑更高层次的民族国家关系模式，从而永久告别战争？

这正是欧洲联合寻求超越民族国家模式，追求主权共享的意义。欧洲联合之路是一条寻找新的人类社会制度模式，重塑近代以来民族国家之间交往规范的超越族群、超越民族国家甚至超越宗教、文化的探索之路。欧洲联合的历史实践，使人类看到了跳出暴力、专制、战争、霸权的历史循环的希望。以法德和解为例。没有欧洲联合的大框架，没有超越民族利益的大设想，没有建构新型国家关系模式的大目标，法德的历史性和解是难以设想的，或者即使和解也难以巩固。显而易见，如果法德和解模式可以作为中日关系的借鉴，欧洲联合也可以作为二十一世纪处理世界各国关系的模式参照。对于处于国力上升阶段的中国和亟须重新调整战略平衡的亚洲说来，欧洲超越战争与和平的旧模式，锻造全球关系新模式的借鉴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将这一话题引入国人的视野，开创欧洲与亚洲、中国与世界对话的新空间，正是我们创设双年欧洲－中国论坛的要旨所在。

本论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论坛，因为论坛希望每届讨论的问题都是能够引起公众舆论关注并以欧中及世界为背景的主题。论坛也主张既面向多学科，又向社会各界代表开放。论坛不仅仅旨在为欧中双方思想、战略对话建立一个有效的民间渠道，也希望尽可能向欧中双方公众传达欧中社会及世界变迁的信息及其对策，寻求与双方媒体及公共舆论建立合作与互动机制。

1.3 中欧双年论坛的理由和雄心

罗卡尔（中欧论坛创始人、法国前总理及欧洲议员）

在亚洲地区，特别是亚洲的中国，凭借其人口大国特点和自身的巨大变革，已经在经济活动和世界贸易当中重新取得了重要的地位。

这场巨大而进步的变革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它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例如出口增长迅速，这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迅速得到提高。

此外，这也意味着中国在发展同世界其它国家间关系的过程当中，重新取得了平衡。这还是新的、重要的一点。

最后，这也意味着中国将要在世界上逐步取得首先是贸易、其次是金融、政治、外交方面等等，那些至今我们还无法充分想象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项变革是极为困难的。就如同我们所期望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宣告的那样，它需要以和平的方式来实现。然而，要知道，这种平稳顺利并不是自然而然的或是天意安排的。

存在着不断的、甚至是严重的利益冲突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们彼此间了解还不够深刻，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容易从互不了解到产生偏见，再从偏见发展到矛盾冲突。此外，不容忘记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的金融世界当中，全球化进程尚未完全走上正轨，更有甚的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常常被迅速严重的不平等化，系统的不稳定性和由其带来的就业的不稳定所抵消。

这些影响使人们感到害怕。全球化的这些不良影响部分地解释了荷兰人民和法国人民为什么对欧洲建设法案持否定态度。同时也解释了伊斯兰教人民在他们长期屈辱的历史过程中看不到一种更好的生存方式在他们的国家被确立的希望。这种失望的情绪不能说与恐怖主义的滋生无关。但就是这样一个世界构成了我们今天和明天全部的日常生活。

两个巨大的重要的经济、金融实体——中国和欧洲——都为世界的和平与对和平的追寻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我们不应冒险眼看着金融和贸易方面的不稳定，转化为威胁双边相互理解与相互友谊的因素。我们清楚地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经济危机而爆发的。

所有的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必须加深相互了解，彼此开放，在二者之间创造一个真正的伙伴同盟关系来理解差异，彻底消除彼此间的误解与隔阂，将此次会议转变为一种深化双方新型合作关系的机会，继续扩大多种沟通渠道，跨越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鸿沟。

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多次的会面和深厚的友谊。

建设一个和谐、平稳发展的世界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然而，这就是我们今天相会在这里，举办这次盛大的中欧论坛所要谈论的话题。二十一世纪只要我们同心协力，世界必将能够呈现出一个尚未开始的和谐局面！

1.4 中欧共同面对的三个挑战

郁白（法国驻华公使）

各位来宾好！在此我想简单地讲两三件事情。

法国政府和法国大使馆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论坛。2005 年 5 月 29 号，欧洲的列车已经停进火车站，它的驾驶者包括荷兰和法国等[2]。很多人为火车停驶感到失望，最失望者中出乎意料地包括一名乘客：中国。早在六十年代，欧共体还在构想之中时，周恩来先生就对我们驻北京的大使坦露，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比欧洲更坚定地欧洲化。总理先生还说，不久，欧洲将比世界预想的更好地统一。四十年后，中国仍然保持着这一态度。中国人很失望地提问：你们在做什么？为什么停入火车站了？请重新进入全球化的轨道！

中国人是有道理的。因为欧共体的建设为世界和人类的未来带来了三个重要保障，首先一个强大的欧洲为国际秩序的稳定提供了保障。其次，一个经济繁荣的欧洲为不发达国家，特别是非洲和亚洲贫穷地区的发展提供保障。最后，一个独立的欧洲，可以保障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文化多元性，这是我们在全球化情况下更应该时刻提到的。刚才罗卡尔先生提到，要使世界和谐，就一定不能让世界变成一个单一的模式，这在欧洲的建设过程中，在新世纪到来之时，具有非常关键性的意义。中国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里我可以说欧洲和中国是被共同的命运连到一起的。中国人说这叫做**有缘分**。

中国为欧洲重建提供了巨大的机会，这也是我们实现梦想的最大可能性所在。因为中欧关系正在经历三个重大挑战，一个是经济方面的，就是建立伙伴关系。与其有一天欧洲和中国在世界上成为对手，我们更加希望看到的是，中国有很多的欧洲公司，中国公司也去到欧洲发展，我们可以相互结合起来。这比前面描述的冲突和对立要好得多。我们在航空、核能、铁路运输、空客建设的方面进行了合作，比如在中国生产欧洲的空客。我们为什么不能欧中合作建造一辆高速列车呢？这样可以进一步减少欧中之间产生冲突的可能性。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想大家都会给出肯定的回答。

第二个挑战是政治方面的。在前面的发言中，有人已经提出欧亚大陆问题，欧亚大陆是变成一个团结的大陆，还是一个冲突对立的大陆？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中国在亚洲大陆的东部，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纳入友好对话中来。在亚洲的中部有一个比较动荡的地区，我们是否能够通过在亚洲和中国之间的联系来解决这些问题？对解决伊朗问题，中东问题和巴基斯坦问题做出我们的贡献。刚才罗卡尔先生所说的，我们面对的命运，并不是必然的、确定的。

第三个重要的挑战就是文化方面的挑战，这是非常自然的。现在世界正在全球化，甚至有人把这个“文化”硬性地规定为一种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文化和欧洲的文化都面临着自身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我自己对法国文化有着很深的感情。我们能否能在未来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多极性的同时，也能使自己的文化给别人的文化带来某些启示，而不是大家始终处于无知和文化保守的桎梏中？

我们可以讨论“选择”的问题，可是应该说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特别是当中国在不断

[2] 指法国和荷兰公投对欧洲联合宪章的否定。

崛起，欧洲也想进一步崛起，重新走向自己统一的道路时，在这方面我们应当非常慎重地选择。我们应该给予本国人民一种希望，一种有待实现的梦想。

非常感谢与会的代表，因为你们的与会与你们的发言会使我们学到很多东西，谢谢！

1.5 过渡时期的世界与中国的发展及中欧伙伴关系

吴建民（中欧论坛创始人、中国外交学院院长）

卡蓝默先生讲到大家共同面临的五项挑战[1]，这是当今世界所有的人都面临的五项挑战。在讲话中，他还提到了本次论坛的三个关键词，即“相互尊重”、“自由空间”、“经验交流”。这三个关键词，我认为是我们的一个指导原则，是我们今后几天中，探讨欧中合作前景的一个指导原则。我想和大家一起，就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各项挑战以及如何治理今后的世界还有如何建立中欧合作伙伴关系进行一些思考。[3]

首先我想谈的就是现在世界上每一个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正置身其中的历史进程。在我看来世界两极化局面的结束，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我把它看作一个过渡阶段，向一个新时代的过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代表了我们今天转型时代特点的现象。今年 4 月份，我本人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美国，这是一个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专家组成的代表团。这个研究所汇集了中国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它的主任即主席是唐家璇先生。他曾任外交部长，现在担任国务委员，属于国家领导人。我本人是这个研究所的副主席，我们有很多研究各种国际问题的机构。我们到达美国以后，和美国的同僚进行了很多的讨论，包括学术界、政界等的朋友；到访了白宫和其他机构。我们通过交流获得了这样一个印象，今天美国正在开展一场关于对华政策的大辩论。实际上，对中国实施一个怎样的政策，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有人跟我说，现在美国有三种思潮，第一种认为中国是一个威胁，应该遏制中国。就像过去对苏联所推行的遏制政策一样，遏制中国的崛起。第二种思潮认为中国是一个合作伙伴，我们之间的合作正在发展，现在双方之间还有很多需要合作的空间。中国不是美国的对手，而恰恰相反是他的合作伙伴。第三种是我们正在观察和思考，只能看目前的形势，目前中国的表现还不错，但是从长远来看，如果把目光放到更远的将来情况就不是这样肯定了。目前这三种观点，持第一种观点的人是少数，第三种则是大多数，大多数人都在观望。

今年的 5 月份和 9 月份，我曾经两次到访日本。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我是国际展览局的局长，日本爱知县所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也是第一次把环境作为博览会的主题，在博览会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和他们接触后，我也听到了关于中日关系的同样的或类似的三种观点。所以现在可以说，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今年 8 月份，我还去过一次东京。这次去东京并不是去处理中日关系或参加世界博览会的，而为了参加一个叫做国际东亚思考论坛的活动。因为几年前我参加的 10＋3 的会议曾经决定建立一个机制，就是东亚地区的国际思考论坛，这一机制的目的在于发动学者研究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问题。我和东南亚地区的学者进行了很好的交流。东京之行使我也看到了一种忧虑，即对今后中日关系的忧虑。有人说东亚地区共同体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中日关系，而现在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所有的一切都反映出我们目前所经历的这一转型。这个转型期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正处于一个非常不稳定、正发生各式各样变化的时期？大家知道去年 7 月份，一名中国的将军，中国国防大学的教授，会见了一批外国记者并发表了一些言论，这些言论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说到台湾问题时，作为一名将军，他说解决台湾问题首先要使用核武器，这就冒着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危险。怎么办呢？那就要牺牲中国的东部。我没有计算过，中国的东部有多少人口，也许 10 亿。是否可以此为代价用我们有限的核武器攻击美国？这一言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听到这样的讲话以后，我也非常吃惊。一名将军竟然说

[3] 本书为大会论文集，编排顺序与大会发言次序有差异。卡蓝默的“五个挑战”见 2.1.2《欧中交往未来展望与二十一世纪人类面对的五个挑战》

这样的话来，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大家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在今年的 7 月份进行了一个中美日对话，即三方的会谈。在会谈中提到这个将军的讲话时，李肇星作为我们的外交部长立即做出表示：第一，这是这个人的个人观点，第二，他的观点不反映中国政府的立场，第三，他没有被授权发表这样的言论。李肇星先生解释道，换句话说，没有任何比我职务更高的人被授权发表类似的讲话。第四，关于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样立场没有改变。第五，中国政府对台湾的问题立场也是没有变化的，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以最大的诚意，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现在在中国，一名将军竟然敢发表这样的言论，这样的事情是前所未有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我个人认为所有这些都表现出我们目前正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所谓转型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认为这样的时期，一切风险都没有定型，一切事物都在发展，我们可以前进也可以后退，这更表明为什么我们今天举行这样的研讨会如此重要的转型时期呼吁大家都来发表好的观点和想法，因为最好的解决办法都来源于好的建议和思想所以今天这样的研讨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人和欧洲人都在自己的国家生活着，各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文化都也有差异。当欧洲人和中国人走到一起的时候，我们最好是相互交换观点。我认为这样的交流能够产生非常好的思想，并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让大家畅所欲言，我非常同意总理先生、部长先生的说法，我们应该努力创造一个对话空间。

世界处于一个转型过渡时期，任何好的观点和想法都是受欢迎的，可以在类似我们的论坛的环境下提出。卡蓝默先生刚才提到治理世界的重要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因为世界上有 200 多个国家，要做到整体的治理调控何其困难！但正像总理先生所指出的，我们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这是一个疯狂的设想，而从疯狂的想法中往往可以寻求到非常好的建议。

我们现在面临全球化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有三个主题词，和平、发展、合作。这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关键词，也是当今中国的外交纪实。

第一个主题词“和平”非常重要，是前提，对中国来说它更加的重要，因为从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第一次获得这样一个和平发展的机遇。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一直遭到蹂躏，在上海一个公园，曾有一块牌子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件事当时是确实存在的。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认识赵无极先生，他自 1945 年就已旅居法国，他曾跟我讲过一个小故事。在法国居住很长时间以后，他再次回到上海。有一天他和他的法国太太在上海外滩散步，又看到了这个公园，但那块牌子已经没有了。然而赵先生回到旅馆以后，仍然非常伤心。太太问他怎么了，他说看到这个公园就想到以前，所以非常伤心。他已经旅居法国那么多年，想到旧事还是很伤心。所以我想告诉大家，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伤害却一直还在。1840 年以后，中国一直在遭到这样的伤害。1949 年到 1989 年期间，我们有过很多周边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柬埔寨战争、巴基斯坦战争等。现在中国人民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下生活，这是一个前提条件，没有和平不能发展经济。

第二个关键词是“发展”。现在世界正面临经济的发展，世界上仍有 10 亿多人每天的生活费低于 1 美元，非常贫困。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仍有三分之一的人处于贫困生活中。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只有发展才能解决贫困问题。对中国同样如此，我们现在有 13 亿人口，每年有两千多万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只有经济的增长才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同世界各地一样，我们非常重视经济发展。

第三个是“合作”。我们现在面临很多的问题，昨天在美国 CNN 电视新闻中，我看到克林顿总统谈气候变化的问题。我们每天消费太多的汽油和煤炭，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这样的情况如何应对？我曾去夏威夷参加一个政策研讨会，根据美国人的调查，到 2040 年，中国人将拥有大约 5 亿辆汽车。5 亿辆是什么一个概念呢？我当即的反应就是对他们说，也许这

是现实，但绝不是一件好事，而是一场灾难！如果像美国一样，一个家庭一辆汽车不够用，就发展到两辆三辆，这种生活方式、发展模式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单凭一个国家能够改变这种形势吗？我觉得不行，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挑战，需要我们共同面对，所以合作非常重要。

一个国家不可能在孤立的情况下获得发展，中国人非常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为了懂得这个道理，中国付出了太大的代价。1820 年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到全世界的 1/3，但是到 1949 年，仅仅 129 年后就不到 1％了。为什么中国发生了如此惊人的倒退？因为中国封闭了自己，没有跟上当时的发展潮流。为这个错误决定付出代价是公平的。今年是郑和下西洋 600 年的纪念日。一次我和德国的斯密特先生吃午饭，他问我，中国早在 15 世纪，郑和下西洋的时代就已经如此开放发达，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关闭了自己的大门呢？其实是在明朝，确切地说是明宪宗执政的时期，他 1464 年即位，在位三年，当时做出了一个决定，一个对整个中国来说非常致命的决定，就是把所有的口岸都关闭。郑和下西洋是当时全球最大船队，有 1000 多名水手，然而这样的优势就逐渐消失了。由于中国受到外来的屈辱，我们经历了从开放到关闭的过程，现在终于重新开放我们国家。所以坦率地讲，说中国一直闭关锁国，这是不对的，并且中国不会再重新关闭自己的大门，因为闭关锁国的代价太大了。以上三个观点跟总理先生所说的不谋而合，这是我们可以在多方面进行合作的基础。

现在谈谈我们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欧洲和中国的伙伴关系。从 84 到 93 年，我一直担任驻外大使，从荷兰到日内瓦到巴黎。中欧合作关系已经进入最好的阶段。这一合作伙伴关系的特点在于三个支柱的相互协调。各个国家之间，两个大陆之间合作关系的建立是需要基础和支柱的。那些支柱呢？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

从政治方面来说，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人和欧洲人一样，都呼吁一个多极世界的来到，这个世界是诉诸多边合作的。我们并不是要针对美国，我与你们的观点一样，中欧合作并非要针对任何人。但是一个单极的世界，所有事情都由一方来指导，这不是稳定的世界，也不是和平的世界。这是中欧双方在政治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共识，在这一问题上，中欧关系是一直是稳定的。

第二是经济方面，我们的经济是互补的。在法国，我看到了欧洲人的经济优势，发现它与中国的经济发展重点恰好是吻合的。欧洲的优势是哪些？首先是能源。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可以说能源非常缺乏，有人告诉我，有时候我们必须关闭工厂，7 天中有 3 天不能开工，因为没有足够的能源和电。而这方面，欧洲人有足够的优势。在法国的时候，我感受到法国在核能方面强大的优势。其次是交通。这几天恰逢国庆，很多人出行，我们的交通运输压力就很大。而你们有空客，有法国高速列车，都运行的很好。欧洲另外一个长处就是环境治理。前几天你们来到中国，游览了北京，可能觉得空气不好，因为北京污染很严重。而在环境方面，你们有很强的优势。另外还有一方面是农业。中国有八亿农民，如何让这些农民走出贫困状态，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所以我们有如此广阔的经济合作空间，但这不可能自动地完成。坦诚地讲，目前法国的中小企业有一些萎缩，当我们建议他们与中国合作的时候，他们认为太困难。我们必须打破这些成见，人为地加强中法间的合作，现在双方并没有完全明白这一点。所以应该主动消除他们的恐惧，将他们联合起来。

在文化方面，我与你们的观点是一样的。我们在文化上相互吸引，刚刚结束的中法文化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7 月 13 日，奥委会决定 2012 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的当天，中央电视台请我去他们的演播厅，对各个不同的申办城市进行评定。当时主持人请网民对他们最喜欢的城市进行投票。很遗憾的是，中国人不是国际奥委会的投票者，否则的话，巴黎就会胜利的。因为有 50％的网民将票投给巴黎。有一位网民这样说道，中国的法国年非常成功，我当然要投票给巴黎了。我们不知道这具体是谁，但可以知道这是千千万万人的观点。在文化方面我们也有很多有待合作的事情可以做。

一个事物总有两面性，我刚才说了很多正面东西，当然也有负面问题的存在。那些负面问题呢？9 月 27 号，我参加了中法市长论坛。克劳德·伯纳斯先生，巴黎大区市长协会主席，率领了一个 100 多人的代表团参加论坛。他发表了这样的讲话，女士们、先生们，我们非常嫉妒中国的经济发展，你们能把中国的发展借给我们一点吗？关于中国的发展，他感到非常令人羡慕，但同时也感到非常担忧。说到这里的时候，会场有一些议论，说当中国人穷的时候你们就不害怕，现在我们刚起步你们就害怕了，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这些都是当时与会者的想法。有法国朋友跟我说，目前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法国企业外移，在别国建立生产厂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抢了他们的就业机会。其实民众的观点有时和现实是有很大区别的。我在法国曾进行过一个玩具业调查，由中国制造的乐高玩具，欧洲的市场价是 27 欧元，原材料价格是 1.2 欧元，人力费用是 0.8 欧元。中国人所赚的钱只是这 0.8 欧元而已，你们比我更好地知道，到底是谁赚了其余的这二十几欧元的钱。当然这种交流是双赢的，但是我们要意识到，实际上法国人获益比中国人更多，但有的法国人对此却不满。我不知道中国人到底要做些什么才能够使法国人高兴起来，难道放弃这 0.8 欧元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我在法国有很多的朋友，法国电力公司的总裁也是我的朋友，他曾跟我说过，由于中法合作，法国电力公司创造了一万个就业岗位，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因此与中国的合作并没有抢占法国的就业机会。我们大家都应该坦诚一些，在劳动力市场上，你们与中国是无法竞争的。因为你们的工资比中国的工资高 20、30 倍，这怎么和中国竞争呢？但是基于中法合作，你们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我所担忧的是这些错觉占了上风。如果这些不正确的想法占了上风，结果是双方都受到损害，而且某种程度上欧洲人受到的损害更大。因此无论是欧洲人还是中国人都应该真诚合作，来纠正这种错觉。如果让这种观点继续下去，后果将会很严重。

女士们、先生们，主席先生，非常抱歉，我的讲话可能太长了，谢谢大家！

(吴建民长期担任驻外大使，现任外交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主席，旨在研究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他也是东欧智能团的高级协调员。)

第二部分：全球化中的世界治理与中欧相逢

2.1 欧盟经验和世界未来

2.1.1 世界的管理可否参考欧盟建设？

米歇尔.罗卡尔

现在讨论的这个主题难度很大，世界的管理可否参考欧盟建设？我的答案是“大概可以吧”。为什么我相信如此? 现在的欧盟是一个意愿的整体，由 25 个国家共同实现经济的发展，现在欧盟的生产总值已经可以和美国相比，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实体。如此巨大的一个经济实体，是历史上第一次通过非暴力方式建立起来，以一种共同体形式存在的。然而最开始的初衷并不是建立一个经济实体，而是试图在不同的西欧国家之间、特别是连续了七八百年战争的法德间，创造一种机制，使这样的战争不再可能。我们曾经希望**通过一种机制来制止战争。注意，并不是想创造友谊，而是要制止战争，**这是我们的初衷。这个最早想法出现在 1 947 年，50 年代开始进行，1951 年《罗马条约》签订，标志欧洲煤炭钢铁联营的建立，它使法德两国避免出现庞大的国家战争机器。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意大利等其他国家看到这一点，也决定加入这个机制，那并非是要强调一种欧洲联邦的形式，而是能够参与煤炭和钢铁的联营。

当时这一进程非常顺利，但历史证明是不够的。当时法国产生了第二个想法——法国是欧盟建设思想的最大生产者，从而也是一个破坏者——就是把军队统一起来。冷战其时已经开始，大家都害怕苏联，这个想法于是得到另外五个国家的支持，包括美国的支持。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美国如此大的支持，什么原因呢？因为美国人想利用西方共同对抗苏联。但是当时欧洲各国没有统一的外交政策，这一想法不合逻辑也不现实，为时尚早。特别是刚刚经历战争就给德国士兵重新武装，大家觉得太早了。法国否决了这项提议，后来我们再没提过。欧洲现在给人们的形象也得归功于 1954 年这个关键的年份，我们决定互相开放边境实行共同关税，取消所有内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成为一个外部统一关税的边境。50 年代中期，条约谈判进展很快，罗马条约签订后不久即于 1959 年开始实施，六缔约国就此产生。事先我们没料到这会是一个如此强大的经济推动器，一个经济增长的杠杆。15 年之后，6 个缔约国的经济增长比世界平均水平要多一倍，而且其中每个成员国的对外贸易也增长了 1.5 倍，这是非常惊人的，西欧因此得以拉平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

70 年代末期，增长速度非常快，超出人们的设想。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法国人和德国人**开始相互有了好感**，就像日本人和韩国人在经济的重新繁荣中和解一样。但当时的机构还很脆弱，决定由部长会议定夺，还没有很好的运行工具。欧洲议会也没有立法的主动权，最开始只是一个咨询性机构。欧洲委员会是欧洲的立法机构，但它只能作出新的提议和决定，而对已有规定没有决策权和发言权。另外欧委会通常采取全体一致通过的标准。欧盟进程至今一共有八个条约，从一个条约到另一个条约，我们看到欧洲议会在不断壮大，在税收方面政策还需尽可能地加强，在社会事务尤其是对外政策等方面也要扩大权力。四十五年来，我们还没有能够协调好税收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关系。

四十五年很漫长，从内部来看，欧洲是一个很大的家庭，可以说大得有些笨重了，很难

推动其产生变化。它暂且只能很好地实行其共同贸易政策和保护竞争的政策，而我们的美国朋友还有反垄断的政策。欧洲的内部市场用一些标准、贸易原则、商务行为等政策进行了很好的协调，这个内部市场运转良好。在欧共体建设中，一般人尤其是年轻人更关心钱的问题，而不再是人类的痛苦。戴高乐说欧洲的事务是过时的事务，但它的进程是强有力的。可以说这是一个富国俱乐部，他们聚集在一起以便更好地组织，保护自己来反对别人。

然而从外部来看这个整体，就是另一回事了，所有的邻国都希望加入这个俱乐部，而英国曾有十年时间一直想着破坏欧共体，当德国、丹麦等其他的国家都加入欧盟，它才没了别的选择。希腊在经历专制过后，疯狂地想拿自己的经济作赌注，以响应人民对民主的诉求，进入欧共体这样一种系统，我们同意希腊加入了这个整体。西班牙、葡萄牙也相继加入，佛朗哥死了，专制者死了，人们想重新找回民主制度。从经济上来说，这是一种近于疯狂的举动法国和德国太强大了。赌注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混合了政治因素。在铁幕落下之后，共产主义在欧洲崩溃，瑞典、芬兰、奥地利三国迫于邻国的强大所构成的威胁，也立刻申请加入欧共体。一旦内部共产主义消亡之后，中欧国家还有巴尔干国家，如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等都要求加入。我们没有一个标准，也没有一个书面的协议规定哪个国家可以加入哪个不可以加入，因为他们是坏欧洲人。最终大家都加入了，这非常好。但是在这此过程中，世界的战略安全是由美国保障的，是美国而不是欧洲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因此大部分欧洲国家在对外政策方面都不希望与美国产生敌意，而唯一的方式就是压根不要有自己的对外政策。四十五年来，也正因为此，我们从来没有成功地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一致行动。例如在伊拉克问题上你们就看到欧洲没有共同对外政策，这并不令人惊讶，我想中国政府也不会对此感到惊讶。欧洲现在所拥有的统一军事力量只是用于某些人道主义干预，而且是在北大西洋公约之外的仅仅是在中东、以色列、巴基斯坦等问题上，欧洲开始用同一个声音讲话，并制定统一的政策，但是由于我们仍没有能力进行干预，这些使命还远未完成。但一切都将发生变化。以上是对整个欧盟的历史的概括。

你们可能还想问，欧盟对世界的治理是否有帮助？我想是的，理由有很多，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首先是令人惊讶的和解。1945年还相互仇视的法国和德国现在联姻了，在各个国家中，如果做一个公民调查：如果你不在这里生活，你将更喜欢在哪个国家生活？ 在法国和德国，即使跨国婚姻并不多，法国人也会首先选择德国，而德国人会选择法国。两国的城市纷纷结为友好城市，企业之间相互参股。150年以来冲突不断的天主教徒和爱尔兰新教教徒，现在也在走朝向和平的进程。而波兰人和德国人之间，现在才达到了真正严肃的和解。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经过了9个世纪的仇恨和战争，各自为营，相互交仗，和解的意 义多么珍贵，而欧盟的形成最终解决了这些问题。同时我也赞成土耳其加入欧盟，否则我怕很难看到土耳其能够承认希腊的塞浦路斯共和国。

其次，欧洲还发展了一种内部的团结互助精神，一种经济上的团结，帮助比较贫穷的、不够发达的成员国达到共同的富裕水平。比如西班牙对葡萄牙的帮助，现在葡萄牙比西班牙好要富裕。而希腊则更加受益，更要特别提到的是爱尔兰，加入欧盟的时候它是最贫穷的国家，而现在已经成为位列第二或第三的最富裕的国家，进步极其明显。所有东欧的国家加入之后，都可以享受到欧盟体制的帮助。现在还有五个国家等待加入：保加利亚、土耳其、乌克兰、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可以说这是我们二十一世纪即将经历的最大冒险。欧盟是一个非常强大、有益的工具，用来调整欧洲发展的不平衡，对世界的治理做出有用的贡献。

第三，欧盟政府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产生政治决议的机构，在不同的国家中做出不同的决策。谈判是一种技术，而且是非常困难的技术。我也观察到，有一些个人或政治力量，国家、

民族，他们知道自己的力量，认为自己很强大，但非常不重视谈判的能力与才智。在欧洲，任何人单独行动都是没有力量的，所以我们必须协商解决卢森堡不愿接受的资本问题以及希腊的税收问题，**谈判就成了我们的第二天性**。这样的谈判能力是非常有益的，对于我们管理世界的公共事物也非常重要。当然，它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因为我们所生活的当今世界，武力的局限性在增加，许多情况下使用大棒政策是不会奏效的。我们今天完全可以友好地协商减少相互之间的不愉快。布什总统其实也该听取欧洲国家的一些建议。我们并不是处于反美的立场上，当然确实有一些反美人士，但他们是少数，我们并不反美，只是希望提醒布什总统要警惕，在伊拉克使用武力只可能让人民更加反对你。我们并不反美，而是出于社会角度进行考虑。谈判是一种软权力，在伊朗问题上也是同样的情况，面对它使用核武器的要求和愿望，欧洲人都一致认为使用武力是不能取得任何效果的，而且可能会有危险，同亚洲人的想法一样，当然这要由你们自己来表态。欧共体已经开始启动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开始时布什总统总是谴责我们，说你们干什么呢，这是美国人的事情。之后一些美国机构却发现这是一块对美国军队来说难以消化的东西，因为伊朗比伊拉克大三倍，而且国家意志更强，美国人无能为力。他们应该寄希望于欧洲人而不是去攻打伊朗。这也是布什总统现在的想法，所以他很聪明，他改变了自己，虽然谈判现在还处于僵局，但很多人都希望这样的谈判继续进行。

同样在中东，多年以来，欧洲就在支持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总体地推进那里的民主进程和选举制度，帮助开发那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水资源。欧盟的形成是从共同管理煤钢资源开始的，同样地，在那个地方是从水开始。大家没有选择，在那个地方如果用武力就永远不能建立和平。现在我们都懂得了仅用武力是永远也不能建设和平的。谈判才更加有用和有效。我们通过了《七十七国条约》，和非洲的一些国家达成协议。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重视谈判，只是使用武力去推行人道主义，现在欧洲的谈判天赋发挥出来，使全世界刮目相看，它使欧洲处于和平之中。谈判的作用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不再要使用武器，除了采取一些军事措施。我想谈判的应用范围会越来越广，解决当今一些世界性问题，仅通过武力是不可能的，是没有效率的，我们应当承认这一点。软权力的时代已经来临，也就是法律的时代、谈判的时代和相互理解的时代已经来临。

还有比这更紧急的事情，就是在二十世纪的对抗中，并非管理经济赢得了胜利。不仅北美和整个欧洲，而且很多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国家、俄罗斯还有中国，他们都通过和接受了市场经济的原则，保证市场经济的运转。市场经济可以帮助我们确定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但它却不能完全规定所有的社会机制。我们还要明确企业的所有者，不论是公共的、合资的、联营的或国有的企业，以及国家的作用。国家是一个很大的生产者和机制的调控者，或者它不参与市场经济，只是负责警察、外交和军队，这是一个很现代的观念，这些都是有待思考的问题。

当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结合的时候，就是资本主义，当然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存在，我们当初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自30年代以来，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形态。在冷战开始时和冷战之初，欧盟建设刚刚起步，当时资本主义处于恒久不稳定的状态，当我们通过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把社会1/3的收入用于建立社会保障系统，建立高工资制度，它的那种不稳定状态被纠正了，我们成功地促进了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这改正了资本主义的弱点，提高了人们消费的数量和质量。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做法，即通过加强国家对财政管理政策和货币管理政策的干预，其时成效卓著。**从1945年到1975年，欧洲经济持续三十年繁荣，没有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而不平等现象不仅没有加重，在法国和英国还有所缓解。**到70年代末，资本主义已经如此强大，以至于大型企业超出国界并且超越了所有规则，因为在世界范围内劳动力的生产已经不再有任何规则，于是产生了新的经济理

论——货币主义，也就是美国的弗里德曼的理论。它宣扬市场的平衡是可能存在的最好的管理方式，尽量避免国家干预，甚至是对减少失业、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干预，因为国家的干预只能使问题更严重。它更倾向于提高利润而不是提高工资，强调收入的不同分配。一些保守国家，像美、日、英等主要的发达国家都采用了这样的理论，包括世界银行等经济实体，这一理论已经主导了世界。

各位中国朋友，你们在开放当中，并且在国内给予市场经济以重要的地位。你们知道，在你们周围，资本主义正在变得更加残酷，从80年代以来，贫穷在发达国家有所发展，同样富人也在增长，财政是不平衡、不稳定的。97年金融危机震荡亚洲，导致汇率下降，美洲和一半以上的拉丁美洲国家也都在朝着这一状况发展并陷入一种非常痛苦的境地。差不多所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都在变得日益脆弱。国家不再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新奥尔良的堤坝没有被修复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足够富裕才可以保障自己，因为国家没有钱。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残酷阶段，但它并不是命中注定的，我们在40年以前就已经采用过最好的调控政策。

中国面临选择，问题在于，你们是否要一个经济发展平衡的、和谐的、有调控能力的国家。你们有悠久的历史供你们借鉴来做出这样的选择。选择一个更加活跃、更加资本化的模式，也许是有效的，但却是不稳定的和残酷的。你们的选择非常沉重，因为不可能以武力来决定这一切。我们原有的世界已经结束了，已经没有疆土可以去征服，和平是不可能通过军事力量的外在干预实现的。在我们确定和加强有效的、经济的和人性的管理机制的时候，中国将会看到并不是武力在制造强大和和谐。而欧洲对中国来说，是可供借鉴的最重要的且有益的存在。管理世界要通过一系列的机制，要加强调控的能力，减少贫困，建设和平。也许在这之后，由于我们不使用武力，我们不会让任何人害怕。我想这样的方式会更好地服务于世界。

现在请我们的中国朋友做出他们的选择，谢谢！

2.1.2 欧中交往未来展望与二十一世纪人类面对的五个挑战

卡蓝默（中欧论坛创始人、梅耶基金会主席）

在经过了一个月前纽约的联合国峰会的失败之后，中国和欧洲面临着我们共同的历史责任。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都曾延续久远，拥有如此历史厚度的中国和欧洲在当下时代有责任思索如何管理我们多样化的世界，致力于一个和谐社会的发展。欧洲和中国都经历过战国时期，地方割据和征战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时代距今已经很远，而欧洲的战国时期却很近，与民族国家的建立相与伴随。20 世纪欧洲的这些国家都是在当时建立起来的，他们相互征战、残杀。欧洲人从这些战争中吸取了历史教训，学会了要在不同的基础上和谐共存，在复杂的背景下和谐共存。在二十一世纪，古老的中国和古老的欧洲、新中国和新欧洲都面临未来的挑战。我们的世界应该成为一个共同家园，当今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命运共同体，而中国和欧洲是其中两个重要的部分，地球的两个省份。非洲的谚语说，“让人们共同去建造一座塔，让他们就能变成兄弟”。我们现在要团结、要重新联合起来，不是仅联合过去和现在， 而是要面对未来的共同挑战。中国和欧洲应该致力于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友谊和团结的基础上建设未来。是什么共同的挑战能够使欧洲和中国结为兄弟？我认为有五点：

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以和平的方式来治理我们共同的家园。对世界良好的治理和有效的管理，使人民享有民主，同时又能保持各自的独立，并有效地管理这种独立，这样民主才真正具有意义。两年前在费城，宣布美国独立的地方，我们发表了《相互依存宣言》。我们论坛在座的法国前总理罗卡尔先生参加并主持了那次会议，当时还有利比亚前总理，这颇具象征意义。所谓“相互依存”是不同的民族经济、文化相互共存的概念。我们意识到应该求同存异，进行欧洲的建设，这也是我们管理未来一体化世界的基础。面对目前人类的公共家园，我们要确立起共同的管理理念。今天我们应该加倍快速地革新我们的理论思维和制度建构，以补回我们所浪费的时间。二十一世纪是相互依存的世纪，这是二十一世纪各国所面临的共同挑战，这种局面其实 300 多年前就几经开始了。面对一个新的一元化的世界，如果不尊重各自的差异、历史语境和传统，将是没有前途的。在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和谐的同时我们必须保存我们各自的特性。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实现生物世界的和谐，20％人口消耗了世界 80％的资源，人类对资源的使用已经超出这个地球所能承受的能力。我们如何进行一场革命来节约资源？欧洲不可能单独地保持其消费模式，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在电视、媒体中看到并效仿这样的生活方式。而在中国，经济的增长、汽车业的迅猛发展和大都市的扩张，对农村的发展和环境都造成影响。另外还有很多资源的浪费，这样的方式是不能实现世界的平衡发展的。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变革。目前大都市的生活方式是不可行的，是不可持续的。我们这个世界可供消耗的资源存储量已经不多。

第三个挑战是如何进行世界性财富的分配。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加深了贫富之间的差异，我们必须填补这样的沟壑。300 年来世界化的趋势带来了野蛮的竞争甚至掠夺，我们必须重新分配世界各地区的财富，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前提。有的观点认为应该任由世界市场自动调配，而历史证明世界市场的无节制扩大并未給平等带来好处。我们必须理性地调控全球化进程中各地区相互的资源、财富分配。比如中国和欧洲，我们应该在人际关系、认知、资源管理等各方面，看到这个世界市场的利弊并进行调配。学习如何管理人类社会财富的问题，这是第三点。

第四个挑战是如何利用前几个挑战的结果去创造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我们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去弱化竞争的残酷性、攻击性，使我们的宗教传统、精神传统能够有利

于我们未来的建设，建设一个共同的世界家园。我们必须达成协议，取得和谐，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可以分享。

最后一个挑战是统一和多样化的协调。在我们的进程当中，现在所缺乏就是这样一个交流的机制，我们欧共体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面对这项非常广泛的挑战，欧洲正面临一个建设的新开始。欧盟的创始人让•莫奈先生说过，我们现在不再应该是坐在桌子的两侧，如通常的外交谈判那样，而应该坐在桌子的同一侧以便共同面对挑战，从而实现双赢。解决以上五个问题，欧洲不仅想通过政府，而且还希望有各个社会组织的参与。在悠久的历史中，光明或黑暗时代的轮替给了我们诸多启示，今天我们更应该加强理解和对话。我们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但可以克服差异取得共识。1978 年中国实现了改革开放，开始进入现代化的加速建设时期，中欧的关系也进入于硕博士划分的第三期。早期的传教士们在欧洲文艺复兴末期进入中国，当时他们和中国人相互欣赏，达到了很高水平的理解。在宣传自己的宗教的同时，他们也将中国文化介绍给欧洲，这是欧洲与中国的第一次相逢。第二次中欧相遇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悲剧，它使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殖民侵略，但也使中国接受了一些现代信息。第二次相遇的战争是分化的主权国家时代，中国还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然而这在今天已经不可能了，我们必须生活在人类的共同家园中。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次相遇，决定着我们未来的命运。我觉得有三个关键词，第一就是相互尊重。今天各位与会者不远千里地自愿参加这个论坛，特别是中国朋友们牺牲了自己的黄金周来参加论坛，都是为了能够相互倾听，平等对话，而不是抱着单方面的优越感。第二个关键词是自由。很多与会代表都身担重要职责，他们曾经、现在或者将来担任一些重要机构的领导，不过今天他们不代表这些机构，而是以他们自己的名义来发言。这个论坛是有象征意义的，他们在这个星期中完全可以畅所欲言，表达个人的想法。我们要通过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来消除我们之间的误解，了解我们的思维差异。有一些年轻的志愿者，包括北大、人大及广外的大学生来协助我们的会议，我们也希望能实现这种平等的交流和对话。

第三关键词就是经验交流，我们与中国主办方联合组织这届论坛，是要向中国介绍欧洲。我们有各自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是不能原样照搬的。特别是现在，在法国和荷兰的两次欧洲宪法投票失败了，欧洲共同发展面临着很大的危机，我们对自己也有很多疑惑。不能老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是要看到欧洲的弱点和局限性。在过去五十年，欧洲的建设给人类历史提供了一些经验，一些思考模式，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超越民族、文化的界限来建设一个共同的世界。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论坛尽可能地向中国介绍欧共体在政治、机构、人员建设等诸多方面的历史经验，介绍这样一个欧洲的历史。很多朋友都见证过欧洲的发展历史，现在许多老人都不在了。像贝尔图安先生，因为高龄，本人也不能到会，但他通过录像来与大家交流。

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寻求一个针对其他人，比如针对美国的模式。中国和欧洲当然都希望在未来世界有一席之地，但我们是要同美国一起来建设这个世界。我们也要和美国组织论坛这样的对话，实现互补，以责任协作的方式建设我们共同的未来。

2.1.3 欧洲的世界图景与全球化

保罗·张万亭（中欧论坛创始人、欧盟驻世贸前大使）

谢谢主席先生，您使我们更加智慧，因为以爱和倾听的方式来进行的论坛会使我们更加智慧。我准备了讲稿，但是我很愿意我的发言以一个小故事开始。我本人是世界化的一个小小的产物，可以说某种程度上的“蛋黄酱”，大家知道蛋黄酱是怎么做的吗？我是越南裔的蛋黄，然后加上法国的第戎芥末酱，而最重要的是用油将它们混合起来，这油就是欧洲，而我正是这样一个产物。事实上这也充分地说明我们可以在一个大的范围内实现比较好的世界化。今天早上不少为欧洲做过贡献的人都在这里发表了演讲。而我有幸作过一些与中国有关的工作，比如说签订了第一份《纺织品协定》。因此，希望大家看到一个亚洲人站在欧洲的角度谈欧洲，不要感到奇怪。

首先我要说的是世界化

世界化事实上五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现在我们不过处于这一发展过程的第三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6世纪，随着哥伦布和西班牙航海家的活动开始的；第二阶段发生于19世纪，是由英国商人和他们的买办推动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今天早上到现在我还没有听到大家说到通讯和信息，而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通讯和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这个全球性的信息紧密交流的时代，将会为我们的后世子孙带来幸福还是厄运呢？世界化到底是福音还是诅咒？

我想有一点对法语学者是非常敏感的，那就是世界化（mondialisation）与全球化(globalisation) 这两个词汇的不同，我们千万不能将它们混淆，但在英语世界中这是混淆的，这里有一个深刻的区别，莎士比亚的语言不知道它，而莫里哀的语言则相反。事实上世界化是一种现象，而全球化则是一种手段。

世界化是福音还是诅咒？这取决于有既定边界的主权国家是否能理解全球性的挑战，也取决于我们能否因此而协调一致、团结行动。这个问题的答案还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大家既是个体也属于共同体。可以说世界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象，甚至反世界化的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一现象是无法控制的，它只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采取一些政治上的战略决策以及全球性的行动来加以管理。然而目前的现实情况并不乐观，现在的世界化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控制的，因为主权国家之间目前还不可能达成一致，随着国家权力以及管理国家的能力由于全球环境下的合作而分散，各个国家的主权范围在不断减小。虽然目前主权国家仍扮演着主要的角色，但是他们在国家范围之外不再有任何权力，单个主权国家也不再可能主宰全世界的命运，如果有，也只能是短暂的。主权国家无法挽救目前社会的灾难并给我们提供一种未来的整体世界观，比如一种能团结起地球上所有的民族男人、女人、青年和老人的观念。现在我们可以动员所有的公民行动起来，因为很多人已经为此提供了基础性的贡献，斯蒂芬•黑塞尔、米歇尔•罗卡尔，本雅明等，还有独立运动组织、国际民间协会、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积极促成的世界公民大会等的活动，也为此做出了贡献。因此我们可以说主权国家越来越无力，只是人们目前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不愿意知道这一点也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可以取代这些主权国家。然而半个世纪以来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已经有一些种子在萌芽，比如说欧洲的共同建设，一种全球性的政治、经济新秩序正在发明之中。

我演讲的第二部分是关于欧罗巴的起源

古希腊诗人们吟唱着，祭司阿格诺尔的女儿欧罗巴被天神丘比特化身的公牛绑架。1747年画家佛朗索瓦•布什尔绘制了欧罗巴的优美形象，这幅画被路易十五得到，大家现在可以在卢浮宫的Sully馆欣赏到她。离我们更近的维克多•雨果曾经写到“我希望以一项伟大的事业为自己盖棺论定”，那就是欧洲合众国的奠定。英国前首相丘吉尔1946年在瑞士苏黎世也曾强调，应该启动建设欧洲合众国。经历了两场非常残酷的战争后，犯过错误的欧洲人在1952、1953年，终于使欧罗巴这棵生命之树扎下了根，通过远见卓识的欧盟奠基者们的努力，通过欧洲煤炭钢铁联盟、欧洲核能联盟、欧洲经济联盟等组织的建立。从六个国家扩展到9个、10个、12个一直到现在的25个国家。然而这个进程还没有结束，这就是我们的欧罗巴的长征。我们的长征才刚刚开始，如果说有一个终点的话，那就是到那个时候，和平可以永不动摇地遍及全球。目前欧罗巴正在建设中，有时候它会减缓脚步喘息，然而欧罗巴的进程事实上是不会停止的，也不可能停止。现在我们只是要作一个回顾，好好思考一下然后再继续我们未竟的道路。现在欧盟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官僚主义、复杂的关系，充满了政治诡计，不太关注当今公民的日常生活，而且不再了解战争之苦和战后的物资匮乏。然而尽管有这样不好的印象，人们仍然没有排斥欧罗巴，相反，在9月份的时候，有过一些非常令人惊讶的调查结果，可以说对欧盟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法国人希望在国际世界上有一个非常强势的欧盟，并且有82％的人希望欧盟可以在国际事务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有87％的人希望欧盟可以成为一个超强实力的大陆，这一比例在欧洲居第一名，比平均数高出了17％。欧洲宪法投票在法国和荷兰的失败不应该被视为人们不再渴望欧洲在政治上强大的证明，而恰恰证明了尤其在法国和德国人们所达成的共识，那就是欧洲应该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有一个唯一的代表权，欧盟会最终代替法、德、英。

最近巴罗佐，也就是欧洲委员会的主席，注意到欧洲宪法暂时失败的状况，他说，欧盟奠基者们所确立的欧盟的使命没有变。发生变化的不是我们的既有价值，而是目前我们推行这些价值的历史背景。应该使我们的政策和措施更适应二十一世纪。欧盟应该开放，对内向各个成员国、所有公民和各个机构开放，对外向无论富有或贫穷的外部世界开放。我们刚刚进入一个世界化的世纪，变化日新月异，为了进一步促进自由、安全、繁荣，我们不应该排斥而应该收集各种由世界化带来的成果。

那么欧罗巴的秘密是什么？有三方面

首先欧罗巴是源于不断进步的一种平衡，一方面是国家主权的实施，另一方面是公共利益的管理，更确切的说是大家共同利益的经营。换种更好的说法就是，国家管理的补充原则是从一个国家的主权转向一个共同的主权，这是欧罗巴合法性的第一个秘密。

第二方面是制度方面的。欧委会作出提议，准备并实施欧洲理事会和欧盟议会作出的决定，这在人类政治历史上是一个独创的机制。欧委会是欧盟共同利益的促进者，它的特殊权限使它可以超越各个国家的利益。照顾欧盟整体的利益。欧洲法院保证了对共同法统一的解释权。可以说欧委会是欧洲政治的卫士，而法院则是法制国家的保障者。

最后一个秘密在于欧罗巴最终极的使命是要实现和平。只是欧洲的和平吗？当然不是，否则这将是消极的。和平要么是全球性的，要么就没有和平。尽管现在我们在讨论欧盟暂时的行政边界，但不应该忘记欧罗巴是作为一个和平的使者是不讲边界的。

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讲话的第三部分，就是全球的机遇以及挑战

到2005年，我们的地球有60亿人口，2050年的时候将会有90亿，或许到下一个世纪将有110亿人。这些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本世纪末，气温会进一步上升。一万年以来，可以说气候是相对平稳的，这使得人们可以生存下去，但目前这一平衡正在被打破，关于它的原因

我们还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当气候变暖的时候是不是风暴会更多？我们是否可以在一些气候现象与地球变暖之间找到相关性呢？科学越是进步越是揭示了各种现象的极端复杂性。如何确认、估量它们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当气候系统无法整体预知的时候，人类或许会发现自己的卑微，这是人类的关系中远古的美德。或许气候变暖目前还可以承受的，但如果在全球泛滥，将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严重的问题。今天早上我们说到了能源、空气的问题，照目前的速度发展，到2050年我们对能源的需求会翻倍。如何调控能源使用以保证可持续发展？所有这些可以说都前景暗淡，很多忧患正在无声地酝酿……

爱德加•莫兰先生说，我们必须经历绝望才能重新找到希望。而要想实现希望必须实现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欧有着相互互补的优势，他们完全可以促进二十一世界多极化发展。为什么是中国呢？因为在1600年之前，中国的文明已经享誉世界，中华文明是无法逾越的，而当时古老的欧洲才刚刚开始萌芽。或许中国并不需要欧罗巴，然而欧洲正在寻找某种社会模式能够适应它的多样性、适应现在的时代，这方面它是可以与中国分享历史经验、帮助中国设计自己的新社会建设蓝图的。经过30年的经济改革，中国获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这在人类的历史上史无前例。然而在成功的后面隐藏着不均衡的问题，与全世界其他地区的这一问题一样它可能成为定时炸弹。如今在中国，占人口总数不足6%的少数民族占据着整个国土的60%。中国的农民目前还没有很好地从发展中获益，存在很多社会问题，比如与地方势力的关系问题，尤其是他们健康问题，20年间这一费用增长了30倍。有1到1.2亿农民因为农村经济不景气而进城打工，他们在城市中的工作条件得不到很好的保障，也得到不到足够的报酬，这就是在中国所说的民工。他们每天要工作10到12个小时，常常是权力滥用的工具。弱势、边缘化群体在所有的社会都存在。《北京青年报》曾有文章指出，最重要的整个社会的态度，人们如此冷漠以至于民工们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望境地。虽然有这些阴云，但中国的经济确确实实起飞了。90%的家庭拥有电视，20年来已不再有饥荒。他们还将主办2008年奥运会。中国最终将成为世界上的领先大国。

最后我想提出一个疑问，是中国-欧洲还是欧洲-中国？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中国走向繁荣和幸福的道路，我想唯一能阻止他们的只有中国人自己或者是全球变暖这样的问题。中国非常美丽，这方面，欧洲人也被中国深深地吸引。在欧洲走向和平的时候，欧洲也会看到中国正在继续它自己的道路，我们希望实现的是一个更为社会化、人性的世界化。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共同行动起来，比如说转基因组织和转基基因产品，这方面我们农业的保护是不够的。我知道在中国有6万名研究者在研究这一领域，这在欧洲和中国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必须正确认定和评估转基因工程对抵御虫害、适应盐性的土地、提高营养的作用。然而最终这对我们的环境和生态多样性会产生很大的冲击。这方面欧洲人是非常恐惧的。

我们的合作可以控制甚至减缓全球变暖，并留给我们的后代子孙一个没有被破坏的土地，就像《小王子》中的智者所说的那样。

我们共同联合起来可以对民主进行重新审视。北美人和欧洲人在民主方面的认识可能有些过时。西方的民主模式以法律名义、通过民主选举来实现的。我们的西方模式并不是完美的。民主暗示着多数和少数，如何使少数也分享集体的共同利益？如果问我在人权和民主两者中会选择什么的话，我会说男人女人们权力也就是人类的权力是高于民主的。

最后我想给大家讲一段小王子和狐狸的故事。“我在找朋友，”小王子说，“驯服是什么意思？”狐狸说：“这是个早已被忘记的东西。它意味着建立关系。”“建立关系？”“当然，”狐狸说，“对于我来说你只是个小男孩，和千万个小男孩一样。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于你来说我只是只狐狸，跟千万只狐狸一样。但如果你驯服我，我们将会相互需要。我对你、你对我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只知道驯服，”狐狸继续说，“人们已经不再处于蒙蔽时代。他们从商人那里买来做好的东西。但如果不再有商贸上的朋友，人们就不再有

朋友了。如果你需要一个朋友，就请你驯服我！”中国和欧罗巴同时问“谁是狐狸？谁是小王子？中华帝国还是欧洲帝国？”

交流评议

吴建民总结，就三方面提问：武力、共同治理、对中国发展的认识与建议；罗卡尔、约翰·帕尔莫、卡蓝默回应。

吴建民：大家的发言给我们带来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我又想到几个问题，借此机会提出来。首先向总理先生提一个问题，因为在他昨天的讲话提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观点。他说在当今世界上，武力是有局限性的，而且这个局限性越来越大。他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伊拉克战争，这场战争最后导致伊拉克人民起来反对美国。我就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漫长历史中，总是以武力来发言和说话。您在讲话中所提到的这种现象，是一个新现象吗？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的话，它的趋势是什么？也许在某个时期还是由武力解决问题，最后终究证明武力是有理由的？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谈到对世界的治理，正如总理先生昨天所说的，有很多国家在世界上都有自己的政策和关注的问题，但是我们都面临一些共同的挑战。大家都需要有一个对世界的共同的治理，那么这样一种治理中国和欧洲分别可以做些什么呢？面对这些共同的挑战，你们是否能够提出一些建议呢？欧洲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因为你们找出了共同利益所在，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你们开始建设欧洲共同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不断深化和扩大。今天会场上没有美国人，在中国和欧洲人之间我们可以共同做些什么呢？

我的第三个问题是，如果主席先生允许的话，就昨天总理先生说中国应该作出选择，要选择一个对经济有效的组织形态，这指的是什么呢，您是否有具体的建议？因为我经常对一些到访的外国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你们是局外者，而我们整天都会面临这些问题。当你们来到中国的时候，你们是以外部来看中国，来到中国以后，你们是从中国的内部来看中国。我们的问题非常多，非常可怕的挑战。您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如果处在中国人的位置，您能够提出什么样的建议？这些就是我想到的问题，也许可以抛砖引玉，我就很自由地提出这些问题。谢谢！

罗卡尔：我非常欣赏吴大使。他的提问其实很幽默，他真的非常出色。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能足够精确和有高度地回答。我想也许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准备好给你的答案，我答应你。现在我只能即席就你的三个问题随便做一些回答。

关于第一个问题，归纳说来，历史学家们在一个半世纪以来不断改变着他们学科的研究视角，以更好地看待人类的历史。吴大使昨天也重申了六千年的历史当中有一万五千个战争。六千年的历史是一个暴力史，战争连年不断。在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中国的情况当中，有一点就是它的连续性，只有中国保持了如此悠久又连续的历史。埃及的历史比中国要早，但是中断了，而中国人则牢记着他们的历史。他们牢记着战国之后，第一个帝国的时期，秦始皇时期是如何混乱又是如何重新整合起来的等等。我难以想象吴大使如何看待欧洲人，当中国人在编纂自己的典籍、律法和像《孙子兵法》这样的伟大著作时，欧洲人还生活在山洞里呢。但是文明改变了我们。经过长年战争，是欧洲第一次公开地谴责战争罪，体现在1599年的《南特敕令》中。我们不能原谅战争的暴行，但却可以忘记，这两者是很不同的。后来欧洲又开始了连续不断的宗教战争，国王亨利四世结束了暴力战争，我们维持了400年的和平，当时一些国家宣布成立，还签订了一些公约。

其实，无论那个国家，参加战争的人都有一种强硬的立场，都不能心平气和地承认自己是

罪犯。所以我们才有法律，由不同的仲裁机构来判定，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看看战争。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家是中国人，例如我已经提到的孙子，可能我的发音不准确。很早就出现了国际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五千万的死亡，可见人类喜欢战争，而且在不断地发动战争，他们乐得其所。朝鲜南北战争、造成几百万人的死亡，而且退回到最原始的历史状况中。犹太民族在中东也不断地出问题，其间已经有五场战争，到现在也没有恢复和平，战争却什么也没改变。从死亡人数来看，伊朗和伊拉克也是一个例子可能有四到五百万人无意义地失去了生命。还有一些中小战争，像厄瓜多尔和秘鲁，一些山区的战争等。传统的战争不再能起到平衡的作用，所有的战争之后，人们又回到战争爆发前的状况。你们同越南的战争，最终也没有什么结论。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集体的压力阻止着人们做太过分的事情。

第三点，不久以前我们商讨成立国际刑事法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通过这个条约，美国人也没有通过这个条约，我对此很感兴趣。但是将来你们会看到国际公众舆论的判断。我昨天被邀请参加一个活动，就是在中国人民网上与网友进行一些国际问题方面的对话。

第四点，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共识，但动机却非常不同。共识就是如果我们不能共同解决那些问题我们都会走向灭亡。这就是不容忽视的地球变暖和臭氧层减少现象。我曾在八年期间担任美国一个机构的成员，我知道现在路易斯安那、新奥尔良的环境都遭到破坏了，科学界正在把这些问题同臭氧层破坏结合起来，以后美国会签订关于能源和环保的条约。我觉得年轻的美国，相对不那么年轻的欧洲和古老的中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都在这方面不断的积累经验。以后美国会签订关于能源和环保的条约的。我们都认为对能源的过分消耗是罪恶的。

中国总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我们现在正在对现实的世界进行思考。我们现在很有礼貌地成为了朋友，我想谈一件人们都知道但不太愿意说的事情，就是国际标准，谴责专制行动，谴责刑讯等等，要尊重基本的人权。从历史上我们有不同的观点，西方在人权方面的发展甚至造成一个无法管理的社会，但你们中国恰恰相反，你们执着于儒家的思想。也许是因为中国太大了，我承认这一点。而且我也想到了西藏问题，当然我不会在此谈很多，30年之后我相信我们在西藏问题上的思维方式可能是一样的，这是一种趋势。人们要拿起武器来解决这些重要的问题的话，我想成功的几率是越来越低的。解决问题的话要通过其他的方式，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当然会有一些倒退，还会出现战争，但是人民并不愿意停留在这个水平上，而国际法庭是为未来建立的。我们更关注未来，我们知道这一点，这是我所想到。

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问我对世界的管理是否有一些建议呢？我是很老的政治家，当然，当我不想接受别人的建议的时候我会拒绝。在管理世界的时候，要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不是听取别人的教训。谈到世界金融体制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谈谈我们小国家的经验，但我们不可能承担同中国一样的责任。刚才我们听到了斯洛文尼亚的情况，库昌先生介绍了本国的历史。他们创造了奇迹，保护了一个国家，但他们的人口只有两百万，而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但我们关注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共同做些什么呢？现在的世界信息膨胀，传播交流的速度非常快，我们接受了一些共同的原则，而朝鲜、古巴和中国不在之内，有些贸易中国也参加了。我们面临着一些不稳定的风险，因为你们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国家。经济学界都认为我们处在一个金融的火山口上，美国每天借出的19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对中国的占到了35%。我们想问为什么你们那么好心地借入这些价值每天都在减少的资本？我想我们应该一起来讨论金融体制稳定的问题，现在它处于爆炸性的状况，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协议来重新确定国际金融体系。我们现在正在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中，你们是除了日本以外最大的借款国，中国自己也说，这种状况很疯狂。国际金融体制已经是无法控制了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稳定的。当中国说出这样的话时，欧洲也可以开始说了。如果我们一起谈谈，这将是非常好的事情。

你问我们有什么共同的想法提出来，我想现在经济和金融体制的变化是非常残酷的，新

的资本主义的运作非常有效率，这是非常积极的，但也很不稳定。而且我们的代价是牺牲别人，一部分的拉丁美洲和非洲，还有一些小的国家，老挝、缅甸等等都是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这很自私，我们应该加以控制。当然非洲和拉丁美洲给我们带来的移民问题和恐怖问题以及向我们出口的毒品，我们必须制止，我们应该更加严肃地进行相互合作。中国已经在摆脱非常贫困的状态，我们承认中国有权利来先关注自己，再去关注别人，这非常正常——如果六亿农民还非常贫困，那你们确实应该首先关注他们。你们块头太大了，要先致力于解决自己的问题。你们可以跟美国人说，我们现在这个游戏非常危险，很残酷。我是亲美的，我知道其实美国也很不幸，他们所代表的是非常危险的思潮。我们不可能一起来改变所有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对美国的想法提出质疑，可以把这个世界引向另外一个方向。亚洲现在正经历财富的增长和快速发展，不仅仅是中国是整个亚洲都是这样的。你们亚洲可以单独行动，可以有报复的权利，这是很可怕的。的确，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你们可以报复，当谈到鸦片战争的时候，我也感到耻辱。如果亚洲单独行动的话，你们会赢得胜利，因为在未来的几年当中你们将占有世界财富的一半，并且占据国际贸易的一半。所以在世界贸易组织当中你们会有更大的发言权。所以从现在开始就要去做，比如跟日本达成协议，完全可以以和平的方式去发展，并且通过国际合作来巩固你们的力量增长，这就是我所想到的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关于第三点，我想说整个知识界甚至经济学界的知识分子都没有对世界做出很正确的判断。我们非常高兴看到自己从苏联的进攻威胁中解放出来，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解救了我们，它带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由，从而带来公民的自由，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我们对细节暂时不进行讨论。法国有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叫做布罗代尔，他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进行了区分。市场经济是客户和市场之间的矛盾，需要竞争，不需要垄断；而资本主义最终目的是要进行垄断。它们的游戏规则不一样，当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演变的情况也不一样。我们的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在1929--1932年的经济危机中，在美国、德国都有人饿死，人民以为资本主义可能会消亡，这导致了独裁者的上台。二战结束以后，大家以为资本主义会消亡，但它依然存在。我们有持续30年的经济增长期，没有出现系统性的经济危机，而且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有所减少，**因为我们的三个调控工具发挥了作用**。第一是凯恩斯发明的工具。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拥有各自的货币，这个系统是不稳定的。你们有货币权利和财政权利，就必须管理这两种权利，遵守一些必要的平衡机制，凯恩斯指出了如何管理这两种权利，以防止货币市场系统出现混乱。第二个调控工具就是社会保障。它的创造者是贝黑兹先生。你们中国人正在致力于市场建设，而市场总是不稳定的。你们应该实施医疗保险、退休保险和失业保险。这不仅是福利制度，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起到稳定的作用。如果你们下决心拿出财富的1/3甚至是1/4来防止经济的不稳定，那么像西方1929年那样的经济大危机就不会出现。弗雷德曼先生曾说到过这一点。前两种调控都有很多理论阐释，而第三种控制机制由美国人发明的，简单地说就一句话。这句话是1931、32年左右经济危机刚过去的时候一个美国人说的，他就是亨利·福特，他说："我发职工工资就是为了让他们买我的汽车。"一语道破了一个重大原理。资本主义可以完成大规模的生产，但必须有前提条件，就是大规模、高品质的大众消费。我们在战争之后就是这样做的，当时也采取了提高收入的政策，之后我们经历了三十年的资本主义繁荣时期，我们赢得冷战的胜利其实就是在经济上赢得胜利。所以经典资本主义的力量可以保证我们做任何事情，而70年代开始我们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模式。

你们现在也面临这样的选择，现在有一些重要著作解释市场的平衡是可以优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互动可以建成市场的最优平衡，如果国家的干预破坏了这种平衡，是很糟糕的30年当中，在西方重新出现了贫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衡也在进一步加剧。我们无法吸收10％的大量失业人口，因为我们社会参考的经济标准不再是工资，而工资可以保证消费水平，而我们现在的参考标准是利润，这很残酷。所以在1997年，我们遭遇了金融危机，

包括亚洲的金融危机。你们对资本主义有两种认识，欧洲比美国更多关注社会问题，但我们还是破坏了股份制的资本主义。但也许你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我想说的是，中国应该面对这些问题，认清这些问题，资本主义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我很谴责弗雷德曼的国际法理论，虽然谴责一种理论是不太合适的。谢谢！

约翰·帕尔莫：女士们、先生们我讲的非常简短，我基本上同意罗卡尔先生的讲话，因为他刚才所讲的东西，比如说关于政府的管理能力等等，都很有道理，也特别符合我的想法。刚才有人问我们怎么看待中国？我想我这个人确实没有资格来对中国这个国家发表很多的看法。刚才你们提到的问题，在欧洲人们也经常提到。欧洲人经常提出能否把多种社会问题，比如福利和环保能很好地结合起来，把中间的矛盾化解掉等等。如果我们来参考欧洲的经验，就要看到，在发展很成功、竞争力很强的经济中，社会标准包括环境标准都会相应提高，特别是根据联合国经贸组织的标准。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就要让它参照最高经济标准，最高环保标准等。欧洲在发展福利方面，维持经济平衡当中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也有一别失败的教训，特别是在本世纪初，我们非常忽视社会福利、社会保险以及环境保护这方面的利益。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当我们的经济成为一种发展非常有效的经济，像中国今天的经济这样时，我们必须重视一个事实，就是政治体制，包括过去遗留下来的政治体制，能否和新的正在发展的经济完美和密切地结合？最富有活力的经济，应该是参与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社会生活，社会的发展进步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发挥经济的带动作用。我们面临的挑战也正在于此，必须做出正确的评估和判断。因为大家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不一样，所以有很多意见和冲突。必须寻求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好的方法，这样才能符合目前世界发展的趋势。中国面对世界所做出的反映是多方面的，它与英国、法国的观点和判断又是不一样的，各国之间有一种相互竞争的情况存在，我认为最简单地做法就是将来中国允许这些不同看法的存在，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和充分发挥它的优势。谢谢！

卡蓝默：我只想谈一个看法，刚才约翰·帕尔莫先生谈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可能在思想上和意识上落后的问题，在世界各地都存在。现在欧盟取得了一些经验，但是在确定政策和执行政策方面，有时也是落后的。大家也注意到了刚才罗卡尔先生讲的世界相互依存的现象。联合国大会所讨论的问题，像罗卡尔先生讲的，也应该给各国一个决定权。欧盟只是一个小小的组织，我们应该创立一个更大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像昨天所说的，如何像欧洲这样在维护各个国家主权的情况下，制定一个统一的政策，同时把制定政策的层次分解为地区政府、中央政府以及这个国际组织的层面这些不同层次。当我们反复地思考这些问题时，我们就会设想在全世界有一个类似于欧盟的机制，以便在这个机制中使各个国家通过协商达成共同的意见。我本人认为，比如对中日本关系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借鉴欧洲的情况，面对世界上我们面临的各种挑战，我觉得应该有这样一个论坛，使得大家坐到一起来，就解决双方之间的共同问题提出建议。现在这个世界各个国家相互依存的程度越来越高，如果我们不在这方面做出特别的努力，世界就真的没有前途了。谢谢！

卡蓝默对第一天论坛的总结

今天我们已经进行了八个小时的对话讨论，作出一个全面的回应很困难。既不要低估也不要过高估计中国的发展，这点我是同意的。这也正如今天早上吴大使所讲的那样。我们仅仅是在全球对话刚开始这样一个阶段，中欧之间的全面对话也只是刚刚开始。张万亭大使也表明，有必要从全球范围内解决贸易问题，同时要有足够的耐心。特别像吴大使所说，面对向纺织品等商贸问题，大家应该坐到桌子的同一侧，把面临的挑战都摆到另一侧，不仅仅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共同方案，同时也要驱散人们心理上的恐惧，因为这种恐惧是很不利的。现在世界变化很快，我们应该做出什么的选择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很多事情还不可预见。

欧洲的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本以为共同空间的建成需要几个世纪，但事实上却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这是不曾预见的。我想一开始的时候并不需要太多人欧盟建立初期就是这样，由一个小组的人开始了一个变迁过程。21 世纪的共同历史是由我们共同谱写的。我们现在就在这里谱写历史。明天早上将要播放乔治•贝尔图安先生的录像，他就说过，我们正有意识地谱写着历史，也正是这一点使得我们的梦想充满力量。今天大家的坦诚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想无论是欧洲的发言人，还是中方发言人，都认同欧洲的建设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很有启发意义。我们并没有说我们的建设有多么了不起，取得了多大的成功，我们想强调的是一个逐步建设的过程，人们在思想上认同对主权的超越是需要时间的。

这就使我们更明确地知道需要付出多少代价来超越主权，来从全球范围解决一些问题。今天会议的最后一部分，比如丁学良教授的讲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所说的挑战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回应了我今天早上说的。在我们谈到欧洲需要共同建筑未来社会的时候，提出一些比较务实的挑战。在这些方面，我们说到要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正如刚才演讲中所提到，欧共体赋予了那些刚刚走出专制的国家一些东西，比如多样性和民主等。这也教会了我们如何讨论建设一个未来的世界，如何共同建设和平，实现和谐的社会。我们必须相互交流。中国代表说了很多中国的变化，而我们也说了很多欧洲自己的变化。很幸运能有这样的交流，我和欧洲朋友都还没有讨论过一些观点。或许欧洲经验对你们是有利的，而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也了解到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的地方，比如如何不使欧洲大陆陷入墨守成规的状况。另外，越来越多的国家想申请成为欧盟的成员，我们必须设法在不断扩大规模的同时不使欧洲仅仅变成一个大的统一市场。

现在我们开始了与中国之间建立长久对话的第一部，以后可以共同讨论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当然中欧关系肯定还存在一些误解，甚至相互指责，比如关于倾销等方面的问题，或者相互斥责政治模式等。但是我们必须前进，现在应该做的就是试图找到一点共同的机制，不要开倒车。或许有的时候，我们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会停止前进，比如 1954 年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它的代价是很大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前进，我们希望与中国对话，因为这种对话可以讨论出明天的新的发展模式。我们必须有耐心、有足够的政治愿望，才能使我们不会后退。这也将是我们继续生存的唯一机会。

2.2 现代化与世俗化：中欧相逢

2.2.1 中欧三次相逢及跨文化视野

于硕

第一次相逢

谈中欧三次相逢，像一次远足，在空间上很遥远，在时间上也很遥远。但不是单行线的历史，而是双向的。远足是令人欣喜的好奇探险，但在中欧相逢的远足中我们一路也会感到态度上的对立，彼此求全责备，甚至带有某种敌意或轻蔑：你们－我们，精神－物质，理性－感性，民主－专制……其实可以带着轻松好奇的心态出发，边走边深入，遇上困难就克服，然后再上路。从题目上我已经表明进入的角度是跨文化的，一种“场”视野，以区分文化主义的线性思维。跨文化视野首先是一种理想的人文境界，也就是承认，在人类宏大深远的空间中，我所有的，你也一定有，只是采取的方式或有不同；要懂得自己，永远需要别人在场；文明传播的清风，可以把花籽带到异地开花生长，结出新奇的果子。

回到我们的主题，中欧三次相逢。中国和欧洲各自作为两个独立的整体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并各自将自己视为唯一的世界中心。新大陆的发现使人类世界第一次拥有了自己完整的海、陆交通网，为中欧相逢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和条件，从这个时候起，无论中国还是欧洲都不再可能留在各自封闭的状态下自行其是。愿意与否，相互参照都成为必须。一个共同的历史开始了。我们将这一共同历史中的中欧相逢划分为三个时段，因为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性、相逢属性、问题域、相逢地点、文化代言人以及身份认同。

这一相逢史如同所有其它的历史一样，在现实和虚构的历史记忆中展开，但它却使历史发生弯曲，改变了世界的行程。文艺复兴末期，几个欧洲人远离故国，漂泊海上三年，踏上了中华帝国的领土，在智慧好奇的中国文人和渊博执著的西方僧侣之间开始了一次真正的精神相逢，双方的世界观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激发了对许多新问题的思考。接着将是一些中国人，在我们称之为的第二次相逢中，即200年后，带着好奇、屈辱、愤愤不平走向欧洲，以“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今天我们正处于第三次相逢之中。我将重点谈第一次相逢。

第一次相逢：神圣性追求

第一次中欧相逢是在两个“中心”之间进行的，时间是16世纪文艺复兴末期，以1583年耶酥会士到达中国为标志。一来就不走了，有的一住多达50余年，开始了生活世界中真实的接触。相互不断深化的交往造成两个世界精神上的震荡，分别引起了一些观念论战，在中国有17世纪初发生的南京教案及随后刻印的《破邪集》，在欧洲有17世纪中叶开始的著名的“中国礼仪百年之争”。

1．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耶酥会士在中国著述、传教、结交名门、修教堂、建图书馆、画肖像、教数学、译逻辑、绘地图、测天文，做出了许多成就。利玛窦1605年建的北京南堂后被设立成图书馆，有关欧洲的藏书最多的时候达7000册。法国著名汉学家艾田蒲曾引用过当时一位传教士的评论说：“这个图书馆在两个漠不关心的世界之间扮演了纽带的角色。对于远东而言，它使人们了解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对于西方而言，它又间接地向人们显示了远东的财富。”（《中国之欧洲》第2卷，钱林森译）。

利玛窦的著述中最有震撼力的是《坤舆万国全图》。他的世界地图告诉中国人中国之外还

有文明，让中国人知道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标记还有另一种方式。对西洋历法的采用是中国宇宙观的一次突变。我们知道万历皇帝将此图《坤舆万国全图》制成屏风，日夜伴随。利玛窦用中文写了很多著作，第一本书是《乾坤体义》，介绍欧洲的天文学，1773 年出版的《四库全书》把该书视为“西法入中国之始”。在他的《畸人十篇》（1608 年）中他探讨了生命的短暂，财富的徒然无用和荣誉的虚荣，写于他去世前两年。得益于他受过的特殊的记忆能力训练（漂泊海上是无法将大量的古代书籍放到船上的），利玛窦写了一部《交友论》，从古希腊哲人到文艺复兴的埃拉斯莫，汇集 100 种包括他本人的关于友谊的论述，其中突出的是友谊的神圣性。在利玛窦和徐光启等人的交往中，友谊的向度很重要，这至少是利玛窦想要向人们展示的。这些著述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被广泛引用，在许多文集中被重新刻印，使利玛窦在知识精英中获得了令人尊敬的地位。

在文化认知学上耶酥会士留下的遗产是“适应法”，“利玛窦规矩”是通过补儒、释儒、合儒进而超儒。利玛窦在书院讲学，注释经典，传授科学及宗教，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中国知识分子最熟悉的经典注释，用儒家的概念阐述天主教，在两者中寻找伦理共性。

另一个原因是，传教士对阳明心学的批评，指出它过于强调心性（“吾心即宇宙”）而忽略实践知识，这很为当时的士大夫所认同。文化的“他者”扮演了启示者的角色，耶稣会士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概念知识在明末中国激发了一种新气象。以至利玛窦被评论为“俨然大儒风格，是则可重也”（黄景昉《序三山论学记》）。据说利玛窦在中国期间接触过１４０多位当时的名流，他们从全国各地前往南京、北京去拜访他。包括著名哲学家李贽，虽比利玛窦年长 25 岁，但却多次登门拜访利玛窦并邀请他到自己的官邸做客。李贽对利玛窦的印象极佳：“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礼仪，是一极标致人也，”平生“所见人未有其比”（李贽著《续焚书》）。利玛窦也在他的札记中也曾记述过他与李贽一起讨论孔子儒学的本质和当时儒学的偏离。我们似乎能感到他们在既借鉴又欣赏中形成了一种深厚的友谊。李贽曾送给利玛窦一把亲笔题书的扇子，并多次帮助利玛窦，写举荐书并组织刻印他的著作。不过李贽在对利玛窦高度欣赏之后，表示了自己的疑惑，利玛窦他们到底来干什么？那些传教士到底来干什么？这是中欧第一次相逢中已经面临的问题，非常有趣。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解决了吗？

2．中国的“世界”开阔了

在这两个世界相互趋近的历史中有三位士大夫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被视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三柱石”，他们是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庭筠，在皈依基督教后分别被命名为“保禄”，“利奥”和“弥格尔”。

徐光启为明代礼部尚书，官至一品，司国家礼仪、祭祀、科学、教育。他是大科学家，与利玛窦和其他神父们合作撰写了许多科学著作，领域广阔，包括：欧几里得几何学、天文学、水利学、农学等。是耶酥会士郭居静让他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惊悉世界如此之大，而欧洲科学令他欣喜，并终生努力著述传播。作为现代科学先驱，他在《刻几何原本序》中写道：“私心自谓不意古学废绝，二千年后，顿获补缀唐虞三代之阙典遗义，其裨益当世，定复不小。”（《增订徐文正公集》卷一）。人过中年，身居高位，他是否真信天主教？常人对此多有怀疑并做出世俗功利的解释。其实他自己早就清楚表明了他的认识，在他给皇帝的上书中，他将天主教解释为：“以昭示上帝为宗本，以保救身灵为切要， 以忠孝慈爱为工夫，以迁善改过为进修，以开天真福为作善之荣赏，以地域永殃为作恶之苦报，一切戒训规条，悉皆天理人情之至（《增订徐文正公集》）。从我们跨文化认知的角度理解，徐光启的这本奏折是关于神圣性的第一次超越中西文化空间的思考。

事实上，皈依天主教的士大夫们的精神关切是十分深厚的。受到儒学和基督教具有相似性这一观点的影响，这些皈依了天主教的士大夫们所要寻找的正是某种普遍的超验存在。我

们可以从不同层次上来看。他们相信西方这些“有用的手段”可能将儒学从它的“偏离”当中拯救回来，“如石击而火出，玉砺而光显，皆借异己之物，以激发本来之真性。始虽若戾，终实相生，安见大异者不为大同也。”（林起《代疑编序》）。

像徐光启这样的大儒居然皈依了天主教,这意味着两种文化的承担。上帝、天主、祭祖、祭天、尊孔子，他是怎么把这些不同因素融合为一的呢？这是一个特别值得追究的文化符号兼容或精神超越的个案。

3．欧洲“世俗化”的中国借口：“礼仪百年之争”

第一次相逢在欧洲引起的震撼强烈。从16世纪末开始，一系列的传教士通讯、记述、见证、历史、科学和哲学译著纷纷在欧洲出版，使欧洲人的精神世界受到冲击，引发了“中国礼仪百年之争”。我们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欧洲对中国的热情从未像那时那样高涨，对中国的兴趣从未如此广泛：在欧洲之外竟存在着一个文明世界，甚至达到比欧洲更高的文明境界，但却不存在一神统治。一个带有想象色彩的中国为启蒙运动思想家提供了摆脱教廷霸权的有力武器。这一外来力量的强劲，反衬了欧洲教皇政权的不得人心和衰落。

震撼了欧洲人历史观的是卫匡国出版于17世纪中叶的一系列巨著，《中国历史》、《鞑靼战史》、《中国新地图》。他的《中国上古史》可以称为欧洲第一部中国古代史。卫匡国依据中国古典，建立了从公元前2952年伏羲起，直至公元一年这一长时段的中国编年表。这是一个大胆的宣示，因为这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文化的真实性，从而使《旧约》所描写的创世观念受到挑战。在中国上古史结束之点，西方基督教大写的历史才开始。这部书无疑是对当时欧洲人类史观是颠覆性的。

“中国礼仪百年之争”始于17世纪中期。论争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1）“神”的概念的中文翻译，用我们的话说即名称的文化转译。如Deus译成“天”“天主”“上帝”还是“泰初”？（2）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是否继续祭祖和祭奉孔子的传统习俗？（3）儒学经典是否可以与基督教理念并存？

中国最热情的赞美者是被誉为全才——“整个科学院”的哲学家莱布尼茨，他的中国关怀始于翻译圣经词汇的争论，但是真正的原因却来自他长期以来对“普遍语言”的追寻。在他所处的时代，天主教世界一直在找寻遗失了的亚当语言。在一本1669年出版于英国的著作中，作者考证出汉语是人类的第一语言，由于中国人没有参加巴比塔的修建而保存了原初语言的纯洁性，并通过这一语言媒介保留了自然神论。莱布尼茨的批判视野使他超越了同代人的宗教的观望，而将中国当成他的科学、哲学和道德三重普遍精神思考的重要寄托。从《易经》中抽象的64卦的二元相数，到围棋体现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再到最能吸引他的道德精神，他把它称之为“实践哲学”和“生活最佳规范”，他甚至呼吁“依我们所处的世界的腐败的现状而言，我认为完全有必要让中国人向我们派遣传教士，如同我们为了传授启示而向他们派遣传教士那样，向我们传授自然神和如何以道德治理社会的方法。”（Roy,O. Leibniz et la chine）

莱布尼茨的追随者之一是伏尔泰，中国在伏尔泰的眼中被大大理想化，从1734年出版《哲学通信》时开始，他就肯定过中国是全世界最智慧、政治最完善的国家。在他的名著《路易十四时代》（1751）和《风俗论》（1756）两本著作中他给予中国以十分重要的位置。《路易十四时代》的最后一章，题目是“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 这些争论怎样导致中国取缔了基督教”，而在《风俗论》这部世界史当中，伏尔泰认为中国从未陷入迷信或天主教一类的教条之中，而是一直处于物质、进步和追寻理性之中。伏尔泰借用《赵氏孤儿》这部元代戏剧，创造出了另一部叫做《中国孤儿》的戏剧，曾被译成十几种欧洲语言上演。伏尔泰自己曾坦白承认，《中国孤儿》这部戏剧除了题目外，与原作并无相似之处，他是要在剧中将孔子的五个道德标准（仁义礼智信）体现出来，以便向欧洲展示一个理性赋予的自然优势，一个超越于野

蛮和盲目力量之上的光辉榜样。在这种有意识的夸张和改造之中，伏尔泰向我们展示的是文化代理人常用的移花接木的策略。他还体现了一种自我投射机制，通过中国人之口述说的是他自己的理性哲学对自然神崇拜，并以此作为武器，与路易十五的不宽容政策作斗争，同时试图摆脱梵蒂冈教廷的束缚。

18 世纪中叶以后发生了由欣羡中国到鄙夷中国的转向，如果说前者以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为代表，后者可以说以德国狂飙运动思想家为典型，但却又是以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为象征。中国负面的形象开始浮现，他的“东方专制”成了一个广为人知的中国代号，一直到今天都影响着欧洲人和中国人自己对中国的判断。

尽管发生了由欣羡中国到鄙夷中国的转向，人们却始终不能遗忘中国，反而欧洲思想界在 18 世纪下半期到 19 世纪初期更加关注中国，不同的只是其中的位势关系发生了变化。

总之，从 17 世纪开始，中国便无意识地被卷进了欧洲现代化的发端之中。

4．几点启示

第一次中欧相逢的历史性。

相逢的两个世界都自以为是唯一的世界中心。中国的皇帝仍然是天之骄子，神圣不可侵犯；明末精神危机沉闷，利氏实学给士大夫阶层带来清新气氛。神统的欧洲刚刚走出中世纪，面临着种种困惑，需要一个“他者”如中国作为参照系。启蒙运动思想家将中国塑造成一个普遍主义理想的社会象征，并由此把中国用作摆脱教廷统治的武器，我们称之为的“积极性误解”给予的动力。而德国狂飙运动思想家对中国的批判则伴随着主权民族国家创立的激情和个人主义强化的意识。因此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们否定“中国专制”模式，被中国人视为道德的社会治理在他们的眼中却是精神的窒息。在中国，这次相逢的影响需要等到 19 世纪下半叶才显现出来，即在第二次中欧相逢的过程中，欧洲才给中华帝国带来了 100 多年前中国给欧洲的那种震撼。从此，中国人进入了身份彷徨期，直到今天仍然处于精神的流离失所状态。

语言及符号转译及意义理解。

从建教堂到改称书院，是符号的重新“具形化”（configuration）。“教堂”是神圣的“上帝之家”的标志，而“书院”是一个世俗的和中国传统教育的场所。在教堂和书院两个符号之间如何发生了精神的相互转化，或借用“他者”的符号来寄托自己的思想？ “利玛窦”这个中文命名远远比他的意大利原名 Matteo Ricci 更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我们看到翻译是一种文化整合工程，无论翻译多么严谨，任何翻译都意味着变异，包含了原初语言的部分意义的遗失和到达语言中的意义增加。将意义恢复到位并使相互理解成为可能的还有语言之外的东西，比如艺术。“圣母圣子图”就扮演有效的沟通媒介，作品一下子就向中国人传递了人类共通的母子之情，也体现了中西文化当中皆有的重视男性继承人的价值观。值得注意的是，在多次教案中郎世宁和其他一些欧洲艺术家却被中国皇帝继续留在了宫中。

具有决定性的代理中介。中介的个人品质，中介的主观意向在相当意义上决定了传教政策和相逢的取向。例如传教士力图融入文人阶层、认同文人品味的愿望造成了他们对中国非主流文化的轻视，忽视佛教和道教思想的价值。从中国的中介看，比如某些皇帝和文人，他们对于西方传教士的接受，使得两个分离的世界建立起紧密地关系，可以将其称为“跨文化”文明发生的“酵母”。

文化代理和本部之间的距离与双向代言人。

传教士和教廷之间在原则和做法上的分歧产生于所处的空间距离。传教士们基于自己的亲身经验而行事，罗马教廷却在教条上冥顽不灵。而天主教内部的派别、宗教之间（佛教、天主教）的敌对、僧俗之间以及权力之争都影响了相逢的进程和质量。无论主观意愿如何，中介们都扮演着双重代言人的角色。利玛窦的适应策略是采取双重标准，向西方介绍中国的祖

先崇拜和祀孔时，他解释为一种自然宗教；但同时在他的中文著作中，他又对儒家的世界观、生活意义、伦理系统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这种模棱两可和矛盾现象非常普遍，是文化双向代言人的特点之一。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过程经常处在无意识的隐蔽状态下，外部符号唤醒“异他性”意识，而生命炼金炉产生的定是文化混血儿。在长期融合的过程中，谁都难以区分出原来所属的那部分。我们至少可以指出两个原因：一个是意识形态的表征体系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差异和悖论；二是这些双向代言人含糊不清的命运，如同灯泡中的钨丝，当灯亮着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而当电压不稳造成钨丝熔断后，我们又把灯灭的责任推给了钨丝。中介就像钨丝一样永远处于这种尴尬状态。

历史交叉场中的主体判断。

一个相逢交叉场的构成包括相逢各方的行动者及其意向、资本、位势、所处时代的历史性等因素。第一次相逢的在场和潜在的主体有：罗马教廷及其意图、天主教的各派及其敌对关系、新生民族国家的威力及其扩张、危机中的中华帝国、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及不同的宗教信仰，最后，是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包括改朝换代、思想潮流、相逢的代理人的资质和他们在相逢中的地位。这一切形成了第一次相逢的“场”效应。

因此，不讨论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出现的民族敌对，进化论、启蒙运动和狂飙运动之间的对立交错，我们就不能完全理解欧洲对中国态度的转向。如果鄙夷中国在 19 世纪变成一种主导性的态度，那是因为欧洲已经完成了他的“形构”和各种革命：思想革命（启蒙思想和理性的凯旋）；工业革命（蒸汽机及其在航海上的应用）；政治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科学革命（进化主义）。 欧洲不再需要像中国这样的一个世俗化的参照系，欧洲人获得了对自己的信心。然而，认知逻辑使然，欧洲中心主义仍潜在地需要一个“异他性”来凸现自我。这一次欧洲人发明了“文化”“种族”“民族国家”这样一些新概念来界定“我们”和“他者”。布罗代尔曾说过：“文化”一词的好运刚刚开始。

人们的肯定或否定也是场效应的：莱布尼茨肯定中国价值是为了他的“普遍原则”；伏尔泰夸大中国是为了他的“知识共和国”和更有力地与法国天主教作斗争；孟德斯鸠和德国思想家对中国的批评针对的是欧洲的专制主义。关系之环在交叉场中愈趋繁复。虽然文明间存在各种偏差，但我们看到有意的主观阐释在相逢中竟如此重要。代理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给出某种主体阐释。莱布尼茨把“理”“太极”“上帝”三者做了一个“三位一体”的阐释；孟德斯鸠在专制主义和恐惧之间建立联系；伏尔泰以自己的自然神论阐释儒家；洪堡在语言和国民精神之间分析出结构的相似性。基督教在中国文人那里也引起了相似的主观反应。

“场”是复杂的。在一个多元文化相逢的交叉场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偶然性、想当然的未思或不可知性。对这点的体会可以帮助我们避免绝对客观的虚妄。而“测不准原理”恰恰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更多的确定性。

总结起来，那个时代的人类可以被称为**神圣人**，他是畏神的，敬神的。在人格化的上帝和宇宙太极的“天”的信仰上较量高低。人们关怀的是永恒的精神性和短暂的世俗性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个体内敛的精神认同行为信仰尚存，而科学在当时还带有探求真理的神圣性所以这次相逢是一次真正的精神观念的相逢。在历史性上而言，这次相逢处于一个弯道上，**神圣世界**开始下降并转向**英雄世界**，即正在形成中的主权国家世界。相逢的地点在中国，受震撼最大的是欧洲，她仍然是一个实存的单位。中国的“至高无上”的文明被用来服务于启蒙运动的世俗化过程。

第二次相逢：现代化在中国的展开

我们将中欧第二次相逢划定在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以18世纪末英国马尔嘎尼（Macarteny）代表团访华为开端标志。在通常的表述中，这段历史的核心象征是鸦片战争，中华帝国遭受蹂躏与践踏、丧权辱国。一方是欧美殖民主义的野心扩张和武力护卫的重商主义，一方是拒绝通商的华夷朝贡体系，最终是天朝的崩溃。我们在此需要梳理的是，在这“页页都是血泪史”的历史记忆中，同时还有另一个很少被言说但却相与伴随的历史，即个体之间的人与人相逢的历史和中国的与世界同步的现代化历史。这次相逢启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社会及知识面貌。第二次相逢推促着中国人进入了一个漫长的“他我认同”（hétéro-identité）的时期，并在自卑和自尊之间尴尬地徘徊。

1．历史性及交叉场（champs croisés）中的形构

第二次相逢发生在西方的中国观出现逆转的时期，由赞美中国向鄙夷中国转向。新生的各“民族国家”粉墨登场，在世界舞台上摆出主角姿态，并在各自间建立起较量平衡的关系，反映这种“主权国家”关系的是鸦片战争的“理由”和租界的设立。

西方刚刚完成它的一系列变革：世俗的民族国家，绝对的理性，国际法则规范，在全世界面前以优秀典范自居。它以自由贸易为名，在炮舰伴随下奉行扩张的外交政策，并将其视为国家的权利和文明的进步, 一种“保证人类幸福”的权利。这一全球化进程将在不久之后把世界变成一个统一的市场。

保持华夷贡奉体系的中国人则表现出从远古至此一直保留的对“商”的蔑视。对于中国来说，接受传教士所传播的思想仿佛比合理贸易中的商品更容易。而开放兰学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为中国树立了现代化的榜样。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在中国人的表述中变成了：“前天的学生，昨天的敌人，今天的榜样”。日本将在中西相逢中扮演中介的角色。被迫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体系的中国，虽然对自己的优越性和 “同化”能力深信不疑，面对着失败，渴望复兴，于是决意向“敌人”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

2．中国的现代化三部曲及相逢的代理人

这块广阔的相逢场域由无数不可分割并同时进行的回环往复所组成，但为了方便，中国史家们一致同意用一种略嫌简化的方式把这段历史划分为三个渐进的阶段：首先是工具性学习的技术阶段－洋务运动，其次是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政治阶段－戊戌变法，最后是引进西方现代价值观的文化阶段－新文化运动。从此开启了中国现代化整个进程。

科学、传教的双重身份及“第一批”中国现代符号的出现

这一次是欧美的新教教士活跃在舞台上，他们像利玛窦、卫匡国一样杰出。1807年到达广州的英国人马礼逊，是第一位被派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其贡献在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新型学校，第一份近代报刊，第一个“非政府组织”，第一座新型医院，第一部中英大字典，并将西方近代印刷术传入中国。到了19世纪下半叶，李提摩太、丁韪良、伟烈亚力、傅兰雅、花之安、林乐知……，可谓群星荟萃，这群富于自由主义思想的新教教士，对中国的政治与维新运动，以至知识分子的思想蜕变，曾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例如美国人林乐知（1836-1906），1860年来华，身兼三职：传教士、经纪人和翻译家，办学（格致书院）、办报（《教会新报》与《万国公报》）并写作。1863年英国人赫德被同治皇帝任命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任职长达48年。他是最典型的双重身份的代理人，如汉学家费正清所评论的，一方面他对自己的祖国忠诚，一方面对清帝国恪尽职守，在任内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港口设施、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为北京政府开辟了一个稳定增长的新的税收来源，奠定了中国海关的现代化，也在中国对内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了作用。

洋务运动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一口号体现了中国在学习西方中的取向，即功利主义的进入，直到今天基本如此，而今天新的儒学振兴努力潜在透露出肯定这一取向的趋势。洋务运动的推动力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于19世纪40年代末期启动，“富国自强”是根本目的，掌握西方技术为首要目标。近代最杰出改革者是身兼数职的北洋大臣李鸿章（1823-1901），当时国家所有重大事务的决策者之一。梁启超说他本人就是“四十年的中国史”，西方学者则把他视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外交家。作为个人他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中国。他虽然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和十足的封建官僚，但却勇于承认西方的长处，成为现代化推进的先驱。1865年至1895年三十年间开展了现代工业和“走向世界”的洋务运动：建立各种现代企业，包括武器军备、造船、铁路、电报系统、机器制造、开矿、纺织、交易所、银行。培养人才受到重视，1862年创设了教授西方知识的第一所翻译学校京师同文馆（后来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前身），然后是上海的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局，及各地现代学科建制的大学。被誉为“科学之家”的上海格致书院建于1874年，科学翻译家傅兰雅在李鸿章的支持和科学家徐寿的帮助下发起于上海公共租界，聘请西洋教师讲授化学、矿学知识，聘请中外名人学士讲演格致原理。书院设有博物院、藏书楼，它既是一所中学，同时也是一座图书馆和科学博物馆。政府出资于1873年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120个儿童被送往美国学习。不同的是他们多是穷困孩子，并在7年后被强制回国，因为他们有洋化的危险。

宪政理想的戊戌变法

中国在军事和科技方面的西化没能避免1895年中日战争的失败。政治改革的呼声兴起，新教机构广学会的报刊《万国公报》成了当时思想变革和政治改革的思想源泉。它通过书文竞赛的方式，在大城市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广泛宣传政治改革的势在必行。《万国公报》还组织翻译出版了许多与政治改革有关的书籍。它有500位作者，分布全国各地，其中著名的有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郭嵩焘、李善兰、王韬、郑观应、薛福成……梁启超曾一度担任该报总编李提摩太的秘书。

威尔士人李提摩太（Timothai Richard , 1845-1919）被誉为“变法维新运动的精神导师”，对晚清一代开启民智、了解世界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他1870年到达中国后曾长达十年参与山东、山西的救灾赈济，非常了解中国的底层社会。应李鸿章之邀，出任天津《时报》的总编 ，后又担任广学会秘书长。出版了《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建立山西大学，与当时的中兴名臣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革命派孙中山等均有往来。他对康有为一代新兴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及其重要。历史学家熊月之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称：“他集传教士、学者、政客于一身，传教、译书，进行广泛的政治活动，样样搞得有声有色……”。1881年开始，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他的著作《近世要务》，完整地提出了一个中国改革方案，该方案包括98个要点，设计科学、经济、宗教道德观念、教育、医疗卫生、外交、法律、改革本身及其展望，几乎完全被采纳为戊戌变法的方案中去。他撰写的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是研究近代中国的珍贵历史资料。

被同时代人称之为“19世纪最优秀的汉学家”的德国人花之安（Ernst Faber, 1838-1899）也于1879到1883年间在《万国公报》发表他的著作《自西徂东 》。以儒家的五个核心原则（仁、义、礼、智、信）为参照，他介绍了西方的道德、平等、民主、习俗、科学和教育以及结社（包括工会）等民主社会的基本特色。花之安的这部作品指出了当时中国的各种腐败和缺陷，介绍了西方的一些优点，提出了一套改革方案。

美国人林乐知重要著作之一是《中东战记本末》，与蔡尔康合作，于1896年出版。他在书中建议进行五项改革：1）激发民族自信，同时遵守国际惯例；2）教育强国，培养精英，

改革教育制度，向西方派遣留学生；3）以西方三原则来提高道德水平：信仰上帝、平等与科学；4）从上下两个方面进行政治改革，上下一心，实行地方自治；5）改革旧俗：禁止体罚，放弃专制，立法，是新宗教自由，废除女孩缠足旧俗。林乐知的这些理念既是批判性的又是建设性的，在全中国都有影响。第一版3000册很快售空，广学会在10个月后又再版，还给总理衙门免费赠送，总理衙门致信感谢，时居中国政坛巅峰的李鸿章高度赞赏此书并希望它广为传播。

百日戊戌变法的核心是“维新”，即建立“共和宪制”。悖论的是，镇压变法的慈禧太后三年以后再次发动的“新政”，完全模仿了前者的改革。她声称“准备立宪”，这一次是阻挠更激进的资产阶级建立共和国。

进化论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新文化运动

受亚当·斯密斯等古典自由主义理念影响，在中国产生了三个派别：由严复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梁启超代表的政治自由主义，以及胡适代表的文化自由主义。

关于经济自由。严复（1854-1921）堪称“自由之父”，成功地将儒家学说与西方知识相结合。严复通过翻译赫胥黎、斯宾塞、穆勒及孟德斯鸠的著作，普及了达尔文的词汇如“天演”、“物竞”、“天择”、适之等词汇，一时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他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英国游历，得以亲历资本主义的英国社会，指出社会财富的来源不仅仅依赖于“坚船利炮”，还有像亚当·斯密斯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所鼓吹的自由竞争机制。由于他的名气，自由思想和社会进化论的影响广大，将知识分子引向了彻底的现代主义。

关于政治自由。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创建了《新民报》。但是他和严复一样，具有严重的汉民族主义倾向，因此两人最终都在他们的思考和建议中抹去了自由和个人主义。严复于1898年发表了一篇长文，极力捍卫“保宗（汉民族），保国，保教（儒学）”。而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则更对政治结构感兴趣，他们的改革集中在议会制度和现代教育的建立，不那么关注经济改革。19世纪在西方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进化思想几乎同时在中国扩展，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不懈地坚持着进化论的逻辑。

关于文化自由。在中西第二次相逢中，西方知识范畴虽然一直既是参照又是敌意的对象，但却在中国迅速扩展，成果累累。从19世纪最后30年的报刊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西方知识的认可程度发展很快。洋务运动初期的“夷学”在洋务运动高潮时变成了 “西学”，到戊戌变法时期变成了“新学”，再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成为“显学”。而这同时也是西方对中国负面判断在中国人心理上的内化过程，以至于中国人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看自己一无是处，只能“从西方思想中汲取精神营养。”新文化运动引进了民主、科学和个人自由的新观念，《新青年》（直接用了法文副标题La Jeunesse）和《东方杂志》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青年》的创始人陈独秀教授（1879-1942）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其总书记。他和北大教授胡适一起，将当时最优秀的左派学者团结在杂志的周围。从《新青年》第一期的目录我们可对其办刊宗旨做出判断。这一期包括陈独秀写的一篇社论，充满了对青年的希望；他另一篇是“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一篇关于“新旧问题”的思考，Max O’Rell的关于妇女的评论，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片断，一位法国作者关于历史和文明的随笔，一位美国作者论青年的汉英双语文章。

《新青年》杂志及时介绍所有西方重要的思潮，提倡中国文字改革，推广白话文的知识民主化的理想，形成了一个思想辩论的自由开放时代。对于北京大学教务长陈独秀来说，西方宗教高于儒教，理性主义代表着思想的最高形式。而曾留学德国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则

提倡“以美育代宗教”的理念。对于他来说，美带有普世性，它可以超越功利，培育心灵，提升思想。从五四运动开始，杂志从文化和哲学中心转向了政治斗争和民族救亡，胡适，鲁

这一次相逢的历史性：可以概括为较量关系中的英雄世界，自由经济竞争和国家干预并存的时代。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英雄世界里，相逢需要坚船利炮，打着各国认同的国际法的旗号占领土地（殖民地）、人（奴隶）、利益（商业），征服自然（科学技术）、理性至上（世俗化）。

相逢所面临的问题是一个悖论：信仰上帝的人试图将神的使命交给民族国家，人取代上帝二，人的理性成为绝对意志，世俗的主权民族国家给自己赋予神圣性。而清帝国救亡的挽歌也神圣悲壮。同时人在世俗化，从天堂下来，从地狱上来。不过世俗化并没有解决人的神圣性依赖问题，于是理性变成了宗教。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强化了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集体行为，“文化”、“种族”“祖国”成了时髦的词汇，一起构成了做人的标准。迅和其他一些人最终离开了它。新文化运动是在对儒家文化的否定和批判中进行的，如陈独秀所言：“既然儒家学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就不能修正它，只能整个抛弃它。”到了30年代，全盘西化的极端化后果之一是对中国文化的否定，造成了大陆文化的荒芜，特别是近半个世纪的青黄不接。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东方杂志》在以西方为鉴的同时，是作为《新青年》的对垒出现的。在后来的几十年间，两个阵营围绕全盘西化和发掘“中国文化的精髓”进行争论。《东方杂志》的拥护者主张新儒学。在新文化运动正酣之时，北大年轻教授梁漱溟出版了一举成名的著作《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是一部古印度、古希腊和中国哲学比较研究的著作。梁漱溟是新儒学第三次复兴的代表人物，这种复兴没有停止过，在台湾和海外持续着研究的基础工程，在大陆，柳暗花明，2004年被称为“传统文化年”。

3．小结：英雄人的征服

第二次相逢是在近代世界共同史中进行的。在那些宏大叙事背后，有一些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人本的交流，其间人们相互吸引，共同工作，结下友谊。 人的历史充满复杂性。

这一次相逢的历史性：可以概括为较量关系中的英雄世界，自由经济竞争和国家干预并存的时代。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英雄世界里，相逢需要坚船利炮，打着各国认同的国际法的旗号占领土地（殖民地）、人（奴隶）、利益（商业），征服自然（科学技术）、理性至上（世俗化）。

相逢所面临的问题是一个悖论：信仰上帝的人试图将神的使命交给民族国家，人取代上帝，人的理性成为绝对意志，世俗的主权民族国家给自己赋予神圣性。而清帝国救亡的挽歌也神圣悲壮。同时人在世俗化，从天堂下来，从地狱上来。不过世俗化并没有解决人的神圣性依赖问题，于是理性变成了宗教。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强化了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集体行为，“文化”、“种族”“祖国”成了时髦的词汇，一起构成了做人的标准。

地点：战场在中国，欧洲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民族国家。代理中介人：新教传教士、谈判的外交人员、中央帝国录用的西方人、现代中国文人、西方知识分子。他们起着一种在两种双重性中往复的作用。

第二次相逢在20世纪中叶沉寂了。在冷战中，相遇至少在表面上停止了。从1978年开始的第三次相逢，似乎重奏技术、政治、文化改革的三部曲，至少在逻辑上延续了第二次相逢。中国人在“他我认同”（hétéro-identité）的悲情中，也一直未找回不卑不亢的平和品质。

第三次相逢与超越

第二次相逢的时候“上帝死了”，理性取代了它，人变成了自己的上帝。然而绝对理性正在给我们带来无数的灾难，包括技术和金融对人类社会的支配，我们所面临的各种生态、能源、食品安全以及精神危机等问题。我们仍处于主权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机制中。一个主权国家的建立，需要有一个历史文化的基础，需要有一个承担它的种族的存在。所以我们明白，主权国家只能是文化的和种族的取向，不可能是全人类的取向。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的取向比一个种族的取向更高尚，那我们就不能不超越一个国家的利益，不能不重视所有的文化遗产，也就要超越历史的规定性，超出种族的属性，超出地域，进入一个更宏观的领域，去面对我们作为人类共同体的存在。

第三次相逢始于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冷战的结束，这次相逢立即搭上全球化加速的特快列车。作为被中断了的一个历史的续弦，双方之间的交往与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然而，此次相逢的历史性体现为一个怪异的悖论：相逢的虚拟时空的无限可能性和人的多重隔绝。一时间出现了“历史终结”的宣言，人类整体受到威胁。中国人制造的酸雨，日本人受苦；中国的禽流感、法国的疯牛，其它地区的人受苦。灾难在高科技中比以往更快地传播，精神的边界却反倒因为恐惧而重新加固，社区主义强化，民族主义复兴。从而使得这次相逢仍延续着较量关系的逻辑，它迫促着我们这个世界兴致勃勃不顾一切地狂奔。尤其是今天的中国，沉浸在一个原教旨市场主义，原教旨金融、技术主义量化的亢奋中。属于人的，不可量化的价值被压抑或被置若罔闻。面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灾难性前景，我们显得悲观无力，我们所有的是拒绝、平庸，而“他者”和“我们”之间却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分疏了。纠缠着我们的是某种强烈的现代性的主体焦虑：我是谁？什么能证明我是中国人？中国餐馆还是孔子学院？离家出走的我和你杂居在世界上的各个角落，既在其中，又在其外。百年西化后的我们，没有办法只认同一个符号，从里到外，从器物到思维，我们有时比西方人更西方。

第三次相逢的地点是交叉的，既在中国，又在欧洲，即在物理空间，又在虚拟的符号空间。所有的主权国家都在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做着跨国公司的贤内助。作为人，我们的特征是**经济人**，满脑子里只有数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的世界发生了质的变化。有责任的古典资本主义已然结束，出现了三个分离：生产与销售分离了，经济运作与社区、国家分离了，人与人在物理空间上分离了，人之迷失如丧家之犬。销售终端的跨国超级市场既不知道谁生产，也不晓得卖给谁。生产者亦然。那我们如何让他们对产品的安全质量负责。出现假药其实正是我们的世界的典型征兆，一个冷漠无情的野蛮资本主义的世界。

在社会意义上说我们的世界完全没有可持续性。这个世界不可持续了，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相逢模式。

也就是说，处于共同命运的生态世界，我们的时代使命是提升作为精神的公民意识，展开神圣性重建，寻找对技术和金融统治的应对方案，认同的只能是唯一的人类家园，我们生死与共，相逢地点以城市为核心，足够大又具体地小，有街道广场、住宅学校。网络大可利用，从无限虚拟空间回到可触摸的地球，从宏大的国际公民网络回到具体行动的、可感知的社区空间。创新第三次相逢的行动者是有意识的世界公民，跨文化人，是艺术家，因为艺术天然是超越的。

大家努力创造的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是共同命运的生态世界。我们处于的命运息息相关。目前还只是一个共同命运的经济世界，处于恶性循环之中。面对家园危机，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单独解决问题，也没有哪个国家愿意为她负责。能不能共同管理我们的生态世界？如果经济世界和生态世界在西方有着同一个希腊文词根-eco＝oïkos，意为“家政”和“家

园”，那么我愿意说“经济的”是世俗的，而“生态的”是神圣的。经济家政与呵护家园，第一个是在人家的层面，而第二个是在自然的层面，与大千宇宙相连。人重新变得谦卑，敬畏自然，还自然之魅。所以我们将修复的生态的世界是一个神圣的世界，超越人之上的宇宙和谐的世界。

当我们建构共同命运的生态世界的时候，我们正在回到神圣性。**生态人**在共建家园中最终会成为兄弟。

（经本人重新整理）

三次中欧相逢一览表

时间	历史性	时代问题	认同对象	相逢地点	代理中介	人的特征
第一次相逢： 16—18 世纪	弥留中的神圣世界 观念和想象的相逢 中国属于“上帝的选民”	“上帝—人”的精神存在（欧洲天学） 天人合一（中国心学）	欧洲：上帝 中国：天普适信仰与普遍理性	地点在中国 冲击在欧洲（实存的欧洲）	天主教传教士（艺术家和科学家）,启蒙主义的思想家,中国士大夫	神圣人
第二次相逢： 19—20 世纪中叶	较量关系中的英雄世界 自由经济竞争和国家干预并存	“人—上帝”的绝对理性存在 主权民族国家的形成 中国救亡	主权国家、“种族”和“文化”的认同新标志	分崩离析的中国 “欧洲”不复存在	外交家，商人，新教教士，士大夫中的现代主义者及新生知识分子 主权国家	英雄人
第三次相逢： 始于 1978 年	技术和金融统治下的全球量化世界，虚拟相逢与人的隔离 人类受到整体威胁	现代性主体焦虑 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灾难意识和无力感	“惧怕”和“平庸” “他者”和“我们”混杂与认同迷失的时代 欧洲重现	符号和虚拟空间（网络） 中欧的交叉相逢（场域） 统一欧洲	商人，企业家，科学知识分子 “主权国家” 国际组织 跨国公司	经济人
创新第三次相逢： 1990 年至今	共同命运的生态世界	神圣性重建，寻找对技术和金融统治的应对方案 提升作为精神的公民意识	唯一的人类家园	城市核心 利用无限虚拟空间回到可触摸的地球，可感知的社区（中欧论坛）	世界公民 跨文化人，艺术家 公民世界论坛 国际网络	生态人

2.2.2 欧洲进化论、科学和中国的发展主义

罗红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我的题目是讲进化，里面涉及到科学以及知识共同体的一些问题。刚才我听了两位的发言也深受启发，他们从宗教的角度来讲、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自己的问题。我也曾经研究过宗教，也有自己的法则，今天我谈另一个问题，就是从科学和科学主义的角度来谈世俗性的问题。

首先请大家跟我一起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肤色不同，文化的背景也不同，但是我们能坐在一起，而且有一个默契，之所以大家有默契，是因为有知识在我们中间作桥梁，我们是一个很像宗教的共同体，不分国界也不分种族，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背景。把人从自然的状态剥离以后，人开始脱离自然，这时候人就不仅是一个自然体而是一个文化人，是一个知识人，有一个共识的说法就是，他是一个有思想的动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人在讨论知识、科学、发展的时候，跟宗教讨论的人神不分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这时候人相对独立于自然。按照康德的说法，就是把道德和伦理讨论，随着时间的关系，变成了人类征服、改造自然世界的讨论，知识在里面起多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是我谈个题目的背景。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就给我们叙述了一个生物进化的过程，这对我们现代人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以至于现在我们的政治家也受到了《物种起源》的影响，可以说它已远远超过了宗教了影响。它很深刻，影响了科学家和我们目前做研究的人们。但是达尔文对社会并不太感兴趣，他是做生物学的，可是把达尔文的思想用做发展的社会科学，变成我们最后所熟悉的达尔文主义，这时候就开始出现我们说的把达尔文的研究通过何许变化而形成一个社会进化论的过程，一个物种的进化到社会的进化论，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世俗性过程，是通过科学的渠道来完全的。它是怎么说的呢？首先社会进化论对我们中国来说不陌生，这是来自欧洲的观点，他们把社会的演变过程也看成一种生物现象，就是说这个社会的发展也是从出生、壮大到死亡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从A结构变成B结构，当然社会的变化也伴随着斗争。社会进化论早期的介绍者是严复，他翻译了《天演论》，《天演论》讲了自然的进化、自然物种的变化和它们之间的链条，他也说这种变化可以用作社会科学的领域。这是严复在早期翻译的《天演论》中讲的，是我们所说的世俗性的一个过程。在中国，又遇到了一个更大的运动，就是马克思主义，它也讲社会进化，而且是社会发展阶段论。我们从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一直走到共产主义。他把社会发展演变成线性的轨迹，而且是明天永远比昨天好，这是他们线性思维的一个基本逻辑，所以你可以看，从达尔文的朴实主义的科学知识延伸到社会领域一直发展到马克思主义，就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线索。在中国我们不能忘记严复在里面的作用，他把西方的东西变成一个中国知识领域可以理解的东西，而原来的中国不是线性思维的。

有意思的是发展阶段论仍然使中国困惑。马克思韦伯在证明资本主义之所以产生在欧洲的原因是很局部的，它没有产生在伊斯兰社会、中国社会，证明了资本主义产生的背景。这时候我们就知道社会发展也有它自己的轨迹，这个轨迹就是在某些地方的发展表现出这种特征、在某些地区的发展是另一种特征，就是我们讲的第三次世俗性的前兆。当时我们知道马克思·韦伯写了关于中国道教和儒教的书，里面大量的事实证明在中国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当然在伊斯兰和印度他也做了同样的研究，在《基督教伦理》这本书中，谈到西方出现了这种现象，到我们这里就变成了西方和东方的模式。中国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谈社会发展和社会进化的。可是在东方和西方的问题上，最后就把这个话语变成了东方和西方的关系，这里面就有一个习惯性思维，尤其是历史学家（指主流的历史学家），他们认为一个主流历史的思考就是说中国近代革命以后的变化，都是在西方冲击、东方反应这样一个框架下产生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中国近代的发展史出现的变革、运动，无非是对西方列强的刺激的反应。换句话

说，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尤其是在近代，并不是中国自身的动力，而是来自于西方。这里面我们讲到东方、西方的问题时出现了一个思维的定势，就是中国的历史是一个被动的历史，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史是西方史的一个延伸。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教授写了一本叫《怀柔远人》的书，这本书的主导思想是讲我们的传统认为中国人抗争西方列强然后产生自己近代的革命运动，而他认为满族打入中原、统治中国，事实上当时与英国等列强的对峙不是东方、西方的对峙，而是两个殖民者的对峙。这种对历史的解读已经不是简单的东方、西方的问题，当然主流还是中国的历史是一个被动的历史。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毛泽东开始了中国的革命，一直到解放战争1949年为止。实际上毛泽东在马克思著作中没有发现资本主义，而发现的是地主，就是说地主在中国的出现有它内在的逻辑，中国按照发展论看问题应该是地主而不是资本家，所以毛泽东解决的是我们中国内部的问题，这一点上我把它定位在我们自己的发展阶段论。大家可以看到达尔文一直到严复到马克思到毛泽东，毛泽东解决土地问题，发现的是地主而不是资本家，我认为是第三次世俗性的过程，并且对进化和发展的问题是第三次的世俗性过程。

根据这个线索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我们一直坚持社会主义的学说，但是中国的发展轨迹证明了两点：一、方法论的相对主义。这不仅反映在政治上，更重要的反映在科学研究上。二、意识形态的相对主义。实际上就是后来以色列的学者讲现在的世界是多元化的，而不应该是一个现代性。可以看到这也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相对过程，我们中国的情况和西方也是一样的，不是单纯被动的反应，它出现的轨迹也是一个相对主义的过程，这就是我们讲的两个现象。

这幅图画比较简单，但是我的主题思想就在里面。虽然我们对人的起源有很多说法，但《物种起源》对我们原来固有的知识产生了巨大的挑战，，严复在翻译的时候说到的弱肉强食等思想，一直延续到社会领域，这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从社会进化到生物进化，演变的是一个知识劳动的过程，这个知识劳动是对过去概念的隐喻。生物的进化也同样可以解释社会的进化，所以隐喻在知识劳动中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也不可能回避他，包括我们现在做研究，我们的想象、我们的灵感，有很多是来自隐喻的，这个世俗性的过程没有离开知识劳动，讨论人类发展的问题是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这里面有几个非常具体的论点：

1.经济增长就是社会进步这一信念的发展主义。

2.发展不是一个生物事实，而是一个被文化化了的“社会事实”。我认为目前的日程仍停留在经济互助的层面，还没有走到道德伦理的水平，我觉得这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里面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发展。发展是为谁发展？还有发展的代价。经济指标的增长意味着社会福利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吗？但是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以人为本这个人是什么人？是不是也是欲望膨胀的人？这个我们需要讨论，而不是凭着感情喊一个口号，至少是认清一个变化。我们现在的发展究竟是不是现代化、工业化以外的发展？

现在事实上从生物进化到社会进化我们讲是社会的演变，演变的过程中科学在发展，我们的欲望、需求都在不断膨胀，引起一系列问题，像环境问题、道德伦理沦丧的问题、人际关系疏远的问题，当然还有疾病的问题，已经向我们显示了贫富差距、社会、自然、环境等的一系列问题。因为我们生活中孕育着这样的矛盾，这些并不是不发达国家才有的问题，而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共同演绎的问题，我认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是共案犯。我们原来的战争是源于分配不平衡的问题，实际上现在的发展不是这样，战争形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为金融的发展，我们不需要打仗就可以获得便宜的劳动力和资料。包括伊拉克也不仅是因为资源的战争，我认为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战争。所以金融资本上的发达已经让我们的社会有了总体发展。我认为不发达国家其实是参与了恶性循环，为了追求和欧洲同等的水平，就势必要出卖自己的原始资源，但遗憾的是，因为社会进化知识的劳动，已经把我们的思维牢牢拴在一个尺度里。方法论的相对主义给我们提出一个质疑，我们把人从自然状态中剥离出来，

科学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方向，我们的科学怎么样逐渐离开自然，以此来证明这是客观的。所以我们科学发展的方向和社会的特殊需求，已经让我们习惯于这种被科学认为安全的生活方式。比如我现在把电关了，我们的劳动就不成立了，所以我们实际上已经是浮游在自然上，我们是建立在人为基础上的生活。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科学的发展方向是不是应该无限接近自然，而不是脱离自然？这两者是很不同的，是不同的哲学。这也证明我们将来所谓的发展，物种的起源因为人为的事实，也就是因为它的滥用，科学和伦理分离而出现了方法论上的伦理问题，这样的问题很多，我不一一例举。这时候也出现了与达尔文思想相反的质疑，就是物种的灭绝和物种的危机，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种研究来研究物种的危机并重新审视我们的物种基础，来看看我们盖出的大厦的根基是不是牢靠的，这是我提出的问题，希望大家一起讨论。

交流评议

秦晖主持提问，多尔、罗红光、塞维兹格·兰杰回答

问题1：我想向罗先生请教一个问题，您在讲到社会发展的时候，我觉得您把社会发展的过程分析的很有意思。我们考察欧洲社会发展可能也是这样的过程，我感到经济发展使国家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比如说经济市场化以后，人们的那种本来的群体关系，包括种族、家庭的关系被原始化，然后欧洲可能又想通过一些方法，包括社会政治的，可以进一步把它凝聚起来，是不是从社会结构上适应新的经济和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

罗红光：我认为尤其我们现代一些社会政策（指公共政策）是靠一种知识和权利来完成的，我稍微说一下背景。像凯恩斯主义的人，他们认为在生产财富的过程中造成了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生活方式固有的矛盾，在生产过程中，因为分工不同，所以需要不同的人来发挥不同的作用，他认为这是社会分工，当然这里面有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对这时候产生的不平等他们采取一种凯恩斯主义的办法，就是通过二次分配来填补在生产过程中造成的不平等。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也跟当时把自然现象肢解了一样。因为发展需要靠一套逻辑和知识来完全重组，而且是有理念和政治目的在里面的，所以有些地方是需要、有些地方是不需要的。所以这种重新组合是肢解之后再建构的过程。同样我自己的体会是在二次分配中想消除生产中的不平等是浪漫主义的做法，其实在消除的过程中同样会造成新的不平等，我是这样看的。

秦晖提问：我给多尔先生和罗红光先生各提一个问题。

首先是向多尔先生提出的问题。一个是关于信仰自由的问题，我们知道整个欧美，凡是自由世界都把信仰自由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但是这个信仰自由一直有模糊的地方。比如法国就做出了一个决定，穆斯林妇女带头巾是一个宗教象征，可是如果这个头巾是宗教象征物，那么十字架是不是宗教象征物呢？比如说带一个有十字架的项链，是不是也构成这个想法？这与信仰自由是什么关系？另外欧盟有些国家的宪法中是明确规定有国教的，包括丹麦等的一些国家，当然我理解宪法中虽然这样规定，就像英国没有宪法，但是在事实上是实行宗教宽容的，但是宗教宽容能够仅仅表现在事实上的存在吗？

对罗先生的提问是：我同意作为所谓客观规律的科学论的进化论在事实上是不成立的，在价值上也是有害的。那么排除了科学的进化论，是不是可以有一种价值论的进化论，也就是说我们还是承认这个社会有好坏之分，但是我们认为并不存在从坏社会到好社会的必然，好社会是靠人为的争取的。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由于进化论的信誉扫地，的确造成了不仅科学论的进化论被否定了，甚至连价值论的进化论也被否定了。那么进化论能不能推到这种极

端？这是我的问题。

问题2：我想针对刚才几位学者的发言提出的问题，顺着刚才秦教授提的问题补充一下。今天下午我们讨论的是文化世俗性的问题，但是我想我们要注意从另外的层面看问题，因为现在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宗教正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一些新的动向。比如在美国我们看到新保守主义不断发展，特别是美国的共和党在宣战的时候主要是用宗教的言辞来争得选民，通过他们在南方的教会在那些地区获得了很多的选民。穆斯林的极端主义也在极端发展。欧洲的一些国家面临这种现象，就是未来的天主教、新教怎么样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在谈世俗性的过程，我们也许说这种过程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但是当中有一些现象不是我们想的那么自然，当中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也可以从反面思考一下宗教的反省。

中国现在也面临一个问题，即中国的执政党怎样面临一种未来的变化和内部的冲突。中国的年轻人不断奋起，社会贫富差距严重，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农村的问题便暴露出来。我们看到在波兰，过去的20年间，农民中出现了宗教重新崛起的状况，我想请中方的代表谈一下这方面的看法。

问题3：我想向刚才发言的奥利维耶·多尔先生和罗教授提出我的问题，你们的发言非常有说服力。西方和东方有共同点，今天形成了这样不包含宗教的现实政治体制。我想问的是，刚才你们所谈的世俗性的发展，是不是说要让人成为一种自然的、社会的、科学的主宰，就如同过去上帝主宰一切一样？是不是把人放在了上帝的位置，这样人就成为了权利的主宰者？这样的世俗性还是真正的世俗性吗？

问题4：我向两位外国朋友提一个问题，他们都谈到了关于欧洲的法律和对于宗教参照的关系，也谈到了中国和欧洲两个世俗。我要提出的问题是，在整个过程中，由于现在我们全人类各个地区共同经验着的信仰层面上的危机和价值迷失，大家都在寻找一种新的出路，最直接的出路就是宗教的回归，我要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区分神圣性和宗教。这是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的出路可能不在于在各个地区去重新建立和回复宗教，而是给予人们神圣性的可能。

问题5：我对宗教没有什么研究，但是听了几位的发言，有一个具体的问题想提出来。多尔教授提到，在讨论人权条例的时候，法国提出要把“宗教遗产”改为“精神和伦理遗产”，而在后来又接受了。我基本的问题就是说在这当中所说的宗教遗产，指的是基督教还是其他的不同宗教？目前我们就面临一个讨论土耳其入盟的问题，同样是一个关于宗教的问题，但和其他的成员国的宗教不同。对同样的问题，一部分成员国的认识和另外一部分的成员国的认识就不一样。我知道英国接受土耳其的宗教，积极支持它入盟，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兴趣的是，某一国意见重要还是多数国家的意见更重要？

于硕提问：给罗红光教授提一个问题，您谈到由于科学革命我们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科学实践使人从自然中摆脱出来，第二个阶段是罗教授期待的，科学能帮助人们重新接近自然。我的问题是关于回归的条件的。人类自现代化以来以一种科学理性的狂妄去征服自然，并在这一过程中把我们的环境家园（eco=oïkos）及生存资源破坏了。恰恰是非理性的欲望使人抛弃乡野，出走城市，在超大化的都市中流离失所，正可谓是丧家之犬，有家不归。而在技术统治的今天，我们自己又被进一步异化：无属地，标准化，符号化、虚拟化，无名无姓无感觉（空调人失去天然的身体感觉），但却快速地在QQ的共时状态中缺席地沟通连接。重新接近自然显然需要改变现有的生存方式。在您看来，我们如何才能够克制欲望，放弃现代化的不可持续的奢侈，恢复我们的自然情怀，进而重归自然？

奥利维耶·多尔：首先我想回应一下秦教授提的问题。按照我的理解，您提的问题是现在的宗教事实是在法律之外还是已经进入法律体系的关照之内，即法律体系是否适用于各种宗教现实？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法律的规定已经考虑了宗教的事实，涉及到宗教领域。然而我们应该弄清楚，法律不仅仅是某宗教之法，不应当在宗教上出现偏好。法律与宗教是不同的。我们的

法律对各种宗教都一视同仁，它在各种宗教事实的基础上形成的条文规定，法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美国同样也是坚守国家体系与宗教信仰的分离。但是我们看到有些国家，从法律上来看，他们可能是单一宗教的国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另外苏格兰有自己的新教也作为自己传统的一种官方宗教。从英国的传统来讲，英格兰的国王是英国宗教的领袖，但是有什么法律上的后果？其实什么后果都没有，因为英国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公民必须要遵守英国的公教，事实上在英国没有关于宗教信仰的立法，任何人都能以自由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在英国带来了一些问题，以至于我们可以这么说，某些穆斯林的极端主义者就在伦敦找到了栖身之处。

总而言之，在某些国家，例如英国、丹麦、瑞典，它们虽然有国教，但是并不影响这些国家实现多元宗教的共存，甚至与无神论者的共存，所以两者是并行不悖的。欧盟的其它国家则可能在宗教自由上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希腊根据法律规定，东正教有特殊的地位，这也许是因为历史的原因造成的。这些国家曾长期被奥斯曼帝国或土耳其占领，而这种关系在法律上留下了一系列的影响，比如在希腊，宗教的婚约要比法律上的婚姻关系更加重要，并且教会享有一系列的特权，希腊的国家法律更有利于东正教会，而对其他一些教会或宗教，特别是一些新兴的宗教组织就不是那么有利。

刚才秦教授又提出面纱的问题。其实法国的相关法律不是针对穆斯林的面纱，而只是在公立的学校里，禁止佩戴任何与宗教有关的标志，但是这种标志如果很小，在法律上是允许的而且法律限制的范围是公立学校和未成年人，这是考虑到学生们作为未成年人，应当有一种中性的环境，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体现共和的精神。

罗红光：大家提的问题都非常复杂，我知道大家在这方面都有研究，问题不是很轻易就能回答的，所以我简单说一下。

我认为中国的宗教跟西方的宗教不能简单地放在一个尺度上说，比如宗教复兴，中国的宗教究竟是不是“宗教”也值得界定。因为我是研究民间宗教的，中国人并不相信来世，所以比较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当然中国也有宗教的复苏，我们面对这些现实的文化现象进行一些探索。伴随着宗教复兴，还有一个种族的复兴，这两种复兴基本上是同步的，这也是面对飞速发展的社会值得重视并要找出答案的一些问题。

第二点，是一位先生注意到的，人都变成神了还叫什么世俗化！确实的，不过如果人都变成神了，那是一种极端了的社会化，所以我理解那还是世俗化，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它仍然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

还有秦教授和于教授提的问题。都是关于新的价值的问题，在什么状态和条件下重新接近自然？我认为他俩提的问题是一样的，这个问题是世纪课题，太难了，所以我无法回答。

塞维兹格·兰杰：在这里我想简单回应一下刚才这位先生以及这位女士提出的问题。我们刚才探讨的问题中有一个神秘的层面，另外大家也提到自然的问题。宗教的复兴体现了人类的内在追求，这是因为现在我们面临了太多令人难以掌控的现象。不论是世俗化还是宗教复兴甚至是对于无神论者而言，大家的目的都是一样，都要寻找内在的安全。

2.2.3 中国和西方：500 年交流、错位和选择

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是学哲学的，我想欧洲和中国的历史最密切的就是最近 500 年的历史。这 500 年的历史正如刚才于硕博士所说的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展开的，简要的说，这 500 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持续了 400 年，就是从 1517 年，葡萄牙人首先来到中国，到 19 世纪结束。这 400 年解决了什么问题？就是要解决两个文明的差别，然后中国要承认必须向西方学习，但是中国为了解决这个基本问题，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首先是 1517 年，葡萄牙人作为商人和海盗来到中国，希望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希望跟中国通商。他们首先来到广东珠江上的一个岛，然后向北到福建厦门等地。一方面它要求以正当的方式建交和通商，另一方面却采取了殖民者的姿态和海盗的手段，结果就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导致 1545 年明朝将他们在这几个地方赶出去。1553 年的时候他们退回澳门站稳脚跟，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与其说澳门是一个殖民地，不如说是中国的特区，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澳门都是在中国的管辖之下。1574 年建立了一道围墙隔开了澳门和内地。再后来，大批的传教士通过澳门进入内地，就这一点而言，它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尤其有意义的是 1582 年利玛窦到澳门，然后到北京，从此开创了一个中国和欧洲交流辉煌的阶段。这段交流带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件礼物就是世界地图，让我们中国人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另外他在北京传播了很多西方的学术文化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比如农历就是利玛窦对中国大同历修改的结果。但是这个过程经过了刚好 200 年，在 1717 年中断了，是康熙皇帝下的命令，这在历史上是有名的“礼仪之争”（具体原因见下文）。这是一个阶段。另外一个阶段从 1793 年开始一直到 1900 年，具体的情况大家都很清楚。这个阶段反思的是欧洲跟中国文化的差别主要在哪里。学术上的成就的差异是一个方面，更重要是制度的差别，而制度才是决定整个社会发展快、慢的决定性因素。我想用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的话来概括这种制度的差别。对于西方、欧洲，我想用莫奈的一句话：“整个欧洲的命运是可以用各个地方的自由顽强的成长所决定的。”各个地方实行地方自治地方上贵族或其它实体拥有特权，这个特权包含了自由意思，包括封建制度本身以及封建制度保护下面各种各样的权利，当然还有其他法制的传统等等，包括大学的特权，形成大学自制的传统等等，这使得一个中世纪的欧洲逐步实现社会转型，变为一个现代化的欧洲，而这恰恰是中国所缺乏的。

中国文化是什么？我想用一位史学家的话来说：“中国文化一言以蔽之：三纲六纪”。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就是按照血缘的关系来决定亲疏，从父子关系一直到朋友关系。中国的法典遗留下来最完整的是《唐律》，就是按照“三纲六纪”规定的。辱骂父母和辱骂一般的人是不同的，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来决定刑法的轻重。但是这句话说的是正式制度文化，中国还有非常丰富的非制度性文化。刚才丁学良教授说我们要保护传统、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其实说的是非制度。而过去的人之所以搞的很糊涂，就是没有把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分开。而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是无可救药了。

从这几百年的交往中可以看出一点，中国人不是都对，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很多地方是错的。中国人的情结是我们是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这个对不对？另一方面，这几百年为什么老是我们解决不了要不要向西方学习的疑惑呢？答案是因为对中国的文化和特点不理解。中国文化将世界上的人分为华夷两个类别，华是文明，夷是野蛮，野蛮人是不可以变为文明人的。中国人接受的教育告诉他，中国是天下最文明的民族，华夏民族是天下最文明的，所以就有一个原则，只准以华变夷，可以用中国的文明教育野蛮人，不准以夷变夏，这就是中国抗拒外来文化的一个思想堡垒。一直到 19 世纪，我们都躲在这个思想堡垒下里面，所以我

们不能承认自己的错而向西方学习。回到1717年，康熙下令要正教，除了少量的为皇帝服务的技艺人，留下为皇帝工作，其余的传教士一律遣送回国，留在中国的可以信教，就是不可以传教，并且不准回国。传教士原本打算翻译6000卷书，因为这个措施而中断了，于是中国失掉一个向西方学习的机会。

提到19世纪，一讲大家就痛心，可是中欧战争有没有中国人的错？中法战争是法国人侵略，而1860年英法联军是由于中国文化的保守性、封闭性造成的。1842年的《南京条约》决定开发五口通商，其他的四个口岸都没问题，只有广州不准洋人进入，因为按照广州的传统外国人要进入广州城，必须是朝贡的，而这些外国人1840年以来来到中国的根本不是来朝贡的，所以聚集在十三行，也就是现在的人民路，离广州城只有100多米，却不能进城，假如进的话就有人打你、赶你。结果多次冲突就导致了战争，第二个是义和团事件，这件事中国人肯定错了，那些人一共杀了236个外国人，其中50个是妇女和儿童，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山西省政府杀的，这对中国来讲是非常大的屈辱，我们不能从民族主义的观点来讲不是我们做的。但是后来八国联军在中国做了坏事，这是错的，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否定我们中国义和团的残暴。

以上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决定不了要不要向西方学习。第二个问题是，二十世纪的历史给我们什么教训。中国人要向西方学习，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马上就碰到了要学习消化什么的问题。法国的革命风潮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代表革命的一派是学法国的；另一方面欧洲还有德国，中国人曾经以德为师。但却是通过日本学德国，所以好的、坏的都通过日本传过来，其中对中国影响很大的就是大陆法系。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政府的改革，如何对传统进行改革，如何进行教育改革，都对中国造成了很好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没有真正实施民主，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以皇帝的专制为中心，恰恰与德国没有现代化的制度结合起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以德为师，蒋介石提倡向德国学习，请到一些专家来指导整个国家的建设，也包括怎么样做好准备抵抗日本的侵略等等。而这方面恰恰跟国民党的维权统治结合在一起。最早是孙中山以德为师，后来共产党继续走这条路。欧洲还有英国和它的儿子美国，恰恰中国在这方面的学习是比较差的。在向这四个国家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究竟有什么问题？我感觉到有两个比较大的问题：（1）传统的所谓民族自大的思想的残留。所以眼睛盯着欧洲盯着美国，一发现对方有毛病，就什么也不学了，就认为自己可以超过对方了其中最明显的就梁启超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是一个很落魄的欧洲，他回来就讲我们要用东方的文化去挽救他们，这个思想一直延续下来，很多人都还在这方面用各种的形式来延续那种民族自大。而且假如说有人对这种自大提出批评，就会有人给你扣帽子，说你卖国，忽视中国的历史。还有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政治家非常落后，却总是相信能超越西方，孙中山说我比西方高明，我就要毕其功于一役。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很落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国共两党以及当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的经济主张大同小异，都主张实行计划经济。当时整个世界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文明有一个大的变化，但是我们没有察觉到，这个大的变化集中体现在罗斯福提出的四大制约，这四大制约就是联合国建立的基础，也就是后来一系列人权公约的基础，我们对这些东西的重要意义视而不见。如果我们要对二十世纪进行总结，就要看到对中国二十一世纪的发展带来非常重大影响的事件，就是1997年、1998年中国相继在联合国的两国人权公约上签字，还有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这三件事是决定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未来和影响全世界一个大的决定，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不但在经济上完全认同西方的市场经济，承认WTO体现的经济原则，而且开始认同西方的法制制度。在政治上，有一个最主要的人权公约到现在没有经过国内的批准，但是没有批准没有关系，因为在道义上中国政府已经承认这个公约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努力向这个方向前进，江泽民、胡锦涛一再表态，我们正在积极研究批准。好了，过了7年没有批准，再过7年能否批准？我们要明白，凡是中国人都有责

任推动中国政府完成这个历史任务，这个任务就是我们按照人类文明的标准来推进中国人类的建设。在这个大的框架下，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争论已经没有了，中国照样要搞中国的社会主义，但是这个社会主义必须是按照 WTO 的规则、按照两个人权公约的标准来建设的，这是中国政府承担的义务，我想只要按照这个方向前进，我们中欧的关系乃至中国和各个国家的关系，以及二十一世纪的前途将是非常光明的，但是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谢谢大家。

第三部分：欧洲运行机制：同一与多样的管理

3.1 从和平构想到双边关系的突破

3.1.1 卡蓝默采访贝尔图安：战争浩劫后的梦想

乔治•贝尔图安（欧洲煤钢联盟创始人、让•莫内助手）

贝尔图安：首先我很抱歉不能来到现场，我非常高兴通过远程系统跟大家见面。欧盟最初是怎么开始的？我们希望能够面对战争的浩劫来做一些事情。同时避免说空话，试图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来改变几百年以来敌对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事业可以称为“政治拯救”，做出一些影响全世界的事情，逐渐使传统的敌人可以沟通共事。但关键词是“政治拯救”，使人们在二战后超越历史重演的危险。这是一个政治的飞跃和心理的飞跃，当时情况很危急，因为有飞跃，就会在公众中造成冲击，但是我们很快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坐在了一起。是什么将他们联系起来？从人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什么？这说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有区别的。我们都很爱国，爱国主义是一种信仰，可以说这非常正当，人属于某一个民族群体，有的是德国人、有的是法国人。人们要真正忠于自己的祖国必须更好地超越民族主义。如果排斥别人，最终视别人为敌人，那么别人也会将你看作敌人，这种敌意逐渐会升级，最终为冲突的发生提供可能。就是欧洲的悲剧之一。但是这一次我们成功地使一部分国家，最初是6个国家，接受了和平的逻辑，将他们从永恒的敌对生活中解脱出来。这不仅适用于欧洲，而且适用于全世界。我们有两种选择，传统的外交政治是相互之间比谁更加狡猾和谁更强大，相互分化，这是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策略。而新的选择是我们正在探索的如何更好地保卫民族的利益，这就是要努力团结各方，而不是分裂他们。然而充满悖论的是，莫奈先生非常明白自己要干什么，但是作为他身边的合作者，我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当然我们是知道主导方向的，就是欧洲的统一。但是面对具体事情的时候，我们不确定自己要做什么，我们并不清楚每个人的处境和立场。当时并不存在秩序，一切都是一团糟。在这一点上，莫奈提醒我，以前参加革命运动的人，在最开始的时候也都是这种情况。随之而来是秩序，这将产生巨大的心理效应，使人们很快忘记自己是德国人还是意大利人，是反派还是正派。在令人担忧的混乱中，人们确实逐渐建立了秩序。从人的方面来讲，团队很快就组织起来，刚开始的时候为数不多，但是我们正在改变历史，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感觉。我相信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初搞革命建立共和国的时期，他们的人数也是非常的少的，但他们也一定有类似的感受。至少我们有着与他们相似的感受，当时虽然处于一件事情的初始阶段，但我们知道最终的结果会产生巨大的效应，莫奈非常知道这一点。1952年底和1953年初我们建立了几乎所有的欧洲机构。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机构依然存在，而当时这些机构都是几周内建立的。欧洲议会、部长会议，欧洲理事会等等，这些机构都在条约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它们运行的原则至今都依然是有效的。

卡蓝默：我们从欧洲的煤钢联营过渡到欧盟的经营，您认为这些运作的核心是什么？
乔治•贝尔图安：在欧洲有一个古老的理想，就是维克多•雨果曾经提到的欧洲合众国。拿破仑三世时期，他被流放根西岛的时候，在那里种了一棵树。当时他说，当这长成一个大树的

时候，欧洲也会成为一个合众国。很清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煤钢联营方面做出了努力，使我们有能力完成建设欧洲的使命。有趣的是，最早有一些煤钢产业的工会，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反对成立欧洲共同体，但是在具体的工作中，他们看到我们有能力实现既定目标。我们非常关心当时为数众多的煤钢工人的命运，这改变了工会的态度，使他们在欧洲共同建设的问题可能比各个政党走的更远。一个证据就是，1955年让•莫内建立了欧洲行动委员会，当时并不要求所有的工会组织、共产主义组织参加。但是这些组织私下对已经完成的工作产生了很大兴趣，并且主动要求参与，所以这个组织渐渐由工会组织和产生。他们大部分人都支持莫内提倡的欧洲行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接下来统一欧洲市场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人类历史上一大独创那就是欧洲委员会这样一个政治机构，它被赋予了政治责任，对欧洲议会负责。他所代表的是共同利益，代表共同利益而提出建议，而主权政府可以接受或者是因建议不符合共同利益而拒绝这些建议。这完全是一个新鲜事物，因为在传统权力观念里面，统治者倾向于说“我知道这对我们国家是好的。”当涉及与他国的关系的时候，他说“我的主权跟邻国的主权是一样的。”而现在这样一个机构说，“你们有着合法的国家利益，但是在此之上也有超越主权的共同挑战。”在50年至52年的期间，这种共同的挑战还不明确，但现在大家看到气候变暖，目睹饥饿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事情都超越了国界，超出了一个政府的能力，一个好的政府如果不意识到存在着超越一国的共同利益，就无法进行很好的治理。所以一个排他的主权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人口众多的世界，这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交叉重叠的世界。我们应该共同对这种关系进行管理，

卡蓝默：欧洲宪法公决的结果使欧洲陷入了危机。1953年欧共体防御提案的失败以后，人们也认为这是一个致命的危机，那么但是你们这些坚持欧共体建设的人是如何重新站起来的？
乔治•贝尔图安：首先我们这群人还是为数众多的。另外要正确认识危机，莫内先生二次大战期间在中国长期生活过，他理解“危机”在中文中的构成意义，它由两个字组成，一个是危险，一个是变革的机会。所以欧洲面临危机的时候，既存在着危险，同时也存在着变革的机会，我认为二者是共存的。明智的领导者和公众都很清楚这一点，我们不都任由危险加剧，而且要抓住变革的机会。我相信欧洲的危机，将成为欧洲完成新的飞跃的机会。

卡蓝默：1953年是你如何做到不气馁的呢？
乔治•贝尔图安：我们不气馁是因为让•莫内深入思考了危机的本质，当时的危机比今天更严重，除了实现煤钢联营，政治、习惯、利益还完全都是各个国家各自为政的。欧洲人之间相互并不了解，人们还没有共同工作的习惯。而今天所有的人都在一起工作，没有铁幕、没有国界。提到国界，大家可以看看欧元，就是一个伟大的象征，国界已经变成了桥梁。每一张欧元钞票都象征着一座桥梁。1954年，面对欧洲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我们进行了思考，莫内也进行了思考，他说你们继续吧，继续留在欧洲的政治机构中，这些机构是时代的产物，它们必将发展壮大。他作了一个被围困的城堡的比喻，并且说“我要冲出一个突破口”。于是他创建了欧洲行动委员会。这就是说，我们要避开一些已被否决的政治决议，比如统一军队等，如果再次提出肯定还会被法国人否决。但在民用设施方面，比如和平使用核能，创建统一市场等，我们可以寻求突破口。也就说以经济过渡的方式完成原来的政治目标，在事实上建设欧洲共同体。

卡蓝默：你如何看待现在欧洲的前景，以及用什么方法来建设这个世界？
乔治•贝尔图安：莫内说创建欧洲共同体的方法可能成为世界上任何国家皆可运用的方法。在处理共同利益和行使国家主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这两个方面进行的。今天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是应该有一个能够代表共同利益的机构，所有的人承认这个共同利益，

并与各个国家的主权相协调。各个国家的主权不会被忽视或同化，但是必须明白，国家利益存在于共同利益中。我认为在全世界应该形成这样的平衡。联合国真正的改革，应该给予秘书长一种建议权，这种建议权类似欧洲委员会的建议权，也就是说给他一种政治责任，使他能够解释什么是共同利益，并向主权国家提出建议，然后由后者来决定是否可行，是否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行动。还有一个有趣的方面，我们都知道，与敌人和过去的敌人合作是很困难的过去法国人和德国人合作很困难。我们为什么成功了？因为我们都重视共同的任务，法德实现了和解，同时这种和解不是排他的，而是来更好地推动欧洲的发展。在世界范围，这可能是一个大胆的设想，还有中国和日本，中日存在几个世纪的敌对，几个世纪的悲剧。我们理解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情绪，这是一个历史的回忆，尤其是中国人民饱受日本人的凌辱。但是人民不能总是处于这种敌对状态，历史不能被忘记，但我们更应该为以后的合作着想。如果中国和日本不能真正地和解，不能为联合国改革提出建议，这在全世界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中国现在正在成为一个最强大的国家，而日本已经成为一个最强大的国家了，他们的特点不一样，他们之间还存在对立，最近通过外交行为已经表现出来了，示威游行，还有几个世纪以来的相互不信任。如果有这样的共同建议，欧洲、美国、俄罗斯和印度大家都会欢迎，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拥有悠久文明的大国能够共同面对今后的挑战。如果从欧洲的角度来看，中国和日本的国家利益非常地吻合，这也是因为有一种运转良好世界体制。我非常敬重吴建民大使，他极力邀请我出席这次会议，但是因为健康问题我无法与会。大使先生在01年10月我们共同参加的一次研讨会上说，加强国际合作，已经成为必然。他还说，这对所有的国家都是必须的，特别是对中国。这种合作对于日本也是必须的。正如法德联动策略，法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否决权，而德国不是；同样中国有否决权，而作为战败国家日本不是。法德是为了一个共同的欧洲事业联合起来的。所以我认为，中日能够行动起来的，服务于一个世界化的事业，这也符合他们各自的利益，我相信两国之间是存在实现真正和解的因素的。首先，这些因素不是基于过去，而是面向未来，适应世界变化的大环境。我想引用莫内先生的一句话，“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在中国不应该问答案，而是猜出答案。”我提出这些建议，也并不是想得到一个答案，而是希望能够猜出答案。祝各位工作顺利，各位承担的工作非常的重要，谢谢！

3.1.2 突破双边冲突与法德和解

安德莱·肯夫（法德基金会秘书长）

法国前部长，法德基金会主席，安德烈·鲍尔先生没能亲自出席今天的会议，他对此深表遗憾。他委任我以法德基金会负责人的身份，来此向大家详细述说一个意义重大，不可或缺的历史使命，这就是欧洲建设。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法德和解与法德合作的发展历程。

女士们，先生们，首先请允许我表达我此刻的心情，能够在诸位——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代表，和来自法国、欧洲各界的杰出人士面前，来共同回忆这段对于欧洲乃至对于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我深感荣幸。

我要特别感谢此次大会举办方对会程的良好组织，还要感谢为大会的成功举办而倾注了心血、汗水的每一个法国人和每一个中国人。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期，法国和德国曾共同经历了一段悲剧、血腥的历史，付出了几代人伤亡的巨大而惨痛的代价，并长久地荼毒着两国人民的灵魂。

戴高乐总统与阿登纳总理，曾为摆脱这种危险的对抗的做出了许多的努力，不仅涉及到两国的法律建构，更是通过1962年1月22日签署的法德合作条约，来推动两国的和平共处与双边合作。

这项合作已远远超出了最初对它的期望。它不仅建立在外交家和政治家们沟通对话的基础上，它还建立在由许多民间团体逐步发起的，广泛的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这是为所有希望共同进步的人们提供的一个难得的学习的机会。

然而我们也应清楚的一点是，广泛合作的前提是良好的政治意愿。

亲爱的中国朋友们，法德两国的和解与合作对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之间建立新的友好往来关系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法德和解

鲍尔主席来自于阿尔萨斯省。那是一个曾经饱受战争之苦，遍布暴力与敌对的地区。还有谁能比一个阿尔萨斯人或者一个摩泽尔人更有资格来讲述战争与冲突呢？主席先生本人也曾在1940至1945年间参加了这场战争，先是在游击队，后来在安德烈·马尔罗指挥的阿尔萨斯-洛林纵队中服役。他将三十年都贡献在法德合作的建立和发展事业上。

从我个人来说，我也是一个阿尔萨斯人，我出生并居住在斯特拉斯堡。过去，那里是战争中兵家必争之地，现在，那里是欧洲建设的枢纽地区。而斯特拉斯堡，作为阿尔萨斯地区的首府，过去曾是军队通行的十字路口，今天成为了欧洲之都。

阿尔萨斯位于法国东部的边境地区，莱茵河西岸，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天然相隔，西靠孚日山脉，是法国面积最小的行政地区。人口稠密，属于半大陆性气候，农产品丰富，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良好。地区内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林立，并以美食和旅游业闻名。

阿尔萨斯还是印刷术的诞生地与欧洲人文主义的中心，并以华美的大教堂建筑而闻名于世。

路易十四在游览了阿尔萨斯的美景之后曾由衷地感慨道：“多么美丽富饶的地方！……”

阿尔萨斯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一直是欧洲政治、领土争端的焦点。

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阿尔萨斯地区的居民们曾经五次变更国籍，并在两次世界大

战当中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在阿尔萨斯地区，曾有一段时期，其居民面对着复杂的文化更替的考验。我们知道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必然造就出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文化。二元文化并存并非是件容易的事。如同许多边境地区一样，阿尔萨斯也以其保留的阿尔萨斯地区方言而使其具有显著特点。所以就拿我来说，我生来是一个法国人，然而我的母语却是阿尔萨斯方言。

法德和解的建立

１，共同的价值观基础：

反对纳粹主义

２，完美的双重意愿的结合：一方面是政治领导人，另一方面是民间团体中的要人。（坚定的决心来自于对于痛苦经历的体验）

３，失败与成功并存，不存在神奇的处方

戴高乐将军与康拉德·阿登纳总理于１９６３年１月２２日，在巴黎签署的法德合作条约奠定了法德和解的法律基础，此次合约的签订中体现出来的个人关系比政治生活和时间考验的运气与侥幸更加有力地显示了法德和解的坚定决心。

并且，两国和解的伟大成就很快就将被新一轮的双边合作所超越。

在此，我们呼吁法德两国人民的和解互谅与团结一致。

在法德青年社（OFAJ）所做出的努力基础上，继续巩固法德两国人民的友谊。

加强法德双边合作，建立统一的欧洲（CICFA）。

定义：和解

所谓和解，其含义是在不和睦的人们之间重新建立起友好往来。停止彼此间的敌视态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一个逐渐的心理成熟的过程，它要求人们突破以往的偏见和刻板的印象。

１，在价值观上：反对纳粹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那些亲身经历过纳粹迫害的人们便开始着手积极推动这一事业。

然而人们总是容易忽视战争期间或者在战争刚结束时，那些在两国民间建立起来的私人联系：莱茵河两岸数不清的战俘当中，就有一部分为建立起两国的民间联系做出了很大贡献。

为了两国达到成功的和解，我们需要构建一个统一的欧洲。随着在经济、社会的进步，在和平、人权和社会公正的价值观基础上，建立一个欧洲共同体。1949年在斯特拉斯堡创立的欧洲委员会，将以民主为原则，成为上述这些价值的承载者。

然而，价值共同体并非建立在天命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民间团体围绕矛盾进行耐心对话的基础上的。

和解的成功经验在于：

- 在两国城市与乡镇之间建立起友好联结关系，结成姊妹城市，进一步推动居民彼此间的相互了解。在当今，众多的城市联谊活动已在人民中间编织起了一张巨大的友谊之网。

- 法国在贝德（BADE）、帕拉蒂那（PALATINAT）等德占区的驻军也为传播法国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大量的法德联合会存在，他们的活动为两国人民定期会面提供了许多机会，为维持两国人民间牢固、持久的友好关系发挥巨大作用。

选择在煤炭和钢铁方面的联合经营[4]并非偶然，作为经济的支柱，在这两方面进行合作

[42] 一个开放性组织，也面向欧洲其他有意愿合作的国家。

将是法德和解迈出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步。

这些初级原材料是战争准备的必要产品。

随着1951年欧洲煤铁共同体（CECA）的建立，昔日的敌人变成了负责任的合作伙伴。

1962年，欧洲六国煤铁共同体创立所遭遇到的阻力，还有富歇计划的失败所带来的困难都不利于法德通过条约建立一种“伙伴”关系。

2，1963年1月22日在巴黎签署的法德合作条约

条约是由两位标志性的人物签订的：

夏尔·戴高乐，反纳粹意识形态的代表，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和康拉德·阿登纳总理，纳粹受害者，德国总理。

1963年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有54%的法国人支持戴高乐将军的对德政策。

然而，合约并没有唤起对旧日的同盟关系的狂热激情，相反，却招致了美国，英国（戴高乐曾在1963年1月14日对其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表决中投了其反对票），还有俄国（为建立核联盟而担忧）的恼怒与抗议，就连阿登纳总理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党（CDU）内，那些大西洋主义者们都认为合约走得过远。如外务部长施罗德（SCHROEDER），经济部长艾哈德（ERHARD）和国防部长凡·哈塞尔（von HASSEL）。

在1963年2月6日的部长会议上，戴高乐将军宣称：“从西边到东边，所有人都在反对，可见，我们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法德合作条约深刻影响了法国公众对于法德和解的认识态度，并且深化了两国人民的交流活动。

法德合约推动了两国在外交、国防和文化方面的直接合作与对话。

戴高乐将军和阿登纳总理特地为两国文化交流开辟了特殊的重要地位，并为创办法德两国青年社做出了努力。

同意创建法德青年社的协议于1963年7月5日在波恩签署

办公室的首要任务是促进法德两国青少年友好关系的发展。

在法德青年社的帮助下，已有五百多万来自两国的青少年相聚在一起，彼此学习对方的文化，特别是通过改变以往的思想形态来更好地相互理解。然而，想要交流，就需要有人参与，需要沟通的能力。法德青年社还致力于语言的培训，帮助青少年们实现这一点，帮助他们深入到彼此的文化当中去学习交流。

久而久之，双方逐渐相互理解，对彼此的态度发生改变，仇恨也从两国人民心中消散。

法德青年社的目标是密切两国青少年之间的往来，加强相互间的沟通理解，鼓励青少年进行会面和交流活动。

在这些会晤活动中，也显示出两国青少年所共同面对的问题：例如怎样融入社会，职业前途，公民身份和欧洲体制，人生观，毒品，疾病，健康，环境问题等等。

这些交流活动是通过一系列的青少年联盟，体育俱乐部，语言培训中心，职业、工会办公室，初高等教育机构，联盟委员会和地方性团体等组织实现的。

法德青年社之所以能够成功，其关键的原因在于：青少年们在这些活动中激发出的，对彼此间的深厚友谊，能够维系直至他们一生。

法德合作条约创造出的另一个组织是法德合作部际委员会。

法德合作部际委员会（CICFA）

其使命是作为补充纲要的一部分，为外交部提供跟踪建议。它与这个行政部门紧密联系，却表现出政治性活动超出行政性的特点。

委员会曾经历了众多杰出要人的领导（鲍尔主席也是其中之一，并且领导了17年之久），在2003年，委员会改名为法德合作总秘书处，由欧洲事务部长担任其领导工作。

想要列出一份有关法德合作领域的详尽的清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双方的合作涉及到了太多的领域。

在众多法德合作的事例当中，我们仅列举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在鲍尔主席倡导下成立的ARTE电视台。

3，文化和教育方面：

- 在语言学习方面给与支持，新的语言学习方式的创立（TANDEM语言培训中心）双语幼儿园的建立（ABCM zweisprachichkeit）；在中等教育方面：法国中学会考与德国中学会考的相互承认，伏尔泰计划（法德两国的中学生在高中二年级时到邻国的一所负责接待的中学共同完成一年的学习任务）等等。

- 法德综合性大学的建立（1999）。两国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合作：针对日尔曼语和罗曼语学生的奖学金计划；由一项合作协议联结的两所高等教育机构共同发起的，法德两国间鼓励科技交流的PROCOPE计划等。

- 通过位于萨尔布鲁克（SARREBRUCK）的法德合作总秘书处组织举办的，两国青少年与成年人在职业培训方面的交流活动（虽然两国在职业培训的定义理解上存在的分歧导致了一系列困难）。

- 经济方面：法国是德国的第一个经济战略伙伴国，德国也是法国的第一个经济战略伙伴国，双方的经贸合作在国内创造了数以千计的就业岗位。这种合作极大地推动了生产技术的进步。

- 空客的母公司，欧洲宇航防务集团（EADS），同时也吸引着中国。商会与行会的会晤。CHIMIE公司，商务俱乐部等的合作。

- 科学技术方面：

- 建立了法德统一的科学与技术数据库网，目的是将其统一在一个欧洲合作项目计划内。

- 设立在格勒诺布尔（GRENOBLE）的核研究中心的HERMES和ARIANE空间计划。

- IRCAD /MARESCAUX/EISENMANN/BAIERSDORF/CHAKFE 与法国工业创新署的成立将开展四项法德合作计划：

- 其中两项属于信息技术：

- 未来的网络多媒体与多媒体研究的机构设置

- 两项属于生物医学技术：（用于更好地了解阿兹海默病的分子照相技术和用于更有效治疗皮肤癌的生物照相技术）等等。

- 在国防安全方面 ：欧洲部队的成立，法德部队的德国籍士兵们参加了1994年7月14日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的游行阅兵庆典活动。

- 外交方面：阿富汗法德公共服务组织。

- 在政治方面：施罗德总理身边的法国参赞夫人布里吉特·索塞（Brigitte SAUSAY）。

- 跨国合作在各个阶层的社会群体中广泛开展：社团联合会，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初中、高中到大学，公司，公社，团体，治安，司法，私人发起的社团等等：

- 为消费者的跨国问题建立起的一个法德信息和咨询办公室（inforbest）

- 职业培训机构（Euro Institut）

- 治安方面的合作：蒙多夫协议（ACCORDS DE MONDORF）

- 鼓励使用双语言

- 环境的治理与保护

- 旅游业实现计算机化与伴随着法德公路而建立起来的自行车道网络，莱茵河公园民俗博物馆

- 地方能源利用局

- 促进法德双边和解的其他方面：

- 双方有关萨尔地区（SARRE）问题的正常化

1960年对一些人道主义问题的解决，例如德国对曾经在集中营受过流放和囚禁的受害者支付的赔偿。法国与德国共同的经验表明，建立一个法德基金会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个基金会只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长期坚持不懈地为促进法德两国的友好与合作而努力。

法德基金会（FEFA）：

法德基金会是法国500个以公益事业著称的基金会之一。

- 历史发展

- 两项使命：战争赔偿与法德合作

- 日常活动

1)历史发展

法德基金会于1981年在斯特拉斯堡创立，其名字充分体现了两位创立者：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SCHMIDT), 对它赋予的重要使命。

一方面，基金会主要负责解决一些二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争端（例如取消土保管权，庇护维桑堡城市引水水源的曼达森林的所有权问题，巴黎布朗什路上的教堂所有权问题等等）。

2) 所有的条件都已集中起来为了完成其两个使命：

a) 向阿尔萨斯和摩泽尔地区的在战争中被强征编入德国部队的居民们提供战后的经济赔偿。战争的罪行不但为这些受害者生活上带来巨大的痛苦，并且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海牙公约关于人权方面的法律规定。基金会的这一使命目的在于平息战争带来的在道德上所受的谴责。还有就是为了支持并配合纪念战争受害者——这一必要的工作。

目前，总共约有86500人接受了战争赔偿和一系列的对他们具有补偿性质的社会工作，并从中受益。

基金会的全部资金都用于了对战争受害者的赔偿工作上。

b) 发展法德合作

3) 法德合作的形式十分多种多样：几百项方案，几百万欧元全部用在以下一些方面：

- 文化方面（语言培训，青少年交流和跨文化主题交流，学术研讨会，博览会，论文与研究，视听实践），法德两国的音乐和合唱团。

- 积极开展柏林法国中心的翻修工作，给与愿意到柏林来工作的法国、德国和欧洲的年轻人以更多的优惠政策和帮助。

- 由一个法国和德国外科医生组成的科学团队开展一项IRCAD科学计划，与想要通过纽约的外科诊室在斯特拉斯堡建立一家医院的林德伯格合作。——移植：糖尿病的治疗和透析——GEPROVAS实验室：CRETE，都由法德两国科学和外科医师团队组成，致力于有效控制异体排斥的血管织造补形术。

- 社会方面（欧洲郊区）在法国与德国都存在的郊区问题

- 经济方面

- 体育方面

法德合作的经济收入来源，法德谅解基金会的社会文化活动和基金会的正常运作，都依靠这项资金，等待着被分配利用。

和解= 成功建立同盟关系=投入到合作当中

结语

今天，我们已经走到哪一步了呢？

以下是我们已经走过的历程：

1958年，德国仍然是我们的对手，敌人。

1962年，她已不再是敌人。

1985年，她已成为我们的特别同盟。

索弗瑞（SOFRES）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公众态度显示出对德的极大热情，已经将德国当作法国最亲密的朋友。

1988年，有54% 的法国人声称他们最友好的邻国是德国。

有67%的德国人认为法国是他们最亲密的邻国。

所有为了战后法德和解做出努力的人们，他们的努力今天都有了回报。法德两国之间在文化上，在两国人民之间，两国良好的经贸关系共同促成了法德合作条约的成功。法德两国人民之间缔结了从未有过的，紧密的联系。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意愿是法德合作模式形成的决定性方面。

法国与德国之间合作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对众多差异的不切实际的忽视，而是在于能够积极探讨、指出并且特别注重考虑两国文化的汇合点。

当然，新的几代人继承着开创法德合作先驱们的足迹，在60年代和平繁荣促成的“正常化”的外交环境中成长起来，法德关系在欧洲构建事业中始终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

1963年7月5日在波恩召开的法德青少年办公室成立大会上，为了欢迎戴高乐总统，阿登纳总理在致辞中说道：“法国与德国之间的友谊，就像一棵永远长满了蓓蕾，开满了花朵的玫瑰树。它开出的玫瑰，尤其是那些带刺的玫瑰，是永远都不凋谢的。”

我邀请你们共赏法德的这片玫瑰园！

你们必将为它的美丽和丰富所深深陶醉。

谢谢大家。

交流评议

杨成绪评议，嘉宾（郑启荣，赵凡普）提问，高雅将军、安德莱·肯夫回应

杨成绪：法国朋友谈到法德和解的问题让我深深感动。我是中国太平洋和解委员会的会长。法国朋友非常希望我们学到法德和解的经验，促成中日的和解，我感激你们的好意，感觉从这里学到很多东西。但法德和解和中日的和解有太多不同。戴高乐找到他的德国合作伙伴阿登那；我们中国先有蒋介石、后有毛泽东，在日本没有找到这样的伙伴，日本继任首相都是战争的追随者甚至战犯。比如 1963 年法德签订《爱丽舍条约》的时候，德国对纽伦堡的协议是不持否认态度的，日本却不承认对战犯的宣判，认为它不需要承担责任。在德国，希特勒是头号战犯，世人皆知。中国人清楚二战中日本的罪行，但日本人自己未必清楚。法西斯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犹太人是非常有影响的集团，尤其在意战争中德国曾经做过什么，说过什么，德国压力很大。然而在二战中，中国人被日本人屠杀却没有构成强有力的集团。我们太善良了。

冷战把欧洲分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美国倾向支持日本，是可以理解的。除此之外，我们应该看到德法的和解，在战后法国和西德有同样的社会制度，同样的社会意识形态，而在亚洲，日本和中国有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这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和解的难度。我多年从事德国问题的研究，也关注德法的和解。我记得小的时候，读到《最后一课》很感动。最近十多年来，我是中日 21 世纪友好委员会的成员，和日本交往非常多，每年访问不下 20 次，每次都在谈如何促进中日友好。我觉得日本朋友和我们想法一样，就是如果中日不和，对世界和平是不利的。我记得去年出席 21 世纪友好委员会最后一次见到小泉的时候，我对他说，请你不要再参拜靖国神社了，没有回答。我想和欧洲朋友谈一下，一谈到中日之间的对峙，大家不好说什么话，因为大家和中国有很好的关系，也和日本有很好的关系，我想中欧论坛还会继续下去，我希望欧洲的朋友花更大的努力，来缓解中日方面的情况。如果欧洲朋友能够

真正地努力，我想真可以像德法和解一样促成中日的和解。

郑启荣：我今天听到介绍法德和解的时候，加深了我的认识，我也感觉到欧洲朋友的苦心，今天早上贝尔图安（Berthoin）先生讲到超越障碍问题，当欧洲朋友谈中日关系超越历史障碍的时候，我在想对中日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欧洲朋友到底有多少了解？因为超越历史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历史碰撞的基础上，抛弃过去，面向未来。二是无视过去的历史，将过去的历史完全翻盖，歪曲。在这样的基础上超越历史对中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中日关系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障碍，我想是在大的方面出现了问题。如果在欧洲出现类似的问题，肯定会掀起风波，比如德国参拜希特勒的亡灵，我想欧洲朋友是接受不了的。在这方面欧洲朋友能否给我们提出一些好的意见？

赵凡普（外交学院）：刚才听了高雅将军的讲话之后，也有启发。高雅将军谈到，在冷战期间西欧依赖美国提供的军事保护，没有自己独立的军事保护政策。冷战之后，随着欧洲的形势的变化，欧洲人认识到他们的利益不可能完全等同于美国的利益，欧洲人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站在美国人的一边，于是开始发展欧盟共同的防务政策。十几年来，高雅将军谈到的96年的柏林协议，还有后来的欧洲安全战略，还有快速反应部队，都可以看成是欧洲共同防务政策方面取得的进展。我同意高雅先生一个观点，未来防务安全政策的道路还是漫长和艰辛的。但是我认为，加强欧盟共同的安全防务政策对欧洲一体化是非常有必要的。昨天罗卡尔总理在他的讲话中也提到在目前的状况下，欧盟的防务政策只限于进行人道主义干预，这样的份量是不够的，应该有一些改变，但是没有具体讲。可能的改变是哪一些？在我看来，加强欧盟的共同安全防务政策，不仅有助于增强欧洲大陆的安全，同时也可以使欧盟对整个世界的安全作出贡献。大家也知道在伊朗问题，尤其是中东问题上，欧盟试图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但是效果不是特别明显。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欧盟如果缺乏军事实力作为后盾的话，它的外交效果就会受到限制。反过来说，必要的军事力量会对欧盟外交政策给予强大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加强欧盟安全防务外交政策不仅可以增强欧洲的安全，而且可以使欧盟为世界的稳定作出更大的贡献。

刚才大家也提到，当前欧盟宪法条约由于法国和荷兰的否决目前被搁置了，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在这样一个状况下，欧洲人有没有可能考虑一下在安全防务政策领域，采取进一步具体的行动来推动欧盟安全防务政策以此来保持欧洲一体化的势头。

高雅将军（Coignard）：我想先对大使先生提出的问题作一个回答。这次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欧洲人不想给中国人什么教训，或者提什么方案供你们考虑，因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和战后法德之间的关系是大不相同的。所以答复是，我们来这里只是想介绍一下当时法德和解的历史的状况，我们不是认为这样法德和解的模式可以用在其他的国家。作为欧盟我们只能提供一个道义上的支持，中日之间的问题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必须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当然，他们的政府必须要支持。至于邢先生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法德的前景，在当时的情景下，有华沙条约所带来的威胁，这个轴心是针对这所提出的利益，就是他们的边境不再是自己的敌国，从德国的利益来说，可以通过两国的合作伙伴的关系吸引法国的防务力量以应对来自东方的威胁。

当时，关于今后怎么做第一点要指出，我们首先要把自己取得历史的成果能够进一步地丰富，我们应该考虑到我们有共同的命运，并且基于这种共同的命运，考虑一个地缘战略的具体的实施方案。另外可以考虑的是，法德两国有互补的作用，我们可以考虑如何让这种互补的关系变得更加强大，德国倾向于东欧，法国倾向于南欧即地中海地区，我在法国工作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时的倾向总是试图使德国人关注东欧地区，法国总是关注南欧，这样的伙伴关系可以使我们找到互补的因素。

第二点我想指出的是，德国在安全防务方面正在失去一个和法国同样的优势，因为它在与东德合并后，财政上的负担非常大，所以就造成了这个伙伴轴心不平衡的局面。

最后一点，面临恐怖主义威胁，我们不应该通过武力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而应该通过政治和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这应该是欧盟建设的第三个支柱，这就需要欧盟之间的共同合作和交流。

安德莱•肯夫：我跟将军的话是一样的，我来这里不是想让大家照搬我们的模式，因为这个模式有具体的原因，也有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没有现成的奇迹参考。像《爱丽舍条约》签订的时候，在德国就受到了一些阻碍，我们当时设法采取了一些方式让德国的议会通过，现在我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进行协调。

3.2 欧盟扩大：主权的超越

3.2.1 欧洲：合作超越冲突？

吉尔·德兰诺瓦 （巴黎政治学院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在此，我想对从欧洲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三点经验进行说明并且进行思考。在做这项工作的同时，我们也将对中国的情况给与考虑，将她与欧洲的差异与相似之处进行对比。

首先我要说的一点是，我们在从过去所犯过的错误中不断学习。最好的情况是我们在今后的道路上不再犯类似的错误，我们能够取得一点进步，做得更好一点；我们能够从过去的错误中充分吸取教训，改正错误；我们以其他的方式来提出问题；我们能够在无损既得成就和不忘过去错误的前提下，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我们永远不应该把科学方法和政治活动混为一谈，但是这一次，欧洲建设正是将科学方法和政治建构的共同点体现出来。

第二点是，我们有必要表达、化解分歧和矛盾。这项努力应首先从知识界开展，随即扩大到政治生活，并且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发扬光大。欧洲曾经过分夸大了其内部的矛盾冲突。但是在争论与悲剧当中，她也从中吸取了批判的精神和活力。

第三点，历史永远都是世界的，然而这场全球化其节奏和发展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即便是与刚刚过去的历史相比也是如此。所有的活动及其影响都可能在短时期内迅速扩大到全世界。在这种新形势下，若使用以往通常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则国家就会在面对小问题时显得太大，在面对大问题时又会显得太小。要应对这个加速发展的事实，解决的办法不是取消国家，不是消除差异，不是统一语言，而是学习合作。学习找出适应行动效率和角色多样发展的那个层次。在地方性与全球性之间，存在着多种层次的合作。

在这三点上，欧洲往往做得比其他地区更超前一步。然而，她也是在严重错误和成功的交替中才学会做到的。

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时，似乎应与以往一样，相互认同是相互联系的结果，而且并非是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即使在自身水平上没有变动的事物，也会随着其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全球联系在加速发展并制造着新的紧张局势。欧洲和中国都有着众多优点和实际经验，有助于发展其自身与外界联系，发扬人道主义。我们在这三点经验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灵感来源。对过去所犯错误的改正工作正在小心谨慎地实现着变革。和平时期的矛盾所激发出的动力在交流与多元化中实现变革。为了掌控这种人类活动的加速发展和全球性的反响，这两项变革应首先被完成。我们面临着毁灭的危险，因此必须理智谨慎地行事。这个急迫的任务是对所有人的一个有益的激励，只要我们能够及时对它有所认识。

3.2.2 中国视角：欧洲的地位和发展

曲星（中国外交学院副院长）

今天非常荣幸在这里和大家来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的全球战略中，欧洲所占的地位。第二个就是中国如何看待欧洲和欧洲的发展建设。

应该说欧洲建设几乎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时开始的。在最初阶段中国就对欧洲建设采取很支持的积极态度，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当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还在进行内战时，毛泽东就已经开始注意欧洲的作用。当时他提出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可以简称为中间地带理论，他当时指的是亚洲、非洲、欧洲。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中国实行的战略，用毛主席的话概括就是一边倒。因为当时世界格局是两极，就是西方和东方对立的格局。当时的欧洲是美国的盟国，所以它不可能成为中国的盟国，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始终认为欧洲是一种可以用来对抗美国的力量。应该说毛主席曾多次利用欧洲或者发挥欧洲的作用，比如说朝鲜战争，后来1954年的日内瓦谈判，以及1956年发生的苏伊士运河事件，以及后来的戴高乐将军执政。在这些事件中，毛主席使欧洲为中国的外交所用。总而言之，当中国实行一边倒政策的时候，欧洲始终被中国人认为是可以利用的力量，可以用它来削弱美国的力量。60年代以后，中国的全球战略发生了变化，首先认为世界上出现了两个超级大国，社会主义阵营的性质也变化了，主要是指当时苏联在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以后开始谋求全球的霸权同时他也不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了。并且，资本主义阵营也发生了变化。世界在重组，欧洲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的格局中。在70年代特别是在中苏边境发生争端以后，苏联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为了适应这样的变化，毛泽东发明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个理论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叫做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当时毛泽东认为欧洲是第二世界的基础力量而这个第二世界有一种双重性。第一个特点是它作为过去的殖民主义国家，对非洲实行殖民政策，相对发展中国家是剥削者；第二，它经济上是中等发达国家，所以和第一世界国家存在着矛盾。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在70年代中国所执行的形成全球反霸主义的外交战略。进入了80年代应该说中国的国际战略又有了新的变化，一是它不再重提全球反霸战略，而做出了调整。这个调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美国的关系降温，但是没有降到发生冲突的温度。同时也跟苏联关系发生加温，但是也不会发生到成为大家庭的温度。因为当时中美苏关系是处于等距的情况，所以也为中国与欧洲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中国和欧洲共同体之间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当时发生的两个重大的事件，使国际局势发生了改变。一个是中国在政治形势方面发生了危机，第二个就是冷战的结束。所以一段时间中国的外部条件即国际处境非常地困难，后来邓小平在外交方面提出了韬光养晦的战略。具体说来就是中国要继续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主义，但是在国际上不出头，不扛大旗。中国冷静的观察东欧一些国家出现的巨大变化，但是采取不介入、不干预他们的内政的政策。中国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就提出坚决反对西方干预内政的战略，但是中国避免挑起对西方的敌对。当时中国努力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友好关系和相互支持，但是也不做第三世界。也正是这种采取低姿态的战略，使得中国很快就从那种很困难的外交环境中走了出来。但是国际关系中所存在的困难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随着苏联的消失，国际的格局被打乱，国际关系失衡的状况下，美国在世界上没有对手了，所以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利用武力去解决问题，他们使用武力的次数完全超越了解决问题的次数。而经常使用武力解决问题是不正义的得不到大家认可。在90年代为了能够缓解困难，中国开始推行多极化战略，这时候欧洲又有新的角色扮演了。中国先与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签订了多极化的声明。与此同时欧盟也逐渐认识到与中国的关系、和中国的合作之重要性，所以从95到03年欧盟前后发表五个对华关系文件。通过这五个对华文件，我们可以判定，欧盟的对华政策变得越来越积极了，越来越

独立了，越来越务实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歧问题慢慢占据了次要的地位，文化、经济方面的合作上升了。我上面所讲就是我的研究第一部分。我可以简单地概括一下，在中国对外战略发展的各个阶段，欧洲都在其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另外，中国也越来越认识到欧洲和欧盟对自己的重要性。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共和国成立55年以来，中国从来没有针对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专门发表一个政策文件，但是在03年中国发表对欧政策文件，直到目前为止，这也是我国政府发表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针对某个地区的文件。

我所要谈到的第二个部分是中国如何看待欧洲建设。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问题，在中国人的眼中，欧盟代表什么？回答是非常简单的，大部分中国人不了解欧盟，或者对欧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并不是很清楚。人民对欧盟具体的内部工作情况或者是内容不太了解，大家都认为欧盟是一个国际组织，因为他有25个成员国，像联合国、世贸组织一样，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应该说现在欧盟的成员国把很多的主权实际上移交给欧盟这个组织，我们看他的组织，欧洲议会、欧洲法院、欧盟审计院等等，这些行政权都超过了国家主权，所以欧盟不应被看作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组织。有些学者把研究的方向放在这个重点上，就是研究欧洲联盟的邦联性质。欧洲很多国家都忠于自己的国家，他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主权，所以建立联邦制就不太可能，所以从邦联的性质上去研究欧盟。这种邦联的形式可以在巨大的维度上维持一种平衡，又能以一种最小的矛盾冲突去寻求最大的统一和一致，这样既可以促进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合作与发展，又可以使各个成员国保持自治的机制。但是也有的专家和学者持不同的观点，说欧盟远远超越了邦联的形式，因为很多国家的主权实际上已经移交给欧盟，欧盟已经有它的立法权，已经有对任何一个公民的司法审判权，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联邦制的组织但是我认为这个欧盟远远不能与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及俄罗斯联邦等同，因为它的政治体制无法比较，因为欧盟成员国的部分主权移交给欧盟，完全是在自愿的情况下行使的。并且欧盟成员国很大程度上还维持着自己的主权，在国际上是一个独立体。由于对欧盟的性质到底是一个联邦还是一个邦联，这个争论不一，有的人说干脆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体制，就是带有联邦性质的邦联。我认为如果我们仅仅在这个政治词汇上争论下去，那么我们就永远不能够给欧盟在性质方面一个结论，因为他毕竟是在社会进步中出现的一个新的东西。因为现在有一些专家说，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词汇来称呼欧盟，这个新的词汇没有发明创造出来之前，我想是否可以把欧盟称作是一个后现代时代的政治实体。但是中国外交部没有参与这种纯学术的争论，在他们发表的对欧文件中，把欧盟称作一体化程度最大化的实体。欧洲和欧盟是不是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应该说在有些方面是，有些方面还不够。我不想详细地谈，但是我想引用一位中国学者所说的话。他说欧盟在经济上是一个巨人，在政治上是一个矮子，在军事上是一个瘸子。

交流评议

曲星，德兰诺瓦等

法方代表：刚才曲星先生做了一个令人非常感兴趣的报告，中国朋友会问欧洲到底是一个联邦制还是一个邦联制？作为一个欧洲人，我觉得是处于两者之间，因为欧盟是一点点发展起来的，最终会走向一体化的组织。我不懂的是，我们的中国朋友对欧盟的态度。中国人的讲法就是要推动世界多极化，这一点我非常理解。作为欧洲人来说多极化有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在19世纪的欧洲，我们当时为了避免冲突、避免战争而建立一种联盟或者是一种联合体，因为今天的敌人可能成为明天的朋友，反过来也是如此。所以多极化是按照步骤一步步走的，不光是历史，今天也是这样。欧盟现在还是有不断的小的争吵。我想我们要做的是避免我们祖先在19世纪，特别是在20世纪所犯的各式各样错误，我想弄明白，中国对多极化的态度。现在中国已经是世贸组织的成员，那里制定的法律往往高于其他组织的法律。中国加入这样的组织是一个意外呢？还是一个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然？

曲星：提到这个问题使我们有机会展开来谈一下，首先区别什么是多极世界，什么是多极化，多极世界和多边主义。多极世界在世界上有多个极，现在国内政策是如此，在国际惯例上也是如此。至于多极主义则是一种方式，实现一种多极的方式，在国际关系中，每个国家每个行为人他都要为自己的利益采取一定的方式去处理问题，如果一个国家非常强大的话，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候，就不需要咨询意见，完全采取自己的方式。当然现在有联合国、国际法很多处理国际事物的工具，中国人认为还是采取多极化的工具来处理国际事物。

法方代表：你们现在是不是认为多极规则是不错的？中国的下一步想法是不是进一步加强国际机构的作用？

曲星：现在你要问国际机构或者是国际法是否足够？我认为这不是个问题，因为你永远不能说，这个东西是够了还是不够。因为一切事物都在发展之中，现在的问题不是加强已有的国际法和国际机构的作用，这么多年一直在加强国际法的作用。现在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他认为国际法的和国际机构不够，所以他想单独来做，这样实际上他不符合我们的思想。中国人的思想首先是维护和尊重现有的国际法，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在此之前没有考虑要加强国际机构和国际法。

曲星：我想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国人民相当感兴趣的，也经常提出的问题，就是法德和解这个经验能够对中日关系也什么借鉴作用？应该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两对国家的关系一个是中日关系一个是法德关系，这两对有相似地方也有不同地方。相同地方就是两对都是大国。双方的行为决定着这个地区的和平和战争，这就是相似之处，还有一个就是德国和日本都发动过战争。不同是法德之间可以实现和解，为什么中日不能和解，我曾经跟美国学者讨论过为什么中日不能和解。因为法德之间有相似的历史意识形态，而中日之间如果和解合作的话就会动摇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考虑到这两对关系之间存在这样很大的不同，我想问问法德和解能够给中日关系以什么样的借鉴？

德兰诺瓦：不同之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口的问题，因为法德之间的人口是相当的。世界上的人口跟中国相当的国家就是印度。喜马拉雅山是一个很大屏障，但是很多人还是希望在这两个国家之间架起桥梁，而不是设置阻碍。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法德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是比较相似一致的，这个观点可以说正确也不正确，因为多年以来，法德之间就存在着一种竞争，这是在历史上英法之间竞争的一种延续。尽管目前这种竞争不是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大家知道法德在历史上曾经发动过三次大的战争，在他们交战的地方就是阿尔萨斯地区，战后很多人还是选择加入了法国，但是他们的文化传统方面还是更加接近于

德国，所以说法国的观念或者是价值实际上曾经被德国征服过，这是19世纪发生的事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是这样。当时美国总统是威尔逊，他说大家应该从战争中得到教训应该把选择权利交给人民，由人民去选择，这种观点一出笼，在欧洲中部引起很多的问题，使民主分子产生很大的冲突，所以我认为在我们解决总体问题之前，应该解决部分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以一种公开和和平的方式找到解决的办法。在历史上法德之间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塞尔斯是法国北部、德国的南部。二战以后这个地区的归属问题，最后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归属给德国，通过这样的方式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克服了历史上的问题，也克服了政治上的问题。总之，法德关系历史上犯了很多的错误，我们不希望日中关系重复我们的错误，尽量不要像法德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争才得到和解。应该从法德和解中得到启示，最终要防止暴力，但这并不表示日中之间应该建立一种邦联的关系。日中关系我们现在表示理解，我只是强调，对于日中关系，我们不能说你们应该做什么，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你们不应该做什么。

另外我还要提起一点，就是你们刚才提到的差别，对于这个差别，我们欧洲人不像中国人这么敏感。如果假如德国和法国有非常独立的军事力量的话，我想美国对于法德的和解也不会采取今天这样的态度。因为现在美日之间有一种很亲密的关系，而法德从军事力量上讲都是属于北约的成员国，所以我们并不像中国这样的敏感。这两天来我们一直在讨论欧盟建设它的积极方面在于我们将一些主权移交给欧盟，由它来做统一的决定，但是我认为不能把一些问题混为一谈，在主权方面的让步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各民族的利益。虽然主权方面作出让步，但是并不表示民族主义就让步了。现在欧盟需要作出某项决定时，大家的政治态度与过去比反到是下降的。

中方代表：我想简单问一下德兰诺瓦先生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赞同你讲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分歧，你是否觉得在欧洲实现一体化的时候，就可以避免矛盾出现激化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在欧盟以外的区域，你是不是认为还是坚持以欧洲的和平的方式解决矛盾呢因为最近几年，欧盟的在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问题上，采取的方式并不一致，那么伊朗的核武器问题，欧盟会不会采取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呢？

德兰诺瓦：首先第二个问题我是无力回答的，我不知道是否会采取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第一个问题是否可以和平地解决所有的冲突，在这方面欧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我们可以举两个比较的例子，一个是爱尔兰，一个是巴斯克地区。当然我要说的并不是每一次的和平协议都可以成功，总之欧洲人不会人为地去制造一个没有欧洲人参加的冲突。

3.2.3 扩大时期—未来的挑战：谈斯洛文尼亚入盟经历

米兰·库昌（斯洛文尼亚前总统）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国家加入欧盟的整个经历。给大家讲讲我们国家就是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一些情况。它加入欧盟的整个过程是怎么样？我所说的是2004年东拓时候的情况，这一过程遇到很大的困难，它预示了冷战的结束。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的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大家有共同的命运并且承担共同的责任。南斯拉夫在暴力的情况下瓦解了。这些欧盟新国家，除了塞浦路斯和马耳他外，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有很多是专制国家，他们各自各有什么特殊性呢？我想说一下斯洛文尼亚的情况。

同时我也将提到中国不断对外开放的一些经验和问题。我本人要用斯洛文尼亚语跟大家做这个报告，使大家对欧盟有一个更好地理解。

首先是斯洛文尼亚国家的产生。斯洛文尼亚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倒台以后产生的，是由一系列政治经济和价值体系的变迁所产生的。总的来说，这个危机反映了欧洲的共产主义遇到的整体危机，而这个体系是由苏联来经营的。当时这一体系是为了适应冷战，适应各个大国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可以说这次危机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同时也使华沙公约集团解体了。但是南斯拉夫至少面临着以下几个危机，首先是他的经济分配制度，这对建设市场经济是不适宜的。第二，各个地方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第三，不同民族之间冲突。第四，国家整体没有办法适应现代化的情况，缺乏灵活性，没办法保证各民族之间的平等。第五，因为我们实行自给自足的制度，这就导致了一些官僚体制，有些问题甚至产生很大的影响。第六，我们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是很空洞的。虽然二战以后这种自足的模式使南斯拉夫族人民团结起来，但是接下来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就解体了，而且我们内部的经济体系也遇到很大的困境。南斯拉夫的军队无法建立与政治、经济的协调，思想上差距越来越大。

第二，我要讲一讲斯洛文尼亚是如何获得国际承认的。首先，我们承认各族人民都有自己的权利，这也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第二，斯洛文尼亚试图在当时的南斯拉夫进行一些改革，使南斯拉夫现代化，但是它的这个意图失败了。第三，我们对国家独立的方案进行全民公决，这非常具有说服力是因为我们当时全民公决的结果是92.8％的人同意斯洛文尼亚独立。第四，就是我们的相关法律都是合法的。这些法律的基础是南斯拉夫的宪法以及国际法案、联合国的各种文案以及联合国在人权方面的规定。

取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当时的国际氛围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人们非常担心暴力方式的解体，同时担心欧洲的版图会发生变化，这些恐惧其实完全没有道理。在经过和欧盟的和平谈判以后，欧洲共同体也承认了斯洛文尼亚。1992年的时候，欧洲共同体的各个成员国都承认了斯洛文尼亚。接下来就是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因为一开始国际社会一直强调应该将南斯拉夫作为一个整体保留下来，对斯洛文尼亚的提议他们没有任何反映。然而事实上波黑和科索沃的暴力活动都非常频繁。

第三，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斯洛文尼亚选择了欧洲一体化，选择欧盟和北约。可以说支持欧洲一体化是斯洛文尼亚对外政策的重要战略性目标。事实上，斯洛文尼亚人哪怕在南斯拉夫时代，都是一致认为他们国家的独立对于欧洲一体化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国家的经济更快的发展，有利于繁荣昌盛，人民生活水平也会改善。因为成为欧盟的成员国，可以使斯洛文尼亚跟上其他的欧盟国家，无论是在经济、技术、行政还是组织方面。可以说斯洛文尼亚的改革都是在非常平稳的环境下进行的，并没有完全否定过去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所实现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同时欧洲一体化也可以进一步加速国内的整个过渡，比如说经

济改革、体制改革和政治改革以及相关的所有制的改革。我们要学会如何重新掌握南斯拉夫的市场，因为这个市场上斯洛文尼亚份额占30％，同时这可以使人们承认斯洛文尼亚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它尊重法律、人权、民主，并且也是一个可信的合作伙伴。在东欧发生了冲突和战争的情况下，如果斯洛文尼亚加入欧盟的话，会更加安全，同时也能加强它在防卫方面的能力。对于斯洛文尼亚来说，加入一个安全的欧洲是非常重要的，这对前南斯拉夫来说也非常重要，当时国家之间有着各种冲突，甚至国家内部也存在冲突。斯洛文尼亚对于欧洲的未来在关于欧洲未来的讨论中非常积极，这些讨论主要涉及到欧盟以及欧盟的各个机构。同时在支持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超越欧洲的模式和风格。斯洛文尼亚本身就是一个战争的牺牲品和欧洲分裂的牺牲品。同时这也意味着欧盟向东欧和中欧扩展的过程中，斯洛文尼亚可以扮演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因为斯洛文尼亚对于《华沙公约》的成员国的情况非常了解，因此斯洛文尼亚可以促进这些国家更快的加入欧盟，帮助他们满足入盟条约，超越以前的思想模式。

现在我要说的是，斯洛文尼亚在加入欧盟的过程中实现了哪些目标。斯洛文尼亚决定加入欧盟，因为它相信这对他们是有利的。因此斯洛文尼亚支持欧盟的利益，而且决定在涉及欧盟共同利益的同时会作出必要的妥协。斯洛文尼亚已经遵守了欧盟在经济政治方面的标准。在谈判的过程中，可以说斯洛文尼亚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者，它要求有非常透明的入盟条件这些条件是非常明确，没有歧视的。可以说斯洛文尼亚入盟的准备非常地充分，它也是最先完成谈判过程的。作为前南斯拉夫最发达的国家，它比当时的东欧和中欧国家经济条件更好。比如说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斯洛文尼亚已经达到欧盟平均值的75％，而且在涉及到欧盟援助分配的方面，事实上它对欧盟作出的贡献比它从中的获益更大。随着谈判的进行，斯洛文尼亚也对国内的司法体系和经济政治体系进行了改革，公民也可以定期地了解入盟的结果，因此在全民公决的时候，有89.6％的人都支持自己的国家入盟。当然也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说有一个平均数的要求，这使得斯洛文尼亚必须在体制方面进行严酷的改革。而且邻国意大利等都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希望借此机会来解决所谓的边境问题以及在二战以后签订的条约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在二战的时候，斯洛文尼亚加入的是民主联盟。意大利和奥地利的行为推迟了斯洛文尼亚的加入。这个条约是1977年签订的。在7年时间内我们都没有办法实现人员的流通，尽管斯洛文尼亚是进口劳动力而不是出口劳动力。而且斯洛文尼亚被要求外国人获取不动产，这使得斯洛文尼亚不得不改变它的宪法。

第四，我想说一下我们在欧盟的一些比较有用的经验，这些经验是非常积极的。我们的理想一直在变成现实是因为我们对欧盟没有什么幻想，没有把它过于理想化，我们知道我们的整个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也取决于在欧盟决策过程中是否能够成功。进入欧盟以后斯洛文尼亚的经济继续发展，速度比整个欧洲要高，04年的时候斯洛文尼亚的发展速度为4.2％，欧洲只有1％。而且斯洛文尼亚满足《马斯特里斯特条约》五个条约中的四个条约，在满足四个条约以后就可以引进欧元。因此斯洛文尼亚在1997年的时候引进欧元。我们的价值体系跟欧盟是一样的。我们在欧盟中的立场完全可以显示我们如何从一个多国集团进入到另外一个多国集团，这两个集团是不一样的。同时我们把一些权力让渡给其他国家，与欧盟进行合作。斯洛文尼亚的议会通过了欧盟宪法，我们的民众也是支持这个宪法的。然而在起草欧盟宪法条约的时候，我们没有抓住机会，因为我们曾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同时斯洛文尼亚也作了许多的努力，希望在2007年加入《申根协议》，它必须保证欧洲边境的安全。尤其是使斯洛文尼亚不要受到国际跨国犯罪、贩毒、贩卖人口、以及非法移民的问题的困扰。展望未来，我们相信欧盟会进一步加强。对于欧盟来说，欧洲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这在调整欧洲宪法的时候表现得很明显，在讨论2007年到2013年预算的时候也表现出来。但是我不想说一些大的概念，比如危机，欧盟终结等等。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减缓的时期，任何的

计划都不能以现行的方式来实现。这是欧盟第一次一下子吸收10个成员国，这些国家都是一些中东欧国家，50年以来，他们的经济政治体制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没有议会传统也没有市场经济，他们的价值观、习惯以及思维模式都与欧盟完全不同。因此对他们来说要实现这个内部过渡也是很困难的。我相信如果欧盟这种扩展逐步进行的话，这个过程会更加顺利。我相信现在欧盟需要一点时间，使得老的成员国和新的成员国适应新的形势，适应这种新的集体生活，同时也使决策机构、决策体系能够适应新的形势。我们如果不断地强调，新老成员国之间的区别，这只会进一步加剧欧盟的分裂，这对欧盟来说是毁灭性的。而且现在美国政府总是强调老欧洲和新欧洲，这种想法有局限性。在北约扩大的时候，以及在涉及伊拉克行动的时候，美国的态度表现得很明显。法国和荷兰拒绝宪法条约，我认为对各个成员国来说可以是一个重新找回失去的时间，更好地修改我们的宪法条约的一个机会，这可以使我们对自己的世界观进行思考，明白到底什么是更好的互助性和多极性。而且在很长时间以来欧洲已经不再扮演老的垄断者的角色，他也不再完全处于世界的领导地位，通过这样的思考，成员国可以更容易地找到解决目前他们遇到的两难境地的办法。我相信如果欧盟要发展，应该不仅仅局限在经济协调和统一市场方面，而要加强经济政策、防务政策和安全政策。首先，应该重新定义它的伦理价值观，因为这是发展的基础。应该在欧洲进一步加强统一的欧盟的观点，使欧盟能够适应当今社会的变化。讨论欧盟究竟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到底是联盟还是联邦，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实上我们现在所实施的历史计划是非常有潜力的。我们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一个信息时代，这为我们的社会带来很多变化尤其，是时空的变化，我们个人和国家以及民族的定义都有很大的变化。因此这也要求我们面对当今社会的问题采取一个更为灵活的办法。正如欧委会的主席所说的，欧盟希望能够创造新的附加值。同时他也要为欧盟的公民和各个成员国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很显然，现在欧盟需要更多的平衡和团结。要将成员国的利益和欧盟整体利益进行协调。同样，正如美国试图在全世界推行他们的民主模式，欧洲也完全可以向外部出口它现在正在实行的社会国家的体制。然而这需要我们对全球化的市场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每个国家都在试图避免承担责任，而往往将这种责任往往归咎于某些国家。我们这个时代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知道，如何在一个全球化的民主框架下引入适当的伦理价值观，这个世界里面包括整体的全球资本以及资本主义。

最后我要说，欧盟应该加快与亚洲的关系，比如日本、韩国和中国。我们要超越历史的敌对情绪。加强各个地方的政治经济能力，并加强他们对人类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影响力。在我看来，中国与法国和日本一样，也完全可以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谢谢！

3.2.4 和平建设与主权超越

约尔迪·普约尔（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前主席）

我想谈谈关于和平建设和主权超越的问题。的确，和平是欧盟一体化进程的一个最根本的目标。几年以前，也就说距五六十年代刚开始规划欧共体较长时间以后，德国联邦的总统先生在回答为什么要建设欧共体的问题时，很简洁地回答说是为了和平，他没有说是为了经济建设或社会进步。

从1870年至1939年期间，欧洲经历了三场非常重大的破坏性战争，又经历了1914至1918年、1939年至1945年的两次世界大战，其间只有24年的间隔，欧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的精神、欧洲的局势处于仇恨状态中，民族歧视，相互攻击，这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情况不一样。一战时在政治、经济上人们对欧洲的共同建设不感兴趣，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情况有了改变，当时整个欧洲各国人民都希望建设和平的欧洲，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因素。欧洲的建设成为举世瞩目的任务，并将确立一种模式。我们确信能够很好地把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结合起来，能够最好地保障人民政治、宗教、文化的自由，并且整个欧洲还达到了在经济上、政治上很高程度的统一，这一切非常令人惊讶，而且都是在和平的方式下进行的。我要重申，从我们整个历史进程来看，这是一个特例，也是一个事实。在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历史上，都有很多的暴力冲突。美国在经过了南北战争后才成为统一的国家，整个欧洲甚至瑞士在历史上也经历了很多暴力和武装冲突。所以我们可以说欧共体的建设是历史上唯一的特例，它完全以和平的方式来建设整个欧洲。

现在我们遇到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缺乏一个好的领导团队，也缺乏深入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竞争目标，而且很难进行经济和社会的改革，虽然欧洲非常需要改革。同时我们面临人口老化等问题，所以欧洲正面临一个如何持续发展的历史关键时刻。1957年，欧洲统一的促进者之一保罗•亨利在签订《罗马条约》时说，我们现在正面临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完全自愿的变革，不是在暴力基础上，而是通过我们的智慧来进行这样的变革。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呢？

首先必须要有很强烈的政治愿望，牢记欧洲悲惨的历史经验，这个政治愿望才能进一步得到加强。我们不希望看到欧洲衰落下去。第二点就是采取一种渐进的方式，并且共同开发一些基本的资源。第三点是要求一些国家部分放弃主权，这对它们来说是很困难的任务。由一些欧共体的中央机构，比如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来负责接管这一部分的主权，可以说这是欧洲一体化最困难的一步，但我们在这方面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们很难想象的事情已经实现了，马克已经让位于欧元，还有其他的货币都让位于欧洲统一的货币。欧洲很重大的政策都是由布鲁塞尔的欧盟机构一致作出的，由各个成员国到布鲁塞尔去参加这样的决策，比如汇率政策等等，这都说明在主权的转让上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还有申根协议也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它表明了边界划分的进步。申根协议是欧洲进程中边界划分的一个重大进步。这些都是构成主权的一些支柱因素，现在已经解决了。第四点很重要，就是在欧洲各国之间有经常性的协商。第五点是大家普遍都接受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共同模式，同时保持自己国家的特性。

所有我们工作的基础在于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并且有一个关于社会发展模式的最基本的协议，这个协议是建立在民主、市场经济、经济发展、福利国家的基础上的。午餐的时候我和吴建民先生谈到了在西班牙如何逐渐实现这样的变革。在欧洲的君主专制时期，我们已经决定了接受市场经济，并且把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之后是福利国家随着民主的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然后逐渐再把专制制度改造成民主制。要想对欧洲的成功建设作一个很好评价，我

们应该重申欧洲是一个多样性的大陆，文化、传统、历史经验、人的精神、思维方式以及发展水平、社会结构等等都有很多的不同。过去还有着宗教信仰方面的不同，这在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并且欧洲有很多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比如我是西班牙人，我在这里发言用的法语，但是我的母语也不是西班牙语，而是加泰罗尼亚语，在西班牙还有巴斯克语等等。只有700万人说加泰罗尼亚语，还有斯洛文尼亚语等。有些语言只有100万人在使用，这些是非常小的语种，但是欧洲必须保护这些小语种从而来保护语言的多样性。所有这些对我们这个时代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欧洲向世界发出的信息不仅仅是和平和文化的多元化，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而且是民族之间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合作。欧盟要表明一个大的集团能够尊重成员之间的特性，这一点有着非常特殊的重要价值。我们不仅仅要集中在一起，还要使各成员不失去自己的民族身份。现在我们正经历着文化的交融和人员的巨大流动，这些之所以能成为积极的因素，是因为欧盟表明了统一的进程和保持文化特性是同时进行的。

还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因素，就是在整个大陆保持政治和经济的稳定，而这一进程的基础是根据欧盟各地不同情况不断巩固民主制度，比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都是从专制的体制过渡到民主制的。货币、汇率、贸易政策等都没有对成员国的特性带来威胁，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欧盟内部，人员流动和文化交融非常重要。我是一个欧洲人，当时我经历这一进程的时候还非常年轻，只有十几岁。在欧洲我也致力于保护西班牙的利益，对于我们来说，欧盟可以成为一种保证，一种使人们和平共处、使各个成员国之间和平共处的保证。

欧盟的建设有许多积极的影响，第一个影响就是带来了整个欧洲大陆的稳定，正如我刚才所强调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稳定发展。在最近五年当中，有些成员国经历了一些问题，比如说石油涨价、财政危机等。我们很难在一些国家面临政治经济危机的时候维护欧洲货币的统一，所以说稳定这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在谈到民主进程和民主制度的巩固的时候，我们有些非常具体的例子，如果没有欧盟，西班牙、葡萄牙或是希腊这样的国家就不会实现民主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也不会经历变革。换句话说，我们进行这样的建设、经历这些变革的时候，也尽力保持了整个欧洲的稳定。像东欧和中欧的一些国家，在1990年之后经历了非常重大的社会变革，之后的进程非常困难，如果没有欧盟的话，它们的改革与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我们现在讨论欧洲的时候，都肯定欧盟是一个减少和消除发展不平衡的非常有效的工具。我想在世界各地，在中国都有这样的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欧盟已经证明了如何克服这样的发展不平衡。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但是如果没有欧共体的积极推动，我们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成绩的。可能我所介绍的欧盟建设经验同中国的情况有很大差异。中国在民族、语言上也有很大的多样性，还有和邻国的关系问题，比如中国和日本面临着和解的使命，像经过几个世纪的冲突之后的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一样。这个前景我没有能力预测，但我想重申的是，虽然中国的情况跟欧洲完全不同，但我认为从逻辑上讲，我们可以提出同样的建议；作为一个原则，我们可以说和平不一定是以放弃主权为条件的。像一些亚洲大国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建立在其他一些基础上，相互尊重主权并且进行对话、合作，同时不放弃自己的主权。我们可以参考法德关系的成功例子，但我并不知道亚洲到底应该怎样做，比如说中日关系，这超出了我的发言的范围。但是像法德关系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除了这两国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当时在大战的混战中各国都是相互对立的，大国对小国、中等国家对中等国家等，法德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例子，它们以良好的愿望来克服消极的历史影响。今天上午我和几位法国同事谈到，舆论对历史记忆的作用非常强大。在欧洲我们很自豪，对我们的成绩感到自豪，我们是幸运的，但我们不想教训别人，因为每一个大陆、每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都有自己的理由走自己路。

第三，就是在和平稳定与平衡发展的基础上相互合作的经验，促进了整个世界大的国家和大的地区之间的合作，特别是欧亚地区。吴建民先生也强调了这一点，我想主要有三个地

区：亚洲、欧洲、美国。当然我们不要忘记还有俄罗斯，因为它将会成为经济和政治上非常重要的一级。如果说美国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整体，那么欧洲正好相反，它正在经历统一联合的进程，我们确实实现了很大的进步，这在几十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而亚洲有中国、印度、日本这样的大国，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在分量上没有那么重要但也不可低估。

所以很明显，中国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它会在亚洲增加自己的影响。整个亚洲正在走向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并且在世界上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所以也将为世界承担更大的责任。本着这样的观点，我们认为欧亚的关系、欧洲和中国的关系是互利互惠的。一个统一的欧洲是非常积极的，我想感谢组织者组织这样的一个论坛，一个中欧之间的对话，我希望它富有成果并且对各方有益。如果欧洲不统一的话，在世界上就不会有分量，不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上都是如此，我们也不可能让欧洲来参与世界政治的进程，参与这样一个多极化的进程。如果欧洲不统一，它会很弱小，各个国家只是一个单体，就无法起到这样的作用。只有通一个欧盟来保证社会的和谐和行动的统一，欧洲各个国家才能够真正愿意放弃自己的一部分主权来为欧盟的统一服务。现在人们的思维变化非常快，对于欧盟的设想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想欧盟的建设将会更好，会更积极的参加这样一个关于世界多极化的对话。谢谢！

交流评议

法方代表对普约尔的评议，普约尔的回应

法方代表：J·普约尔主席先生我向你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刚才谈到25年以来中央政府收回了一些给你们的权利，主要是为了维护一种平衡，马德里政府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否考虑了欧盟的立法要求？现在欧盟立法要求是统一应用，这样才能够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时效性。现在加泰罗尼亚要求扩大自己的自主权利，这样做是不是有悖于欧盟的要求，有碍于欧盟的统一发展？

代表：我想补充一点，现在要求更大的权利，不光是西班牙问题，比如意大利的比兰地区，你认为这样的要求有可能性吗？另外它们是否能够给我们提供安全的保证？因为现在中央政府毕竟给了目前这些要求更大权利的地区很多经济上、金融财政上的很大的支持。现在也给加泰罗尼亚提出了一个要求，但却没有了政府的支持。

J·普约尔：现在我来谈一下，最开始是在 25 年前西班牙政权被推翻，开始民主化政治。我们当时没有要求更多，我们当时采取温和的态度，我们希望以后的时间能够有所改善。但是 25 年以后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宪法，虽然签署了，但是措词非常的含糊，到今天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所以我们现在是时候提出扩大自主权利。刚才提到我们这个要求会不会导致欧盟一体化的阻碍或者是刹车，我是这样看，作为一个国家，西班牙对欧盟是有责任的，这个责任不是应该由我们来承担，不光是我们加泰罗尼亚很多地区的自治权都被削弱。至于您提到的关于分裂主义的问题，我认为欧洲联盟本身就是对分裂主义的一种遏制。因为 1815 年欧洲的荷兰等国家已经接受一种理论，反对分裂国家，在非洲也是这样，非盟也是反对分裂的。我认为欧盟不光是一个机构，它是一种体制和机制，无论你是把他叫邦联或者是联邦，它都是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这个加泰罗尼亚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小的国家也完全可以在很多好的环境下生活。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小一个国家是完全可以生活的。所以我们的要求不是分裂，从这个国家分离出去，我们只是要求更大的自由，给我们更大的自治权，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地区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是有自己非常显著的特点的。

3.3 欧洲体制：面对多样性挑战

3.3.1 面临多样性与欧盟宪法挑战的欧洲体制

让•路易•布朗热（欧洲议会议员，政治学教授）

欧洲曾经面临的历史性问题就是要坚持它的利益以及价值观的统一，同时也要尊重每个成员的个性，这种挑战是来自于欧洲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根本的矛盾，这种矛盾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欧洲是在古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在这样的历史遗产上，发明了国家的概念，把它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民族国家成了欧洲的中心特性，我们不可能在否认各个国家存在的事实的基础上对欧洲大陆进行组织。第二个方面是欧洲民族国家的分裂。从18世纪末开始的，欧洲陷入一种自我残杀的疯狂中，最后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欧盟之所以可以创立就是为了解决这样的怪圈：怎样来尊重属于共同欧洲的国家各自的多样性，同时也能维护一种文明和政治的统一？这种文明和政治总是相互交织、相互冲突，而且又由于这些成员国的存在受到挑战。这一切构成了欧洲的特性也构成了欧洲的分歧。

我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欧盟的创始人比如让·莫内先生对这个问题都已做出过回答。现在欧洲面临新的挑战，随着苏联解体和欧洲人面临的新挑战，今天的欧洲人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解决经济和政治的全球化带来的问题？

首先我们看看怎么样把统一和多样性结合起来。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敏感的，解决这个问题特别需要平衡。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国家是欧盟组成的中心，另一方面要使这些成员遵守共同的法律，这些法律是在它们统一的基础上制定的，要避免使用暴力、讨价还价、恐吓、战争等。总之一方面要使他们相互尊重各自的原则，另一方面还要把他们放在一起。也就是说欧洲要尊重它的各个国家，这些国家不是州联邦（像美国那样），它们以主权的形式来决定是否可以把某些主权放在一起，使这些国家在欧洲首脑会议或者是部长会议的范围内来做出所有的重大决策，各国的银行家来共同管理中央银行，国家的司法体制来制定法律并决定是否使它成为整个欧盟的法律。我们同美国的比较是必须的，美国发明了一个国界之内的联邦制在这个联邦制中，各联邦成员不会起到国家的作用。而欧洲发明了合作性的联邦主义，这种联邦主义是直接由各个国家和自己的政府主持实行的。在美国，州联邦附属于联邦之内，而在欧洲是自己管理联邦。我认为发明欧盟的人有一种革命性的思维，所以他们才有一个共同性的、联邦性的逻辑，由它来管理和处理国家间的行动。欧盟继续使各个国家经历着变动，正如历史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让个人承受变化，把国家改变成一个被尊重的、有责任的合作伙伴，它也要遵守共同的法则，制止相互的威胁。在野蛮的状态下，人是一匹狼，只有一个社会契约才可以给他带来安全和个人的发展。在古老的国家，国家就是一匹狼，而欧盟给它带来一个保障，只要它可以尊重其他成员的合法利益。卢梭发明了作为公民的个人利益，让·莫奈发明了作为公民的国家利益。

国家的共同利益可以从五个方面体现出来。第一个方面是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委员会，它不作决策，只提出建议和处理其他人所做的决策，它应该起到促进共同决策的作用，因为只有它能够有一个整体、平衡的眼光，并且找到整体的利益和各个国家的利益的共同点。第二个方面是一个超国家议会的作用，罗卡尔先生和我都是这个议会的成员，这个议会不能单独作出决策，也没有权力强加自己的意志，但是不经过它的同意，大部分的立法和预算方面的决策是不能够形成的。这个议会代表人民，超国家委员会代表政府，这两者构成了平衡的保障保证了民主的需求和官僚管理需求之间的平衡，另外还保证了每个成员国共同的愿望。第三是在运行机制上采用有效的多数制，我们要重视这一点，也就是说在做决定的时候，必须取

得多数的同意。这不是一个分裂的机器，不是把欧洲分隔为两半的工具，而是一个有机体的工具，因为有效的多数制使那些愿意让步的人在发展过程中也表现出自己的愿望。大一统的制度只可能造成瘫痪，只有这样的有效多数制度才可以使大家团结、动员起来。克劳斯就说过有效多数制是通过其他的方式保持了协商同一性。第四方面是国家保持独立的司法权，我们的法院是不制定规则的，但是它可以保证人们遵守已经制定的规则。第五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就是欧洲中央银行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在共同体的范围内独立建设的。

上述机制要求各个成员国事先承认一个原则：这种体制结合了国家权力，体现了有效性、效率、民主和对法律的尊重。人们经常说有一个政府间的逻辑，但这个逻辑是非常可怜的，同共同的逻辑相比，政府间的逻辑只能使单个政府面临深渊，又会使事情变得更复杂。按照政府间的逻辑，25国只是各自为政的25只狗在行动，所以应该欢呼共同体的欧洲万岁，而应该打倒政府间的欧洲。我这样的体制已经运行得很好了，但是它一直在不断面临挑战。

冷战结束后，苏联从中、东欧撤出势力，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们面临着一些新的矛盾趋势，这些趋势包括三大方面：一、这个体制应该完成的使命比过去更加沉重了；二、联邦的一些局限性也加大了；三、成员国面对这种局限性的反抗比过去也加大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现在面临着困难，并且使欧盟陷入了深重的危机。1989年以来，欧盟经历了历史性的变革，它的目标是要组织共同体之间的交往，并保证欧洲人之间的和平与和谐。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是由另外一种不同的范畴确定的，这个范畴就是由美国人所主导的大西洋的共同体，而现在一切都发生变化了。欧洲人中心的问题并不是来界定和平，而是要组织同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和贸易关系，特别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范畴内。从政治上讲，美国人对欧洲人的兴趣是越来越小了，而欧洲人也越来越不需要美国来保证自己的安全。所以欧洲人应该使自己有能力共同行动，一致对外。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任务，这与仅仅是消除内部的紧张相比是更加沉重的任务。在过去只需要调整人们各自的利益，以避免产生冲突而我们现在应该有一个真正共同的政策，这就意味着成员国之间应该有更高级、更高水平的和谐。关于第二个趋势，我们会看到一些在联邦法制方面的局限性，比过去更加严重。如果我们想在6个国家当中达成协议，还是比较容易的，经常可以通过协商达到一致。但是如果要在20多个国家间达成统一的话，那将是一种导致瘫痪的做法，只有联邦的逻辑，建立在超国家机构责任增强的机制上，并且采取有效多数制的基础上才能保证行政效率。欧盟越是扩大，联邦的需求越是强烈。关于第三个趋势，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成员国反对联邦的一体化，这是由两个原因产生的：首先是成员国数量的增加，使每一个成员国都感到有被边缘化的可能现在的欧盟，国家成为一种行动的工具，这种趋势在一些小国家那里表现得很明显，特别是一些边缘的国家，它们希望能够保护自己而不是加强欧盟。所以欧盟内部有一种不协调性在增加，6成员国的欧洲可以把不同国家的利益集合起来，而25成员国的欧盟是一个地理面积非常广大、宗教倾向完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不协调局面。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加尖锐，特别是因为欧盟还没有制定一个非常明确的针对成员国的标准，现在它已经进入向巴尔干国家和土耳其开放的进程，它不知道对乌克兰说些什么，也不知道对摩尔达维亚的申请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一旦对这些国家作出反应，就会产生一些矛盾。这样一个机制的危机随着法国和荷兰否决欧洲宪法条约变得更加严重，我们很难解决这些矛盾。欧洲人怎么样才可以摆脱这种状况呢？

我只简单谈几点，我认为欧盟今天面临一个“十字路口”，它应该解决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自己特性的问题。它是要成为一个历史的、文明的、政治的团体，还是成为一个不断扩大领土的共同体？它是一个历史性的共同体还是一个价值观的共同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第二个问题是政治问题，欧盟将来的使命是要成为一个政治角色，能够在多极的世界中取得一席之地，还是仅仅是一个经济合作、共同司

法的自由贸易区域？一个联合国的一个组织，没有权力也没有一致性。我是赞成第一种可能性的，但罗卡尔总理对此表示怀疑。第三点是经济问题。欧洲是停留在目前的阶段还是相反？我们可以确定两点，一个是把欧洲货币的联盟真正变成一个经济、预算的联盟，使它有一个统一的金融政策，并且参与经济的世界化，以便把市场的逻辑和贸易的逻辑、竞争的逻辑同一个国家对法律的尊重结合起来。第四个问题属于机制上的问题。我们能否接受作为共同体和多样性合作的欧盟只满足于政府间的、无效率的合作，还是应该抓住有活力的合作，使欧盟可以拥有真正有效的机制，既能体现民主又能体现效率，所以这些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无条件扩大欧盟？是否要使欧盟走向政府间的合作？现在我们面临着多重选择，像托尼•布莱尔一样。我认为我们必须在暂停扩大，使欧盟成为一个实体，一个受尊重的政治实体，它的统一货币体系可以加强财政预算的协调性，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要建立一个受尊重的共同体或者一个有活力的欧洲，并且同时接受世界的多极化和多边化，这个多边化就是每个人都有权享有自己的差异性，同时还有义务采取共同的行动，这是一个挑战，谢谢。

3.3.2 欧盟发展的深刻问题和挑战：同一与多样的建设

约翰·帕尔莫（欧洲政策中心主任）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大家中间，认识来自各个方面的代表，了解中国社会。我们可以通过这次会议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一些经验。我非常高兴向大家介绍一下整个欧盟从开始成立的6个成员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的过程。

欧盟从1957年最早的六个成员国创立欧共体，一直发展到现在拥有了25个成员国。这个发展可以说是革命性的，虽然是一个缓慢的革命过程。在欧洲建设经验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习如何分享各自主权，这是非常困难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演变过程。在建设欧洲的共同主权过程中没有什么秘密计划，也没有秘密交易，毕竟它涉及到各个国家的主权。当时我们看到美国、加拿大都建立了联邦制，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在欧洲共同体的建设中，我们要努力把各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独立的、拥有自己主权的国家统一在一起，让他们相互分享自己的主权。6个最早的创始国，在1957年签署了《罗马条约》，然后逐渐扩大。1973年从6国家扩展到9个，加入了英国、丹麦、爱尔兰。几年以后，我们吸收了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注意发展地中海国家加入欧盟。最后在90年代，北欧的一些友好国家，瑞典、芬兰，加上奥地利等也加入了我们的组织，现在一共发展到25个成员国。最近我非常荣幸地在欧盟的部长理事会上发表讲话。当时爱尔兰总理说，根据每个国家轮流担任主席国，任期为6个月的制度，作为主席国的代表，他要分别和25个部长谈话。我突然意识到我都认不清楚这25个国家的部长，原来只有6个、9个、12个国家的时候我还能搞清楚。这是一个特别的例子，说明我们的组织并不是一个俱乐部或者是局限于相互合作的联盟，而是建立在法律制度上的一个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各个国家分享主权，进行共同的决议，这与通常的国际联盟是非常不同的。

大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最开始是6个国家而不是9个国家或者是12个国家？我想告诉大家，当时英国是不太可能加入欧洲共同体的。英国的加入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它不愿意参加。为什么？这要历史地看待。当时二战结束不久，我们要考虑到战后的一些变化。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英国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响，二战后它的势力范围正在发生变化，要让它习惯和其他邻国共同寻求一种政策，这种做法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当时英国也就加入欧共体的问题进行过谈判，但谈判失败了。当时的困难在于怎么在经济、贸易上把欧洲共同体融合在一起。1973年、1975年英国通过大选，最后确定加入欧洲共同体，同时丹麦和爱尔兰也加入进来。应该说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大家努力寻求一个新的欧洲政策，这种共同的政策涉及到欧洲这个地区本身的发展。我们现在不仅有25个成员国，而且涉及到100多个地区，这些地区都有自己民主选举的政府。在英国，我们在苏格兰、威尔士会选出自己的政府，德国、西班牙这些国家都有很长的联邦体制的历史，权力很大程度地分散到地方。在其他国家也是既有统一的政府也有权利非常大的地方政府。

在开始阶段，我们主要关注欧洲的社会制度，90年代瑞典、芬兰加入以后，大家开始更加注意协调各国的社会政策，特别是对少数的歧视和贫困问题。处理这些问题时我们遇到很大的困难，也做了很多的努力，最后才制定出共同的政策，以消除社会排斥现象。我们需要弄清楚，在欧盟的层面，应该决定什么事情，在地方一级和更低一级的政府，应该有什么政策，要使我们这个行政体系分为国家性、地方性、和欧洲性的，这三层体制同时发展。有时候这三个层次之间会发生一些冲突和矛盾，甚至政策危机，有些人认为某项政策应该全由欧洲统一，有些人则认为各地方有决策权。

欧洲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地调整前进的过程，有时候进三步退两步，再前进再倒退等等。在发展过程中我们逐渐形成欧盟的共同政策，使得我们把国家、地区的政策和欧洲的政策尽

量统一起来，达成一致。这样的政策才能进一步拓宽，就像欧盟不断扩大的事实。需要在各方面不断扩大我们的影响和范围，90年代北欧国家的人民对欧洲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我们欧盟经济政策中三大支柱之一。**增强竞争力，促进和谐社会，提高环境保护意识是我们经济政策的三大支柱**。有时候需要经过争吵甚至是斗争才能取得一致。因为有时候提高竞争力就意味着破坏和谐性，对环境也会造成一些影响。但是从实际的情况来看这一经济政策促进了欧洲的繁荣。在过去的25年中，欧盟从6个国家扩大到9个、10个、12个一直到加上北欧3国的15个国家，这个过程正是我们通过一系列法律条文来固定我们的体制的结果，这些法律条文都有法律效力。

1992年我们通过了欧洲单一市场的文件，然后又通过了《马斯特里赫条约》，它为引入欧洲统一货币奠定了基础。最后我们12个国家开始使用统一的货币——欧元。这个过程中，确保各个国家利益成为一个主题。我们建立了欧洲银行，让它来执行欧洲的货币政策，使12个国家都来遵守这个政策，长期以来它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统一货币带来了三个非常重大的变化：

第一，欧洲统一市场的建立。今天这个市场已经建设完成了，各国之间实现了财富、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各个国家在市场管理方面的主权已经缩到最小程度。各个欧盟国家执行统一的市场政策，目标是建立一个完整的欧盟内部的经济统一制度，从最北边的芬兰到最南边的希腊，从最西边的爱尔兰到新的东欧成员。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统一货币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远远超过了建立一个统一市场、建立欧洲中央银行的意义，它会引起更多深刻的变化，就是各个成员国将来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必须面对欧盟的集体。大家可以想象，关于国家资本与欧盟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是多么敏感，我们必须进行更好的协调，把各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跟欧盟的经济政策统一起来。欧盟各个部分不可能总是一致的，会和欧盟的整体利益发生冲突，但在未来越来越全球化、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欧洲单一货币的发行将成为建立一个欧洲的共同经济政府的基础。这是第二点。现在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政府，目前的讨论集中在多快地建立这样一个政府和它的发展方向问题。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进程，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这并不是说要完全取消各个国家的主权，必须考虑到过个国家地区政策、文化等的多样性，保留地方政府的一些决策权。但是关于经济增长、就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等最重大的问题，我们就必须逐渐在欧盟的层次上进行协调。欧洲已经完成了从共同市场发展到单一市场，从各国的货币发展到单一货币的发展过程，应该说这个过程发展是缓慢的。在欧洲的层次上，货币的统一把15国，现在是把25个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个国家都要面对欧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决定欧盟应该做什么，同时25个国家更要赋予欧盟进行统一决策和行动的权力，以实现大家的权益。这是第三点。

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我们刚刚进行了两项决议，欧盟共同的对外政策和的国防政策，在这方面我们取得很大的共识。在这之前，在如何来处理对外关系和国防问题上，我们有很大的分歧。现在这样一个共同采取政策的机制，我认为和美国的体制不一样，和中国、其他国家也不一样，我们共同的防御政策是由欧盟的各个国家从各个方面来负责的，它要求不同的地区加强合作。过去我们曾设想建立一个统一的欧盟外交部，任命一个统一的外交部长，但是现在还没有实现。另一个例子是，现在我们越来越重视建立欧盟内部的安全制度和司法制度。在世界各地发生一系列恐怖事情之后，欧洲人认识到要联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采取措施，保证各成员国和成员国人民的利益。

我们目前已经有25个成员国。我可以告诉大家，前天离开欧洲来中国的时候，我们刚刚和土耳其签订了一个加入欧盟的协议，确定下一次谈判的日期。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将会在2008年加入欧盟。欧盟在不断地发展，我们密切跟进这些情况，来负起自己的责任。

最后想说说我的结论。这二三十年来大家紧密地生活在一起，取得了很大发展，有进步也有倒退甚至危机。从所有这些经验中我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欧盟现在的25个国家、曾经的

15 个国家都有民主的传统，这是一个强大的基础。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在欧洲的层次上建立一个欧洲式的民主，在各个国家都可以实施。我们已经建立的欧洲议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构，有很多民主权力，包括选举等，将来的欧盟委员会都会通过这些民主程序来运行。这表明欧洲人对民主的一种追求，在欧盟的整体范围内，我们都需要学习如何进一步推动欧洲民主的发展，并给这样的民主制度以合法性，特别是在欧盟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我们更有必要在这方面作出努力。谢谢！

3.3.3 欧洲法系与多样性

奥利维耶·多尔（巴黎南泰尔大学，公法教授）

欧洲共同体的建设从一开始就经过了一种紧张，统一的超国家机制和多样性之间的紧张，这是由各个国家的特点和不同的传统所决定的。

从政治上来看，这种矛盾表现在东扩和深化之间的矛盾。在每一次接受新的成员国的时候，我们都要走向一个一体化的新阶段，也就是说要建立一个新的条约。《马斯特里赫条约》和《欧盟宪法条约》之间，从法律上我们可以看到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矛盾，事实上这是历史上逐渐形成的，我们有三个最基本的条约：1951年签订的《煤钢联营条约》，还有另外两个条约《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联盟》。从法律上来讲这三个条约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每一个条约都有自己相应的机制，事实上它们每一个都是一个特殊的法律体。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有愿望也有必要在它们之间创造统一性，尤其是将各个不同的行政机构合并起来，于是我们1965年通过了一个《合并条约》。欧盟法律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问题在《马斯特里赫条约》里面进一步加强，使得我们在分析欧洲法律条约的时候变得更加困难。事实上它们以另外一种形式补充了欧盟，欧盟整个体系的主要的特征就是建立了三个法律支柱，这三个法律支柱更多地引入了多样性，即使欧盟的法律更具多样性。

今天各条约涉及到了欧盟各个成员国的地位，事实上自《马斯特里赫条约》和《阿姆斯特丹条约》之后，各成员国的地位就不一样了，这取决于它们承诺的是什么。事实上欧盟内部有多种地位。我们刚才说《马斯特里斯特条约》可以建立一个欧盟，事实上它更加细化了欧洲的法律体系，因为它建立了三个支柱，这三个支柱又有一些其他的相关欧盟法律来进行补充。

这三个支柱是什么？首先是欧盟层面的，欧盟的层面事实上可以称之为一个欧盟的“庙宇”，因为在这里面，我们融入了欧盟所有的最根本的条约，比如说统一市场、经贸联盟等。在这根支柱上，我们的决策方式可以说是共同体的决策方式，欧洲机构根据相关的程序来获得一致性的决定。比如说欧委会有提议权，部长理事会作出决定，部长理事会代表了各国的利益，在大多数时候是以多数有效的方式确定的。除了这个主要支柱外，还有另外两个支柱一是外交与公共安全，它的目的在《马斯特里斯特条约》里面就已经明确了。在外交和防卫方面采取共同的政策，这里更强调各成员国自己作出决定，可以说这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政府间合作。而在这个领域里，欧盟的各个机构是不发生作用的。第三个支柱就是司法和警务合作，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建立公共的安全和司法空间。也就是采取一些共同的政策来解决由于大市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边界问题、签证问题以及跨国犯罪问题。在这第三个领域里，决策方式事实上也是政府间的决策，可以说欧盟的机构被排斥在外，不参与决策过程。

如果要做总结的话，我们可以说这三大支柱保证了欧盟行动的一致性，而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欧洲各个法系的多样性，在各个条约里面融入欧盟的作用来保证欧盟的行动的协调。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欧盟的体系里面有一个共同的支柱，首先就是《马斯特里赫条约》的存在，它定义了欧盟的作用是什么，它的目标、它的机构框架、它的价值观、它的各种资源，同时在条约最后还可以看到我们规定了对于那些申请国的定位是什么。条约的第三款也规定了欧盟机构的统一性。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三个支柱的运作方式非常不一样，虽然对第二个和第三个支柱来说，欧盟的机构被排除在外了，但是我们仍保持了欧盟的协调性和统一性。大家知道首脑会议，每年都会召开数次，参与这三个支柱的活动，起到一些促进作用，从而保证整个欧洲体系的良好运作。部长理事会更多扮演的是一个共同角色，它与议会共同做出决定。可以说部长理事会不完全是一个欧盟的机构，它更多的是一个外交平台，可以使各个成员国集中在一起，根据政府间的方式进行讨论，但讨论是在一个欧盟机构的框架下进行，就是部长理事会这个框架。

最后一点，就是欧共体的法院建立的基础是欧盟法律的平等性。事实上，虽然它被排除在三个支柱以外，但是有时它又有足够的能力使各个成员国支持这三个支柱。面对多样性，为了保证这三个支柱的同一性，欧盟建立了一系列的法规，保证在欧盟内部的行动是协调一致的。事实上各个条约保证了各个成员国在政府间行为中严格遵守一些规定，有时政府间的行为会威胁到整个欧盟的利益。在政府间支柱的框架内，可以使它们的职能领域转移到共同体的事业上，当然前提是各个成员国都赞成这一点。正因为是有这些通道的存在，它们可以在有限度的基础上重新修整一些条约，主要成员国都同意的话，我们可以将一部分由政府管理的领域转移到欧盟的层面。《欧盟宪法条约》在2004年6月18日的时候就已签署通过，大家知道它现在正在交由各个成员国进行批准，这个宪法条约试图更多地强调同一性，并且取代三个支柱，同时给欧盟的职能定义一些新的原则，这样就可以简化决策过程，使欧盟有更多的同一性而减少多样性。大家可能都想象得到，这一宪法条约的签署和统一实行可能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另一个问题是各个成员国如何加入欧盟共同体。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对峙，随着这些条约的签署，各个成员国都要满足统一的条件。如果一个国家一旦进入欧盟，它会发现事实上各个成员国的地位是相对的，是各种各样的，并不存在同等的成员国的地位，只有申请国的地位是一样的。而真正成了成员国，它的地位可以是各种各样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如何将入盟条件统一化。

首先，要成为成员国，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巴黎条约》和《罗马条约》已经不存在了，《煤钢条约》更多的是一个共同体的层面，而《罗马条约》是混合性的。《马斯特里斯特条约》只将入盟的一些条件概括起来，融合了《罗马条约》和《煤钢条约》的性质。同时它也随着欧盟扩大的进行，就两个条款进行了立法，一个是申请国必须完全接受欧盟的一切法律体系，就是欧盟从一开始所制定的一系列条约。同样，《马斯特里斯特条约》还制定了一个法律，规定了第二个入盟的条件：申请国必须遵守民主要求，必须尊重人权，这是写入欧盟法律的。我们可以看到将入盟条件统一了以后，在法律上就排除了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没有提出一个成员国可以退出欧盟，在现有的条件中，我们没有任何条约规定一个国家可以拒绝欧盟、可以退出欧盟。也就是说对于成员国来说，不可以以单边的方式宣布退出欧盟。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很多条约将会永远存在下去，除了第一个《煤钢联营条约》已经在2002年失效，其他的条约都是永远存在下去的，因此从法律上来讲，它们是不可能退出欧盟的，但是从政治的层面讲，情况就是不同了。

欧盟有史以来，事实上很难使一个国家单边退出。有些国家可以阻止欧盟，甚至使欧盟的运作陷入瘫痪，现在我们需要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法国在 1965、1966 年由戴高乐总统实行的“空椅子计划”，奥地利也在 95 年的时候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某一些成员国实行了安全限制的政策，可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欧盟陷入了瘫痪。同样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时候，有的国家威胁着说要退出欧盟，这对它们来说也是一种武器，因为这样它们就可以争取机会来重新讨论他们的职责、承诺是什么。比如 1974 年英国的工党政府就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事实上从逻辑上讲，《宪法条约》在某种程度上也承认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很显然，各个成员国的地位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作为一个成员国，它的基础就是它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平衡的，既然要享受权利就要履行自己的义务。随着一系列东扩的进行，我们会看到事实上存在某种灵活性，这区分了各个成员国的地位，正如雅克•德劳所说的这是一个充满变数的欧洲。尤其是在签订《马斯特里斯特条约》的时候我们做出了两个让步，首先承认一些国家有特权，另外还承认各个国家之间如果愿意，可以单独进行合作。这些特权地位，有两个例子可以说一下，从短期来说，有一部分国家在使用欧元方面，可以首先实行一个过渡政策，因为它们没有满足进入欧盟的所有条件，比如我们有《斯洛文尼亚条约》，他们希望在 2007

年的时候引入欧元。还有一些条约，也是在《马斯特里斯特条约》中签署的，它使丹麦和英国有一些的特权，他们至少现在不会参与欧元区，同时丹麦也不会加入我们刚才所说的外交与共同安全政策。这种多样性就使得我们在执行条约的时候，情况非常复杂。另外这种多样性还有一种表现，它受到大家的鼓励，就是我们所说的某些成员国“加强合作”。加强合作的体系大家都知道，它的基础大家都认识到了，刚才布朗热先生也说到了，成员国越多大家以同样的速度前进就越困难，条约的起草者认识到应该让一些更加有意愿的国家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扮演一种先锋的角色。25 国的联盟肯定有这种必要，就是使某些国家走得更远。这种体制是由《阿姆斯特丹条约》规定的，当然我们不能够质疑共同体的法律，另外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使所有的成员国都可以融入到加强合作的国家中。我们希望不论在什么时候进入欧盟的国家都可以进行这种加强合作，当然这在短期内会有一定的多样性，但是这对欧洲的总体来说是有益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同一性和多样性之间的冲突，对于欧洲的整个进步是有利的，我们会发现，这种冲突会越来越明显，尤其是随着欧盟的成员国不断增加，而且各个国家的情况各异，利益也不一样，这是肯定的。这对于我们的协调性甚至对欧盟的运作都会造成一定的威胁。最后一点就是这种多样性的存在，各国国情的不同，肯定会对公众的观点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会使欧盟在欧洲公民看来是难以理解的，而且欧盟的法律对他们来说尤其晦涩，这也会让公民在某种程度上失望。

交流评议

秦晖主持，布朗热，多尔会议发言后评论（约翰·帕尔莫，奥利维耶·多尔，布朗热，罗卡尔，库昌等）

秦晖：谢谢两位演讲者为我们作的非常精彩的演讲。两位所谈的一个核心就是在**欧盟统一过程中怎么样促进多样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确是实现人类的任何一种认同，包括超国家的认同和国家认同都必须面临的问题。多样性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多尔先生是研究法学的，我们中国人一讲欧洲的法学传统就要提到所谓的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但是我们知道尽管有这样法律传统的存在，但是今天号称在大陆法系背景下的法德与当年的拜占庭帝国的区别还是很大的，今天的英美与亨利八世时代的英国的差异也是巨大的。今天的英美和法德之间差异相对来说反而并不会更大，这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在消除多样性方面有进展，而确实是在处理有具有特性的各个个体的关系上有了非常多的进展。我们现在不再把多样性看作一个牢笼它是不可改变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多样性也不再仅仅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归根到底我们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都是有多样性的。以往的多样性经常成为矛盾和战争的根源，我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民族之间存在着强制同化的现象，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民族内部存在着强制反同化的现象，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个现象，16世纪的欧洲首先在每个国家内部都出现了内战，紧接着就出现了国与国之间的冲突。那么今天欧洲各国正是在尊重多样性，我觉得这种尊重的基础首先是尊重每个人的多样性，因此也就尊重由个人组成的共同体，尊重民族的多样性等等。如今欧洲各国没有了内战，出现了民族国家的整合，还出现了一种跨文化的整合，包括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以及波斯尼亚这样属于穆斯林文化的共同体。既然要整合那么多样的个体就必须把个体的部分权力让渡给一个共同体，过去是个人让渡给一个国家，而现在可能要让渡给一个超国家的联盟。实际上这几百年我们人类积累了很多这种智慧，这种智慧用我们中国一位学者在翻译一本西方名著时候用的译名《群体权界论》就可以体现出来，就是要划分个人权力和共同体的权力之间的边界。只要有了这样一种智慧，把一部分权力让渡给民族国家和让渡给一个超民族的、更大的共同体，我觉得两者的差别虽然很大，但绝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受到欧洲很大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是有一种导向的，我

们都很熟悉一首来自法国的歌曲，其中有一句话是“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过去曾经有人试图用剥夺每个人的自由方式实现，但是失败了，那么现在能不能以保护每个人的自由、每个人的多样性的方式实现呢？我祝愿这可以成功，我们要建立自由人的联合，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条件。

约翰·帕尔莫：听到让路易·布朗热博士提出的两个深刻的问题，我必须做出回答，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我们欧盟必须发展，在遵守原则的同时要面临应对的挑战，刚才在讲话中，发言者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回答，应该说欧盟在不断扩大，在今后也计划这样走下去，根据它的历史、经济、文化等等，推广欧盟的价值观念和他们的原则，使我们在整个欧洲内都来实现这种价值观念，这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大家都应该努力加以理解。在国际媒体中，有时候在亚洲的媒体中，也有这样的说法，说欧盟是不是野心太大了？它不断要求扩大自己的范围和实力。但是欧盟扩大的趋势往往不是来自于欧盟内部，而是来自别的国家，它们希望加入这个组织。因为这些国家在实行改革，在建设现代化，在发展自己的国家，它们希望可以加入欧盟，成为它的成员国，从中得到更多的发展动力，所以欧盟有时候也面临压力。

确实欧盟很多成员国都在经历一个社会变革的时期，都处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布朗热先生刚才说的非常好，确实我们在扩大的过程中，要有一定的限度，否则很难想象欧盟能有足够的能力驾驭这个组织。我们目前内部的问题就是如何根据我们确定的原则来管理这个组织，有的国家是成员国，有的国家是我们的邻国，有的国家执行的政策是偏左的，有的偏右所以欧盟从现在开始就要考虑和将来可能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处理问题，使它们可以接近我们的组织。

我认为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和邻国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特别要考虑到这个成员加入了欧盟以后将会产生怎样的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比较激进的，就是尽管欧盟的范围应该是有所限制的，并不应该无限扩大，但我们首先要吸收从地理位置最近的邻国加入欧盟。我们和很多国家都有很好的合作关系，像挪威、瑞士，他们不是成员国，但是和我们有很好的合作关系，我们有时候和他们签订合作伙伴关系等等，都是非常密切的。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够确定我们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将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有可能在谈判结束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对这些问题看得更清楚，因为我也不知道和土耳其的谈判将来的结果会怎样，是否会成功。我们在欧盟内部享有一个集体的权利，有些国家现在还没有成为我们的成员国，所以不可能完全承担一个成员国的责任，这只有在今后才能够慢慢做到，因为目前欧盟扩大的势头还是非常强劲的，在这个过程中，欧盟和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会不断加强。

现在我要提出一个问题，刚才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如果我们欧盟的扩大是有限度的话，像密特朗总统讲的，欧盟是一个很大的家庭，那就必须在它内部兼顾普遍的合作和各个国家的利益。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就到底这个限度建立在什么范围内比较合适，这个问题在欧盟扩大的过程中一直困扰着我们。在过去的50年中，欧盟一体化的势头随着欧盟的扩大、成员国的不断增加，也有起伏，我们确实把欧盟认为是一个整体，大家都维护自己的独立，但是是在欧盟范围内的独立。我们也和其他的国家都建立了合作关系，比如中国、美国，甚至和他们建立的合作关系更加紧密。现在我们的目的一是在内部的安全政策方面承担好自己的责任，另外在对外政策、对外安全方面必须尽量维护欧盟政策的一致性，对外采取统一的政策。内部问题和对外政策有时候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欧洲要实现对内对外统一。这是我们欧盟所遇到的最大的问题。解决好了这个问题，才能够使我们真正在政治上把欧盟建设成为一个符合《马斯特里斯特条约》要求的组织。

奥利维耶·多尔：没有什么反应和意见，我想重新明确一下布朗热先生提出的欧盟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我们看到，这些问题是对于我们联盟的前途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民众现在的讨论还非常少，不仅从政府的层面，而且从公共舆论层面上的议论还非常少，像罗卡尔总理说的

在讨论和公民投票的时候，我们看到人们缺少信心和兴趣来作这样的思考。

让路易·布朗热：多尔先生的发言我很感兴趣，其他人的发言也很精彩。我想讲三点，首先罗卡尔先生所提到的一点，不知道是不是有积极的结论，就是说我们东扩的压力并不是来自内部的，而是来自外部。我想如果真的是这样，就说明欧盟的模式是有吸引力的，我们应该响应申请国的一些要求，因为它们可能不一定满足所有的标准，但是我们要积极响应，因为这会带给它们更多的民主和进步。尽管如此，有这样一个扩大的进程，但还是要加以控制，这是被动的过程。法国前部长说“法国并不应该解救世上所有的贫穷”，法国的确应该有一个移民政策，但是应该有一个自主的移民政策，而欧盟的扩大确实是一个被动的进程。

第二点，我非常赞成这个说法，就是未来的欧洲必须统一。我们知道有一系列问题，我们只能通过团结的方式才可以应对挑战，这就解释了我们现在欧盟建设遇到的困难，我们现在必须采取行动，但是公众对此感受不深，他们只是感受到了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和平，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恢复和平，这种反映是非常强烈的，但是人们认识到必须要摆脱这样一种可怜的状况。而现在采取统一的行动来解决移民的问题的必要性，人们的认识还不够，而精英们和领导层在这方面的认识是很深刻的。应该把欧盟组织起来，使它运转的更好，而人民对这个问题认识得不是很清楚。

第三点，多尔先生在他发言的末尾强调这样一种紧张，就是我们建设的一个公共的集体，一个政治性的实体，与它的外交理念之间的紧张，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我认为我们必须区分一个真正的政治实体，它建立在一种民主的机制和舆论的认识不断加深的基础上，另一方面还要向外形成一体化，要处理这个实体同外部的关系，就是欧盟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所以欧盟不应该是中国长城这样的边界或者是马奇诺防线，应该从外部的关系来实现，所以我们要从另一方面来巩固我们政治的实体，这是从5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做的事情，同时还要建设一种一体化的关系，如同多尔先生所说的，相互之间渐进的关系。我从来没有否认，像英国人、德国人、瑞典人在货币统一方面都有一致的想法，但是除了货币，大家也会朝着一致的方向努力。它们的理由非常简单，就是在一些不平等条约中，欧洲人已经是形成了最一体化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货币的联盟，西班牙人、意大利人一直对此怀有恐惧，害怕把自己的货币加入到一种统一的货币体系中。有两位德国的政治家就说，那我们现在来组织一个俱乐部，排除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公众舆论就改变了，要求加入，最后你们看到西班牙和意大利都成为了统一货币的创始国。一旦有些国家要决定做某些事情，那么大部分国家都会跟着，可能节奏不一样，但是从长期的方向来看。我们一直是朝着这个方向做。

罗卡尔评论：我在这里发言因为布朗热先生提到了我们之间的一些分歧，我想告诉中国朋友们，你们从外部观察我们是非常重要的。50年代我是赞成欧洲的联邦主义的，我将继续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但是我也更加悲观，我想我们应该同意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比如刚才布朗热先生最后所说的，任何国家都不会同意在欧洲内部被单独看待。土耳其可能只有一个特殊的、单独的地位，这对土耳其来说这是一种侮辱，我们对此不会表示反对，我不再相信欧盟能够对一个新的成员说“不”，因为它从来没有确定一个积极或消极的标准。而在欧盟内部，一些国家从开始以来一直在玩“战略牌”，坦率地说，应该承认我们是在美国人来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英国人的游击战争挽救的。如果英法不和解，就没有法德的和解。英国进入欧盟是为了防止欧盟成为超国的机构，但是英国人得胜了，他们是最积极要求欧盟接受土耳其的。我也是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不是欧盟内部的原因，赞成土耳其加入。我想如此加强欧盟的机构，我们会失败的，我不相信所谓的“加强合作”，因为它太复杂。并且欧盟从来没有能力谈它的边界，因为欧洲是一个机体，作为一个机体要谈边界问题，只能是从军事上来保证，但是欧盟没有这样的权力，现在是各成员国自己负责自己的安全和防务问题。冷

战期间，法国人已经激怒了美国和其他一些盟国，有一半的欧盟成员国都不愿意有共同的外交政策，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可能就会造成自己和美国的对立。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是不是能够改变，也就是说从机制上欧盟不太可能形成一个自己的共同边界，但是我们也不能低估以前所做的努力。15年前，波音和道格拉斯决定合作，来控制飞机市场的80％，因为欧洲市场的竞争是受到保护的，而美国市场接受这种做法的，现在我们所有的政府是自己来控制自己的军事指挥。《伽利略条约》和《伽利略合作》对中国是很重要的，GPS是美国白宫的一个礼物，美国希望继续控制第二代这样的战略武器，但是一旦欧洲的工程师们参与“伽利略工程”的时候，美国人就拒绝他们的参与，这是战略性的。我们本来是可以和美国人共同管理这个世界的，但是欧洲人没有这样说，美国说我们不关心战略，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权利。马上我们就自己做了《伽利略计划》，还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说明。

所以我告诉中国朋友，当你们进入国际贸易组织的时候，欧洲已经站在你们这一边了，不是作为援助，而是某种非常重要的因素。欧洲已经在国际贸易组织中有自己的分量，可以强加一种规则，在人权和制造和平方面已经做得不错了。在这个世界上，现在武力的地位越来越小，欧洲已经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三年以前，人们还非常悲观，还说巴以和平是不可能的，这太困难了，他们相互仇视。我是作为一个少数派说这些话的，因为布朗热先生提到了我的观点，我是为了使你们理解这个问题，欧洲不是军事上得到保护的一个边界、一块领土因为我们没有这种能力，像乌克兰加入的时候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还有其他的国家，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没有能力设计一个领土内的欧洲。我们必须指出人权是我们法律的基础，还有就是遵守市场竞争的原则，现在欧洲已经在这两方面发挥了作用。有一本名为《欧洲之梦》的美国人写的书是值得看的，你们可以看出军事和外交使欧洲的弱项，而美国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不可能去做不可能做的事情，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了，在文明和贸易方面，我们要把欧盟建设成一个法律基础上形成的统一体。谢谢。

库昌：我非常高兴我们的议员先生给我们做的这些讲话，他从欧盟的视角讲了这个问题，当然这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的效应，但是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些非常有利的关系。我想土耳其问题会是另外一方面，刚才罗卡尔总理在这方面作了非常热情的讲话。我想当土耳其的谈判问题持续10—15年，法国就会对此进行全民公决，最终是由人民来决定到底是否让土耳其进入欧盟，甚至克林顿先生也参加“赫尔辛基会议”，甚至当时是因为克林顿先生去了才使人们达成了一致。我们感觉美国始终都发挥了它的作用，可以说还是美国人在国际社会上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他们有最大的影响力。当我们说到临近国的时候，我们只说到中、东欧的国家，刚才罗卡尔先生说到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的问题，可以说欧盟总是忽略了他的南部，就是地中海地区，但是事实边境是存在的，而在这里有人认为它的边境事实上比东部的边界还要明确，因为南边意味着非法移民，没有足够的和平，而存在暴力活动和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而在这条边界上我们却谈论得很少，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在15年以后，土耳其会发生什么事情，同时还有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我想我们对这些国家也应该进行一些思考，是否可以就此提出一些建议，建立一些比较好的临近关系，因为他们对欧洲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17年前巴塞罗那的会议上，人们就完全忘记了这个问题，我想这在方面，我们应该尊重一些原则。我非常担心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您刚才说所到的在15年前，您的前总统跟我说，事实上地中海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在地中海中我们也可以建立明确的关系。

3.3.4 法律文化的同一与多样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体现

朱力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我想讲的主要是三个问题，第一，关于法律文化的同一与多样性。第二，关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问题。第三，关于法律文化同一和多样性在中国的体现问题。当然这是很大的题目，我想只是谈谈其中面对欧洲的同行和在座的代表想到的一些问题。

先讲第一个问题，关于法律文化的同一与多样。

我想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法律文化是人类文化系统中独特的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构成，是人类在漫长的文化进步过程中从事法律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社会结晶和精神财富。我自己认为，这种法律文化的概念实际上既包括着观念形态的法律形象，也包括规范形态的法律现象，甚至还包括实践活动形态中体现的法律现象。所以，一般在中国学者中讨论法律文化，认为是法律制定、法律实施、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等等活动中间所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也是人们从事各种法律行动的行为方式和传统、习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自己同意对法律文化进行这样的定义，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法律文化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因素构成的。比如说，人们对法及法律现象的看法，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法的表现形式，法的结构，解决争端的主要方式，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法律技术水平，法律意识的特点等等。那么，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家历史发展阶段中，法律文化会有很大的差异，有时这种差异表现在法律文化的某个因素上，有时则表现在多种因素中。在法律文化各个因素中间，法律规范和制度的规定差别往往比较容易发现，我们看法律文件、文本的时候很容易区别出中国和欧洲某个国家的法律上的差别，而法律实践，特别是法律观念上的差别则隐藏在更深层，有时在由两个有不同法律文化的国家，虽然有大体相似的法律规范和制度但是由于法律文化的其他因素的不同，比如法的结构，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人们法律观念的差别，那么法律规范和制度的相似也是只是表面的，实际上它们对社会生活有不同的功能”。这是从比较广的方面给法律文化作一个界定。

同时，任何民族的法律文化，无论是观念形态还是制度形态的，都是世界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它发展的基本规律与其他民族的法律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大体上是一样的，其或多或少都是与其他民族法律文化相互影响、渗透的结果，而且越是接近现代和当今越是如此。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前天和昨天讨论的不同法律文化碰撞的问题。所以不同的民族法律文化越是鲜明，对世界的法律文化的价值就是越大。所以中国前些年有一句比较著名的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同时，越是世界的，也是越是民族的。我想这一文化发展的规律性同样也适用于法律文化。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任何民族的法律文化都不可能脱离世界法律文化而独自发展，都必须要吸引和借鉴世界各国优秀的法律文化成果。我想这是讲同一和多样所以不同的国家法律文化的发展和批判，也要批评借鉴其他国家的法律文化。这些批判和借鉴之所以可能，一方面所有的法律文化的发展在本质上都有相同的规律，因为各种法律文化又有其特殊的发展形势，它们是可以相互借鉴和补充的。这是讲补充和多样的，另一方面，一切法律文化包括中国、欧洲的法律文化，他们借鉴和继承都不可能是简单的原样的照搬，而是再创造重构的过程，中国也面临一个对自己法律文化再创造、重构的问题。

第二关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这两种文化的都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其实在短短的20分钟中很难说清楚。我讲这种影响，主要是讲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方面讲中国的。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实际上是在儒家的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有这样的法律观点，主张把人的教育放在中心的地位，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主张德治和法治的结合。利用“徒法不足以自行”这是孟子的话，主张“和为贵”，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这样的思想和作法。它不仅包含进步

和合理的成份，也是深深积淀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

西方方面，我认为是这样的，西方到了近代，随着教权、王权、贵族权的矛盾和冲突愈演愈烈，人们最终冲破了神学的禁锢，开始以人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历史。这些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使西方彻底的告别了中世纪的黑暗，并在法律文化上将神的光芒统统剥去，开始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在社会构造法治。西方法律文化从希腊、罗马以降，无论法律思想的实践还是法律制度的建构，我认为自古至今一脉相承的就是崇尚法治。其间可能西方虽然有过中世纪的反动，但是一旦以法制代替宗教之后，法律即成为国家和社会中“最至上权威”。正是在这种法律文化的不断熏陶下，西方法治观念才获得了持久丰富的资源愈加深入人心，并且成为西方人文精神深处的重要的部分。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正是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培育出截然不同的法律文化。所以，我想从中国这个角度来讲，可供西方法律文化吸取的是调整社会关系的知识和经验的智慧。对于西方在法律技术方面的内容，及其他们在反对封建专制斗争中所形成的法律思想，对他们发展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各种法律调整手段和技术和做法，特别是崇尚法治的信念等等，都是我们应该加以吸取和借鉴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把中西方法律文化中蕴含的优秀精神——对法治的信念和对德治的信念，通过实践不断地选择、冲突、融化、重组，最终整合成一种崭新、先进的法律文化体系，将制度的改革延伸到人们观念的变革中间，将现代法治精神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唯有如此，这样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在中国才能最终的建成。

第三个问题，将问题具体化一些。是关于法律文化的同一与多样在中国的体现问题。

我想今天坐在南沙的会议室里，在我们的东南便是香港，南边是澳门特别行政区，这里是中国的内陆，大概在这三个不同的地区，面临着多样的法律文化。香港的法律文化的传统是英美法系，我们也叫SK法系，在澳门的法律体系是大陆法系，或者是罗马法系，而我们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先讲一下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来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是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一国两制大家都很明白，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指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台湾、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它是中国从当今世界和自己的实际出发提出的解决和平统一问题的一项切实可行的基本国策”。大家知道，“一国两制”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和1990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获得了法律体现。我国政府已分别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对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我认为从法律的角度看，实行“一国两制”之后，中国法的主要部分，内地的大陆法仍然保持社会主义的制度不变，而非主体的部分，也就是回归中国以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仍然保持着资本主义性质不变，这不但在理论上给中国法的本质带来了“一国两制”的独特的情况，而且对于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也带来新的发展变化。

我想第一方面的表现是中国法律体系的多样性，一般而言，在单一制国家，由于只存在一个最高的立法机构，只有一部具有最高效力的宪法，而且法律体系中间所包含的各个法律部门的各种法律规范都产生在同一的经济基础上，具有共同的政治本质，奉行共同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所以一般而言，只是存在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比如说，中国在实行“一国两制”之前，存在着社会主义法律法系，那么我们讲这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反映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而且我们有一个指导思想，在宪法中叫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和原则的统一法律体系。这是中国主体内部的大陆内部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实行“一国两制”之后，在香港、澳门设立了特别行政区，香港和澳门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征行政区基本法原来的法律是不变的，而且这两个行政区享有独立的立法权，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制定法律。所以这些原有的法律，与特别行政区他们根据《基本法》制定的法律，都

各自构成相对比较独立的法律体系，也就是说，即具有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所以我认为，在实行“一国两制”之后，在中国一国的范围内实行了多种法律体系并存的局面。

同时，这两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应该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体系范围之内占据主导地位，它是根据中国宪法制定的，在特别行政区中起着根本法的作用。它们自己体现宪法的性质，所以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体系，是以大陆内地社会主义法律为主体前提的，即这种多样性的法律体系之间并不是并列的关系。因为这两个特别行政区无论在人口规模，地域规模、还是经济规模都不能与祖国大陆相提并论，他们的法律体系只居于从属的次要的地位。此外，这种地区性的法律体系也要受到中国主体法律体系的制约和影响。因为，无论特别行政区保留下来的原有的法律，还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后新制定的法律，都不得同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相抵触。所以，我认为存在着多样，但是也是同一的，这种多样性的法律体系是以社会主义大陆法律体系为主体的，多种法律体系并存的多样的新体系。

第二种表现的是中国法系的多样性。“法系”实际上西方近来的概念，是比较法研究中的最常用的一种分类概念和方法，即根据法律的结构、形式、历史传统等外部特征，以及法律意识、法律实践中的特点等因素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进行了分类。一般是将源于同一法律文化传统，在法律的结构、形式、法律调整方法和技术等方面具有共同特点的各个国家、地区的法律制度分为一个体系法系。如果从这样的法系来看，中国内地、大陆的法系是受大陆法系影响比较大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属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关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概念我想作一些说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划分不是中国自己的划分，而更重要的是，是法国著名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一个重要著作《当代世界主要法律体系》这本书中提出过这种分类，并进行过详细论述。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已经用 20 几种的文字进行出版，他第一次用文字对当代世界各国的法律进行了划分，他的划分其中比较有突破的一点是突破原有的仅仅作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这样的划分。他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苏联、东欧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所以在国际和国内范围里，学者们均未再对社会主义法系的问题继续进行研究。他们的法律有不同的指导思想，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他认为，它是并列、或者独立于大陆法律体系或者是英美法律体系的，他管这个叫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按照这个划分中国是属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没有争议的。如果从这个角度，如果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体系，这种分类仍然是有意义的。中国内地，大陆的法律就是按照这个法律体系的。由于实行一国两制，香港与澳门就保留了两种法律传统，就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两种传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由于他可以保留原有的制定法、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习惯法等，或者过去的清算法，只要这些法律不与香港基本法相抵触，都它都是可以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香港法律在传统上应该属于英美法系。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由于允许保留其原有的法律、法令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所以澳门法律在传统上仍然属于大陆法系。我们设想一下，将来与台湾统一以后，或者说台湾和平回归祖国以后，我们也可以允许它保留原有的法律，而台湾的法律按照传统的分类也是属于大陆法系的。这样，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中国除在法律体系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体系外，还存在着社会主义体系、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的传统，即多种法系并存的格局。中国是最为多样性的，这种多样性的法律文化。

第三个，就是中国法律体系内部结构的多层次性。当前，中国大陆的法律体系除了划分为不同的部门外，每一个部门之内还有不同的层次，即划分为不同的子部门和制度。实行“一国两制”之后，特别行政区的法律除了基本法以外，还有被特别保留下来的原有制定法和判例法外，还有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这将使特别行政区自成一个法律体系而存在。它们内部又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和制度。这样，从我国法律体系内部结构看，呈现出更为复杂和各有特色的多层次性。

交流评议

中方提问，多尔、帕尔莫回应

提问 1：我是李华，来自中国研究所。请问法国的奥利维耶•多尔教授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当欧盟成员国和欧盟法发生冲突的时候，是怎么来解决的？比如说谈到环保、标签法的时候，如果欧盟法与成员国国内的法发生冲突的时候，是怎么解决的？第二关于欧盟法与欧盟各国内公民的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欧盟是由很多的层次组成的，它有一些条约，之后有条例、指令、通告等等，我的问题是，公民作为一个个体，如果认为自己的公民权受到损害的时候，他可以直接引用上述法律的哪一类？

奥利维耶•多尔：首先我回答第一个问题。关于欧盟的法律和国内的法律的层次问题，或者是它们水平的高低问题。这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应该说这个问题在 1964 年已经获得了解决，因为当时是欧洲共同体的法院作出一个决定，在任何情况下，欧洲共同体的法律都要优先于各成员国的法律。由于在欧共体成立条约中，基本没有条款涉及到欧共体法律和各成员国法律之间的关系的这个问题，所以欧盟法院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介入，他们作出一个决定也就等于制定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欧共体的法律优先于各个成员国的法律。就在欧共体法院 1963 年通过基本原则的过程中，引用了这条原则，它宣布说："在各个国家的法官，无论法国、意大利等在审理案件中，发现自己的法律和欧盟、欧共体的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必须首先采用欧共体的法，而不能采用国内法"。

最后，我还要给大家补充一些细节，在很多国家的立法过程中，都有这样的原则，首先不希望看到欧盟、欧共体的法律凌驾于各国的法律之上，至今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特别是有些国家的宪法法院和最高法院一直拒绝承认欧盟法律应该优先于本国法律这样的一个原则，他们认为欧盟的法律不能优先于本国的宪法。

第二个问题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当每一个欧盟的公民，感到自己的某一项权力受到国内法的侵犯，他的某项在欧盟中应该享受到的权力受到国内法的侵犯时，他可以把这个事情提到本国的法官面前，进行申诉，要求实行欧盟的法律。现在是这样，各国家的大法官同时也是欧共体就是欧盟的法院的法官，所以他应该判定欧盟的法律优先于本国的法律，应该确定欧盟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力。

提问 2：请问奥利维耶•多尔，您说到了欧洲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权法院，到底这两个法院有什么区别？

奥利维耶•多尔: 这两个法院是属于两个不同体制的法院，最高法院是属于欧盟的，是 25 个成员组成的，最高人权法院是属于欧洲委员会的，是由 40 多个国家组成的，是另外的组织，俄罗斯也是属于这个组织的。欧洲最高人权法院为什么属于欧洲委员会呢？因为它是根据欧洲人权公约建立的，欧洲人权公约是由欧洲委员会谈判签署生效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法院。

现在我来谈这两个法院的根本区别，最高法院是在卢森堡，在欧盟产生的纠纷都由它来处理，无论是经济、社会、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产生的纠纷，或涉及到欧洲的人权交流等等，都是由欧洲最高人民法院来处理。

欧洲人权法院是由专门研究人权的法官们组成，他们的任务是审议、监督任何个人，或者任何另外的国家是否侵犯了由欧洲人权公约所规定的任何一项权力或任何一项自由。

插问：是否对俄罗斯有管辖？

奥利维耶•多尔: 当然。对俄罗斯有管辖权。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有意义，事实是，欧洲人权法院对俄罗斯实行着人权管辖权，前一段时间还通过了对车臣地区人权的状况的跟踪。

提问 3：两位欧洲朋友谈到欧洲法律的一体化，我想这一点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这在世界法治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整个世界也对欧洲法制的严格性给予了很高评价。但是在我看来，在实践当中，欧盟的法律实践不是很顺利，不是那么有效，这方面有没有存在很多阻碍、矛盾和问题？我想请教欧洲朋友。我举一个例子，为了推动欧元的出台，欧元区签订一个欧元稳定增长的公约，其中一个是财政赤字不能超过 3%，这个应该是欧盟成员国应该遵守的，如果超过要有连续三年的严重的惩罚。而前几年，连意大利、法国几个国家都突破了，遇到这样的问题，请两位欧洲朋友看看这个执行当中的问题，以及目前的妥协情况。当妥协产生时如何保证欧盟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以及尊重法治？而且这个种情况可能还在蔓延，葡萄牙甚至可能其他国家都不遵守这个公约，这个事情怎么办？请教两位欧洲朋友。

奥利维耶•多尔：这是非常好的问题。但是，我应该跟大家讲，法律不是万能的，在我看来欧洲建设始终遵循法治的轨道进行，欧洲的建设也向每个成员国提出他们应当承担的义务。您提的问题实质就是在执行欧盟的法律中，要突破的极限是什么？其实回答也是很简单的，这要看各个国家的情况。现在问题是，不是所有的欧盟成员国，但是有些欧盟成员国在这方面存在着问题，还有一些是声称自己是非常亲欧盟的、非常推进欧盟建设的成员国，在执行欧盟的法律当中，表现出非常缓慢和懒惰的状态。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感到也不是很自豪，就是法国，法国在执行很多欧盟法律过程中，是起一个拖后腿的作用，尽管最近法国政府也制定了紧急计划，在减少预算赤字方面都作了计划，但是还是拖了后腿。

您第二个问题，一个成员国不执行欧盟的法律，我们怎么办，有什么办法来对付？当然，这个解决的办法应该从两个层次来看，一个是从政治层面来看，一个国家既然加入了欧盟，他就要承担相应的政治义务，因为没有任何人强迫你加入欧盟，没有人强迫你进入这个大家庭。所以这个责任应该是各个政府来承担，各个政府应该有意识，应该缩小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差距。解决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从司法方面的程序。因为在欧盟组织内部，有一定的强制程序，迫使欧盟成员国履行自己应该承担的义务，不这样的话，就对这个成员国实行制裁。刚才您提出加入欧盟区的标准，简单就是马斯特里赫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加入欧盟。刚才提到德国、法国没有遵守有关的标准，那么作为欧盟委员会就可以考虑启动追究这两个国家的责任，或者对它们执行制裁的程序。但是为了更好的解决问题，现在欧盟委员会只是发出呼吁，呼吁这两个国家表达出最大的政治愿望，因为他们是最大的欧盟成员现在这个问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约翰·帕尔莫：我想就奥利维耶•多尔先生的回答作一些补充。在处理财政问题的时候，欧盟的成员国，特别是欧元区的成员国，必须遵守一个特殊的程序。这个程序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核实、证实欧元区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是否大幅度的超越了《马斯特里赫条约》的标准，现在，这个判断应该由欧盟委员会做出。对德法两国的情况，欧盟委员会已经作出了判断，结果是德法两国大大超过了这个预算的标准，所以要求他们尽快改进。但是，在《马斯特里赫条约》中，欧盟委员会是否对超过标准的国家作出制裁，是留有余地的。这也是由欧盟委员会作出决定，但是在作出决定之前，也要听取全体成员国的意见，要集体作出一个决定。所以现在有两个问题还是需要讨论的，第一，《马斯特里赫条约》有关一个国家在经济问题上超出有关标准，对它实行纪律措施，这个纪律措施的灵活性到底是多少，这个问题没有定出来。第二个问题需要讨论的是，欧盟委员会在处理、处罚一个国家的时候，它的责任还不是很清楚，应该给它一个更清楚的责任，无论被制裁的国家到底是大国还是小国。

提问 4：我是来自商务大学的朱贵常，我想请问约翰·帕尔莫先生两个问题。首先我有一些疑虑，面对各个成员国各种复杂的情况，从未来来看，它们是否真能有效地遵守欧盟的共同法律，是否能在欧盟范围内实行共同的法治？而如果欧盟的普遍法律并得不到真正的执行，这

样的法律不是失去了意义？另外我不太了解你们欧洲政策中心，您是否可以就它的性质和操作方式作一个介绍。

约翰·帕尔莫：现在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我们欧洲政策中心这个组织是独立的组织，下面也设立一个实体，主要任务是在欧盟制定政策中提供一些建议、咨询，帮助一些评估，在政治、法律上没有任何的授权来影响欧盟采取任何的决定，只不过我们的工作是为欧盟在采取一些政治决定的过程中提供一些帮助和咨询。

现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也是非常难回答的问题，首先我感觉到您对欧盟将来实行法治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我不太同意您的说法，就是今后欧盟很难实行法治，因为我可以给你举出很多的例子。比如在英国，像英国的一些法律，英国的政府实行的一些政策，像环保等，只要不符合欧洲法院、欧盟的政策它都进行了调整，在很多的成员国也都出现这种情况，只要它们的法律与欧盟出现了不一样的地方，都进行了调整。

您说的第二个观点我同意，如果一个适用于大家普遍的法律，得不到遵守，这个法律就失去了意义，也就失去了权威性。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在各个成员国之间，各个成员国政府之间达成某种一致。我们首先要达成一致，首先问自己，我们是否需要这个法律，如果大家都需要这个法律，我们就制定这个法律，然后大家都遵守。

最后，我想说，在这方面，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种种迹象都表明，越来越多的成员国、越来越多的成员国的人民都看到我们共同承担的义务，看到我们共同合作的价值，也就是在法治的情况下合作的价值。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后在制定法律和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都会做得更好，毕竟我们现在处于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

提问 5：我想向两位欧洲的专家们提一个问题，主要是欧盟和 WTO 之间的关系。欧盟会为自己的代表提出一些意见，因为要扩大自己的权限。不管怎么样，欧洲委员会是有广泛的民主基础的机构，可是在跟 WTO 之间的纠纷上，例如 96 年的香蕉官司的裁决，欧盟吃了败仗，打输了官司，因此每一年要继续向加勒比国家优先购买他们的香蕉，欧洲联盟要赔出很多的钱。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不受任何民主议会监督的机构，它的裁决往往是在专家们的秘密会议上作出的裁决。可是它竟然可以超过具有广泛民意的欧洲联盟，我不知道从政治、法治的角度怎么看这个问题？

约翰·帕尔莫：我想我听懂了您的问题，先回答第一部分。首先必须明白，你的政府无论以多么民主的方式选出来，但是在法律面前，在别人的裁决面前，也要加以服从。应该说这个裁决有理由让你接受，不是非常武断的，强加给你的。欧盟经常改变自己的政策，包括美国也是经常调整自己的政策，如果本系统内最高的机构作出的决策是正确的，你就要遵守。现在面对更广泛地实施的法律，我们认为应该优先于国内法，这是不容置疑的。还是您提出的，欧盟委员会是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选举出来的，这一点没有错，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给您补充更加详细的情况，它不是完全的直选选举出来的，是由各个政府组成的，这个政府是由民主选举出来的。

冯仲平：我给约翰·帕尔莫先生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欧洲宪法条约出现之后，不仅欧洲人对欧洲未来的发展有很多的评论，欧洲以外的其他地方，包括中国也有议论。我想就这个问题，请教约翰·帕尔莫先生，请他看一下，欧洲以后是否是多速发展的欧洲，即多种速度向前发展的可能性。如果是的话，这样的多速，哪些国家会快一些，哪些国家会缓慢一些，哪些领域会快一些，哪些领域会缓慢一些？

约翰·帕尔莫：您提的问题是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在欧洲内部也在进行广泛的争论。现在出现法国和荷兰公决否决欧盟宪法条约的情况，在欧盟内部引起了一场政治危机。如果这场政治危机使欧盟的前进脚步停滞了，我认为是不对的。目前 14 个国家都通过了这个欧盟宪法

条约，欧盟的前进发展才有了一个完整的战略方针。但是要通过这个宪法条约，使它生效，我们需要 25 国一致的统一。

关于为什么法国、荷兰公决否认这个条约，我想在座的法国、荷兰朋友比我更有资格解释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法国否决这个条约，我觉得不是对欧盟整体的否认，绝对不是。因为从各种分析结果表明，在法国也包括在荷兰，大家否决欧盟宪法条约，最大的原因就是对本国政府，以及对本国政府实行的政策表达不满。当然，有人会问，为什么对本国政府的不满，会导致会伤害欧盟宪法条约呢？是为了给它一个否决的态度，我认为这个也很好。我想大家应该考虑一下这个宪法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至少大家发现欧盟的内部政策和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已经是密不可分了。当时，法国进行公决的时候，我在看电视的现场直播，看到结果出来的时候，很多投反对票人们手里也举着欧盟的旗子，也在表明自己的意见。我们不是反对建立一个强大的欧洲，而是应该采取一个别样的政策，改变它采取政治决定的程序。

刚才，您还问到我，今后是否欧洲会出现多种不同的发展速度的欧洲。我想从政治层面来讲，各个成员国都必须履行自己面对欧洲所承担的义务，就比如说欧元问题，在很多国家，比如说在丹麦、英国等等，他们是否加入欧元区，我们没有给它们设时间的限制，这个加入的快与慢取决它们国内的形势。但是就整个形势而言，对欧盟所作出的承诺总要作出兑现，这个兑现的时间长短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如果你们让我在这里预见一下的话，我可以对大家说，我认为欧盟宪法条约将来会被通过的，可能被 27 个国家一起通过，包括新加入的两个国家，这个时间可能在 2007 年底，或者再晚一些，因为我感觉到各个成员国都希望欧盟能够真正做出一些事情来，有一些成就，特别是在有些国家的情况有了改进之后。最根本的是通过欧盟这样一个条约，在欧盟拥有更多成员国的情况下，获得更好的发展和运转。

朱力宇：谢谢主席，我们还是给奥利维耶•多尔提出两个问题，与我刚才讲的法律文化、法系有一些关系。大约在 2001 年的时候，德国的一个法学教育机构，在中国的法官学院对一些法官进行了一些培训，培训的内容之一是组织一个模拟法庭的审判，案件的事实、案情都是一致的，最后欧洲来的老师告诉他们，在不同的法律文化传统的条件下，也就是说，具体到欧洲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不同的传统之下，这个案件有不同的判决，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判决那么，我想问的问题是，这种不同的传统，根据奥利维耶•多尔的研究，因为有些是来自欧洲大陆的教育，因为教育的背景不同，思维的方式不同，对案件的判决是否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个问题，我刚才在发言中讲到，对我影响较大的法国人写的当代世界法系里，对欧洲的法律没有作简单的划分，至少又划分出一个法系，北欧国家的法系，指瑞典、丹麦、挪威这样的国家法律的传统，跟大陆也不一样。如果我们不做大陆、英美法系的简单两分，那还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传统。另外，按照中国的理解，原来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波兰、捷克、斯洛文尼亚已经进入欧盟，它们在法律文化传统上，对欧共体的法律作出判决的时候有没有影响？我最想知道的，在大会中讨论的是，正如前天的新闻所报道，就是欧盟对土耳其加入欧盟敞开了大门，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土耳其的国家大多数人都信仰伊斯兰教，如果有他们的法官进入这个欧共体法院，您能预计一下这个影响有多大？

奥利维耶•多尔: 谢谢您提出的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也是很好的问题，他提到三个方面，一个是各个国家不同文化对欧盟体系产生的影响，还有不同的国家加入欧盟，来自这些国家的法官在法院对案件的审判会不会产生影响，产生对立的情况。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出现审判结果完全不同的情况是不大会出现的，因为法院在审判的时候，通过的是欧洲施行的法律，所以不会出现一个法院和另一个法院判决完全相反的情况。关于您提出各个国家的不同文化对法律的影响，还有来自不同国家的法官的组成对法律的影响，我想这个会有的，而且这也是一种必要的现象。因为由多国的法官组成法院，还有由多国的律师处理法律事务，这

是欧盟法院的基础。因为欧盟的法院高于任何成员国的法院，所以它要求在欧盟法院工作的法官，要熟悉各个法律的体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缺乏资格担任法官。所以，在法院的审理过程中，来自各个国家不同法官的协同工作，以及来自不同法律文化的融合和结合，能比较准确的反映出实行法律过程中的逻辑，比较能正确地作出判决。

关于土耳其的问题，您谈到土耳其的加入会否对欧盟产生影响，因为首先我不敢说土耳其一定能加入，就算一定加入的话，这种影响也会是有限的。它的影响主要是从法律，而不是从宗教方面，因为它是世俗国家，一旦入盟，它的法官加入欧盟法院来工作，也是可以的

提问 6：我是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吴贤。我本人是研究欧洲一体化的。我觉得走了这么多年，竟然出现了一个宪法性的条约，我觉得很了不起。我本人作为一个外在者，对它的被否决也感到很遗憾。所以刚才约翰·帕尔莫说，本世纪的头十年还可以搞第二次的投票表决，我觉得从法理来讲，只要有一个成员反对，这个条约就死亡了，但是从政治愿望来讲，我肯定希望它通过。我想问约翰·帕尔莫先生，怎样可以做到第二次的投票，从法律程序上，是否启动第二次首脑会议，还是原封不动的进行第二次投票，这从法理讲不太通。

第二个问题，欧盟在政治层面上或者在法律层面上有什么意向性的东西可以拯救这次宪法失败，是不是还有什么希望？本人在 7 月份参加萨尔斯堡的论坛，有很多欧洲法的专家持在法律上已经死亡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我希望欧洲人可以想出一个办法，促成这个问题的解决。**约翰·帕尔莫**: 我希望这个问题，大家更多地从法律的角度去考虑，如果是政治方面的问题，就由我来回答了。这些问题都是提得非常准确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大家新一轮的讨论，应该是解决的时候了。我能做的是，向你谈谈我个人的观点，预见一下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发生。

首先，我想一些欧盟成员国将继续完成他们的批约程序，我本人希望一两年内有国家赞成这个条约。但是，如何处理像荷兰、法国已经发生的这种状况呢？如何处理这种表决结果呢？我想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在目前欧盟宪法条约文本、文字不变的情况下，加一个议定书或者声明，对这两国人民所产生的误解作一些说明，特别是对法国要说明，欧盟会履行自己在社会福利、经济方面的问题做出的一些承诺。因为就是在这些方面才影响了在法国的投票结果。第二种方法可能是比较激进的办法，就是把欧盟宪法中影响做出决定的程序给删除，或者干脆撤掉。也就是说，原来要求在每一个成员国都同意的情况下，欧洲才可以做出相关政策的决定，如果有任何人反对，就必须撤除，今后是否可以做出改变，也就是以后做决定时，不一定需要百分之百的人同意才可以通过。还有人提出另外一种办法，就是重新启动一个谈判程序，重新制定一个条约、公约的文字，由各个成员国的议会来进行通过，然后在政府间召开一个首脑会议，25 个同意就可以了。我个人认为，所有的这一切都取决于欧洲的政治气氛，如果说，现在大家开始一种新的对欧盟宪法的辩论，必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像 2007 年 6 月法国大选之后，意大利的新政府也产生了，德国、波兰等等都是新政府，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有可能还有机会就欧盟宪法的进行讨论而通过。

最后一点，我想指出的是，这个宪法条约内有很多是很好的，有一个叫《欧洲公民权力宪章》的条款，还有加强外交作用，在决定政策时加强它的有效性等等，这一切都和欧盟各个成员国的利益是没有矛盾的。在大讨论中也没有对这些有意见，只是对某一项有意见，而不是对整个政策有意见。

3.4 二十一世纪：欧洲如何发展？

3.4.1 欧盟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伊沙贝尔·迪朗（比利时前副总理、参议员， 绿党联盟主席）

比利时是一个小国，虽然它的面积很小，但是有不少欧盟的机构，比利时确实是欧盟的创始国之一，而且60年来它一直试图扮演自己的角色，它的角色既谦逊同时也富有建设性。我们国家可以说是一个联盟，也是内部相互妥协的结果，它有着多种多样的文化。可以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欧洲建设的实验室。

今天我想谈谈可持续发展，在发言中我似乎也听大家说到了可持续性发展，就是说保持资源可以不断地被使用。我本人是比利时绿党的主席，也是欧洲绿党的成员。在这个领域里很多学者作了很多努力，去思考目前地球面临的挑战。大家应该意识到我们的资源有一天是会枯竭的，而且我们的地球是独一无二的，两天以来我听到很多人不断说到这一点。我要说的跟卡蓝默先生说的第三个挑战是一样的，并且吴大使的第三个观点也谈到，如何管理资源，保护我们的地球。一方面我们是开采资源的人，同时我们还要对资源负责任，因为我们依赖这些资源，不仅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还要为我们后代的利益负责任。

先来回顾一下历史，事实上我们是最近才意识到资源是会枯竭的。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承认欧盟作为一个机构来说，并没有什么新的建树，但是欧盟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实现和平、实现人员的自由流动，实现自由，自由流动是欧盟的一个重要目标。在30多年以前，我们就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资源枯竭的问题会构成威胁。接下来是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我们引入了一个经济发展模式，它将社会公正与保护环境相互融合。有一个报告者叫布鲁特兰，是当时的瑞典总理，他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观点。92年在里约热内卢的大会上，也就是所谓“地球峰会”上，可持续发展这个观点就成型了。

什么是可持续发展？我们一方面要满足现代人的需要，同时不要剥夺我们后代在能源方面的需要，并且可持续性发展应该能够将经济、社会、生态有效地联系在一起，它所实现的经济增长应该能够促进社会发展和保护环境。经过一系列的国际会议，这种观点才逐渐成型，欧盟也逐渐在它的条约中引入了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概念，尤其体现在99年签订的《阿姆斯特丹条约》中。接着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个针对人口变化、气候变暖的长期战略。刚才杰罗姆·维尼翁先生也提到了人口的问题，比如说公共卫生、改善交通体系，以负责任的态度去使用自然资源等等。在这里，欧委会选择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方面，比如说在定价的时候要反应出经济活动中的环境成本，同时我们还要加强对科技的投资，改善通讯，这样可以动员我们的企业和公民。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欧委会提出了一个新办法，就是在欧盟的政治活动中，我们应该找到一些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概念，同时欧委会还强调，在每一次做决定之前，都应该就经济、社会、环境的成本和利益进行一个评估。另外欧盟还希望这种可持续性发展有一个外部层面，比如说如何更好地管理全球化，全球的贸易也应该有利于可持续性发展，在各个层次都有一个更好的治理。这就是目前的一些情况。

最近几十年以来，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起源和发展，我相信中国一定有自己的考虑，尤其是目前中国的经济正在腾飞，我也知道中国在讨论“可循环经济”，我想这和我们说的“可持续发展”是不谋而合的。当然我们也遇到过一些失败，有些人对此保持缄默的态度。要知道生态可持续发展并不仅仅只是富国所关心的问题，如果我们看一下北部国家的经济，包括美国、欧洲，以及南部经济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由于北部国家的消费很大，他们将产生有害物质的生产过程输出，这就造成了两极发展，很多时候是发展中国家为已经实现工业

化的国家的发展付出环境成本，并且事实上，受到富国能源消费所带来的地球变暖这一问题的危害的，首先是太平洋的那些小岛。由于南极的冰川正在熔化使海平面上升，很多的小岛都消失了。再比如新奥尔良，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撤离，他们为美国面对气侯变暖的不付责任的态度付出了代价。美国的学者已经说到了飓风产生的原因，而美国面对气侯变暖的现象不愿意付出任何责任。美国是世界上释放温室气体最大的国家，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的意图。在非洲很多地方都已经沙漠化了，而且当地的居民生活在饥饿和贫困中，我所说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并不仅仅是富人所担忧的问题，穷人正在身受其害。

现在我想指出在执行可持续发展这个政策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四个。

首先是我们行为的层面，这个层面肯定是多层次的，因为事实上如果要解决地球变暖的问题，我们不能仅仅从地球的层面解决，首先要经过国家的范围，我想我们的行动应该首先尽可能大的国家执行。140个国家签订《京都议定书》，在我看来，我们很快就会讨论第二份《京都议定书》，因为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世贸组织在经济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与《京都议定书》的目标是不成比例的。事实上环境治理始终都是滞后于经济问题的，我们不能只在经济好的时候才注意到环境问题。如果美国不加入《京都议定书》的话，其他国家的努力都会归于零。但同样在国际层面也对欧盟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在一些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国际海洋事务组织中，欧盟都没有作为一个机构出现，更多出现的是成员国。我曾经参加过几次国际会议，那时候我就意识到事实上每个国家首先都会捍卫自己的利益，根据他们国家自己的利益来建立一些联盟，这样会削弱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但是我想如果要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行动的话，我们需要要在各个层面采取统一行动，比如说关于垃圾、农业、交通、合理使用资源等等。同时在欧盟的整个决策过程中，会有很多影响势力，比如不少成员国的工业都受到了欧洲关于环境政策的限制，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势力，比如工会，他们会提出就业的问题，同时我们还面临着各个协会以及公民，但是他们的力量稍微小一点。

第二个问题是决策的问题，在欧盟可以说作一个决定是很慢的，而且非常难。部长理事会常常不是一个欧洲建设的机制，事实上各个部长捍卫的都是自己国家的利益，因此在这个机构里，我们很难达成一致。我想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比如在欧盟层面，我们希望对那些已经作废的油船进行立法，因为它们在很多欧洲海面上产生了赤潮，有一些离海岸远的国家比如卢森堡就不以为然，还有一些国家如果造船业很发达，它们就不会支持这个立法，因为他们觉的采取了这个措施会让他们失去很多市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国家利益的不同。另外就是化工业，如果在这个领域就业的人很多，这个国家就会反对相关的立法，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国家在这方面的工业受损，正如我们在法国所说的一个波兰的技工或者是中国工人到了欧洲的市场就会给就业造成压力。

第三个问题是评估的问题。我们要找到这个办法不容易，其中有一个参数，就是将外部成本引入到内部成本。比如运输业中，如果把外部的成本引入其中，它的成本就会上升3—5倍，要知道如今用火车来运输，它的成本要比公路高。然而目前我们用来运货的火车的速度是170公里/每小时，并且我们还希望不要有储存式的运动，希望可以及时运输，把北部新鲜的虾及时运到欧洲的市场。

第四点我们必须提到能源问题，要知道现在每桶石油的价格已经超过了56美元。我想这对于后代也会产生一些问题。虽然我相信核能会长久持续下去，但事实上现在废料的存储也出现了问题。我们正在试图使我们的能源多样化，比如说风能、生态能、天然气等等，我想这些都是我们未来的能源，我们也应该往这方面走引导我们的生产者，当然要进行选择的话，将它们一下子引入到我们的经济体系中是不容易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要提出的一个原则就是谨慎保护的原则。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选

择的后果是什么的话，就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我想这就是谨慎原则。在我看来目前这个原则还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比如在涉及到转基因的问题上，比如说在涉及到保护生态多样性的问题上，都没有遵守这个原则。同时我们还要在一个比较长远的基础上看问题，这在欧洲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眼前，我们希望可以及时产生一些效益，这就是我们欧洲民主所遇到的一些挑战。我想对于你们来说也是一样的，或许我说的太快了。我讲了一些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欧洲的观点，我想这对于你们或许是有用的，因为现在中国发展的问题很大或许正像卡蓝默所说的，我希望大家所做出的努力对今后来讲会是有利的。

3.4.2 欧洲的公共服务如何？

皮埃尔·博比（公共服务系统协调委员会）

在欧洲所有的国家，无论词汇表达与使用的概念有怎样的差异，地方权限等级（地方/大区/国家），有怎样的不同，服务组织的商业或是非商业性质，所涉及的角色类型（公有/混合/私有/联合）是怎样的性质，公共权力部门认识到一点：有一部分社会活动是不能仅凭一般竞争法或市场规则来开展的，而是需要依靠某些特殊的组织、调节和改革，以达到以下目的：

保障每一个公民享受到公民基本权益（受教育权，生命健康权，社会保障权，交通运输，交际/信息 等等）。

保证经济、社会和地区间合作的良好运行，加强社会团结建设，发展社会往来，发扬相关团体的集体利益。

为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着眼于长远利益和后代的利益。

这些公众利益的意图和目的是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欧盟所有成员国的社会特点，并且还是欧洲的共同价值观。所以，公共利益服务体系代表着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经济、社会进步整合为特点的，创造了一个市场化社会经济体系的，欧洲社会模式的关键性元素。

自由化战略

1957年的《罗马条约》中就谈到了关于公用事业的问题。它涉及到建立一个公共市场，逐步消除商品贸易的壁垒。然而关于组织开展公用事业的活动还停留在每一个国家内部的历史框架中运行，建设统一的，协调一致的欧洲公用服务体系并未被提及，而且尚没有被考虑。只有73号条款对交通运输行业做出了“公用事业”的初步说明，在第86条条款中指出，为了“整体经济利益服务”，可在特殊条件下违背竞争原则。但是，直到1986年《欧洲统一行动纲领》的签订，该条款才发生法律效力。

统一市场的宗旨建立了一个使外来人口得以欧洲化的欧洲机构，各行各业，国家经济利益服务部门（信息、交通、能源）。

四种主要的自由流通（人口、产品、服务、资本）在1980年到1990年的重要变革过程中取得了反响：技术革新、经济社会的国际化、需求的多样化和地区化、公用事业的收益、部分工业和金融服务集团的战略、新自由主义理论影响的发展、竞争的功效，等等。

对那些早在其成员国历史上就被定义了的公用事业部门，欧盟正逐步实行国家组织和调节形式。自由化的战略建立在各个行业中引入竞争的基础上，市场的逻辑、经济自由主义和对早先的地区垄断（国家，区域或者地方）的质疑，同时瞄准了突破国家之间的边界，和进一步进入效率到那些处于垄断地位，受保护的行业当中。

因此，在行业网络中，不应该实现完全的自由化，也不应该实行欧洲共同体法下的自由竞争。存在于几个大集团之间的寡头卖主垄断的竞争，会导致新的集中化，使利润产生并且实现再分配，也导致利用者的损失。自由化在短期内可以带来超增的加值，市场能够给与有用的指示，却会在长期造成损失，这是市场调节失灵的表现。自由化有利于那些有能力对小型消费者们实施“市场权力”的大买家。自由化会有损于公平交易和价格平衡的实现。自由化既不为地方，也不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负责。它还能够导致社会倾销的形成。

控制与调节

针对以上这些状况，欧洲的法规的出现，是起源于无数次争论，行动者的创始，欧洲网络如 “企业公共参与共同经济利益企业欧洲中心”（CEEP），欧洲工会联合会（CES），

公用事业欧洲委员会(CELSIG)，社会运动，特别是1995年11-12月间，都为发展有制约的、有组织的、有调节的自由化做出了贡献。欧盟通过建立新的概念和规范来完成自由化的部门草案。由此，我们有了首先在电信机构、随后在邮政部门以及今天，在电力部门使用的“一般服务”这个概念，来保障公民和居民的一部分基础服务。

1997年6月阿姆斯特丹的欧洲委员会通过了一条新法令，法令源自于欧盟地理信息系统作为“共同价值”的组成部分，强调了它们在发扬“社会和地区团结”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且要求欧盟及其成员国保证“完成他们的任务”。然而这项法令不能成为一部实际的衍生法的基础。

*公用事业（CEEP，CELSIG，AITEC）的欧洲网络的组织者，《公用事业》的作者，弗拉马利翁出版社，1997，《重建共同活动》，syros-alternatives 经济出版社，1998。

2000年12月尼斯欧洲委员会宣告，欧盟宪法的第三十六项法条，虽然未开放一项针对公益事业的欧洲法，但指出公益事业对公民和居民的重要性。

它的第三部第122条法令的宪法条约对第36条法令作了补充和强化，一方面，在第三部分开头，将其变成为“通用的实施措施”在所有的欧盟政策和欧盟运转过程中都具备可实施性（包括了竞争和内部市场），另一方面，使之成为一项保障公用事业的生存，运作和财政的衍生法的基础（一种欧洲法律），最后，明确地使之成为国家权力和地方权力自由度的参考出处。

我们可以援引两次交往（1996年和2000年），欧洲委员会的报告（2001年），环保书，（2003年）和白皮书（2004年），《欧洲的公益事业》；欧洲共同体的法庭的法律原则，自从1993年到1994年，它就规定了公益事业高于其他竞争的一般规律的目的，任务和组织形式；欧洲委员会寻求补充自由化的指示性部门道路，通过稳固的一般规则SIG。

公益事业保障

因此，形成了今天的明显的不平衡局面，一方面是竞争和自由化，二者的倾向在今天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是公益事业的目的，常常出现针对前两者的矛盾冲突。对于行动者来说，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程度上的不稳定与不安全：

在司法方面，关于共同体的标准等级，关于它们的解释和实施。

经济上来讲，缺少一种规范约束来确保长期的财政状况和投资，以及对履行公共义务的报偿。

关于辅从性原则的实施，公共事业权威部门的权利和责任分属不同层次水平（地方，地区，国家，欧洲）。

政治方面，关于公益事业纳归到欧洲整合的过程中来。

今天，欧盟已经定义出了一个新的，通用的公益事业的概念。从此以后，它包含了三点达成一致的因素：

- 透明公开的原则：实行的方法对目标应该是有比例的，不应在另一部门或行业引起不应有的竞争。

- 辅从性原则：应该将统一欧洲共同准则和基于国家、地区现实情况的应对挑战的道路多样性相结合。

还有一些因素也成为辩论的对象，特别是：

- 实施竞争规则的领域范围（是否是经济服务）
- 竞争法和公益事业部标二者之间的共同标准的等级差异
- 国家和地方职权部门定义和领导公用事业的自由度
- 投资和公用事业义务的长期财政运转

- 调整和公共管辖的模式，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部门
- 评估所取得的成就
- 欧盟内部规则和OMC（AGCS）的协商之间的关系

所以，今天，其成为关于在欧洲计划下发展社会力量、组织和公民网络的干预，成为了公益事业的欧洲学说，并且欧盟也表明自己强烈的政治意愿：

- 重新平衡公众利益与竞争的关系，保障所有的SIG，
- 发展SIG的生存保障（定义，公共权力部门的角色，管理模式的自由选择，长期财政保障，调节，估价），
- 使公众利益的目的欧洲化，在某些部门的服务。
- 修订自由化的部门指令基础，
- 根据需要来对公众利益和公共服务进行估价，
- 组织世界级的公用事业交流，使公用事业更好、更全面地为共众所接受。

(齐文译)

3.4.3 欧洲的社会模式是什么 并回答欧洲福利病问题

杰罗姆·维尼翁（欧盟委员会，欧洲社会保障与一体化负责人）

我谈的是欧洲的社会模式。今天上午我们已经谈到了欧盟的一些机制方面的问题，那么现在我想谈另一方面的问题，人们可能对它关注得不够，关系到它的一些原则，我们通常会说的“价值”。欧洲的机制是在这些价值原则基础上建立的，我们称之为：“欧洲社会模式”。我想马上消除的一个模糊认识是，“欧洲社会模式”在欧盟建立之前就已经存在，欧盟所做的只是将它的价值运用到各成员国的发展当中，尽管各国早已在国家的范围内采纳了这些价值。

我将首先回答什么是欧洲社会模式，然后再谈一下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接着再看一看这个模式在今天世界的背景下包含什么样的机会，最后我想谈谈我们已经开始的一些结构性的改革，并且看一下欧盟是如何排除模糊概念来推进这样的改革。

欧洲的社会模式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契约

欧洲的社会模式是什么呢？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个模式？有些人有意表示怀疑，他们提出各国的社会体制不同，引证斯堪的那维亚的模式，地中海模式等等。的确有所不同，但如同一个家庭的表兄弟。当我们离开欧洲看看美国和日本，我们就会看到欧洲各国的经济－社会模式明显是同一个家庭的。尽管目前人们对欧洲社会模式进行辩论，有的担心它受到全球竞争的威胁，有的认为它无益于实力竞争，但欧洲人仍然都承认深深打上了一个共同的社会传统的烙印。我们要认识这种传统，即所谓的“社会契约”的传统。

这一传统的核心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社会契约。国家一方保证“培养人”，确立公民的机会平等，重新分配财富以防贫困，向失业者提供救济金，使所有人享受公共医疗及有尊严生存所需的各种设施。公民一方作为个人则应该承诺去工作和适应变化，因为工作在欧洲这个发展模式中体现了一种社会权利，同时公民还要培养自己的责任感，这种的公民的责任是与社会的权利相对称的，这就是在2001年我们在尼斯签订的《欧洲基本权利宪章》所阐明的，“权利的愉悦引发义务，这既是针对他人，也是针对人类共同体和未来的世世代代而言的”。

这样一种契约性的社会模式有它的好处，这种模式把社会和经济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国家提供的保障和经济效益两者结合起来，还有社会有机体提供的安全以及个人所冒的风险结合起来。欧盟的宪法条约指出，现在欧盟是要致力于一个市场性的社会经济，它具有高度竞争性，要充分促进就业和社会的发展进步。雅克•德洛尔先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欧洲领袖，他重视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对话，这样一种社会的契约，就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契约，可以使我们看到欧洲共同的理念。在欧盟委员会，我们习惯强调以下四点：一、重新分配财富的机制和避免过分不平等现象。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包括新欧盟的25个成员国，我们都要消除不平等现象；二、寻求机会的平等；三、就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这种中介和调节都要得到发展；四、要促进就业和劳动力市场，使人民生活得到充分的保障，这是人民工作、劳动的权利。在不同程度上，这些原则和理念都体现在欧盟的25个成员国当中。历史上有两大事件，引起了我们这种社会体制的建立，首先是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劳工和资本之间的冲突；第二是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欧洲不管是战胜还是战败国都开始思考如何建立国家的团结。欧洲的社会模式就是要寻求社会的和谐和欧洲的和谐。因此我们要强调各国的特点，如果说我们的动力是一样的，但是各国却体现了不同的历史传统、政治和文化背景，我们还是不能离开在多样性当中建设统一性的问题。我们知道必要的社会保障是一种社会模式最重要的因素，但它不是欧盟的责任范围，而是成员国自己的责任，所以就涉及到如何保持社会和谐的问题。

欧洲福利病问题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就是保持欧洲社会契约的良性循环，可以说直到80年代中期它还运转得非常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欧盟25个成员国是建立在两个标准上的，一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准，二是国民生产总值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这一曲线呈上升的趋势，这一点在欧洲各国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对社会保障发展的越多，这个机制就发展的越好。然而很多国家，特别是大陆国家，良性循环似乎正在停止。现在经济增长的速度在下降，结构性的失业在不断增加，贫富的悬殊在不断增大，这是近几年来的趋势。这其中的问题就是社会模式所带来的好处不能适应现在劳动力市场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公共开支不能为新的社会风险提供保障，比如职业流动性和退休等等。还有其他的挑战，首先就是人口老化的挑战，其次是全球化的挑战，它使我们职业的流动性增大。这些挑战都需要找出类似的办法，要求我们对人力资本加强投资，这样才能够使欧洲人口的潜力得到发挥。他们的教育水平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包括一些新的成员国也是这样，正如一位大使指出的，并不是中国的竞争非欧洲人的就业造成了威胁，而是不能适应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威胁。

面对世界的全球化，欧洲的社会模式是有很大机会的。我们首先要看一看它的理念是否可以加以新的发挥。首先我们要寻求机会平等，就是使每人都能够获得知识，并且获得进步，这样一种努力可以说是对一个智能社会的挑战的最好答复。西班牙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人力资源投资的好处，经过了长期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的努力，西班牙已经能够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能够使市场供需更加灵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结构性的失业，同时在适应高素质劳动力市场的能力上，西班牙超过了法国、美国，获得了最高分。这个好处不是单一的，我们还可以看到现在西班牙妇女的生育率在增加，人们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有所增加。另外西班牙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就是在欧洲社会模式的现代发展中，考虑到了全球性和个人性的统一，像健康问题，既是人的因素又是经济效率的因素，西班牙执行了社会保障和劳动事故预防的公约，这些标准是欧盟所要求的，在这方面的努力使新的投资效率增长了30％。由于有强制性的医疗保险，在法律上促成了这样的立法，从而可以避免工商事故的增加。

未来的欧洲模式是什么样的？

我们必须改革有关社会模式的工具，因为它们已经老化了，必须要结合现时期的变化。各个成员国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们在今年10月27日、28日将会讨论这些问题。人们提出了一些可以想到的解决办法，包括北方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改革，他们的传统理念非常深厚，但并不是唯一的国家，所有的欧盟成员国都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来调整社会发展模式，特别是退休和医疗卫生的保障。在欧洲社会保障委员会的会议上，大家都提出了这些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结构性的改革在欧洲达成了一致意见，主要是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不要再浪费有一定年纪的劳动力的能力，应该组织长期职业的活动；还应该调整人均寿命和劳动力寿命之间的关系；最后还要保持社会的对话以适应现代化的发展，接近我们事业的目标。这样的前景和我们今天早上讨论的内容是有联系的，我们要保持社会内部的和谐，它是使外部联合的必要条件，只有内部统一才可以使欧盟的对外政策赢得人们的信赖。我们在欧洲正开始大范围的辩论，很多人都很关注这些问题，并且愿意学习，在相互依存的状况下，这些都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就业、经济政策、社会保障政策，25个成员国都达成了共同了目标，它们可以在自己的理念中维持对话和正义并找到自己的动力。我们这样的模式在国际劳工组织的决议中，在企业的社会责任方面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被称为“和谐社会”。2001年国际劳工组织就通过了一个全体工作计划，它的原则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国家和地方，它要求尊重人基本的工作权利，并且人人有权享受高品质的生活和得到社会保障。这样一个保障人们体面的工作的文件不仅是我们成果，而且是欧洲社会模式的未来。

交流评议

杰罗姆·维尼翁、伊沙贝尔·迪朗发言后讨论：

回答福利病问题　回答对中国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目标的看法

张健雄评论：杰罗姆·维尼翁教授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欧洲的社会模式，这个模式是非常完善的。我们知道欧洲的福利制度非常完备而且富有历史传统的。我们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很关心也很注意学习欧洲的模式。我们国家在1978年以前，当时非常穷，人均的GDP非常低，但是当时由于在计划经济下有一个非常完备的社会福利制度，国家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承担无限责任，从他的工作、职位、子女教育（中、小学）完全是由国家负担的，而且医疗费用也是国家承担。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认识到这种公平是影响效率的，我们的经济要发展，要迅速实现现代化，迅速赶上欧美国家，就必须改革原来的福利制度，因此国家就不再对所有工作人员的福利承担责任。我们现在的改革一方面是国家减少了福利责任，另一方面把福利制度市场化、商业化。现在我们再上医院去看病，自己要承担很大的医疗费用，国家对我们的住房也不再承担完全的责任，当然还有一小部分责任，幼儿园、大学的教育也逐渐自己承担，跟过去相比公平减少了，但是效率提高了。我们也知道欧洲的高福利制度减少了社会的矛盾，加强了社会的和谐，但是也影响了欧洲的竞争力，尤其是跟美国和日本的竞争力，它提高了生产的成本，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形势下，高成本的福利资本会外流，所以欧洲现在也在进行改革。杰罗姆·维尼翁先生刚才给我们介绍欧洲社会模式的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还没有提到欧洲的福利制度，如果有机会的时候希望他可以给我们做详细的介绍。还有伊沙贝尔·迪朗女士给我们谈的是环境问题，环境问题也是中国非常关注的问题，她谈到了自然资源的压力是由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现在不断下降，自然增长率已经接近欧洲的水平，可能接近于零增长但是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很大，所以每年增长的人口数字还是很大的，虽然是零增长，但是增长数字还是很大。另外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高速发展就需要资源，需要土地，环境是我们高速发展的一个瓶颈。也许欧洲人对我们的发展不是很了解，我举一个简单例子中国现在的人口分布很不均匀，14亿人口有90％在东部，东部的面积大概比欧盟25个国家生活着11亿的人口的领土面积小得多，所以从这里来看，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非常严重。那么中国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是很重要的，因此在《京都议定书》上签了字，承诺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所以伊沙贝尔·迪朗女士的报道我们非常感兴趣的，而且也希望将来能够在这方面跟她和其他的欧洲朋友进行更多的交流。

上海社科院学者：我想请教一下杰罗姆·维尼翁先生一个问题，您刚刚提到欧洲社会模式的形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工业革命导致的劳资冲突，第二个就是二战导致对民族国家认同的变化。现在根据我们的观察，有些国家也有工业化，而且经历过二战，但是他们社会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并没有欧洲那么好。还想请您评价一下如何看到欧洲“福利病”问题，我们现在把欧洲福利病的问题看作是对工人效率的挤压，你认为是社会环境发生的变化，那么是不是您认为这种改革就可以解决福利病的问题？谢谢。

杰罗姆·维尼翁：刚才您提的问题提的非常中肯，确实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产生了目前欧洲的福利模式，特别是罗卡尔先生在发言中谈到，我们建立这样一个普遍性的福利制度最早是从英国学来的，当时我们在战争期间必须采取非常有权威的体制，它的基础就是英国人民的团结，他们当时正在经受着大轰炸等等。不管英国人当时属于什么样的社会阶层，他们都是在统一的指挥和团结的模式下来应对当时的局面，特别是当时的经济模式和国家所面临的财政问题，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不管你是什么人、什么阶层，大家都是平等的，这是

一个例子。我还想说，从欧洲的历史来看，特别是在战争期间，这都是附加的因素，它补充了工业革命以来在建设福利制度方面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和动机。当时人们还想在战后建立一个各国之间和平的环境，我不认为欧洲特别的历史背景也完全适合于其他的地区，因为这种模式不是唯一的、单一的模式，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可以从这里学习一些东西，但是也可以创造自己的东西。特别是国际劳工组织曾经指出过欧洲的经验是可以借鉴的，最主要的就是各个国家要根据它所拥有的不同文化来创造自己的机制。和今天欧洲的状况相比，一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正在建立自己的模式，但是这种模式都是把从其他国家借鉴来好的东西和自己的情况相结合的产物。比如说大家都在尽量减少不公正，通过完备的社会保障措施来减少社会的不公，这样做可能完全不是出于借鉴欧洲的历史而是只考虑自己的情况。我认为大家现在要考虑的问题也更多了，比如环保因素、全球化等等，这与我们当时建立欧洲模式的情况是不同的谢谢。

问题2：向伊沙贝尔·迪朗女士提出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两年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式，第一个方式就是中国科学发展观，是一个新的思想，这个新的思想是中国人对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解释；另外一个中国政府提出新观念就是建设和谐社会，当我们说建设和谐社会的时候，我们指的是在整个社会中创造一种和谐的气氛，同时也创造一种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这可能跟欧洲的情况不太一样。您是否注意到了中国最近两年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因为我想非常坦率的对大家说，我在欧洲工作很多年，我认为欧洲的绿党和其他的一些环保组织，他们对中国有很大的误解，他们经常对中国持批评的态度，但是现在中国的情况是在改善、不断取得进展的，我就想问一下，中国政府的这两种新的发展观念，欧洲人怎么看？欧洲人对我们有什么了解？特别是绿党对我们的了解有多少。

伊沙贝尔·迪朗：我现在回答您的问题，也可能是以建议的形式提出的。你刚才说欧洲的绿党对中国的了解不太深入，我非常愿意进一步了解，我认为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特别快、经济增长非常迅速的情况下，你们建立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这些都受到了我们的重视。我们只是想做一个比较，在过去欧盟扩大前，只有10个国家的时候，我们曾经担任过当时的交通部长，当时我看到了欧洲的一体化必须要作出一个选择。比如波兰是一个领土范围非常大的国家，它在铁路系统方面原来很发达，但是加入欧盟以后，必须把这些部门完全放开，这样原来铁路的网络可能就会分崩离析了。现在各个国家的汽车非常多，这也使得我们面临着一种非常大的压力，可能会造成生活水平的下降。所以我们绿党和其他的政党进行了很多接触，和多个国家的绿党也加强了接触，我们确实认为应该和中国加强接触，以避免误解。我完全相信中国所面临的环保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它比我们欧洲面临的问题大得多，从广度来说是不可比拟的。我认为中国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的科学发展观非常好，对中欧友好是有利的。这样也有利于全体人类可以生活在更良好的自然环境中，也可以使得我们避免10月6日上午第二场会议中提到的我们犯过的很多错误。

第四部分：中方学者论中欧关系（评论与回应）

4.1 欧洲的未来观和中国的未来观

王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会议的主持者安排我讲一讲欧洲的未来观和中国的未来观。我们知道于硕教授总结过中欧在历史上的两次接近，说起来最近中国跟欧洲的接近已经是第三次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卡蓝默先生领导的梅耶基金会持续跟中国十几年社会阶层广泛的接触，对中国未来的图景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在我看来欧洲主流的未来世界图景主要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在国际的关系方面，强调要超越以往的民族国家主权对抗的模式，更多强调世界相互依存性，反对单边主义，主张诉诸国际法，用谈判和交流来解决国际之间的冲突，构建一个和平、自愿、无暴力的事件。对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欧洲的未来观提出了有别于美国的以自由市场为主导的、强调世界保护的全球治理模式。在中欧的第二次交往过程中，中国的历史受到了欧洲思想的巨大影响。我们知道欧洲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故乡，也是社会主义的诞生地，特别是 18 世纪的启蒙思想。马克思主义讲发达世界的今天就是落后国家的明天，在中国的古典社会中有相信各种各样的循环生灭的历史观点。19 世纪中国的思想家严复从外国留学回来，就翻译了一本书名为《天演论》，说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竞争的世界。《天演论》给我们勾画了一个线性的社会进化模式。在过去的 20 世纪的 100 年里，于是就有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1949 年的人民革命，中国力图模仿西方，也建立起以欧洲的现代民族。

在这个时候，欧洲给我们展示了未来的世界图景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我这里想从欧洲的主流世界未来观、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最近欧洲有一个学者，写过一本叫《天堂与实力》的小说描述全球性的国际秩序，我觉得这本书对当代中国人观察世界、思考未来、参与中国关于未来世界观的形成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在他看来，欧洲正在走出 19 世纪、20 世纪冷战期间的势力政治，正在走向依赖法律的世界，她正进入和平的、相对繁荣的世界，这与康德当时对关于世界繁荣、和平的设想是不谋而合的。同时美国依然深陷在历史的泥淖中，它更多依赖着国家的经济实力。从欧洲的世界未来观更多看到的是全球化带来的比如种族冲突、跨国移民等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经济援助可以解决的问题；但在美国看到的是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而这些问题是需要实力来解决的。

康德当初曾经有一个关于国际关系设想，关于永久和平的设想。欧洲也正在构建永久和平的天堂。02 年英国首相的顾问曾经对当代的世界做出这样的划分，一类是欧洲这样的国家，一类是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一类是阿富汗这类失败的国家，欧洲已经进入这种永久和平的天堂。当然实现这种梦想更多的不是依靠实力，而是要依靠谈判协商合作来解决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对未来世界的政治图景的规划设计上，欧洲是不一样的。无论动机如何，我觉得欧洲主流的世界观以及欧洲的国际政治观察有它的深刻之处。我们知道，现在的民族国家是 17 世纪首先在西欧形成的，特别是以《维斯特巴里亚条约》为标志，在西欧实现了民族国家体系。当时的西欧民族国家体系是排斥非欧洲国家的。如同刚才有人提出，西方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美国的西方，一个是欧洲的西方，相应的有不同的世界图景，关于世界未来有不同的观点。而中国是现代世界迟到者，中国的民族国家的构建，以及民族发展水平是非常低，主权国家的建设在中国并没有完成。那么，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欧洲历史性的问题在中国就变成了前现代和现代的问题。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考虑到当代世界不同的

图景，中国有不同于以往的新的问题，一方面需要不断推动国家的构建，同时需要超越单一的国家认同。中国和欧洲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不同，欧洲提供的是世界未来的途径，包括全球治理的治理模式等等。但是无论有多少美好的理想和愿望，都需要组织机构和社会限制表现出来。在 20 世纪的中国，旧有的以家族为中心的民间社会已经消亡了，单单依赖民族国家组织，企业工商业组织由于功能结构特点，出现了自己的问题，包括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等等。

欧洲未来观最主要的启示是全球性的。一个国家能够保持良性互动沟通和交流的公民社会尚未形成。由于当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一方面人民经济生活文化水平有了提升，另一方面弱势群体遭受到很大打击。幸运的是，当代中国逐步构建出公民社会，积极参与解决全球化问题下带来的社会问题。人类的美好未来，归根到底需要我们承担自己责任。近些年来，在发达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情况下，过分依赖自由市场的规则处理问题，在国际经济结构不平衡，民主机制欠缺的情况下，出现了很多问题，恰恰凸现了国际民主公民社会的角色在现时代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全球化问题里面的全球安全等问题的治理，不仅要依靠各国政府和各级组织，还要依靠全民社会组织以实现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法国哲学家曾经说过，“现在”承载着“过去”的负担，也孕育着“未来”这个孩子。我们对于未来的政治想象，世界图景，都有助于我们寻找争取美好未来的途径。中国与欧洲在像类似中欧文化论坛这样的平台上，通过交流阐述各自对于未来不同图景的看法，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有助于实现全球更加美好的将来。

4.2 欧洲可供中国借鉴的六个经验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这是一个太大的题目：中国与两个西方。首先要声明一下，虽然我主要在美国受教育，但是从文化上来说，我对欧洲更感到亲近，所以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在美国呆了 10 多年，还有一大部分时间是找机会往欧洲跑。要看到欧洲的经验对中国有什么意义，特别是在过去中国改革开放 25 年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开放，尤其是在经济改革方面，最早的经验是从欧洲吸取的。当然在以后在改革开放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按照这个背景来看，我这个在中国出生、长大，在美国受教育、在海外工作的人，觉得欧洲的经验，不用说古代的经验，就工业革命以来的经验已经太丰富多彩了。所以要讲清楚欧洲的经验对今天的中国到底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话，要讲几年。下面我就个人的观察选六个非常简短的问题讲一下，这六个方面我坚定不移地相信是现在或可预见的将来时代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挑战。

第一点就是如何处理好统一或者是一致与多样化之间的关系。当代欧洲充满多样性和不同，我们能够看到的人类社会中的不同与差异在欧洲非常明显。我个人的感受是，在美国开车，开几天几夜，从这个州开到那个州，从这个城市开到那个城市都没有什么不同的感觉。但是这种经验在欧洲是不一样的，稍微一会儿不注意，就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了。无论是种族、宗教、语言，还是生活方式、习俗，当代的欧洲都是多样性的。欧盟能够把这么多具有多样性的国家统合在一起，我觉得本身有着相当高度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外，还有一些非常基本的制度性因素，而这些制度性的因素差不多包含了四大块：第一是民主的程序、第二是法制；第三是人权，第四是对少数民族或者是一些特别人士（比如同性恋、双性恋）的保护。这一套制度不仅对于传统上基督教的国家、社会有着全面的吸引力，而且对传统的非基督教社会也有着非常强烈的吸引力。现在电视上在讲土耳其谈判的问题，像土耳其这样一个传统是伊斯兰教的国家，这么多年一步一步升起，这个在我看来真正是一个现代化的证据，验证了我们古老的中华文明的一些圣人讲的好政府的榜样。假如我们把中国古代圣人讲的什么叫好的政府翻译成现代的语言的话，就是说如果要把政治的每一个单元统合在一起，不能仅仅靠武力，甚至不能主要靠武力，而要靠其他的东西，例如法律、道德、文化方面的公正原则，我觉得这一点中国要特别看看当代的欧洲。我们在西方受过训练的人，都知道中国在西方的概念中不仅仅是一个多人口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大的文明，对于中国有着这么巨大的规模和这么大的多样性的国家，这样一个无论是从人口、民族、语言、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来讲都充满多样性的国家，如何可以把一样同多样取得一个很好的动态平衡，在我看来，这是中国现在和未来可以遇见的最大的挑战，如果中国的精英，包括政治、文化、军事、教育、制度、社会的精英，能够把这个挑战比较顺利的接过来然后走下去，我想我们可以预见，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化激励帮助实现万世太平。因为它不仅仅对中国大陆本身长期的、和谐的、稳定的繁荣至关重要，而且对中国大陆处理香港的关系、特别是处理好台湾的关系以及少数民族的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再过 20—30 年，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如果要想申请有中国牵头的亚洲的单元，那么才是值得我们光荣的时刻。

我讲的第二点是，欧洲的经验给我们中国的启发是权力的集权或者分权之间的关系。我们学过比较政治学的人都知道，欧盟的一个最基本的行政制度、行政体制方面的原则是，对同样的问题或者是一组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决策，越基层、越直接就越好。往上提升，越往上成本就越高。《牛津大字典》也说，对公共管理的事物作决策的单元，越小、越直接、越低越好，越高越不好，这就是基本的原则。我想对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人口这么多的国家，层次分类也

是全世界最复杂的，最多变的。相应地，中国的学者还是海外的学者，不断提出新的模式来形容中国的行政架构。前几天全国花了很多力气，把管理中心引到市而把县圈起来，我们现在知道这是很不好的。但是不管怎么改，欧盟的越低、越直接的原则应该在中国的这么庞大的体制中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借鉴，在立法制定政策、对政策的实行、对政策实行的评估中都应该把这些原则实行过来，这对中国的长治久安、减少成本、制订法律更以人为本，以及创建一个和谐的社会意义巨大。

我想讲的第三点是，欧洲会给中国提供非常重要的经验，是财富的创造和财富的分配之间的关系。从 1970 年代末期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了二十五、六年时间，中国在两点上都破了世界记录。第一点是在长期、年均的经济增长上差不多破了世界记录，有史以来还没有出现过长达 1/4 年均的增长可以达到 8.6％；第二个破记录的就是在同样的二十五、六年的时间里，中国贫富的差异由基尼系数来算的话，也破了记录。在改革开放刚起步的时候，中国的基尼系数是 0.29，在全世界只有苏联的基尼系数才比中国低，那时候的东欧是 0.25，如果这个指标是 10，代表这个社会是绝对平衡的话，当时中国在全世界的指数是 7，最高的是 8，就是东欧。那么到了去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 0.45，这个 0.45 在全世界是一个不平等的系数，唯一一个比中国高的区域是拉丁美洲，拉丁美洲是 0.49，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从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期，是全世界第二平等的社会，在 25 年内变成了全世界第二不平等的社会，也是破了一个记录。可以看一下联合国的统计数据，在过去的 25 年来，要从贫富不均的速度来讲，中国达到了 35％，是全世界最快的。我们看一下富裕的欧洲在基尼系数这个指数上，是 0.33，也就是说如果 8 是最平等的社会，富裕的欧洲现在是第六，而中国现在人均的贫富差别排名是全世界的二。最不平等的是拉丁美洲，第二就是我们。所以从这一意义来讲，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美国的指标，美国现在是 0.44—0.45，这点上中国赶上了美国，而且有希望超过美国，贫富不等。我们都知道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都很难避免贫富不均的一定程度的扩张，如果扩张到 0.45 的程度就比较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在已经到了需要从欧盟学一学，看看他们怎样从财富的创造到财富的比较公平的分配上有哪些法律政策。尤其是从《遗产法》、《个人所得税法》，通过教育、扶贫、改变贫困的恶性循环的措施上学习，我觉得这是中国很需要要向欧盟借鉴的地方。

第四点就是欧洲对中国有重要启发的是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我们讲传统，讲现代化，如果从文化研究、社会科学的角度讲，这两个概念是巨大无比、内容丰富、抽象的，那么我们就看具体的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我们只要到欧洲的大、中、小城市看一下，然后再看一下中国的大、中、小城市，我们就能马上看到一个巨大的差别，这个差别一方面是怎么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尊重、保护你的传统，另外一个方式是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不尊重、不保护你的传统，甚至破坏你的传统。欧洲的城市是一个很具体的样板，就是没有把传统和现代的就是非常好的结合起来，而中国的城市现在到处都是“水泥”，所以北京大学建设学院的院长在去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是出自于城市规划的专家，这个报道很具震撼力，开场白说中国的城市在过去的十几年出现的全面的不尊重甚至是破坏程度，超过了中国过去 2500 年的总和，并且这个破坏不是在战争情况下，而是在我们自己手里造成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必须要看看欧洲。如果看北美的话，就有印第安人的文化遗产，但是从哥伦布以后，就基本上被洗掉了。欧洲的城市不是人工设计的城市，而是人的一部分、自然的一部分、文化的一部分、灵魂的体现。我们中国的城市，差不多有名地方的城市都可以找到一千、二千、三千年的历史，然后再看看我们自己在自己的土地上，对自己的传统怎么样破坏和不尊重，我想欧洲能对我们提供的借鉴实在是太多了。

第五点欧洲可以给我们提供重要借鉴的就是发展。在这一方面，我们经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就是说不要拿中国和发达国家比，看一下新加坡、澳大利亚，人家地广、人少，而且那是新的移民社会，我们中国这个土地上 5000 年来一直是炎黄子孙延续，看一下人口的密度，澳大利亚或者加拿大每平方公里只有 2.5—2.6 个人，而中国平均起来每平方公里是 360 个人，而把西部地方和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撇开，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每平方公里是 230 人，这个人口的密度是偏上的，跟澳大利亚、加拿大更没法比，人家是你的 1%，而美国的人口密度是 28 个人。 欧洲的人口密度最高之一是荷兰，是每平方公里 340 人，英国是每平方公里 245 人、德国是每平方公里 225 人、意大利每平方公里 200 人、法国是每平方公里 110 人、西班牙是每平方公里 80 人，欧洲如果像荷兰、比利时、英国、荷兰、卢森堡这些地方比我们的人口密度还要过，但是他们能把自己的家园建设的使你开车、步行的时候感觉天人合一，为什么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我们看到的是天人不合一呢？这一点中国要好好的学习。下午的报道欧洲感到惊讶，我们怎么样要学一下中国在过去的 25 年内经济增长那么快，我们说我们为了高速的发展，我们付出了太巨大的环境代价，用中国老百姓的话来讲，我们现在在透支，透的是自己下一代的支，我们不但把自己的资产，而且把属于第二代、第三代的资产都用掉了。这点上我们要好好向欧洲学习。

第六点我特别要讲一下的，我们都知道在今天中美之间的关系中，时好时坏，从长时间来看，中美至少有四个层面的关系：（1）政治；（2）种族；（3）文化；（4）地理政治。为什么我说地理政治？因为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美国一部分人也说给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那么庞大的民族主义观念，但是美国人自己不承认，美国是现在唯一的现成的超级大国而中国现在是看起来最有可能成为第二个超级大国的大国，这种关系的情况下，中美之间发生关系的紧张是非常符合逻辑的，但是发生这种关系的紧张并不等于这两个国家就要打仗。今天上午我很荣幸听到吴建民先生给大家的演讲，他讲的话是非常好的，从中长期看，唯一有可能使中美进入战争边缘的就是台湾问题，而欧盟跟美国不一样，所以这就给欧盟一个地位，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在中美之间关系、在特殊情况下要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调节人的作用，因为虽然澳大利亚、新西兰也有这些作用，但是这些国家无论是他们的规模、实力、在国际舞台上的势力，都不能跟欧盟相比。

最后讲一下，我经常到欧洲参加学术活动，我觉得欧盟凭着自己文化方面巨大的资源，凭着你们法律建设在处理多样性的方面，积累了这么丰富的资产，你们现在真的应该对欧盟和中国之间中长期的发展做更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欧盟的一些重要的国家，在中国不同的区域都有历史上的关系，当然也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从长期来看愉快多于不愉快，人们抱着美好的希望多于不美好的希望，所以希望欧盟的国家可以充分利用资源，可以在中国这个庞大的舞台上找到自己重点投资的地方，我觉得这一点对欧盟和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我觉得欧盟应该让自己大学对中国的研究方面做一些更新。因为我到欧洲的时候，他们在考古等方面都有非常优势，大家谈到以现代科学的方式来研究今天中国的变化等等，我觉得欧洲确实跟其他地方有相当大的差别，因为欧洲的研究还停留在汉学，欧洲不用完全放弃自己在汉学上的优势，但是欧洲应该很好的抓住这个机会来大力发展用现代西方科学来研究多种变化的中国。而且你们大学教员的开放程度远远比不到北美或者是新西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都比不上日本和韩国，这点上你们要好好的考虑，因为你们对中国的研究会逐渐从古老的中国转入二十一世纪上的中国，从而全方位减少矛盾、互利互惠。所以我讲现在二十一世纪的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二十一世纪地区与地区、人民与人民、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应该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没有这个很难有长期的、强劲的、全方位的发展。谢谢。

4.3 中欧对话的必然性和全球化时代文化多样性的意义

单世联（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院研究员）

这次会议的专家多，论题广，所发表的各种意见和见解十分精辟，要进行总结是十分困难的，况且，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意义上，“真正的对话和讨论经常是没有结论的”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欧洲与世界》这样一个宏大的议题，个人是无法总结的，我要谈的更多的是我参加这次盛会的感想。

第一点，中欧对话不仅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欧洲学者面对面的交流和讨论，也更是现代中国社会的一项基本活动和事实。尽管我们可以从广义上把中欧对话追溯到16世纪中国与葡萄牙关于通商的交涉和冲突，但中欧之间比较全面的接触和遭遇还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明朝末年，中原亡于满清之手，但当时的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并不认为中国文化不行了。而晚清以来，帝国主义入侵，瓜分了一些地方，但清朝中央政府仍有效地保持着绝大部分领土的主权，然而朝野上下却认为中国文化不行了。这是为什么？国家丢了没有觉得文化亡，国家基本上还在但是觉得文化亡了。这是中欧文化对话中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这一百多年来这种对话的特点是，中欧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冲突是如此深刻地内化为中国内部的问题，以至于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要在经济方式、科学技术、政治体制、文化风格等领域清晰地划出中欧的界限是相当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自从欧洲国家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方式把欧洲的文明和欧洲文明的若干要素送到中国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基于对富强的追求自觉引进欧洲文明以来，欧洲文明的若干理念、制度、符号等等，不但整合到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化之中，而且无数的中国知识人和政治人都日益自觉地使用欧洲文明，进行改造中国社会的实验。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处理古今和中西的关系。由传统向现代转进的过程中，欧洲文明不但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示范性意向，而且通过和中国历史不同程度的融合，具体化为现代中国社会运动的理想、旗帜、方法乃至修辞和语言。法国的自由平等和大革命的实践、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的历史理性、英国的自由主义，苏俄的政党组织和意识形态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改塑了现代中国社会形态、政治结构和文化理想，用一种夸张的语言来说，现代中国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中欧对话。即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者，比如一些新儒家论证儒家的学术价值时，使用的也更多的是康德、黑格尔的欧洲哲学的语言。我相信就一般公众而言，中国人对欧洲的了解要超过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一个中国的中学生大概都可以背诵莎士比亚和马克思的语录，基本上都知道卢梭的著作和拿破仑战争。二战以来，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对纳粹德国和希特勒有一定的了解，这些情况固然反映了一个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国家对先进欧洲的学习热情，同时也反映了一个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的活力。中国文化曾经接受和融化了印度佛教，我们也一定能够创造性地接受和融合欧洲文化的挑战，在融合欧洲文化的基础上再创中国文化的辉煌。

第二点，在2005年的秋天，中欧学者会聚南沙举行文化论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记得八十八年前的秋天，苏俄发生了十月革命。它使得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的中欧对话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840年以后，学习西方已经是先进的中国人的共识，但学什么、如何学的争论很多，十月革命标志着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被一分为二，一部分中国人从此确立了学习社会主义的苏俄而抵御资本主义的欧洲这样一种发展道路。走苏俄的路，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洲世界保持着深刻的对立。但是从50年代末的中苏冲突到7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中国的国家政策逐步走出了对立的两大阵营，为80年代的改革开放埋下了伏笔。冷战结束后，分离的欧洲合二为一，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

开放的中国与欧洲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方面日益频繁。建设民主制度、发展市场经济也使中欧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曾经受过欧洲理念的感染，又严厉批判资本主义，中国的历史可以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来描述："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中欧之间也会有矛盾和冲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欧之间将在对话、协商和妥协的过程中走向更广泛、更深入的合作，两个古老文明将共同推动人类的主流。我想强调的是不同文明的合作部分地取决于的各个文明的自我调整。以欧盟的法德为例，德国之所以选择和解、合作的道路，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使德国内部的狭隘民族主义、极权主义灰飞烟灭。我们知道近代德国文化一直充满紧张而深刻地冲突，一方面是理性主义、世界主义、自由主义的歌德的德国，一方面是非理性主义、种族主义、独裁体制的希特勒德国，一面文明的、人间的魏玛传统，一面是黩武的波斯坦传统。经历了战争失败的悲剧，德国光明的一面终于取代了黑暗的一面，只有在希特勒千年帝国的废墟上，德法和解的基础才能牢固树立。在法国方面也有强烈的反德情绪，我们都读过1871年普法战争后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被其爱国主义情绪感动的同时，也回想到中国的一句古话"冤冤相报何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条约》体现了法国的复仇情绪，当时的有识之士包括凯恩斯都认为《凡尔赛条约》的条款过于苛刻，在政治上是不成功的。当时在遥远的中国，在长沙读书的毛泽东，也同样认为这样的条约不出20年就将激起德国的报复，当然，这也是当时中国舆论界普遍的态度。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4号上午，有位法国专家说北大西洋组织创立的动机之一的是管住德国。确实，只有从煤钢联盟到欧共体的发展这种共荣互进的方式，才是管住德国的不二法门，这也为世界上其他地区化解恩怨、共同发展提供了典范。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说过的，对话意味着双方游戏的共同预设和前提，需要一个理想情境，这一情境的获得需要对话双方的共同努力。如果今天的中国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中欧对话就无法进行。如果说在1917年的秋天，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欧洲，那么在2005年的秋天，不再争论姓社姓资的中国已经拥有了和欧洲对话的基本前提和能力。

第三点，我想说的是这次论坛再次显示了全球化时代文化多样性的意义，这次对话使中欧的学者加强了了解，但是至少我作为中国学者，充分地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与欧盟有很大的不同。欧盟处理国际关系的经验也不能套用中国的政策上，比如中日问题，这就提示我们历史文化的多样性特别值得重视。如果说同是欧洲文明的欧盟各国都遇到了多样性和统一性的问题，那么中欧之间这一挑战将更加严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从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出发，认为中国的落后不是因为中国和欧洲文化的不同，而是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先后之别。80年代中国重新开始了现代化运动，也预示着由传统到现代转化的普适模式的作用。这一历史建构的目的在于把中国置于与欧洲同样的发展路线上，实现赶超世界的理想。在全球化浪潮澎湃的今天，我们当然不会拒绝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多元文化之一主流，但在此过程中，如何尊重差异、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依然是一个难题。一方面，如果没有多样性、没有自己的传统，不但世界日趋单调，生活的意义，人性的深刻性、丰富性也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不但德国19世纪反西方的普鲁士道路宛然曲折地通向奥斯威辛集中营，事实上促成了浩劫，而且国情不同、国情特别论也是现代中国"夜郎自大"的保守主义的合理借口，真是进也难、退也难。怎么样才能不难？只有我们遵循政治和经济文明的基本准则、而又保护文化和精神世界的差异性，才能保成我们真正立足于中国同时面向世界，从而完成现代中国的文化创造。

四天的论坛要结束了，关于中欧文化这样的讨论我觉得还远远不够，尤其是中国的学者还不能从中国的经验表达自己的见解，但是各自的见解已足够我们双方去消化。我们期待第二次、第三次的中欧论坛。奥利维耶·多尔先生昨天说，每一次接受新成员国的时候欧盟都会走向一个一体化的新阶段，因此推论，每次的中欧论坛都会将对话推向一个新阶段。不同文明的对话将保持永恒的魅力，让我们保持着对这四天讨论的亲切回忆。我们也期待未来的对话与合作，期待下一次的论坛。

4.4 从欧美看自由竞争与福利国家的两难选择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我也写过不少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研究，这种研究越深入，我就觉得大谈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有危险的。我更倾向于摆脱这样一种语言模式，我觉得不同的民族一定有文化差异，但这种文化差异不应该过度宣传。我还是相信中国先哲的一句话“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觉得很难说，只有西方人才追求自由，而中国人更倾向和谐。我经常对学生讲一个最简单的比喻，无论东方西方，如果监狱不上锁，那关着的犯人都会跑掉。即使是在西方，能够苟活也宁可不追求自由。不追求自由有时仅仅是为了避免风险，在9·11以后，美国不也是因为保障安全而减少了一些自由吗？因此我觉得，在自由竞争和追求保障，也就是所谓福利国家之间，作出选择从来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我们的会议材料也讲了，我们现在要探讨，是不是有不同于美国的自由市场模式的另外一种模式，欧洲当然是更偏向于这种模式。但是我们也知道，无论欧美都有分别倾向于这两者的两党之争。也就是一般来讲的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争。相对来说，美国追求自由会更多一点，欧洲的福利国家相对来说更加发达一些，这本来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仅仅以文化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矛盾，为了自由就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为了福利就要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无论欧美他们实际上都是在宪政民主的基础上寻找两者的平衡，所谓宪政民主无非就是被统治者和统治者达成的契约，被统治者向统治者的授予一部分权力，目的就是要统治者提供公共服务，承担公共责任。这种体制天然是一种权责对应的体制，由于公共权力天然与公共责任合一，因此要求限制权力就很难同时要求他承担过大的责任。反过来要求他承担更大的公共服务责任，被统治者就不能不相应地增加对统治者的授权，这两者会产生矛盾，也就是自由和福利国家。这两者的共同点是以权责为重点，其争论实际上是权力大、责任也大更好，还是责任小、权力也小更好？这样的组成无论哪个都不会提倡权力大、责任小，甚至有权力无责任。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现在的政府是受约束的政府，同时也是责任可追问的政府，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非宪政的体制下，人民面临就是完全不同的背景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统治权力太大和责任太小这两种弊病经常会同时存在。由于统治权力太大，因此公民权利缺失，基本自由不足。由于责任太小，因此公共服务缺失社会保障不足。因此我们单纯地讲，学美拒欧或者学欧拒美，单纯地提倡大政府和小政府都会遭遇尴尬。首先就是所谓政府大小的尴尬，一讲小政府就容易推卸责任，但是限制统治权力却非常难，但是一讲大政府就容易为统治者扩张权力，但是追问统治责任却非常难。于是在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时间里出现一个怪的现象，就是集权不集责和放责不放权的恶性循环。在这样的情况下，权力部门不履行公共服务等责任，尤其最近我们在讨论所谓的医疗、教育问题的时候，大家都痛感政府责任缺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同时垄断资源，自我服务的部门权力却越来越大了，在责任缺失的同时，权力并不因此就更受限制，反而不断扩张。越来越发展成一种自我服务的权力，就是以垄断的地位滥用公权，阻碍合理竞争。

我们沿着历史回溯，会发现这种现象不仅现在有，中国历来就有这样的传统，就是统治权力比欧洲大得多，但是责任要比美国小得多，形成一种无福利更无自由的法家传统。大家知道中国的帝国时代，是建立在法家政治背景下的，法家政治极其强调国家有非常强大的权力。要保持国强民弱，要进行经济垄断，把所有的经济资源都给国家垄断起来，不能放权民间。但是国家权力这么大，它就能承担福利吗？恰恰相反，中国法家是古今中外的最反福利的。法家的荀子就说，那些穷人是不值得同情的，救济他们是剥夺富人的权利。有一次我在美国的学术研讨会上就提出法家的思想。有一个学者就说，对，我们的布什总统就是提出这

样的说法，不给福利但是给你自由。法家总非如此，我们可以将那些贫穷的流浪汉抓起来送去劳教。布什总统有这样的本事吗？显然不行。

我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中国有的知识分子，熟读了宪政制度下西方人写的那些著作，而且熟悉了他们争论的问题背景，于是经常将西方人面临的问题当做我们自己面临的问题，经常把推卸责任看作是下放权力，把不受制约的弄权看作对国民尽责。如果没有福利就说我们自由了，如果又苦于没有福利就说自由太多了，是新自由主义作祟。这样的现象我觉得在汉学视野中、探讨中国历史问题中也会遇到。在探讨中国现实的时候，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参加WTO农业谈判的代表，记得几年前我们在法国见到在座的张万亭先生的时候，他就抱怨说中国在加入WTO的农业谈判中，为什么要紧跟美国同意削减农业补贴呢？他无法相信，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应该更加倾向于福利国家，为什么要追随资本主义。我说这实际上跟新资本主义没有关系，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对农民的补贴不仅是零而且是负补贴，那个时候难道也有紧跟美国的问题？有趋从资本全球化的问题吗？这里的问题完全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中国与其说是需要在美国和欧洲之间选择一个学习对象，不如说首先要学习欧美的共同特点，也就是宪政基础上的权责对应。中国需要一个责任更大的政府，因此他需要学习欧洲，中国同时也需要一个权力更受制约的政府，因此他要学习美国。中国大多数人，他们不要说跟欧洲相比，跟美国相比能够有美国的福利就不错了。同样他们也不要跟美国相比，有欧洲的自由就很不错了。除此以外还有两个问题，如中国在讲联邦问题，就是中央和地方的问题。但是中国人理解的联邦问题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来自于欧洲的概念，就是从欧盟吸取的经验，刚才林先生就是在这个角度上来谈问题的。第二个中国人谈的联邦，具体来讲就是从美国，从联邦党人吸取的经验。但是对这个问题我也有很多看法。还有一些就是在外交方面的，就是中国在国际关系格局中，究竟是应该倾向于欧洲还是倾向于美国，这后两个问题由于时间所限，我就不展开了，但是我觉得中国很可能归根到底面临的不是文化的问题而是制度转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很可能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都已经实现了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讨论在责权对应的基础上是权大责也大更好还是权利小责也小更好。

交流评议

杨成绪 、丁学良等

杨成绪：上面几位教授的发言回顾了西方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审视了中欧关系。王焱教授引用马克思的讲话：发达国家的现在是发展中国家的未来。这句话的内涵是不言而喻的，就是中国要向西方学习，向欧美发达国家学习。

怎么解决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问题，联系今天我们已经进行的讨论，可以看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国家如何看中国。吴建民教授上午讲到，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发展会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从现在开始就想遏制中国。 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很难向西方学习。我认为对中国的看法就好像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中国威胁论，另外一面是中国垮台论。我主张这两方面都不能高估：不要高估中国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实力，中国在任何意义上和西方发达国家、欧美国家相比，还距离非常远。如果高估这点，必然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这会危及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同样也不能低估中国克服困难的能量，我们今天花了很长时间思考了，特别是几位教授也谈到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造成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想提醒一点，中国不是中小国家，中国的多样性大超过中小国家。比如在中国南方闹水灾的时候北方在闹旱灾，要想正确看待中国的形势是很困难的，包括中国人自己往往也很难判断。但有一点不能忘记的就是不要低估中国克服困难的能力。如果消除这两种错误的评估，

像中美关时好时坏这样的情况就会减少一点。对中国要有基本的判断，这个基本的判断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点是怎样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问题。一个多月以前，我参观了飞利浦公司在北京的一家生产某个手机配件的工厂。有关人员告诉我现在这一产品在中国的产量占全世界的70%。过去这些东西在维也纳生产，但他们发现在中国在各方面都有比维也纳具有更利的条件。于是生产比例逐渐向中国偏移，以后可能会全部在中国生产。飞利浦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两年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利润不断上升，但是维也纳方面则发现他们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了。他们就问我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我觉得很难回答。就像吴建民教授上午讲的，中国制造出口乐高玩具只赚0.8欧元的劳务费，这很少的一部分。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跨国公司的盈利大大增加。我们需要的探讨的问题是怎样使他们的盈利更好地服务于他们本国的人民，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弥补他们由于工作岗位的减少造成的损失。这些问题不是通过双边关系就能解决的，而要通过多边关系。而在多边关系中也不是通过一件具体的事情，比如说纺织品贸易谈判，就能解决的，而是要综合各个方面。我们知道今天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利益平衡的世界，不应该像过去的强权时代，大家都承认这点。这一点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也是我们今后发展中欧关系非常重要的方面。我想非常简单的做这两点评论。

听众1：丁学良教授，你刚才讲到欧洲跟美国的差异，所谈到的旅游经验是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没考虑到这个因素，就是即便在欧洲的杂多性和差异性背后，仍有一个共同的精神背景和意义背景，这个背景是欧盟之所以可能成功的最根本的原因，也是欧洲文化到现在为止经历了这么多的内部战乱始终保持活力的原因。我的意思是说不管是希腊的东正教国家，还是南欧的天主教国家，还有中北欧的新教国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督教背景，这个背景提供了共同的意义世界，这个背景使西方的法制成为可能。尽管我们从一个旅游者的角度，可以说在欧洲每过五十公里就是另外一种景象，习俗就有所不同，但他们的深层背景仍是我们需要更多了解的。下面再向杨教授提一个问题，其实这两个是一个问题，杨教授从文化反省的角度批判我们自己对欧洲学习的不自觉和自觉性的不连续。从这个角度我能不能问，欧洲这500年的现代进程是不自觉地发生的，尽管莱布尼兹这样的哲学家准备向全世界学习，甚至向中国学习，他们有世界公民的观念。但是政治家没有这个义务，老百姓也没有这个义务。然而反过来，欧洲之所以走到今天，是在他们自己的意义世界上生成的，而不是文化移植来的。欧洲文化有很多我们很缺乏的东西，但是我想问这种学习不能转换成一种文化移植？假如我们尊重文化，文化一个自然性的过程，是一种植物性的过程，那么文化能不能移植？这是我想请教杨教授的问题。

丁学良：你对欧洲基督教背景的看法我想在座所有的人都认同。我在讲稿里已经写了，欧洲的这套规章制度，这套法律体制等，不仅对传统的基督教社会有普遍的吸引力，现在与土耳其的谈判就是由于土耳其不断地主动要求加入欧盟，这说明欧盟所发展出来的软的制度性的东西对非基督的社会也有普遍的吸引力。你的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其实是两回事，就是在没有基督教传统的社会中发展出这样一套制度、价值是否可能。我对你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要困难得多，但是并不等于不可能。有一个基督教的传统在那里，可能这套制度的发展会容易一点。但是没有基督教传统的社会，也可以通过其他努力逐步建立起这样一套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制度性因素，以便使他所涵盖的社会、国家和大陆会有更多的和谐共处和共同繁荣。

杨成绪：我想这样，历史已经说明这个问题，文化移植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对中国这一类后发展国家来讲。1833年，德国的传教士就在广东办起了中国除澳门外的第一个中文现代报刊，向中国人介绍民主，法制，介绍人有自主的权，所谓自主的权就是自由。19世纪70年代，马健东到法国留学，给李鸿章报告说整个西方的文化就建立在人有自主的权之上。到20世纪初的，特别是民国政府成立后，辛亥革命后，所有的政府文武官员都把自由、法制、军队

不要干涉政治等等说的滚瓜烂熟，虽然行动上没有做到但是观念变了。再加上新文化运动的传播，这些观念的移植到 49 年以前已经相当普遍了。49 年以后我们中断了一段时间，但是 80 年代后又逐步恢复了跟西方文化的联系。我想到现在为止，即使是普通老百姓，假如你侵犯他的自由权，他也会反抗，也会诉诸理论或到法院去维护他的利益。我所以我想文化移植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听众 2：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丁先生刚才您的发言非常具体，对很大的问题进行简明扼要的概括。我更感兴趣的是您提出的第三个挑战，关于财富创造与财富分配的关系问题。我的问题非常具体，欧盟在 2004 年 5 月 1 日实现了第五次扩大，在东扩以后，欧盟的财富的创造与财富分配的问题将更加严峻，我想请问您欧盟东扩以后，二者的关系表现在哪些方面仅仅是人均 GDP 的差距吗？欧盟下一步能够采取哪些有效的措施来面对这样的问题？希望卡蓝默先生也能对这个问题作一个简要的回答，

听众 3：我来自布鲁塞尔的欧盟组织，如果主席先生允许，我想就前面提出的关于希腊文化的问题所一个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所有触动，1985 年我曾经承担过一个任务，就是调查了解希腊使用欧洲基金的能力。我注意到，我们之间存在的分歧不光是宗教方面的，而且尤其是政治文化上的，希腊与荷兰的政策不一样，意大利与荷兰也截然不同，都是天主教国家，但政治文化完全不同。我们关注各个国家发展的不同道路，我们同意各自进行选择。另外我们也发现尽管对一个问题各个国家的观念不同，但我们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是一致的，这两点使我们能够进行对话，而每一方对自己的多样性和特色感到骄傲。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相互学习，在这次论坛中中欧双方也是如此。

丁学良：人大的同学提到的问题，目前在欧盟和土耳其的谈判中表现得更明显。土耳其是一个传统的伊斯兰国家，它的人均收入比东扩的国家更低。当然我现在不是处在欧盟决策者的位置，作为学者，我觉得欧盟的既定做法已经包括了渐进的财富转移。举个我最熟悉的高等教育的例子来说，我们都知道欧洲的大学不但对本国学生，而且对欧盟所有其他成员国来学习的公民所收的学费都是最低的，经过政府补贴的，他们对非欧盟的学生有另外的收费标准这本身就是鼓动大量比较贫困、教育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到欧盟成员国高等教育最发达、好大学最集中的地方去学习。这本身就是一种扶贫，而这点不但对学生个人命运的改变有很大的帮助，也使得欧盟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在年轻人中造成我们属于同一个群体的观念假如我处在欧盟决策者地位，我不会再重复当年西德将东德完全买过来的做法，这个做法成本太高，而且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生态的提升。

4.5 澳门在中欧关系发展中的作用

麦健智（澳门欧洲研究会会长）

我今天所讲的是中欧对话问题。的确我们可以看到，中欧之间的对话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到我们的经济关系、贸易关系、经济合作协定等等。1985 年我们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弗来奥先生是负责委员，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应该说我们的在这些年的工作看到，中国和欧洲人民相互之间日益增进了了解，特别是我们作了很多的工作，来克服我们之间文化方面的差异。在加强我们合作的过程中，理解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国际关系的总体发展。从积极方面来讲，文化方面的差距可以促进我们之间相互的学习，这是从积极方面来看。这一方面，中国和欧盟这些年来的对话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还应该继续努力促成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今天我想跟大家谈谈，澳门是如何来做来消除这些文化隔阂的。

大家都知道从历史上讲，澳门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过去我们和外国的接触非常频繁。我所提到的窗口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外交往方面的频度和深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澳门在国际的舞台上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与葡萄牙语国家之间经济贸易合作方面所起的作用。在很多年以前，澳门政府就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现在它的作用更加重要。2004 年 10 月胡锦涛主席访问过澳门特区，这也促进了我们的对外交往，澳门和欧盟的关系也取得重大的发展。澳门和欧盟在 1999 年已经签署了经济贸易合作的协定，这个协定一直在起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和澳门同时是欧盟在亚洲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澳门在三个方面采取了措施：第一就是和欧盟建立一个优先发展的贸易伙伴关系第二点是充分发挥澳门自己的优势，在银行金融等领域发挥优势来创造更多新的贸易合作机会。第三点就是和葡萄牙政府加强合作。因为葡萄牙是欧盟的一个成员国，通过过去的关系，我们能够在尊重民主和传统原则的基础上促进双边关系发展。我们继续努力促进经济贸易、投资合作、高科技发展和文化交流等，还建立一个“发展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同时我们互派常驻贸易代表，比如我们在布鲁塞尔就有常驻代表。欧盟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也有它的常驻贸易代表。双方通过这样经常性的交流才能保证工作的顺利发展。在过去这么多年中，这些机制推动了工作的顺利进行并取得了成就。另外澳门还参加了亚洲投资计划，这是在 1996 年确定的一个计划。现在澳门政府还在积极推动这个计划的落实，澳门政府依照该计划积极推进在经济文化方面和欧盟各国的交流。我们还派出了很多人员去欧洲的大学学习，获得那里的学位，等等。我认为这样的计划能够使我们从欧盟借鉴很多先进的经验。虽然澳门经济发展良好，但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香港没法比。在过去的三年中，我们一直在努力促进北京的中国社科院来加强对欧盟的研究。两天前，我们刚接到欧洲合作伙伴的提议的一个项目“奈斯卡”，即“欧洲研究中心亚洲分部”的项目，我们为这个计划筹集了丰厚的基金。加强亚洲和欧洲的学术和研究方面的合作，也有助于欧盟对亚洲及澳门增进了解。应该说在香港之后，澳门是欧盟在亚洲地区的另一个重要合作伙伴。因为每年我们的贸易额在 800 万欧元之上，欧洲的投资者也在我们这里进行大量的投资，和在内地，香港一样，欧洲投资在澳门也不断增加，虽然很多的欧洲公司在制定对亚洲的投资计划中更看中内地，特别是一些法国公司，所以促进欧盟和我们的合作也一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据我所得到的信息，我认为应该加入到中国和欧盟的对话之中，我想提出以下的建议：一是亚洲包括澳门要坚持自己的文化背景。澳门的生活非常舒适，我们的生活环境很好，应该说条件与欧洲很多国家不相上下，像你们生活在巴黎一样舒适。澳门能够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让你们来这里投资和生活通过共同的生活来加强了解。我们现在有很多学者都在进行这样的交流，无论中国大学的学者还有欧盟成员国的学者，他们的交流对话在不断增加。我们的目标就是培养年轻人的兴趣

使他们到欧盟学到更多的东西，然后为我们服务。应该说中国和欧洲及欧盟之间的对话，能够为我们将来实现双赢的目标起到很好的作用。

4.6 欧洲与中国的统一观

林崇城（中纬积体电路有限公司负责人，人民大学博士）

我从欧盟的模式和中国的统一开始。所谓中国的统一在香港和澳门回归以后，台湾问题就变成中国统一的焦点。欧盟模式这种首先这种经济合作，进行功能性的整合，并在这个基础上推动政治的合作，成为许多学者和政治家思考两岸统一的方式之一。究竟欧洲统一的模式是否适用于两岸关系，目前在政治界和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大体都围绕在主权问题和综合实力两个方面。从主权问题上面来看，欧盟和大陆的战略就不一样，欧盟是主权国家之间区域性的整合，仍保持独立性的国家。但是两岸关系并不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两岸关系还是属于内政事务，用欧盟的模式来做的话，实际上就承认了台湾是一个国家，这与大陆的一个中国原则是相违背的。再从综合实力来看，欧盟的成员国实力都差不多，但是台湾和大陆无论在土地面积、军事力量、人口数量、综合实力上有相当大的差距，这种相互不对称性状态使欧盟模式在两岸关系上的实行增加困难。欧盟模式的选择基本上是一个共性的选择，并且欧盟整合达到了一个比较高层的政治整合，问题是这种共性的选择在现阶段是否能够成功整合整个欧洲的局面，这需要时间来证实。

欧盟经验以两岸目前所坚持的观点和主张来看，并不可以完全套用在两岸统一问题上。除非两岸已经适度的解决厘清或者搁置主权争论问题，但是主权争议包括所谓的国家定位和统独立场不能够马上解决的话，那么在“合则两利，分则两败”或者是区域经济整合以及全球化这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下，两岸如果还是逆势操作，持续这个僵局，最终导致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后果，我想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尽管欧盟模式和两岸目前的主权争议存在的本质上的差异，但如果能像“九二共识”一样，先暂时搁置两岸争议性较大的问题那么欧盟整合模式仍然可以为两岸所借鉴。欧盟整合的架构是否适用于两岸关系，在各界有很多反应，包括台湾的亲民党宋主席所提到的以一种国际关系来确定两岸关系，仿照欧盟模式两岸签订 30 年的和平协议，进行经济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广泛交流等。另外学者吴昭示先生，主张逐步在各项领域中形成一个共同体的双边机构，制定对内和对外政策，并借鉴欧盟的做法在制度层面上建构一个超乎主权的整合性机构，并随着该机构的组织发展走向某种超主权的共同体。学者张小钟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些主张，包括在“两岸统和治理论与实践——欧盟经验的启示”中他曾提到主权共处及共享的概念，指出主权中有独享性、排他性的部分，并认为只要人们通过民主程序同意后，国家可以将主权的权力共同储存在超国家统和机构，所谓的两岸共同体中，来共享主权权力。那么两岸共同体、大陆和台湾就形成国际法中三个法律主体。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欧盟结构适用于两岸关系。但是有一些论述说欧盟架构并不适用于两岸关系，特别是在大陆“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两岸并存，欧盟整合性经验没有办法使用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事实上除非大陆放弃台湾的土地，或者是台湾放弃所要求的主权否则欧盟的方式套用在中国问题上是很难的。他们认为两岸的综合实力非常悬殊，在这样的情况下用欧盟的模式来套用两岸关系有一定的难度。

我想我们对于欧盟模式的了解，以及这两天我们研讨下来对欧盟的认识，应该可以得到几个值得我们思考的方面。首先欧盟模式是以区域经济整合和、和平共存的方式取代土地争割、民族分裂。欧盟与两岸统一问题的根本差异在于欧盟成员国为了追求长久的和平而愿意放弃部分主权。在两岸问题中特别是台湾方面为了争取主权，不惜牺牲其他利益。参考欧盟的模式结合区域经济整合的概念，走出两岸特殊整合的新模式，特别是大陆自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两岸经济力量是一种自发形成的力量，这种区域性的经济整合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此外，两岸和平解决统一的问题，不但对于两岸政治经济发展有高度的利益，对于区域

经济的和平发展也将有极大的推动，再加上大陆综合实力不断增加，面对两岸统一已经是台湾不可避免的问题。台湾当局应该放弃台独的主张，或者大陆也应该考虑用新的方法来解决两岸在台湾政党轮替以后面临的新的课题。英法德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能够化干戈为玉帛，而两岸有着同根生的文化背景，为什么不能将欧盟模式作为中国统一的一个借鉴呢？在我们思考两岸问题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太固守本位性的思维或者自我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把问题聚集在两岸关系上，如果能够像欧盟经济整合的经验一样，把视野提高到整个亚洲经济整合或者全球化领域的经济整合，那么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一些？我想它的困难应该不会高于当时欧洲煤钢联营时期。

欧洲经济整合和中国统一观我个人有几个看法：首先在中国统一的问题上，台湾今天面对的不光是大陆的压力，事实上也来自于自发性的经济竞争和全球化的挑战，这也使两岸统和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第二，如果是这样的话，欧洲的经济整合模式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呢？我们昨天谈到欧盟整合的一些经验，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得到一个启示，中国统一观应该是包含、包容、交流、智慧和发展。当我们有包容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产生一个协调的机制，而“九二共识”就是这样一个方法，包容、交流才能促进双方的沟通。“三通”就是一种增加双方理解的方式，从欧盟经济整合的经验，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就可以产生创新的机制，而以经济体制架构一个经济联盟的概念，是不是就可以丢掉过去历史的包袱，以一种创新的方式解决两岸问题。当然我们还怀着发展的梦想和企图心，是不是有这样的梦想和企图心就能够产生一种新的执行能力，有这样的执行能力是不是就可以推广到亚洲其他国家，形成一个亚洲联盟。在欧洲经济整合的驱使下，中国的统一已经变成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正如有位日本经济学家在他的著作中说到的，“在中国大陆的效应下周边国家如果不善用机会与中国大陆形成合作伙伴，势必会被边缘化，必然会走向衰落。”这是日本经济学家说的，日本是如此看待中国的，更何况是台湾呢？中国大陆已经发展成为台湾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后欧洲经济的整合动力和概念也正是欧洲统和中包容、智慧、交流给我们所带来最大的启示，让我们以最开阔的心态和视野来看待欧洲给我们带来的借鉴。谢谢！

4.7 中欧科技交流和全球化科技合作

余永贤（澳门欧洲研究学会）

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我想谈谈中欧科技交流和全球化科技合作，主要是讲科技发展方面的三个特点。一是科技发展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它以一种非常广泛的方式，影响着整个人类生活的各方面。我曾经在联合国组织工作过，也参加过科学政策的制定。制定科学发展的政策，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应该和人民生活的各个角度和各个方面结合起来，要看到科技的发展对人民生活包括文化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一点很重要。第二点，我们需要采取非常具有前瞻性的观点，来看待科技发展的问题。因为我们都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在科技方面有一些落后，但这是过去 200 年中的状况。但是在两千年以前，中国的科技已经在世界上占领先地位。当初马可·波罗到中国的时候带走了中国的印刷术。并且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开始发展航天方面的探索，宇宙空间的观察等等，所以我们必须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看他的历史和今后的发展前景。第三点我想谈的就是全球化的问题或者叫做普遍化的问题。20 多年前，我曾在巴黎外交部做过一个演讲，当时有一个法国朋友，是位哲学家，他曾经谈到各个国家科学发展的不同状况。他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就是当我们看一幅画时会有一些遐想。一幅画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特点，在某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特点。科技也是如此。我们也同时可以看到，现在科技对世界的贡献，已经超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样的界限。现在的科学家可以是年长也可以是年轻的，可以是这个国家也可以是那个国家的。这种普遍化是第三个特点。这要求我们在科学方面加强合作和技术的转让。因为有的人经常提出一些抱怨，在技术转让方面受到很多限制，使得科学不能得到非常广泛的传播。我认为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是可以分享的，是可以让大家来共同享有的。所以科学的传播、技术的转让必须得到鼓励，这样才能使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认识到的科学的普遍性。谈到科学的传播和转让问题，我们必须注意两个因素，第一个是科技成果来自多种投资管理。它必须经过很多的投入，才能够产生结果，从这个观点来看必须在很多科学家之间进行合作，才有可能使科学产生巨大的成果。第二个是如何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合同的方式来对它加以规范，这点很必要，因为这样做才能够保证那些为科学投入的人获得回报，也能使得科学的发展和文化更加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使它能够体现在文化之中。综上所述，我们就来到了下一个问题，那就是科学方面的合作。

我们可以认真地思考欧盟对中国武器销售方面的禁令，美国的态度，特别是关于战略物资等的。我认为对于我们来说，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机会更大，我们可以把这些合作归纳于欧洲与亚洲的整体合作，或者欧洲与世界的整体合作范围之内。这样说的原因非常简单如果从文化角度考虑就更容易做出解释。另外要指出一点就是合作需要我们从最基础的方面拥有一定的能力，只有拥有这种能力才能进行技术合作。有的国家能力强，有的国家能力弱甚至有些国家没有这个能力，从亚洲来看，许多国家已经掌握了很高的科学技术水平，有这方面的合作能力，所以亚洲国家的合作前景非常美好。一些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美国和亚洲国家在科学方面的合作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所以前景还是很好的，希望今后这样的合作越来越多。现在中国在亚洲的世界科技合作方面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所以与中国进行合作促使中国提高科学合作方面的能力非常重要，大家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了。

下面我想再谈两点，作为我的结束语。

第一点是传统上经济方面的相互理解。从世界范围内看，应该加强在经济合作方面的相互理解，当然各个公司之间在经济合作方面是有竞争的，这种竞争能够优化我们的合作，使大家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但是这种竞争在科技合作中却有另外一种表现，因为科技合作牵涉的因素太多，联系太广，所以需要我们认清科学合作的发展方向，有许多相互竞争的公

司可能有种攀比，需要在某个领域中进行垄断，比如在医药领域等，他们不希望别人的介入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把观点放远一些来看，可能需要整个世界理解科学方面的合作需要各个因素应该结合起来。我们应该更好地理解这点。

最后一点，就是要提倡容忍。在科技领域有些科学家发展得很快，取得很多成果。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可能会有个人的观点，因为没有得出正确结论之前，可以有很多想法，在科技合作中必须有容忍的态度，有不同的观点，大家可以充分摆出自己的理由。但是在事实上我们都应该很清楚地看到有必要大家坐到一起来，共同探讨哪个是我们科学研究的正确道路，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我们能够找到更好的合作方式，从最开始就把我们的合作进行得非常有效。谢谢。

4.8 法德和解的意义以及面临的新挑战

邢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欧盟研究中心主任）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就这个问题发表我的意见。我相信我个人和中国所有的听众一样，对于安德莱·肯夫（A.Kempf）女士关于法国如何提出法德和解所做的报告很感兴趣，我只想讲两点补充。这两点补充也包括了一些问题。

第一点补充就是怎么看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德和解的意义、动因和影响。我认为，简单地说二次大战法德之间的和解不仅是对整个欧洲的形势甚至是对全球的形势都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它不但埋葬了法德和欧洲一些国家过去由于战争引起的敌视，同时也开辟了未来。很多政治家和学者都充分了解法德二次大战之后的进程，我没有必要再重述一次这个事件，我想说明的是，很多政治家学者都指出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德国内的形势和整个欧洲形势，客观上对法德推动的作用。法德在当时那样的形势下，只能走和解的道路。但是我认为也不要忽视法德和解的主观上的因素。我认为法西斯是对欧洲传统文化的歪曲，当二次大战严重的教训使欧洲人民，特别是德国人民有一个新的彻底的觉醒。这个新的彻底的觉醒，是对欧洲文明的歪曲的根本性的纠正，它也是法德和解最主要的主观基础。我们应该看到二次大战后在德国的非军国主义，在外交上实行，在思想上深刻地完成了。这种德国的全面的外交政策和思想上的非军国主义，使得战后法德的关系得以恢复。整个欧洲形势表现了和东亚国家之间不相同的联系。

第二点补充，我觉得应该讨论在当前的情况下，法德发生了哪些变化？我认为，在欧洲的背景下，对法德和解轴心的需求和面临的两种情况都在同步增长。一个 25 个国家的欧盟，需要一个更有利更有效率的核心，像中国话讲一条龙生长的时候，龙头比其他部分更重要。但是与此同时，这么多的新生员同时涌入，也使法德轴心面临新的考验。

我觉得面临的考验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在过去六个成员的时候，如果我们把法德轴心比喻成火车头，这个火车头要拖动的只有四个旅客，当有了 25 个旅客，法德这个火车头就要拖动 23 个成员，而且这 23 个成员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利益和主张与法德之间有明显的差别。当这些新成员没有参与欧盟之前，他们全心全意地按照欧盟的要求去改造自己，力求达到欧盟成员的标准，当他们进入了欧盟之后，他们觉得有权力要求欧盟成员所得到的一些权力，他们有权力在欧盟事务中发挥平等的作用。我记得一个驻华的外交官和我讲，中国是主张全球的平等化，难道在欧盟中就不提倡平等吗？所以这些新成员对法德轴心的认同是和老成员是不同的。我还记得法国的欧盟宪法公民投票否决之后，波罗的海的现任高级领导人讽刺法国，他在文章中写，啊，法国，过去你教训我们，现在你要不要给自己上上课了？所以，我认为这些新成员参加欧盟，虽然不会根本影响欧盟前进的方向，但是会给欧盟带来一些新的因素。法德轴心不得不考虑，更多的新成员对欧盟前景的一些担心，否则法德轴心就不能继续发挥带头的作用。

第二个法德轴心面临的新的挑战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连续多年之中法德国内的经济情况都不是很好。他们对欧元区内财政戒律的稳定增长公约都没有很好的遵守，他们带头要求把这个欧元戒律在各国变得更放松一些，这也遭到欧盟很多成员的批评。再加上法国和德国在今年或者是今后两年都面临政治上的变动，人们一般的估计是德国的新政府或者法国的新总统，总的来讲还要继续为欧盟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欧盟建设上，从来就存在一个高标准的路线和低标准的路线，很多人预计一个德国的新政府和法国的新总统可能会使欧盟的内部低标准的趋向更占上风。所以我认为，从这两个意义上，法德轴心将会面临新的考验和问题。实际上，我们也看到法德轴心在继续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在改变他们行事的方式

他们好像比过去变得更灵活一些，在一些有关欧盟前进方向，有关欧盟防务合作方面，他们和英国加强了合作。在一些需要更极力加强的防务方面，他们又和西班牙进行了合作。所以我认为法德轴心两个国家是不够的，两个国家在很难地拖动 23 个国家，按照以前的欧盟轨道前进。他们必须不断变换自己的行程进行新的组合。所以我认为，法德轴心客观来说，在 25 个的成员国内部有一定的淡化，面临着新的考验。

所以，我就想请教欧洲朋友、法国朋友在当前欧盟情况发生变化前，法德轴心如何发挥作用？

4.9 欧洲在不同时期面临的威胁及其影响

冯仲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我想谈三个问题：

一个是简单谈一下欧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的威胁。第二个问题是他们面对不同威胁时的应对手段。最后谈谈欧洲的态度、他们对安全的看法对大陆的关系，对国际秩序有哪些影响。

今天主要是谈谈讨论欧洲关系有什么意义？主要是讲二战时期欧洲面临的困境和威胁。二战以后面临的威胁有两个，一是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威胁，比如说法国、德国。第二个威胁就是冷战的威胁，东部苏联集团的威胁。面对这样两个威胁欧洲人采取的手段应该是两个，对待内部的威胁就是要避免法国和德国重新发生战争，他们用的是一体化的手段，融合的手段共同体的手段。在国家之间采取联邦制度，这是法国对人类的一个很大的贡献。也就是第一次在国与国之间走出一条路，以前没见过。法国、德国也好，欧洲也好，他们的经验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图景，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还可以这样相处，以前连想都没有想过。对于外部的威胁，主要是来自苏联的威胁，他们采取的措施，还是和美国结成联盟的手段。北约的成立有三个名言，很清楚：把美国留下来，把苏联赶走，把德国人管住。北约就是为此而成立的现在看来问题解决得很好。现在有人讨论，为什么德国问题已经解决还需要北约，因为欧洲人要搭这个便车，北约还是继续给他们提供安全保险。你坐飞机安全不安全？如果安全你为什么还要买保险呢？是因为你还是觉得可能有问题。

我认为冷战结束之后，欧洲的安全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时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捷克斯洛伐克内部发生的内战，在欧洲的边界上。欧洲冷战结束之后，苏联解体之后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地区冲突，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开始解决得不好。高雅讲他们把美国人叫来，这是冷战之后最大的耻辱，因为这个是代顿签署的，所以才有 1999 年的欧洲安全界石，要把前西班牙的外交部长确定为欧盟的外交部长，这都是因为受到了刺激。可以说，地区冲突的威胁，欧洲人是靠建设自己来解决的。

然后，一个新的威胁就是 911、311（马德里爆炸案）、77（伦敦爆炸案）之后欧洲人面临的威胁。这个威胁是欧洲人过去没有遇到过的威胁，既是内部威胁也是外部威胁，也是一种新的安全图景。我今天想和大家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欧洲人怎么办？实际上 911 之后欧洲人讨论得很厉害，究竟要不要把本 • 拉登作为威胁呢？311 之后有一些进步，77 之后欧洲人可能看得更清楚了，但是我们现在观察欧洲的时候，应该记住，精英的想法不应该代表老百姓的想法，应该说精英应该有新的看法了。我有一篇文章叫做《欧洲的安全观》就是讲 911 之后欧洲人的安全观。就是威胁是什么？怎么应对？在 9.11 之后欧洲人吵了架，之后通过了草案，通过了欧洲战略安全报告，我们叫《苏拉苏报告》，这个中文比较难翻译。刚才我想翻译为“欧洲的安全有赖于更好的视景”。这个报告告诉我们欧洲人对安全的新看法，有一个新的解读。没有欧洲的安全，就没有的中国的安全，没有朝鲜的安全。要世界好了，就安全了。这个题目起得太好了，欧洲的安全是和一个更好的视景紧密相关的，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要的观点。就是欧洲人面对 911 之后、311、77 之后的观点。

欧洲人现在认识到要解决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要解决犯罪，要解决地区冲突，只有用多边主义才能解决。如果不通过联合国，不通过多边主义，欧洲的安全就实现不了，这可能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欧洲在 21 世纪面临的新的安全问题的一个答案，这个答案能否解决欧洲的安全问题，或者说这个答案对中国有没有借鉴的地方，还需要观察。我们不知道多边主义、联合国能否解决当前的问题，至少这是欧洲人找到的一个答案。

顺便补充一个观点，就是扩大和安全的问题。这两天听到很多关于扩大的问题，其实

欧盟的东扩、南扩，包括欧盟接受土耳其都是因为安全是第一因素，欧洲人为什么要把土耳其接受过来，土耳其可以帮助他们解决 21 世纪文明冲突的威胁，土耳其的入盟就成为很符合逻辑的解决办法。如果说欧洲人能够在六千万穆斯林的国家，实现和平的政权更替，那欧洲人比美国人就伟大多了。所以扩大等于安全。扩大是重要的，实际上也是成功的外交手段。

第五部分：大会总结

5.1 中欧文化论坛——总结与展望

主持人：于硕
欧方：罗卡尔 维尼翁
中方：陈越光　宋新宁　陈彦

于硕：我曾在阿尔卑斯山作牧羊人的研究，当过牧人。此刻论坛给我的感觉是，我们好像是春秋之际游牧，在中国的牧场上停下了欧洲思想的羊群。大家或许知道，游牧的时候牧羊人和羊群都不知道自己要去什么地方，但大方向是有的，比说夏天要到2000多米的阿尔卑斯山上，冬天则会下到蓝色海岸。很遗憾今天法国的蓝色海岸已经变成水泥海岸了，没有了草场羊不去了，人去了。羊群停下来，总是因为那个地方对它们有某种吸引力。现在欧洲思想的牧群到了中国的土地上，特别地留在了南沙这块水草丰润之地，与中国的思想牧人相约论道。今天大会已进行到第四天，大家都很兴奋，有很多新鲜感受，我请在主席台上就坐的四位先生和我们一起总结。希望大家轻松一些，让自己处于半理性半感觉的状态，这是当代知识分子很缺乏的一种述说方式。

《科技中国》的总编陈越光先生将以一个第三者的角色，超然观望倾听各位的发言，然后对我们的整个大会做一个提纲式的总结。

……

今天卡蓝默和维尼翁两位先生给我们作了全面精辟的总结，从他们的发言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中国人如何看欧洲，欧洲人十分在意。二、卡蓝默先生的五点设计是一种可生存的美好的人类社会的设计。三、我们必须共同管理未来的世界，通过和平的建构，将我们的论坛作为一个承载体，来共同探讨未来的世界。最后是《科技中国》的主编陈越光先生在听了四位的发言之后，作为“第三者”进行发言。

陈越光：当一个会议要结束的时候，也意味着这个会议开始了面向未来的时刻。所以在听四位学者发言的时候，我更多地想到了这个定位为长期论坛的论坛，它将如何走下去？我们所作的一切思考都已经只是我们的背景，所以我们也有必要从背景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第一点，应该感谢会议的组织者于硕女士在论坛第一天所作的发言，她把我们这次论坛建构在中欧第三次碰撞的背景上。刚才单先生提出，在二十一世纪之初看中欧交流，我们前面的痕迹更多的是100多年前的那次碰撞。但是这100多年的历史沧桑，使中欧双方在角色上都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不同概括起来可以理解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的缩影，而不是世界的一个另类，这一点是不一样的。刚才卡蓝默先生也转述了会议发言人丁学良先生说的在欧洲看到的一系列问题中国都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包括冲突、迷惘、失望，有什么是中国没有遇到的呢？另一方面来看，欧洲已经是世界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世界的代表。100年前，中国现代化的代表者、中国共和政治的代表者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流者昌逆流者亡”。这个潮流是什么？就是欧洲市场。所以在当时的中国人看，看世界就是看欧洲，欧洲就是世界的代表。但是今天世界多元化，欧洲是世界的一个部分，在我们的论坛上我们还看到了作为这个部分，欧洲是人类进程中一部分具有探索性的力量，所以从这一点出发，我觉得论坛的这第一个背景对我很有启发。

我们在论坛中看到的第二个背景就是全球化。今天严格说来没有人可以躲开全球化。那么在全球化面前我们看到了什么？对中国人来说，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有三种代表性的模式和力量在运行着：第一种很简单，是美国主导的一体化。第二种很有意思，是产生在南美开始风靡世界的巴西组织的世界社会论坛。这个论坛每年一次，每次10万人以上。10个月以前，我参加联合国组织的一个对话会，这个对话会是联合国总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亚洲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等等世界各大机构，主要是和谁对话？和社会论坛的组织者巴西的冈第多先生对话，对话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你们那么大的论坛为什么拒绝所有的国际机构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我们申请了无数次，但是都被拒绝了最后我们不得不以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巴西大学的名义来申报去参加这个论坛。冈第多先生说我们论坛的主要宗旨就是反对你们，创造另一种全球化，我们怎么能让我们所反对者直接参与呢？二、联合国总部提出新千年联合国计划给你们，你们不回应，为什么？冈第多的回答是，你们所有的计划都只是局部的小改革，而我们要的是彻底的大改革，所以对我们不作你们单一的、具体的回应。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关于世界的前途与未来的问题上一些对立的思考，但它也是一种思考，一种全球化进程中的产物。第三种模式就是我们的论坛所讨论的、吸引我们的欧洲进程。刚才维尼翁先生、杨成绪先生、单世联先生都多次阐述了欧洲进程的目标、特点、方法，在建设人类未来中的意义和价值。这三种模式，欧洲的进程对我们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第三点是为什么欧洲进程对我们有特别的吸引力？如果今天的中国人只是从旧政治格局、旧政治方式的角度来看待欧洲进程，认为只是对美国单边主义势力的一种平衡，当然这是对的，它是一种平衡，但是如果只是这样看，那我们还是以一种旧眼光在看新事物。当然我要强调的是，人类世界从来就是新旧交替，没有旧眼光是不行的，至少是不客观的。但如果只有旧眼光就没有未来，只有现实的平衡、现状的维持而没有未来。所以当我们在这个论坛上反复地了解、倾听、琢磨欧洲进程的时候，我个人感到，有三种东西是最打动我们的：一，目标。在欧洲的进程中，欧盟委员会是目标的设计者，这个目标就是维尼翁先生刚才说的，创造人类进步的一种模式，在人类历史上我们要创造一种新的东西。正因为这个目标本身具有的超越性，才可以在人性、国家性普遍价值和对现实利益的关照之间形成一种既妥协、又平衡但还有进步的关系，所以一个远大的目标对我们是有吸引力的。尤其对中国人来说，我们有时候不得不为了现实的利益和问题的解决而暂时把目标放一放，中国人将需要再一次被目标感召这是第一点吸引力。第二，方法。从世界之交开始，我们就在讨论治理的问题，治理也可以翻译为协同治理。今年6月我和卡蓝默先生组织了非洲、欧洲、亚洲、美洲四大洲的治理思想登陆中国的论坛，关于科技发展与协同治理，现在我们的专题网站也做出来了。在欧洲建设的进程中，不是单一的政府模式决定、不是单一的强势来决定，而是政府、团体、公民社会来决定的，是在欧洲整个国际层面、国家层面、地区层面、民间层面多层面的协同治理。第三，信念。我们在论坛上有一个感觉，今年春天以来，好像对欧洲的前途中国人比欧洲人更焦虑，似乎在论坛上常常听到的是中国的与会者问，还可能吗？欧洲的与会者总是给我们解释，为什么它还是可能的。这一种执着进步的信念使我想起印度的圣雄甘地的一句话：“善是以蜗牛的速度前进的。”中国人需要在这里学会以蜗牛的速度来坚持善和进步。第四，刚才卡蓝默先生也提出，我们要考虑以后的论坛怎么办。可以说无论一种政策、实验还是一次会议，它成功的地方大概就是它需要改变的地方，而恰恰是它不足的地方是它未来的出发点。当我们思考这次论坛以后继续向前走的出发点的时候，也是在反思我们的不足。这里面有两点，一个是布局。我们看欧洲进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整个欧美都通行一句话“明天的世界是由今天布局的”。所以我们论坛的未来走向也是由今天布局的。越是从长远的设计来看，越需要考虑这个论坛长期的设计和布局，而不是每一次论坛开始的时候思考和寻找本此论坛的主题。从现有的设计和布局和论坛的全体与会者内心所希望的论坛所承担的使命来说，我们

现有的布局还是比较简陋的。关于如何长远地布局和设计这个论坛是我们未来论坛的出发点。第二就是共同问题。这次论坛中间，更多的是我们在互视，我们在看欧洲进程如何，欧洲的朋友们希望了解中国的发展怎么样，当然这次论坛本身更多的是欧洲命题，但是即使说我们下次论坛重点是中国问题，主要的层面也是一个互视，但是今天的世界对中欧来说，我们已经不能局限于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已经不能局限于这个想法了。以前的世界如果中国人把中国的事情做好了、欧洲人把欧洲的事情做好了，当然是对人类的最大的贡献，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整体大于局部之后，欧洲人和中国人，中欧思想者和实践者有必要共同考虑人类未来面对的共同问题，我们需要对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凝聚思考和行动的力量。

最后我想说，我参加这个论坛两天了，得到的启发是我非常感谢会议的组织者、参与者和发言者。有时候我们也会说，单纯以大学研究机构为参与主体的论坛，是不是我们的理论性显得不够呢？我不这样看，所以最后我想引用卢梭在概括古往今来什么是理论时所说的一句话“理论就是热情的、动人的沉思”。我们这个会议担得起这句话。谢谢大家。

于硕：非常感谢陈越光先生给我们所作的热情动人的总结。他让我们学会缓慢，让我们放慢脚步，因为“善”需要一个生命的时间和空间去慢慢体验。他还谈到信仰，其实欧洲正是欧洲人的一种信念，是建构在人类共同体之可能这样一个信仰之上的。最后，我们需要浪漫的乌托邦去想象未来，但需要理性的布局和设计去建构我们的世界。我们的论坛是实现这一理想的一个动态过程，每一点都是它的一个路标。陈越光先生还指出了这次论坛的缺点，即中欧双方作为两个独立的个体互视的时候多，也就是说各自的定位是“你”“我”分离，在对立的二元关系中看待一个不可避免的整体世界。的时候，我曾经在我的发言中谈到过，人类历史第一次拥有了“人类共同体”的真实可能性，我们正在由十九世纪的经济人变成二十一世纪的生态人，只有在认识到这样一个本质变化有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义不容辞地去承担共同体各自要承担的责任。走出“你”和“我”的二元对立关系，进入“我们”的共生的定位从而在未来世界建构中发挥“我们”这一主体行动者的作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保证各自的文化多元性。

卡蓝默：我想继续讨论之前，代表欧洲的朋友们表达我们的感谢。感谢霍英东基金会，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会场、资助，还给了我们很多其它援助。所以我非常热情和诚挚地向霍英东先生表示感谢，感谢他的热情的欢迎和亲自参与论坛。另外特别感谢酒店的所有的员工，使论坛进展有序，我们的生活环境舒适。感谢我们的翻译们，他们的工作是非常富有挑战性的，他们事先不知道发言内容，必须集中精力，我很敬佩他们的这种职业精神。他们的参与和为我们会议的成功所作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最后还想感谢我们所有的年轻志愿者，他们的表现非常出色、有效、非常可亲可爱，他们始终在我们身边。我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有时差和语言的障碍，但是当看到他们的微笑，当他们用法语和英语和我们交谈，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最后还要感谢所有的与会中国代表，我们之间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由于主题的设定，我们想介绍谈的太多，给中国朋友们谈话的机会较少，而我们其实十分想听你们讲话。

于硕：我利用执行主席和论坛筹办人的身份在这里特别感谢卡蓝默先生，感谢他特有的对人类理想的顽强坚持。我要尤其感谢的是学生志愿者和许多默默为论坛做出贡献、提出建议的朋友，如霍英东基金秘书长何建立先生，澳门基金会负责人吴志良博士，法学教授邓正来先生。

罗卡尔：今天让我在这里做总结，我感觉到有一些为难。我前面已经有五位作了总结发言，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我没有太多需要补充的了。如果说对我们这几天的工作作一个回顾，首先我要感谢我们的组织者。他们的确工作得非常出色，实事求是地回顾一下，

这几天的工作确实令我们非常难忘，非常新鲜。因为多年来欧洲人、中国人都有着非常特殊的经历，不是通过官方的渠道，而是通过两国人民之间，还有两国学者进行自由的交流。好像大家都常讲的一句时髦的话："通过公民社会来对政治生活施加影响。"这也是我们交流的主题，应该说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一直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我们看到欧洲方面的与会者或者是在政府担任很高的职位或者是在学术上有很高的建树，他们花了一周的时间来参与这些讨论，主要是表示了对中国问题的一种关切，虽说还称不上是焦虑，但程度也差不多了。我不会说我们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害怕、担忧或者是恐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心怀恐惧地去工作，我们只是认为跟中国的交流是非常必要的。我想告诉亲爱的中国朋友们，我听到三位中国学者在讨论发言的过程中说到中国非常关注欧洲，而且他们看欧洲的历史并不仅仅是从教科书读来的，不仅是看我们过去的优缺点。中国朋友现在有权利以一种讨论、辩论的方式和我们共同研究欧洲，和我们在座的所有欧洲朋友一起进行分析，主要目的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对欧洲将来的政治梦想和政治前途作出一个最好的理解。对一些主要的问题，比如说防御问题等，美国的观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及欧洲人看问题的方法，综合这些我们才能变成世界蓝图最好的规划者、构想者，创造一个大家都可以和谐生活的社会，让各个国家、各国的人民都可以在和谐的条件下生活。

我个人对欧洲的前途并没有丧失信心，也许我属于少数。我不相信战争，我想提醒大家注意，还有另外一种观点或者是另外一种选择。我们可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处理冲突，一种非暴力的方式。与过去解决冲突的方式不同，我们可以通过世界范围内的有效谈判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应该说欧洲的建设是没有限制的，我现在看不出在什么情况下中欧有任何相处的限制。所有方面的限制都应该被突破，在法制的前提下，推崇民主、人权、自由贸易、自由交往等等，这些有效的工具都会把中国推向全球，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非常重视这次与中国同事们的见面、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可能有些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式的讨论或分析。在此我想说，欧洲和中国的相聚，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文明的相会，实际上这对世界的发展起到了一个指导性的作用。欧洲和中国加起来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的文明对世界长久以来的发展以及它将来的命运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欧洲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这次研讨会主要涉及到我们的集体利益，中国人的利益和欧洲人的利益，这也使我们能够就一点做出非常精确的分析。

今天我们的讨论会对能源问题没有过多地强调，之前伊沙贝尔·迪朗说，我们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这个问题和全世界的发展紧密相关，尤其是大家要发展核能，但是核能又带来一些问题，这些还没有得到充分和展开式的讨论。无论在欧洲还是中国，大家都在致力于发展可再生能源，比如风能、核能、太阳能、沼气等等，我觉得大部分欧洲人也非常赞成在这方面做出努力。我知道中国每年电力需求的增长率是20％，几年就要翻一倍。不到十年电力的消费需求就要增长一倍，那么我们怎么办？完全用煤吗？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如果用煤，可能要不了多少年就会使资源枯竭。所以我只想跟大家说，请增加一点同情心，少用一点能源。最好是发展核能，我认为大部分的欧洲人会这样建议你们，对中国人这样讲，并不是从欧洲个人的利益考虑，而是从整个世界和全球的利益出发的，就是说发展核能可以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紧迫问题。在前天早上的发言中，讲了很长时间关于金融体制和财政手段方面的问题，因为金融体制现在遇到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中国的金融形势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我想应该实行一种非常明智的财政政策。我们希望有一个新的"布莱顿森林体系"的谈判，谁能够引导我们建立这样一个新的体制？我想只有中国和欧洲肯定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说服美国朋友，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起到的是决定性作用。我们的美国朋友很年轻，有时候会有一些不民主，而且易怒。中国和欧洲有着古老的文化，有着文明的传统，我们可以用古老的文化传统对付有些人的易怒或不冷静。中国的文明有5000年了，欧洲可能相对中国来说年轻一点，但是美国更年轻，他们只有200年的历史。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

端，我们应该进一步合作下去，为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利益努力工作。希望我们下一次的研讨会可以改善这次会议所有的不足，可以更好向中国朋友介绍欧洲，我们也可以在再次来中国的时候看到中国更多的变化。你们拥有相当于欧洲２．５倍的人口，而你们50年中所走的路是我们过去很长时间才可以完成的，所以你们在前进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很多问题，可能也会有很多新的领域需要探索，只有通过辩论和讨论才可以进行正确选择。我已经准备好以后继续参加这样的活动，谢谢大家！

关愚谦：谢谢罗卡尔先生的发言。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下次我们如果再开这样的会，您还来吗？

罗卡尔：我并不信教，但是如果上帝还让我活下去的话，我肯定会来的。我还想说一点，二十一世纪让我感到害怕，可以说在世界各个角落我们都有一点失控，我认识最深的是法国和欧洲大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大陆上暴力正在发展，而且我们在逐步失去秩序。而美国的政治将可能加剧这种暴力和人们之间的仇恨，并不仅仅是指那些百分之一的穆斯林恐怖主义分子，而是整个的穆斯林世界，还包括其他的基督教世界和佛教世界，我们不太清楚。我的感觉是目前这些问题的处理得都不太好，而我认为答案就在于我们更应该相互倾听。中国和欧洲凭借自己的努力能够做到这一点。只要我还有力气我就会继续参与以后的讨论。

关愚谦：如果说我们两个古老的大陆亚洲和欧洲能够施加影响，促进和平，也许我们可以尽量减少暴力。这样的对话是很重要的。

宋新宁：正如刚才罗卡尔先生说的，已经有好几位对整个论坛做了很精彩的总结，我只是作为这次论坛的主办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的代表，简要谈几点看法和感想。

我很高兴看到本届论坛取得巨大的成功，本届论坛的成功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中欧双方在论坛中的交流与沟通是很充分的。我们论坛的议题很广泛也很具体，涉及到了政治、经济、社会、全球治理、主权让渡、国际关系、国内发展等各个领域，这表明中欧双方的学者和官员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共同的兴趣，乃至相似的追求。例如我们谈到很多关于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等的问题，

二、中欧双方在论坛中的交流和沟通应当说是相当深入的。我们不仅阐述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和经验，而且探讨了欧洲的模式在中国的可行性问题，例如法德和解的模式到底是不是适合于当今的中日关系。当然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并不一样，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才需要通过这样的论坛，来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特别是加强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

三、中欧双方在论坛的交流和沟通是相当坦诚的，中欧之间在很多问题的领域存在很多共识，在很多问题上也存在诸多不同的看法。我们彼此之间的交锋是非常有益的，因为我们谁也没有去刻意迎合对方。我想这次论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平等对话。

四、论坛为我们今后进一步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届论坛规模之大，与会者人数超过了200人，代表性非常广泛。我们吸引了各个学科和领域的人士，这在中国过去所举办的有关欧洲问题或中欧关系研究的类似的会议或论坛上是很少见的。我们过去的会议和论坛的对象相对来说是比较窄的，这次不仅人数多而且还涉及各个领域，参加会议的有欧洲的专家，还有中国的专家。这次交流对今后进一步加强中国的欧洲问题研究、进一步推动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为我们今后开展进一步的交流和沟通打下了更加坚实和广泛的基础。

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可以说是当前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好的一对双边关系，中欧之间的政治关系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中欧之间的经贸合作是目前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水平最高的。我们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欧盟是现在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如果看欧盟在中国的投资、欧盟对中国的技术转让、欧盟向中国提供的政府贷款、中国和欧盟在高科技领域进行的合作以及中国、欧盟至今的一系列合作项目，我们说中欧之间的合作关系比中国与任何一个国家的经贸

合作关系水平都高。过去我们常说的是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不仅仅是数量还有质量都远远超过了中美和中日。中欧在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上也最为接近，目前双方都在探讨如何建立一种真正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我们讨论国际关系中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时候往往看重的是国家间关系的层面，但是在我看来，就目前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而言，这种关系对各自，特别是中国自己的国内政治的发展，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的。例如我们经常讨论的中国国内的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构问题、中国国内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国国内公共服务、社会公平、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等等问题，都可能从欧洲的经验中获得一定的启示，这对中国国内的发展是很有益的。但是正如大多数与会者都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讨论到的那样，中欧之间的相互理解还很不够，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而且应该是中欧双方共同来做。所以作为中国主要的欧洲问题研究机构之一，中国人民大学的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愿意在这方面做出我们的努力。目前我们已经与欧洲的合作伙伴，特别是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共同开办了欧洲问题研究的硕士项目，第一期已经招收了四十四名硕士和九名博士研究生，是中国和欧洲的教授共同授课的。我们现在正在与欧洲的合作伙伴计划在布鲁塞尔联合建立一个当代中国研究所，在欧洲招收当代中国研究的硕士和博士。明年我们还计划招开一系列有关当代欧洲和中国的研究会议。我们也愿意将这个中欧文化论坛继续举办下去，提供必要的资金、人力和智力上的支持。希望我们在不远的将来，在第二届中欧文化论坛中再与大家见面。

陈彦：论坛的组织过程中，包括卡蓝默先生和我自己，我们都有一个感觉，在邀请欧洲学者的时候，欧洲的学者、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包括军事家，他们愿意到这里来。他们的日程是非常紧的，因为我们都是到了最后很晚的时候才真正通知他们，这些与会人员都十分坚定地表示我们一定想办法挤出时间来参加这次会议，他们这么热情地来参加这个会议至少有两个条件：一、他们都是欧洲事业的坚定支持者，他们相信欧洲联合、欧洲统一的方向。罗卡尔先生说他自己对欧洲的前途比较悲观，但是我不太相信。我说我自己对欧洲前进的方向也有点悲观，尤其是法国、荷兰的公民投票否决了欧洲宪法以后。但是我想向大家透露一点，最后我们的组织工作中有一些困难，有很多人原来准备来但是没有得到及时的通知，我们的人员有一些变动，是罗卡尔先生为我们力挽狂澜，亲自去动员与会的欧洲人员，实在功不可没，他既然可以这样做，一定是有坚定的信念的，我想他对欧洲的前景并没有丧失信心，尤其是对中欧的联合对话有坚定的信念。二、来参加会议的欧洲与会者都坚决相信欧洲同中国之间的对话对欧洲自己、对中国、对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有着重大的意义，如果没有这两点他们是不会来的，我在会上大家应该感觉到了这些。

在这两个条件中有两个因素：一、信念。信念就是理想，是对未来的理想，对理想的追求。二、对话，作为国际交往准则的对话。所以在会议结束之前，我想就这两个问题谈一下我的想法。我们这次论坛从对话的意义上讲，应该说是一个很好开端，刚才大家都提到了，是一个共识。关于对话，我想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对话已经成为一种价值，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说对话不好，当然也有可能一些恐怖主义等极端分子会说对话不好，但一般来说是一种价值共识。对话是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迪亚森谈到多边主义的问题的时候曾经讲过“对话无非是一种共同解决问题的民主的方式”。那么中国与欧洲的对话本身从地理意义上讲，欧亚大陆两端的对话，是欧亚两大文明的对话、政府与政府间的对话，这个对话在很多方面都已经很畅通，但是我们觉得在社会各层面的民间的、综合性的对话并不充分，那么也就显得有必要。我讲的欧中对话不仅仅从社会学意义上讲是多元的，从历史发展的差距上来讲也是多元的。最后来参加会议的欧洲议员布朗热先生在谈到欧洲的时候，提出了三个欧洲的概念。一个是共同体的欧洲，指法德最早创建煤钢共同体的六国欧洲，它们希望共同走向欧洲一体化的前景；第二个欧洲是自由交换意识的欧洲，以英国为代表的只想建立一个大市

场的欧洲；第三个欧洲是后共产主义的欧洲，就是东欧、中欧这些国家，最后加入的十个成员国。我想这里他讲到了欧洲内部的差异性，欧洲联合的进程本身就是多元对话的过程。从中国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分为三个中国：一、现代的、经济正在迅猛发展的中国；二、少数先富起来的阶层，他们从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已经走向后现代的中国；三、一个更广大的中国，这是纵深地区的中国，指广大的农村，还有从制度层面上讲的中国。这个中国还是一个前现代的中国。从历史差距上讲，欧洲和中国的对话也是三个欧洲和这样可以分出的三个中国的对话，是不同层面的对话。在这样的背景下要保证对话的有效，我想必须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广泛参与。既然对话是多元的，就要多元参与，各个领域的参与。参与以后可以促进全社会共识的形成，激发民间的公共舆论、民间的参与意识。二是制度化。制度化是欧洲建设的经验，就是说包括法德和解在内的一系列成就和经验，没有制度化是不可能的。欧洲的创建者，他们最早的动机、最重要的想法就是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机制。贝尔图安先生在他的谈话中也讲到，我们要创造一个机制来使得战争变得不可能。对话也需要一个机制，没有机制就不可能坚持就没有高于一般情况的和解的大的制度框架，所以需要官方、民间等各种渠道有规律性地沟通，为讨论、交锋提供舞台。所以我想我们这个论坛应该在这方面做出努力，成为一个交流的舞台。

对话是双向的，论坛的设想本身刚才卡蓝默先生已经提到了，各位也都提到了还想持续下去。如果第一次论坛的主题是主要讲欧洲，是希望中国的朋友们了解欧洲的情况，看看对欧洲能不能有所借鉴，这样一个主题，并把这个主题带入中国的公共空间，那么下一次的论坛就应该是把主题转到中国来。我的想法是中国作为一个欧洲公共空间的话题在欧洲也是不够的，虽然欧洲的媒体对中国的关注比较多，但还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一个综合性的论坛也是不够的。所以这个论坛也希望能够把中国这个话题比较系统地、综合性地引向欧洲的公共空间。

第二个想法是关于理想。刚才说到了对话的逻辑，第二个是理想的逻辑。对话必然是开放的，因为我们必须向对话的对象敞开心灵。开放也意味着面向未来。在发言当中，秦晖教授谈到了科学进步观。因为现在我们在讲科学的进步观的时候，有人就提出进步是什么的问题。二十世纪相对于过去有什么进步，两次毁灭性的战争，有什么进步可言？秦晖教授谈到，可以把进步这个概念区分为价值论上的进步和科学论上的进步。从科学论上来说，发明了原子动力以后，我们可以用核能发电也可以用核能毁灭人类，很难说有进步，但是在价值论上我们还是应该有进步这个概念的。比如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还是可以用进步这个词的。从这个意义讲，我们谈人类发展、经济发展的秩序性等就是希望追求一个美好的未来，在价值论上我们还是想走向一个更好的方向。追求梦想是必须的，包括欧洲建设、欧洲联合的方向就表明人类不应该放弃。欧洲向我们表明它并不听任命运的主宰。在今天的会议发言中，有很多的发言者都提到了，比如于硕女士就专门提到了，我们正面临全球性生态环境的恶化、恐怖袭击、疾病的传播、金融危机、能源紧张等问题，这些并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问题。在这些共同的问题上我们难道只能束手就擒吗？难道我们就放弃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的努力吗？所以我想欧洲的经验应该有助于我们向理想、向未来敞开。在欧洲、美国，忧郁症是一种很普遍的病态，心理分析学的实践告诉我们，将心中的潜意识甚至是无意识的积淀释放出来是有利于治愈忧郁症的。那么对话本身是一种思想的交锋，也是一种心灵的沟通。同欧洲对话、借鉴欧洲建设、欧洲联合的经验，有利于我们走出犬儒主义的逻辑，有利于我们走出幻灭的关于未来的逻辑。我在这里相区别欧洲联合和欧洲建设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我觉得欧洲联合主要是指地区性的整合，是从外部看。欧洲建设是欧洲内部制度的建设、制度的创新，这两者互为表里。参照欧洲的模式，可以促进我们整体的思考，走出经济万能的逻辑。中国古代有“天下主义”这个传统，袁伟时教授讲到了这个问题。丁学良教授在他的发言里提出了“万国归心”这样一个中国的古训。参照欧盟的经验，中华民族作为天下主义的传人，我们能不能将

传统的所谓“万邦来朝”这样一种自我中心的盛世情怀转化成一种“万国归心”的天下主义中国的天下主义我认为法语既可以翻译成Sino-centrisme，也可以翻译成 sino-universalisme。也就是说“天下主义”既可能是一种自我中心的天下主义，同时也可以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一种价值上的普适主义。从欧洲的角度来讲，可能学文科的人都知道我们六七十年代曾经批评过欧洲中心论。比如历史学界曾提出，现有的历史书都是写欧洲的，中国在世界史中没有地位，这是欧洲中心论。我想在欧洲也存在着欧洲版的“天下主义”，比如基督教的扩张是天下主义普世论的一套东西，所以欧洲也存在着一种自我中心和天下主义这样相辅相成的两面，克服自我中心、光大以价值共识为基础的天下主义，应该说是时代向欧洲和中国提出的共同挑战，我想这也是中欧论坛今后努力的方向。

5.2 从欧洲视角看论坛的举办

卡蓝默

一、引言

这次“首届中欧论坛”的目的并非是交流中国与欧洲关于世界或者关于中国与欧洲关系的看法。

在组织者的头脑中，这次论坛显然是“不对称”的，讨论的话题是以欧洲为中心，然而讨论所使用的观点却是从中国的角度。

我们十分高兴能与你们共同来分享我们的热忱，我们以往的经验，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当我们在那些真正为欧盟建设出过力和现在的欧盟建设者们面前发言，向他们提出要深入工作重点等等意见时，对自己心存的怀疑态度。我们也十分高兴，能够坐在一起，用几个字几句话，或者几页纸来共同谈论那些可能要写成好几部书稿的条约，能够暂时放下手头忙碌的工作，为了从日常活动中解脱出来，为了欧洲自己，为了中国社会，从一段长期、复杂、众多矛盾方面参杂校错的历史过程当中总结出来一些经验与教训。我们也很高兴能做一个总结，可以使我们理清前面那些发言文章里面说所过的问题，理清我们头脑中的想法，以及在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最后，我们还希望回顾一下别人，即中国，对我们的看法，所有的中国的与会者和研究人员队我们的看法，既包括那些从内部了解我们的人，比如关谦愚教授、吴建民大使，还有那些从外部了解我们的人，比如丁学良教授和秦晖教授。

荷兰和法国的春季全民公投结束之后，有些人开始考虑：既然说欧洲建设正处于危机之中，我们举办这个论坛到底有什么用？在中国，更有甚者这样讲，被我们听见：法国人的一声“不”断送了欧洲的大好前程。但是事实上，这场危机恰恰为我们这次论坛带来了更大的动力，并且，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有了更大的意愿与大家分享经验，进行交流。这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想到时间问题：五十年的时间，建设一个人类历史上的新事物，伟大的工程尚未完成。

其次，正如乔治·贝尔图安所讲，从长远眼光来看，这并不是欧洲最严重的一场危机，如果说这场危机很真实，即它也可以转换到完全相反的立场上去。

最后一点，我要说的是，由于危机，更加强了我们今天论坛中所提及的“深入到问题本质”的意愿：1欧洲，2 我们所真正支持的，3 使欧洲成为她自身成就的被害者的诸多矛盾冲突相互对质。源于外部的扩张需求逐渐增大，然而之前的扩张尚未被很好的消化，这是造成这些矛盾的原因。面临危机与自我表达的意愿造就了一部由一系列综合概括的文章组成的研究汇编，一部我们说，对欧洲自身有积极作用的文章集合。这是此次学术讨论会第一个没有事先预见到的成果。论坛上所讲的文章很多都是开会的前一天夜里赶制出来的，有一些甚至是讲话者在讲话之前的几分钟写出来的。这是由于每个人都带着强烈的传达的愿望，这意愿简单的发自内心，没有掺杂着半点高校的科研或者是顺应政治的意志，带有其独特的特点，某种程度上来说，或许还是独一无二的。

二、对欧洲的教育和对中国的启发

我们应该从这几天以来的，用坚定的声音和不同声音做出的，对欧洲之未来的诸多深刻思考中获得些什么启发呢？不合常理的是，必须首先从对欧洲自身的教育谈起，然后才能从中总结出对中国的可能的启发。

1）重新振作起来的欧洲

就像在真挚的谈话中往往被形容的那样，敢于自我剖析的人就能自我振作。中国的观点

同时也是欧洲人自己讨论得最为激烈的一个观点，就是欧洲建设的目标仍然没有完成。我们务必继续深化拓展欧盟未来的出路，同时做好准备应对所有不可预料的突发事件，准备应付一切创始者们在一开始没有能预见到的问题：

- 欧盟对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不可抗拒的诱惑力，这既可成为和平的因素，但又是不稳定的因素：如何才能在一种以政治措施作为首要基础，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地理上的联结的条件下组织好这种关系。

- 同样是过去那些军事力量和外国古典政治的梦想者们没有预见到的，软力量角色的出现或许将今天欧洲遇到的死胡同的局面转变成了一种新力量。

- 从某种观点上来讲的民主的疲乏，使今天的统一，即建设欧洲共同体的紧迫感，与初衷相去甚远。

- 第二种常理，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变为协商、对话和在不同社会传统、文化传统、政治传统和法律传统之间寻求一致。

- 米歇尔·罗卡尔，乔治·贝尔图安和其他人都曾重点指出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初建立欧洲计划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然而，我们敢说，这个和平的计划并没有得到逐步地深入和推广。从最初的深入发展国家间友好和平关系开始，这个计划只在一些社会团体之间得到贯彻（正如杰罗姆·维尼翁所讲到的，这种社会联合处于欧洲计划的核心），这项计划最后也包含了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这种所谓的和谐关系正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2）与中国所面临的社会冲突相对照，可能的启示

我们，作为外国人，能够从欧洲的经历中总结出一些社会大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从中国今天遇到的矛盾冲突来看，这些经验教训对中国无疑是具有一定意义的。我们的经验教训到底能否作为中国的社会建设的前车之鉴呢？我们的经验教训能否为中国在对外关系政策的选择中起到参考的作用呢？

1 中国社会建设

我们已经做过统计，正如同丁学良先生所指出的，在欧洲建设中所出现的部分问题在中国现今社会也可以找到影子，并且往往还伴随着现时的忧虑。

目前对于欧洲，如何实现经济效率、社会合作和可持续发展三者之间的必要和稳定的平衡，是共同计划的基础核心问题。同时这也是中国社会和谐发展和“循环经济”建设所要面临的共同问题。

欧盟逐步整合其各个成员国和地区，逐步缩小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的方式，也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满足统一和多样性两种要求的，并行管理方式的多种学习渠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人们称之为辅从性原则的多种回应。首先是如同让路易·布朗热所说的“合作性质的联邦制”，欧洲委员会对议案的垄断权与政府间逻辑相去甚远。随后，是如奥利维耶·多尔所讲的，在由民主决策，随后在全体成员国之间生效的欧洲共同体法律内部，各国家法和各司法传统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如约尔迪·普约尔所提到的，国家主权和责任分担这个全新提法去除了国家间领土问题以及国家与地方团体之间的能力分配等问题中夸大的成分。林崇诚甚至提出了一个有关主权的不太排外的观点，跟随着欧洲的先例，中国可能在对台湾问题上取得进一步令人满意的进展。

最后的一点反思是，要把握住改革的方向，就一定要使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牢牢扎根。只有在欧盟的保障之下，扎根于民主精神，扎根于法律至上的原则，才能领导欧盟的新成员全部朝着和平的方向前行，没有争端，如约尔迪·普约尔 ，米兰·库昌所说的，结构改革又是一件太雄心勃勃的事情。以同样的方式，杰罗姆·维尼翁向我们说明了，植根于社会公正的共同价值土壤中，植根于对话与团结一致的基础上，如何能赋予欧洲社会模式以结构改革的必要力量。

关于中国建设的最后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家内部地区间合作与对外开放，二者的关系协调。在此问题上，秦晖认为，不能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构成关系社会的诸种价值相互分开；这就是为什么法律既权威，而又多样化，条约和法律的作用影响到所有的层面。以同样的方式，杰罗姆·维尼翁强调了欧洲社会内部社会团结，和为把欧洲建设成为国际上一个开放的、有活力的欧洲具备的优势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且自信，社会团结和对外开放能够同时实现。

2 中国同周边亚洲国家的关系

如吴建民先生所说，这个在此次会议上并未引发热烈讨论的主题，在现在以致永远都是一个暗含性的问题。然而，中国与日本的关系问题，就像欧洲经验的回声，法德和解关系，将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虽然这两种关系背景的不同之处已经被很好地指明了，法德和解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我们曾试着分析了这个“奇迹”是如何通过两个社会的民主制度，通过领导人的政治意愿，通过发展两国人们之间（青少年之间，城市之间）友好往来所做的不懈努力，特别是，通过欧洲建设计划来共同建设一个未来的强烈愿望，使之成为现实。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乔治·贝尔图安说它具有世界性的重大意义，是对中国和日本之间建立世界性管辖区的一个良好启示。

三、大胆设想欧洲和中国可能开展的共同合作

中国与欧洲之间进行的对话不应该主要集中在探讨中欧关系方面，更应该致力于双方的协作，共同建设21世纪这个伟大目标上来。

这个信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的世界，就如同吴建民先生所说的那样，正处于一个向着新的国际秩序转变的时期。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分岔路口，一个变幻无常所以需要有果断决策的时期，就像米歇尔·罗卡尔所说。中国向世界经济开放自己，而在此同时，世界正在组织重建全球化秩序。这意思是说，对我们之间在差异基础上的相互依存的认识和管理，如同保罗·张万亭所说。在信任市场自发的秩序和建立在多方有力机构基础上的世界性政府辖区的意愿之间做选择，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欧盟显然选择了后者。中国将做出怎样的选择我们假设，首要的是达成一致，欧洲和中国在坦诚相待的基础上，在相互诊断共同的矛盾冲突的基础上。以此为始，也许就能够逐步达成一个关于国际新秩序概念的共识。

（1）以共同的眼光看待社会冲突

我们的论坛已经就几个共同领域的问题展开过了讨论，还有冲突以及中欧合作的可能方面：

- 可持续发展和生活模式改变
- 能源与交通运输
- 自然资源管理与世界不同地区财富的再分配问题

（2）达成对国际新秩序这个概念的共识

既然我们都已设想过了，为什么我们不从欧洲建设计划的先例中共同探寻建立世界性管辖区的可能的启示呢，就如同米歇尔·罗卡尔先生建议的那样。

在他看来，欧洲经验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欧洲的范围，这项经验表明，在现实世界，武力和武力的使用将越来越不能够帮助那些使用者达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简单的政府间关系已经上升到了世界水平，如同欧洲这一层次。相反地，欧洲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建立适当的法规，来成功完成在各个求同存异的成员国之间协商，这一复杂而艰巨的艺术。

我的中国朋友们，最后让我们来好好体味一下米歇尔·罗卡尔和约翰·帕尔莫的观点，因为他们是站在世界的高度上讲出这番话的：

- 在提议部门和决策部门分开基础上，建立欧洲事务的共同管理体系

-在法律至上的原则基础上，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共同体

四、 前景展望

为设想的前景定义，需要假设：

a 证实之前的直觉都是正确的；

b 看到事物之间的联系。

起初我们的直觉建立在互利互惠基础之上，建立在对话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动员的基础上 ，也建立在期望中国社会能够更好地理解欧洲建设的基础上。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

我们的热情整整持续了四天，在这四天的会议中，尽管疲惫有时可能使我们把知觉当成现实情况，我们还是进行了大量的相互交流。

如何记录下在这段刚刚开了个头，远未满足言说的需要的交流过程，还留待知晓。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只能尝试着提出几点建议，其实现的情况和反响如何，我们只能再日后从媒体和新颁布法规上来获知了。这次大会之后，我认为有三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推动中欧双年论坛的组织和推广工作进一步开展。虽然有些匆忙，但我们还是集中了大部分用法语写成的文稿。乔治·贝尔图安的几分电影拷贝也是可供我们使用的。如果你们当中还有一部分人在怀疑的话，我们将会寻找并且一定会找到方法将他们翻译成中文（有一些已经在预备文档里面了），我们还觉得有必要创建一个网站，建立许多个链接，将这次论坛的资料用中文和法文两种语言发布出来以方便大众查找和使用。所有的良好的意愿都欢迎放到网站上来，如果有精力的话，我们还可以专门开辟一块空间，以继续我们没有完成的讨论。

对部分问题的具体深入

举例来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成立一个反思研讨班，将中国、日本、德国还有法国联系在一起。还有更多的想法和好主意在论坛召开的过程中诞生，借助互联网，我们可以将它们一一实现。

将这次论坛作为今后每两年组织召开一次论坛活动的出发点。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主意，下一次聚会我们的主题应该是讨论关于中国的问题，但是从现在到那时，我们还应该继续扩大我们的视野。

无论如何，只有建立在会议一开始就谈到的道德承诺的基础上，我们所取得的这些丰硕的成果才有意义。米歇尔·罗卡尔谈到我们应该自我剖析，吴建民谈到了我们应该鼓励好的想法。中国和欧洲，就如同乔治·贝尔图安所说，我们之间应该联结起友谊的纽带，我们应该相信：历史是书写出来的，只要我们持此看法并且愿意，我们就一定能够携起手来，共同书写历史的新篇章。

第六部分：背景文献

6.1 雨果的欧洲观

当维克多•雨果被选为于1849年8月21日在巴黎召开的和平大会的主席时，使欧洲国家联合起来的观念已经存在了。圣•西门提倡工业上团结一致，并提倡1814年——1816年的欧洲议会。吉佐在1828年时写了《欧洲文明通史》一书，表明了一个共同文明的存在。奥古斯都•孔德在1848年宣扬欧洲货币，人们开始向往着通过外交达到成和平。反对1815年的国王的欧洲，建立在民主和社会公正基础上，以保证世界和平为目的人民的欧洲思想诞生了：即革命的欧洲。（尼古拉·萨维（Nicole Savy）：《从哥特式到地缘政治学的维克多•雨果的欧洲》）

“法国，俄罗斯，意大利，英国，德国，你们所有的欧洲大陆上的国家，在保持与众不同的优点和精彩特色的情况下，将在一个更高的统一中紧密结合起来，你们将建立欧洲的兄弟关系，一定就像诺曼底，布列塔尼，勃艮第，洛林，阿尔萨斯，所有我们的省一样，结合于法国中，这样一天将会到来。不再有战场，有的只是在通商中开放的市场和开放的思想，这一天将会到来。炮弹将被投票取代，将出现人民的普选，至上的参议院（在欧洲，参议院就是英国的议会，德国的国会，法国的立法议会）的令人肃然起敬的仲裁，这样的一天将会到来！”

——雨果，《政治》，1849年8月21日在巴黎和平大会上的开幕词，第301页。

“我想通过一个伟大的行动来为我的一生签名，然后死而后已。这便是欧洲合众国的建立。”

——雨果，1876年-1878年注释，收集在《散文，关于我》中，手抄本13420，fo 213，《全选集》一书第294页，出版人布根-拉丰（Bouquins-Laffont）。

6.2 温斯顿•丘吉尔的演讲

（苏黎世，1946 年 9 月 19 日）

今天，我非常荣幸被你们这所古老的大学所接待，我想向你们谈谈欧洲，这片壮丽的大陆包括了人间最美丽，最开化的部分，有着温和宜人的气候，是所有西方世界的联姻的伟大民族的地方。

…但是欧洲广大地区呈现出这样一片景象：许多痛苦的，饥饿的，呜咽的，不幸的人们生活在他们的城市和房屋的废墟中，他们将目睹使天空昏暗，面临新的危险的乌云，专制和恐怖再一次聚集。在胜利者中间，是喝彩声；在失败者那里：沉默和绝望；这就是德意志民族在远远地传播恐怖的同时所遇到的一切…

大不列颠彼岸的伟大的共和国渐渐明白了欧洲的破坏和被奴役状态是拿它自己的命运来下赌注的，于是它伸出了援助之手，如果没有这只援助之手，伴随着恐怖可能会预示着一段阴暗的时期。此外，这恐怖能重新发生。但有一个避免它的办法，并且如果许多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民想这样，那么整个景象可能被神奇般地改变，不出几年，欧洲人，或者至少是欧洲大陆上的大部分人，可能同今天的瑞士人一样，生活在自由和幸福中。

这个补救办法是什么呢？它在于在可能的范围内重建欧洲家庭，然后要培养它，以便它可以在和平、安全和自由中发展。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欧洲的美国。只有这样，几亿人才会有允许自己充满欢乐和希望的可能，这些欢乐和希望使人们值得活下去。我们可以用非常简单的办法达到这个目的。为了获得上帝的恩惠而非厄运，只需这几亿男女下决心行善而非作恶…

…我们英国人有英联邦。世界组织并非因此而变弱，反而加强了，并且实际上，在此找到了它的中流砥柱。为什么没有一个欧洲的组织呢？这个组织给那些相互疏远的民族以更广泛的爱国主义感情和一种共同国籍的感情。为什么一个欧洲的组织不应在其它的大的组织中占据属于它的地位并为管理人类作出贡献呢？

必须让德国不再有重新武装自己并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的可能。

当这将是已经做的事情——并且将会是这样——从前格莱斯顿所称的忘却的祝福行动将该发生了。我们所有人应该背向过去的恐怖，放眼未来。我们不应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怀有仇恨和复仇的欲望，就像以前它们来自过去的不公平。如果我们想使欧洲免于无法形容的悲惨在欧洲家庭中就应该被信义所取代，并且忘记过去所有的傻事和罪行。

…现在我回到了一个使你们惊讶的演讲。迈向欧洲家庭的第一步应该在于使德法两国成为伙伴。只有这个办法能使法国重新领导欧洲。如果没有一个在智力上强大的法国和一个在智力上强大的德国，欧洲的复兴无法想象。

如果我们真诚地出色地完成建造欧洲的美国这一任务，它们的结构应这样设计，即每个国家的物质力量只起次要作用。每个小国同大国一样受到重视，并且通过交纳公共事业的分担额来确保自己受尊重。从前的国家和德意志公国，通过相互协定，在邦联制的体制下联合起来，可能在欧洲的美国这一行列中占据自己的位置。这几亿人想幸福自由地生活，不愁衣食，不受危险侵袭，希望享受伟大的罗斯福总统所谈到的四个自由，要求按照大西洋宪章的原则生活。我不想试图为这几亿人制定具体的计划。

如果这是他们的愿望，只需说出来，我们将一定找到充分满足这个心愿的办法。

6.3 拉米的演讲

全球治理模式：欧洲的启示

帕斯卡·拉米

今晚，能在这个冠名纲纳·缪达尔（在座各位最卓越的前辈、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常务秘书）的讲座中进行演讲，对我来说是个崇高的荣誉。各位向我发出邀请的那一天，我已深感荣幸。获知在我之前（2003、2004年）登上这个讲坛的两位演讲者的姓名之后，我更感荣耀：先是诺斯教授，他与纲纳·缪达尔同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后有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亦曾荣获诺贝尔奖。想到他们的才华，我先是不胜惶惑，继而满怀希望，最终信心倍增。

惶恐不安是因为作为一名实际工作者，本人与这些占据经济学顶峰的诺贝尔获奖者们之间差距巨大。与大师们相比，我的学术头衔着实可怜，专业功底亦相当粗糙。继而满怀希望，那是因为各位既然认定鄙人有资格来此演讲，这说明理论与实践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之所以信心倍增，原因是我通过各位了解到，纲纳·缪达尔本人于1945至1947年间曾担任瑞典王国的商务部长，而我正出生于1947年。这是个好兆头！他的经历表明：从政治与谈判实践到经济学理论研究，这样的角色转换是可行的。需要我做的是拿出勇气。我将在纲纳·缪达尔的旗号下，在诸位面前勉力为之。这一旗号意味着什么？当然，它象征着纲纳·缪达尔，社会民主主义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实践者之一。但是，考虑到今晚在座诸位各自的政治信念，我不会从这一领域着手。我的切入点是纲纳·缪达尔在“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互相依赖”这一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他凭此获得了诺贝尔奖。还有，他对欧洲、美洲和亚洲经济发展的深刻认识；他对经济运行中制度因素的所起作用的分析；他对贸易开放的坚定信念：我同他一样认为自由贸易会在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如果我所说的某些内容与几周前我在离此不远处的讲话有呼应之处，请相信，这主要是巧合，不过思路还是大体一致的。

纲纳·缪达尔从巅峰俯瞰余辈。若想侥幸接近他的高度，我必须从他的领域着手，从他的时代（上个世纪中叶）出发，并最终回归我们的时代，这个刚刚开始的新世纪。缪达尔所说的“制度现象”现在已经换了名称，如今我们管它叫做“治理模式”。他与卡尔多（Kaldor）、罗斯托（Rostow）等人所使用的，用以研究本国、欧洲大陆，后来还有亚洲的标尺如今也有了变化。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个相互依存的时代，所使用的标尺以全球化为特征。但是，缪达尔使用他的语言，依据他的标尺而表达出来的思想，其价值并未因为这些变化而有丝毫的减损。正相反，用缪达尔的观点来分析我们今天的世界可以直接引出今晚的话题：全球化的世界上何为“善治”？

治理模式：“怎么办？”而非“多少种？”

毫无疑问，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程度是以往所无法比拟的。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我们的制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为传统的民族国家框架所局限。如今，挑战是全球性的，但制定解决方案却以地方为主，两者之间脱节的程度不断加深，对此显然不会有人提出异议。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需要更多的全球治理模式。而在于我们究竟需要多少种治理模式。关键是，为了付诸行动，我们应当如何操作？

我不准备就“多少种”治理模式这个问题深入讨论。这是个头等重要的政治和哲学命题，但会引发人类社会和经济运行各种不同理论间的持久争执：自由派和干涉派之间，绝对市场经济的拥趸者与主张进行市场调节以取得最佳效益者之间。之所以不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原

因很简单，连最坚决的自由主义者们也认可我刚才所分析的全球治理模式的不足之处。基于民主制度的一个根本原则，治理机构最好能够本地化，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才远离它所服务的人群。“普遍利益”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能是“普遍”的。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以及后来的阿尔图休斯（Althusius）称之为“辅从”（Subsidiarité）原则。

我们就以这个很好的原则为出发点。不要轻言增强治理模式的全球性，除非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只有这样做才能符合公众的利益。剩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办”。在我看来，这是个关键问题。怎样才能更好地管理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这一争论一直困扰着国际社会。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围绕联合国改革而发生的种种争论。

另一个例子，或许没有那么抢眼，是各大洲日益兴起的区域治理模式：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安第斯共同体、中美洲国家共同体、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EC）、非洲联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RC）以及东盟。还有一个例子是我的亲身经历：最近5年来，我在世界各地曾数百次被人问起欧洲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我将向各位陈述我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以及现阶段我从中得出的结论。首先我将概括介绍一下“欧洲融合”的范式，然后通过比较来谈谈我对世界一体化趋势的一些看法，最后从中得出一些结论，用以指导我们的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所使用的正是奠定纲纳·缪达尔成功基础的研究方法。

欧洲治理模式的三个立足点

用几句话来概括欧洲范式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考虑到今晚的主题，我们必须从这里切入。事实上，欧洲一体化建设是十九世纪确立现行秩序（对内民族国家是基础，国际上同样由民族国家根据其喜恶来缔结联盟或撕毁条约）以来尝试建立超国家治理模式最为雄心勃勃的一次尝试。可以把欧洲建设看成一种另类治理模式的实验室 --- 建议各位从这个角度来进行一番观察。需要强调的是，观察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做出正确的分析和诠释。

首先要注意的是，欧洲建设仍在进行中。不管从哪个方面讲，这一进程都没有结束：无论是其地域（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它的面积），或是让渡给欧盟的权力（一体化的深度），还是欧洲特性的培养（作为人类社会的黏合剂，这种特性能在一定的政治空间中造就一种归属感和致力于某项共同事业的愿望）。作为一场运动，这一进程也未尘埃落定，争论的过程中还开过倒车。比如，围绕批准欧盟宪法草案（该草案由欧盟目前的25个成员国于去年签订）这件事，我们都曾参与争论，而这个草案只不过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一步。

其次，欧洲建设是个特殊的进程。再拿实验室来打比方，这场实验是在欧洲大陆特殊的温度和压力条件下进行的，比如欧洲刀兵不绝的历史、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文化和宗教遗产。“欧洲中心论”曾被其他民族和文明猛烈抨击，我非常不愿意再犯这个错误，将普世价值赋予那些只在世界某一地区行得通的事物。

在注意以上几点的基础上，如何概括50年来这个实验室中所发生的一切呢？在我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尝试过了，各种论断层出不穷。在我看来，最出色的分析并非出自欧洲，而来自美国。首先是斯坦利·霍夫曼的贡献。不过，我认为这些分析往往局限于各自的专业领域 --- 经济学（市场一体化、规模的作用、“优化配置”的概念）、政治学（研究作为首要政治空间的国家与作为次要政治空间的欧盟之间的关系以及欧洲选举与各国选举之间的关系）、制度建设（以制宪方式来规范各成员国的国家权力及其让渡给欧盟的权力），甚至包括人文科学（社会学、政治哲学 --- 我指的是哈贝马斯Habermas，最近还有民族学或人类学）。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些研究角度都会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但是，我认为它们都忽略了最根本的东西，正是它们造就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特性和特色。

相互依存 --- 自觉自愿；

相互依存 --- 内容明确；

相互依存 --- 组织有序；

相互依存 ---自觉自愿、内容明确、组织有序。

正是这三点造就了史无前例的欧洲治理模式，一个和平、自愿、没有暴力和霸权的一体化进程。我刚才说过了，这一进程是“自觉自愿、内容明确和组织有序”的，而且并行不悖。需要强调的是“并行不悖”！若想搞清楚欧洲治理模式何以发展到今天，就必须明白这三大要素是密不可分的。三者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只要有了其中两样，第三个要素就必然会出现。接下来我会用具体事例来证明这一点。这一“自觉自愿、内容明确和组织有序”的联盟包含三个要素：首先，要有融合的政治意愿；其次，就所要达到的目标达成一致（相信各位同意我的看法：一方面大家要自愿，另一方面要确立共同的奋斗目标）；第三，要建立相应的程序或制度体系，能够形成某种治理模式，维持其运转，并取得预期的效果。我准备通过四个例子来说明这一转化过程。按时间顺序，它们分别是50年代的煤钢联营，60年代的外贸政策，80年代的欧洲统一市场和90年代欧元的启动。

成立欧洲煤钢联营的政治愿望是为了摆脱战争的阴影 --- 源于欧洲的两次大战都波及全球。欧洲煤钢联营的推动者们都坚定不移地认为和平应当植根于罗伯特·舒曼所说的“事实团结”（Solidarité de fait） 之中。他们找到了一个具体的切入点，把当时各国经济的两个支柱性产业 --- 煤炭和钢铁 --- 加以合并，借以体现他们的政治意愿。正因为有了这两个强有力的要素（意愿和目标），他们才勇敢地迈出了第三步，成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超国家机构（欧洲煤钢联营高级公署）。缪达尔本人于1954年2月25日在伦敦贝德福德中学以《政府间组织的现实与幻象》为题发表演讲时亦对此举表示赞同。

第二个例子：贸易政策。在这一领域，政治意愿来源于这样一个决策 --- 要使1957创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变成一个关税同盟。这一政治意愿相当强烈。最初进行各项制度安排时就考虑以多数通过的方式来进行决策。但它的目标（即共同行动方案）是在国际贸易各领域全面对外开放 --- 这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之后的几十年中，那些具有自由贸易传统的成员国和那些传统上倾向于贸易保护的国家之间一直争执不休。近10年以来，三个立足点才基本稳定下来，支持全面开放的贸易政策，但辅之以各种规章，以保证在贸易这场比较优势的游戏中能够公平地分配利润。如今在农业领域仍有些波折。不久前日内瓦曾做过见证，那是去年7月在这里通过多哈发展议程中期协议的时候。

第三个例子：1985年，雅克·德洛尔建议成立欧洲统一大市场，并在1992年之前完成。我们可以在这个计划当中找到相同的要素：经历过一段困难时期之后的政治意愿；国家领导人的坚定支持，其中包括密特朗、科尔、撒切尔、冈萨雷斯和安德里奥蒂；明确、详尽的目标（取消内部边界，实现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有了政治意愿和明确目标之后，特别是该目标得到公认后，通过一场大规模的制度改革，有关统一大市场的各项决策由过去的全体一致通过变成了多数通过。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例子是来自经济领域的最新进展：欧元。这里仍然可以找到60年代政治意愿的痕迹。作为对70年代世界货币动荡的一种回应，欧洲货币的地位逐步加强。1990年前后，欧洲货币有了一个具体的形态。当时，围绕着货币联盟的利益、目标和形式的争论持续20年后终于告一段落；过去的“蛇形”体系以及随后的欧洲货币体系暴露出了很大局限；自由市场、资本的自由流通同各自为政的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已众所周知；所有成员国都已将稳定货币作为其货币政策的目标。这是个重要的决策，其出台过程并非“暗箱操作”，尽管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去年曾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上对此提出过批评。虽说政治意愿的培养和行动目标的确立总共耗去了20年的时间，我们应当知道，具备这两个要素之后，制度框

架只需几个月的时间就诞生了。不可小视这个新生的“欧洲中央银行”--- 相对其它几个先于它出现的兄弟机构（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或卢森堡的欧洲法院）而言，中央银行更具联邦性。

我想，上述4个例子清楚地表明确实存在我刚才所说的那3个立足点：**“自觉自愿”并且“内容明确”的相互依存关系会是“组织有序”**的。

最后，为了能让各位信服，我准备在欧盟框架内举两个反例，一个是宏观经济治理模式，另一个是外交与安全政策 --- 两者都不具备我刚才所提及的那三个坚实的立足点。

就宏观经济治理模式而言，各国的政治意愿有限，能否就共同的宏观经济政策达成一致令人生疑，其制度安排自然不甚高明，亦不稳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众多的欧盟成员国已经迈过了统一货币的门槛，但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依旧各自为政，政府间合作与一体化政策之间的鸿沟仍未能逾越。至于所要达到的目标，就算有这么一个目标，那也是含混不清的。推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但各国的经济政策仍由本国来制定 --- 这样的想法实在值得商榷。在制度安排方面也不会有什么奇迹，局面比较混乱。首先，各成员国政府、欧盟委员会、ECOFIN（由各成员国经济及财政部长参加的部长理事会）各自的责任未做划分或划分不明。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欧洲中央银行与1992年以来成立的一些乱糟糟的经济管理机构之间。最近的欧洲宪法草案对此只做了些小修小补。其次，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制度安排，所通过的决议颇多缺陷。例如旨在遏制蛇头资金流动的“稳定与增长公约”，我们都知道它有多么失败。还有年年都要制定的欧盟经济政策总体方针，基本上是纸上谈兵，对各国的活动空间无实质性影响。

第二个反例是欧盟的外交与安全政策。3大立足点同样无一齐备，尽管宪法草案在体制建设方面带来了一点希望：设立欧盟外交部长这一职位；出现了“欧洲外交”的萌芽，但这方面的政治意愿并不鲜明，主要因为某些成员国很不乐意与其它国家分享它们的地位，认为那些国家的传统影响力及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与之并非同一等级。至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目标，尤其是它的行动方向，以及它将对第三方发挥什么样的影响，仍远未落实。我承认，在外交政策这样的领域实现一体化肯定是非常困难的。原因在于，从一定意义上讲，需要与他人分享的是**身份**（**“我是谁？”**），而不是**财产**（**“我有什么？”**），比如经济领域。在日渐加强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中，与他人分享市场、环境、增长和经济变动成了很自然的一件事，但要分享身份、梦想或噩梦就没那么容易了，而后者正是打造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原材料。刚才我们概述了欧洲治理模式的核心内容，即意愿、目标和必要的机构这三者的结合。最后我想强调一下，与通常的说法相反，起决定作用的是这种结合，而不是采用了什么独特的治理手段。这并非轻视欧洲建设启动以来在治理方式上带来的技术飞跃：共同体法律高于各成员国国内法；创立了欧盟委员会这样的超国家机构，并赋予其制定法律、法规的全权；创立欧洲法院，各国法官须服从其判决……所有这些举措使得欧洲联盟成为国际治理模式下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和政治组织。但仅靠这些新举措是无法催生欧盟这一史无前例的新生事物的。尽管这些制度创新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发挥着无可置辩的作用，但与之密不可分的是推出这些举措时的各项条件。**只有就实质问题达成一致后才能在形式上达成一致**。尽管我们知道发动机是车辆的核心部分，但乘客们首先关心的是车辆的目的地和车辆的舒适性。

以上就是我对“欧洲范式”的概述。下面我将尝试对“全球治理模式”的发展现状进行总结。

全球治理模式 --- 三角结构

简单地说，与前面我所提到的“三个基本点”相比，今天的全球治理模式呈现出三角

结构。为了使用同样的研究尺度，我准备分析的依然是刚才举欧洲为例时所提到的那三个指标。首先是政治意愿。在全球层次上有这种意愿吗？在一定程度上，答案是肯定的，但其程度非常有限。很久以前，人们就有了开展国际合作的愿望。上个世纪中，这种愿望不断加强。席卷全球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势头更加猛烈。第一次是在1918年之后，但合作的愿望很快就让位于恐怖（最近我们刚刚纪念了奥斯威茨集中营的遇难者）。第2次是在1945年之后，合作的愿望曾长期被冷战的阴影所覆盖，但却没有消失。各位所代表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就是明证，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它成了抵制东西方分裂、开展合作的家园。两极格局结束后，合作的政治意愿得以复苏，但必须承认，不同的领域程度参差不齐：在安全问题上开展合作的愿望要强于发展问题；金融领域合作的决心要大于环境领域；对商品自由流动的重视明显超过人员的自由流动；经济合作盖过司法合作。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差异，显然是因为不同民族及其代表对事物的看法不同，无论是联合行动的好处，还是缺乏合作的弊端。当今国际社会最关心的莫过于安全问题，因为我们都明白，如果听任武器泛滥，战争在地球上肆虐，恐怖组织以人类的苦难为基础不断蔓延，那将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但事实证明，即便是在这个头等重要的领域，合作的愿望往往也是说得多，做得少。其它领域就更不必说了，比如，最贫穷国家的发展问题在发达国家的选战中所占分量仍旧可怜。还有环境问题。选民（往往是富国的消费者）当中，还有那些每天为自身生存而劳作的人（这些人还好理解一些）当中意识到自己对子孙后代负有责任的实在是少数。此外，在国际司法领域，设立国际公共检察官、突破国内法的限制进行惩处 --- 很多人对此还感到难以接受。

发展、环境和国际司法 --- 我之所以举这3个例子，既是为了说明政治意愿的不足，但同时也说明事情在一点一点地发生变化。我指的是公民社会的作用不断加强。在现行国际体系的夹缝中，个人的愿望、各种运动的协力，加上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和媒体作用的增强，都会对国家意志起到弥补作用。但无论其如何发展，这种政治力量都不可能发展成替代性力量。尽管希望其“有所作为”的呼声越来越高，最终发言权依然归属国家。国家掌握着答案。就目前看，国家是障碍所在。

如何解释国际政治意愿形成过程中的这一障碍呢？我的答案非常简单：相互防范。在很大程度上，民族国家固执地把“相互防范”当成国际秩序的基础。在座的各位有很多是我熟识的外交界朋友，对于那些我不太熟悉的朋友，出于礼节，我本应出言谨慎。但我想自己应该没有搞错，外交界有这样一条由梅特涅和塔列朗创立的原则：对于一国而言，既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换句话说，民族国家之间的承诺、义务、协议、合同总是可以推翻的。英国人常说：“不管是好还是糟，那总是我的国家。”请注意，我这里特意引用了一个欧洲成员国的谚语。相互防范的根子在什么地方？我想是来源于对霸权的恐惧。为什么三角结构中的一角（政治意愿）目前总是发展不起来呢？原因就在于此。

请各位记住这些内容，这一段暂且到此，下面进入第2点。

我所说的第2点是指构建共同的目标，也就是说，当集体的意愿形成之后付诸实施时的着手点。没有这些着手点，由愿望到现实的转化是无法实现的。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看当今世界的面貌吧。我的评价就是：沟壑纵横。最显眼的是那些高高的山峰，与以前相比，似乎清晰多了，但深深的沟壑依然横亘在国际社会的成员们之间。

在那些逐渐成形的共同目标当中，有不少是几十年来的各种国际会议确认过的，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例如：环境、卫生、发展、基本社会权利、妇女的权利、保护儿童、裁军等。如果想对此有个整体把握的话，那就看看联合国推出的**8项千年目标**。这是8条具体的目标，需要强调的是，实现目标的期限是2015年，对此我们全都做过承诺。与过去通过的众多决议相比，这8条更明确、更简练、更直观、易于测量。这一质的飞跃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联合国秘书处，尤其是科菲·安南本人。大家都了解为了就这8条达成共识，他付出了多少努力，而这8条

已经成为史上最完整的国际路线图，其关键优点是使各国间的相互依存“物化”了。这8条把消除贫困和实现发展摆在首位，仅以卫生和教育为例，它们提出的条件具备了纲纳·缪达尔及其同事们所说的“实用功能”，这正是治理模式中的关键环节。

因此，这些千年目标属于我们视野中的那些巍巍高峰。

但我们必须看到，在某些领域，人们还远不能就共同目标达成共识，困难重重。我举3个例子。

第1个例子是**能源**。可以说，能源市场已经全球化了。我们都知道，矿物能源是有限的，而科技的进步并未找到能够帮助我们度过难关的新能源。我们也都知道，如果中国人或印度人的人均能源消耗达到美国、欧洲或日本的水平，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尽管如此，各国却很难在能源问题上达成协议，哪怕是过渡性协议。

第2个例子是**经援**，具体说是公共发展援助。围绕经援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方式，争论一直不断。关于援助的金额，关于设立世界性税种以稳定公共资金的来源，关于免除债务，同样争论不休。征税并实现人类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这在国际治理机制中占据核心位置 --- 一般人对此没有异议。但是，再分配的财富数额越高就表明人类社会越团结 --- 这种说法颇有争议。从这个角度上讲，纲纳·缪达尔的观点（曾对当时的福利国家体系产生过深刻影响）如今已经不是主流了，至少在国际层次上不是主流。必须承认，如今要想在富国和穷国间就财富再分配达成协议绝非轻而易举之事。

共同目标难以确立的第3个例子：**世界公共财产**。公共财产指的是那些由国际社会集体经营、保护的财产，维护的是大家的利益。经济学家认为界定此类集体财产的标准有二：消费过程中不存在对立（也就是说，我的消费不会对邻居造成影响）；不排斥潜在的消费者（财富一旦产生，就不能禁止我消费）。对于国际社会而言，水、渔业资源、航海线路、臭氧层、热带森林、金融市场的安全、健康等是否属于“公共财产”呢？这里仅稍举几例，大家就已经能够看出确立共同目标的路程有多么遥远。

意愿和目标 --- 我们刚才看到了，世界治理模式三角结构中的这两角发展缓慢。第3角（制度建设）也是如此。总是说来，当今国际社会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说目前的全球治理模式）仍局限于政府之间，尽管有时会出现一些带有“共同体”性质的管理机构。但与欧洲实验室中正在进行的实验相比，世界范围内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所谓的威斯特伐里亚体系，国际舞台上的主角仍然是民族国家。

在这里 --- 日内瓦 --- 说这样的话可能有点自我矛盾。这里到处都是国际组织或国际机构，尤其是联合国的各种下属机构。此外还有设在华盛顿的布雷顿森林机构，以及那些名气相对较小，但影响力并不差的各类技术或专业组织。这些组织的数量巨大。在座的许多人在这些国际组织中代表着自己的国家，讨论着各种关系重大、内容广泛的问题，履行着自己的使命。我们都了解目前正在进行的几场争论（各位可能知道得比我更清楚）：关于协调的争论关于联合国领导机构改革的争论，尤其是有近60年历史的安理会应当如何改革。

全球治理模式的制度安排中占据核心位置的是协调的问题。一方面是以民族国家为主，国际秩序中民族国家主权独立、地位平等的原则。另一方面，那些在特定领域承担治理责任的专业性国际组织事实上很难履行使命、执行决议。

因此，如果我们只考虑原则的话，协调问题并不存在，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原因在于，对于今天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组织而言，原则上任何举措必须通过“国家”这个层次才能取得合法性。换句话说，如果获得了民族国家的批准，取得合法性之后，这种合法性会向更高层次（即民族国家所加入的国际组织）自动延伸。每个成员国内部协调完毕后，协调的结果可以以“转移”的方式“输出”到其所隶属的国际组织中。从法律上讲，国家具有单一身份，主权独立，因此它在各种国际机构、组织或大会中的立场应该是协调一致的，就像使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但表达的是相同的意思。既然所有国家均如此，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把它

们在各种国际场合所持的观点叠加起来，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囊括各国立场的全景式画面。

这是理论上的分析。不用我多费口舌各位就会明白，现实生活中这种理想的状况很少出现。各位在日常工作可以看到，在国际场合中，主权国家之间并没有出现理论上的这种协调局面。

尽管各国没有对现行国际体系的理论基础加以否定，但它们还是采取了更加实际的做法，从70年代起尝试了许多新的模式：工业化国家峰会（G7/G8），最近还有G20（我指的是20国经济和财政部长会议），而这只是许许多多“峰会”中的几种。推出这些非正式安排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我刚才所说的，现行国际体系在技术和法律层次上的僵局。

我还想提一提的是那些处于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有关重组联合国领导机构、加强其协调性的种种建议：10年前雅克·德洛尔提出成立经济与社会安全理事会；还有人提出成立可持续发展理事会（涉及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

“相互依存的时代国与国之间应当如何进行组织与管理？” 我认为，围绕上述主题而展开的种种争论，不论其进展如何，都突显出我们所说的三角结构中第3角所面临的两个问题。

第1点，目前的局面已不能满足需要。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具有全球性，但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机构里“地方”的分量过重。这个问题我只说到这儿。

第2点，这不仅是个效率问题，还是个合法性的问题。这一点说明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下述现象：为什么制度领域的变革或变革的可能性如此之小？

虽说这个建立在民族国家主权独立理论上的国际体系有种种不足，但其好处是为合法性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经过考验的答案：合法性来自主权独立，因此相互平等的民族国家。否认这一原则、推翻这种理论，这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引发人们对霸权的恐惧，我之前提到过这个概念，历史使得这种恐惧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文化之中。

最后，我想就三角结构的第3角，即制度安排，补充一点：民族国家主权独立，建立超国家秩序虽然是件好事，但希望相当渺茫。在这两者之间，逐渐出现了一个新的过度性空间在现行的国际法体系中出现了一些“共同体化”的因素。我曾谈到过联合国宪章。还可以举出被法学界称为JUS COGENS的国际法中的一些强制性准则。在某种程度上，国家不能以主权独立为理由抵制这些准则。我们的视野曾长期为民族国家，以及国与国（国际）之间的各种安排所占据，如今慢慢出现了若干共同体性质的因素。过一会儿我拿欧洲和世界进行比较，并总结其中的教训时，我还会回到这个主题。但之前我还想谈一谈国际秩序中一个与众不同的领域，区别于前面我所提到的任何领域，那就是国际贸易。

多边国际贸易体系，一个特例？

之所以要谈及这一主题，并非想给各位一个意外。各位对此显然有所期待！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紧扣今晚的主题，强调一下国际贸易领域治理模式的成功之处，与国际治理模式在其它领域进展缓慢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如果我们再用前面的3点分析法的话，必须认识到多边贸易体系在其中任意一点上都有引人注目的表现。

首先，政治意愿鲜明，且由来已久。这种意愿的形成是因为近代以来，经过不同历史阶段，尤其是在世界大战之间，人们认识到了贸易保护主义对本国经济的负面作用。近50年来，人们又认识到了开放贸易所带来的积极效应。我们也了解，在各国的国内政治中表达这种愿望时会遇到许多的障碍。用国内政治的有色眼镜来看开放贸易，感觉是不对称的，公众对此颇为疑虑：一方面，开放贸易的受益者众多，但常常不发一言；另一方面，由于贸易而引发的经济及社会调整总会有人为此付出代价，这些人的反应是非常激烈的。他们自然会组织起来以期挽回局面。所有承担政治责任的贸易谈判者都非常熟悉这个特殊的政治方程式：其中

“利益”这个变量须乘以一个很小的系数，而“代价”这个变量所乘的却是个巨大的系数。

换一种简单的说法：谈论出口总比谈论进口更容易赢得掌声。

再把话说得明白一些，当一名贸易谈判代表参加农业组织大会的时候，他会对这一点深有体会！尽管有这一层障碍，有时还很难逾越，但政治意愿已经形成。哪怕还会有起伏，有循环，我认为大方向已经确立。

三角结构中的第2角是所要达到的目标，但它并没有前者那么清晰，尤其是在全球层次上。虽说并不存在所谓“零保护”的目标，但在几轮多边贸易谈判中，还是确立并实现了一些中期目标。从50年代起，贸易谈判事实上每10年重开一轮。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贸易谈判参加者数量的增加，不发达国家影响谈判进程的能力增长，所制定的共同目标越来越成熟。在我看来，当今贸易协定的基础是我1个月前在世贸组织总理事会所说的“日内瓦共识”。这一共识的主要内容是，如果我们把发展摆在优先位置，那么“经济自由化”、“国际公共援助”和“制定多边贸易规则”这三者的分量孰轻孰重。按照“日内瓦共识”的说法，贸易开放是必须的，但并不足够。贸易开放的同时必须搞经援，以帮助不发达国家改善基础设施，提高生产力，扩大出口，增强它们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谈判和履约能力，以应对我刚才所说的贸易开放之后可能出现的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失衡局面（国家越落后，社会越动荡，经济越脆弱，蕴涵的危险就越大）。为了在运用比较优势进行竞争的过程中保证公平，必须制定相应的游戏规则 --- 各方对此已经达成共识，尽管对其具体内容依旧争论不休。

三角结构中的第3部分（即制度层面）与国际体系中的类似者相比，其治理模式的发展程度要超出甚多。世贸组织中的“立法”工作有一套经过实际检验的程序，尽管这些程序仍有值得改进之处，由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领导的名人小组最近曾就此提出过建议。但主要是世贸组织的分歧解决机制使得它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对各成员国产生了特殊的制约作用一旦有成员国违反规定，就会引发争端，争端各方就必须接受世贸组织指定人士的裁决，否则就有可能面临制裁 --- 这样就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一重大转变是10年前关贸总协定变身为世界贸易组织时完成的，它使世贸组织变得引人注目，这也带来了一些麻烦。很多批评者认为，由于这些制裁条款的存在，贸易领域似乎高高凌驾在国际治理模式所涉及的其它领域之上，比如卫生、环境和基本社会权利。过去常有人批评在国际交换中商品的地位似乎高于一切，两种看法如出一辙。事实证明，到目前为止，世贸组织的分歧解决机构并未使得贸易规则突出于其它多边规则之上，但这没有能够使这些批评者服气，在他们看来，国际治理模式因此而失衡。

在结束本段之前，我还想强调一下刚才说过的协调问题。与其它领域相比，在多边贸易体系中这个问题也很突出。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问题得到了令人满意的解决，远不是这么回事。但世贸组织成员国授权总干事处理该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关系 --- 这确实是个创举。这项工作已逐渐产生成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启动了“贸易一体化机制”，而世界银行推出了新项目促进贸易开放。

我之所以花时间专门强调了一下多边贸易管理模式的特点，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这是个例外，而非常态。国际体系的治理模式从未有过根本性的变动，与50年来欧洲的经历形成对照。但我还要提醒一句，尽管世贸组织与众不同，但它依旧是个政府间组织，“依靠其成员国来运转”，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要改变现状。与国际体系的其它部分一样，世贸组织中不存在“超国家性”。

几点启示

在座的各位都是从事实际工作的，结束我的演讲之前，我想在前文的基础上（我把欧洲建设和世界治理模式的建设进行了对比）为大家作个总结。

第1个启示：开放意味着必须进行国际合作。全球化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像古罗马的两面神（Janus）那样，它有两张面孔。一张是笑脸，使得开放成为一件好事，使得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交流成为进步的动力、创新的源泉、对话的契机和相互理解的桥梁。另一张是鬼脸，使得开放成为对弱者的威胁，成为一种摧毁个性的、抵挡不住的潮流，成为一部严酷的法律，服务于不受约束的市场资本主义。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实际上是一场国与国之间、跨国公司之间、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只不过没有使用战争的名义。只要由国家公权制订的各种准则、标准和规章仍在对贸易发生影响，纲纳·缪达尔最得意的理论，即经济领域的比较优势自由竞争理论，就只能是个幻影。全球化的这一面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一面，而非康德所梦想的温和的世界主义。全球化就像一股急流，咆哮的河水带来了肥沃的淤泥，有利于人类的繁荣和进步，但也能造成经济和社会灾难。为了疏导洪流，需要修建合作的堤坝，调控全球化的进程，对相互依存的国际关系（由于市场、生产体系、通讯和信息技术和移民作用，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增长）进行有效管理。我们至少可以用以下定理来概括这第一个启示：开放的程度越大，就越需要加强合作。我想重申一下这个定理的前提，那就是“对和平的渴望”，正是它使我们大家，使欧洲各国人民走到了一起。应当优先考虑的是经济一体化，最容易被各国的市场经济体系所接纳，欧洲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另一个例子是美洲大陆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合作”为国际交往的基本原则，以经济为切入点 --- 这就是第1个启示。

第2个启示：合作需要有愿望，有动力，有共同方案，以克服那些因为个体利益或习惯势力而产生的障碍。为了培养合作的愿望，我们应当就合作的利益和代价展开讨论。还是以贸易开放为例，经济理论雄辩地证明了开展贸易的好处，但是，经济理论不能带来选票，不能创造就业机会。政治意愿的目标是要明确一个普遍的利益，所有的个体利益都能在其间找到位置。政治意愿不能从天而降，需要引导和培养。它并非现成可用的，需要我们来建设。它不是成果，而是过程。它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领导人的言行之中，需要他们不断地向民众（同时也是为了民众）展现这种意愿。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构成了民族的特性。要想培养一种共同的意愿，我认为就必须接受这些价值观和民族特性，但可以就此进行讨论开展讨论的前提（关键前提）没有人想通过讨论而称霸。从某种意义上说，需要我们共同确立的是一种多元的价值观。

第3个启示：这种愿望须依托变革的力量，即共同方案。通过谈判、对话和合同，这些方案得以出台。在这一过程中，集体的利益将被确定为公共利益，而部分个体利益则被主动放弃。公共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我们自身的利益，不完全归属于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我们的团体（政治、哲学或宗教团体）、先人、文化或地域。目前，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这种公共利益在局部已有了一点眉目。我们应当拿出耐心，坚定信念，进行交流和说服。学会与他人分享才能建立共同的目标，有了共同目标才能为新治理模式的形成铺平道路。

第4个启示：政治意愿的培育和共同目标的确立需要复杂的制度安排。同过去一样，当代国际社会需要具有合法地位的调解机制、组织形式、参照尺度和工作程序，这在政治权力取得合法性的方式发生转变的过渡时期是不可或缺的。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减少敌意、增强互信、加强协调的必要性。我们还看到了权力机构远离公民，两者之间拉开距离所带来的不便，欧洲如此，全球范围内更甚。这正是我认为最根本的一项原则：权力机构须本地化，即前面所说的“辅从”（Subsidiarité）原则。机构越远，越需要维护其合法性，设计治理模式时就越费力。如果合法性缺失，作为治理模式中的关键环节，争端解决机构即便存在，其裁决也很难为人接受。

第5个也是最后一个启示：如果要把上述4个启示付诸实践，在地区的层次上比较容易，而地区治理模式的培育正是今后的优先目标。无论是制定共同方案的意愿，还是在不同机构间建立互信，地区这个层次既超越了民族国家，又不会引发全球治理模式的种种不便，因此

地区层次的合作近年来有了显著进展，无论是在非洲（次区域合作、非洲统一、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NEPAD），在美洲，甚至是在亚洲。我们知道，地缘相近并不能改变历史，但它却能使人相互认同。要在全球层次上做到这一点可不那么容易。在区域层次上比较容易确立并构建欧盟创建者们所珍视的“事实团结”。除了像中国或印度那样幅员辽阔的大国，同一地区的各个国家往往在文化、经济特征、人口、语言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地区建设的成果在世界舞台上也可以发挥作用：成员国在地区层次上进行演练，学会了齐心协力、折中妥协、相互信任并达成共识。将来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商谈全球性问题的时候，参与过地区建设的国家将会态度鲜明、立场坚定。

在结束演讲之前，我准备把刚才说的5点启示合并成一点。如果让纲纳·缪达尔和让·莫内（欧盟的创建者们都深受其影响）就今晚的主题进行对话（或许他们真的这样做过），相信他们都会同意我的观点。两个人很相像，既肯实干，又勤于思考，既从事过实务，也搞过理论，就像所有的开拓者那样。

莫内希望欧洲经济的一体化能带动政治联盟。

缪达尔多次证明了在发展经济、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制度的重要性。

如果想在两人之间找到一个相通之处作为他们对今晚话题的共同回答，我想那应该是治理模式与价值观之间的紧密联系。依靠这些价值观，治理模式才能在我们所隶属的各级行政区域中得以落实。如果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作为基础，那就谈不上什么治理模式。这些价值观包括：和平、各民族以及不同年龄层之间的团结、对美好未来的期望。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人道主义”。我想，缪达尔会赞同这个观点！

注：本文为作者2005年2月22日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日内瓦）举办的纲纳·缪达尔讲座上的演讲稿。（翻译：李旦）

6.4 贝尔图安致欧洲领袖公开信

一个有效的欧洲联盟是我们的福祉

乔治·贝尔图安

〔**2005年6月11日 星期五，巴黎**〕 先生们：雅尔塔会议以来第一次，少数的几个人将决定芸芸众生。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已不在职守。欧洲的命运，她未来几十年的道路，全然掌握在少数人——你们的手中。

欧洲的两个骄傲而我行我素的民族——荷兰人和法国人，拒绝了在旨在创立欧洲宪政秩序的条约上签下他们的名字。你们各自国家的根基乃至整个欧洲的权威与此都休戚相关，陷入危机之中。这就迫使你们必须对欧洲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做出回应。

我们面临的危险是：激情的摧毁将导致信誉的丧失，人们将不得不承认我们共同事业的衰退。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怀疑和恐惧超过了对共同命运的关注，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将如何？我们各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宗教和族群社区之间的关系又将如何？可是，危机中却蕴含着你们做出改变和革新的机遇。让我们考虑以下事实吧。

为了和平、民主和社会向往的繁荣，欧洲人民曾愿意转移和共享他们借以构建各自社会的国家主权，那是他们经历了数十载的政治战役才获得的。然而，由于许多领导人不愿继续努力，以至于使欧盟奠基人的蓝图遭到扭曲，部分地停滞。于是，你们身边的公民们感到，在走向共同欧洲的道路上，他们的民主权利受到国家和欧洲的悠哉舒适而不讲民主的官僚机构的掠夺和践踏。

挑战接踵而来－－失业问题、移民问题、外购问题、环境污染、文化认同、传统、价值观、技术革命，欧洲公民们茫然失措，既不知如何消除他们的忧虑，也不知如何实现自己的愿望。传统的国家层面的解决途径尚未在欧洲层面上建立起来，民众的传统和权力统统掉进了未知的、神秘的黑洞之中。国将不国，欧洲也未成其为欧洲，挫败和失落感日益弥散，对抗和街头游行此起彼伏。

诚然，你们在2001年12月的莱肯峰会联合声明中提出了这些问题，这说明你们清醒地认识到了这种病态。可是，你们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创立的欧洲未来大会并没有使许多选民感到信服。在一些人的眼里，《宪法》不过是把一些含糊之处制度化罢了。官员们在想什么？人们浑然不知，感受到的只是重叠的机构和繁文缛节的压力。

你们可以——不，你们必须——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外交联合。摆在你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真正、真心的政治联盟。难道我们能像从前一样，在无知和冷漠的真空中建立这种联盟吗？欧洲的民众的呼声已经高涨，愿望日益迫切。精灵飞出了禁锢它的魔瓶。

为了对人们做出回答，我们必需明白：我们不是处在两种合法性——国家主权和对共同利益的管理的岔路口上；两者不应当被对立起来。我们想而且需要保留这两种形式，但不是通过那种复杂的操作，如同从《马斯赫里特条约》和《尼斯和约》到欧洲宪法那样的漫漫征程。我们需要的是创造力和想象力，如同过去几经发生的那样。

找出一个既令人满意又简单明了的方案不应该太难。我们已经有很多好主意。只是你们可以发现，它们能够对困难进行共同诊断，并提出可以采纳的策略。

当然，你们的职责在于使多元的、甚至是冲突的各种利益合法化。但愿你们不会让那些计较谁“输”谁“赢”的“自我”们使讨论变得复杂化。但是如果你们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仅仅忙于在甲板上排座位，而对周围的冰山视而不见的话，你们就会把我们正在驶出困境的欧洲巨舰变成第二个泰坦尼克号。

问题的解决非一日之功，但是为了避免分裂和瓦解，必须尽快开展探索性的工作。你们每一个人，还有欧洲议会和委员会的总统们，应该指定个人代表参加“共识建构小组”，并使之处于独立领导之下。而领导者必须摒除一切个人的、意识形态上的野心，他只能尽力于为你们探索一条欧洲复兴的线路图（让·莫奈先生就是这样走过了建立欧盟的漫长道路。在法国对政治防务共同体说“不”后，他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为欧洲合众国达成战略、政治和机构上的共识而建立了以他为首的行动委员会）。

该小组应该在今年秋天做出报告。随后你们就可以决定采取何种共同战略。

放眼未来，当你们开始选择最有效的方案来对付我们面临的诸多问题的时候，请注意，绝大多数否决票不是针对欧洲，也不是针对你们的国家。不明确这一点将导致致命的错误。挑剔的选民在意识到他们的愿望只有在创立一个人人看来都合法、公平、简单的政治框架后才能得到满足的时候，也会回到大声说“是”的阵营中来。

任务看似艰难，却并不可怕。在这个危机中，整个世界都将重新认识到，一个有效的欧洲联盟对我们自身的福祉是多么的重要。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需要你们的意志。携着饱经沧桑的回忆，带着忧虑和希望，我们所有的人将与你们同行，伴随着你们去实践我们和后代给予你们的授权。

然而，请记住，一切取决于你们……

（乔治·贝尔图安，欧洲创始人让·莫内的主要助手，协助后者创建了第一个欧洲组织－欧洲煤钢同盟，即欧盟的前身。现担任巴黎让·莫内协会的荣誉主席。）

（原载《国际先驱报》，陈亮译）

6.5 全球新帝国主义

新自由帝国主义

罗勃特·库珀

编者按：这篇文章代表着现在西方干涉理论的主要思想。一些报纸和网络都有对此文的评论文章。作者罗勃特.库珀 Robert Cooper 为英国资深外交官，布莱尔首相的外交顾问，现任欧盟理事会外交策略主席索拉纳的高级顾问。他将主持中欧论坛的一个研讨组 WT43“中欧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关系）

欧洲三百年来的政治体系在 1989 年走到了终点：即实力的平衡和对帝国的追求。这一年不仅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同时也更显著地意味着一种自“三十年战争”时期而始的国家体系的终结。“9.11”向我们显示这种变化的含义之一。

要了解现在，我们必须懂得过去，因为过去还和我们同在。国际秩序一贯是基于霸权和平衡。霸权是最先出现的。在古代世界里，秩序意味着帝国。那些帝国之内的享有秩序、文化和文明。在帝国之外则是野蛮、混乱和无秩序的。通过单一的霸权中心而产生的和平与秩序的状态保持着从未有过的强大。然而帝国是一种不利于变革的设计。保持帝国的统治(也是各不同帝国之根本)通常需要一个独裁的政治形式；创新特别是社会的和政治上的创新将导致不稳定。历史地看，诸帝国往往是处在静态的。

在欧洲，一个介于混乱状态和帝国状态之间的中间方式被创立了，就是所谓的小国家。小国家的成功确立了主权，但仅仅是在有限的地域管辖范围内。因此，国家秩序的建立是以国际间的无政府状态为代价的。欧洲小国间的竞争成为进步的动力，但是这个体系仍然经常性地受到威胁，即被混乱状态或单一霸权所取代。解决这种威胁的方式就是“实力平衡”，一种能够保持欧洲自由环境的实力制衡的结盟体系。联盟成功地结成了，以阻止对霸权的追求，首先是对西班牙，而后是法国，最后是德国。

然而“实力平衡”体系也有着自身的不稳定性，即与时俱在的战争危险，以及这种危险最终导致的体系瓦解。德国在 1871 的统一造就了一个过于强大的国家，以致无法被欧洲任何联盟所平衡；技术的变革使战争的代价增至无法承受之水平；兼之大众社会与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实力平衡”体系必然面临超道德考量的窘境。然而，在缺乏维持体系的任何明显选择的情况下，1945 年所形成的体系远非旧体系告终的一个新体系。欧洲的多极“实力平衡”体系变成了一个世界恐怖的两极平衡，一种“实力平衡”最终的简化形式。但是，这种平衡的建立不具永久持续性。“实力平衡”无法适合 20 世纪后期的普世道德精神。20 世纪的后半叶所看到的不仅是实力平衡的终结而且还有帝国追求的衰微：从某种程度上说二者是相随的。纪元以来欧洲帝国分隔的世界以几乎所有帝国的消逝而终结：奥斯曼，德国，奥地利，法国，英国还有苏联等帝国而今仅仅是一个记忆。这给我们留下了两种类型的国家：第一类，往往是从前的殖民地，现今从某种意义上说仍滞留在“前现代国家”(premodern)的境况中，这种境况意味着失败的国家而且处在霍布斯所说的那种相互间无休止的战争状况下(此类国家如：索马里和近期的阿富汗)。第二类是后帝国的，那些不再考虑主要靠征服赢得安全的“后现代国家”(postmodern)。第三类，当然就是那些采行常规国家行为的保持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其奉马基亚弗利原则(又译：政治权谋术 -- 译者)和“存在的目的”为行为准则

(可以认为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为此类)。

我们欧洲人所生活的后现代体系既不依赖平衡也不再强调国家主权或强调内政和外交事务的区分。**欧盟已经变成了一个干预相互间内政事务的高度发达的体系，其干预程度径直到啤酒和香肠。**使缔约成员国必须申报其重武器的位置并接受检查的 CFE 条约(Conventional Armed Forces in Europe Treaty ，欧洲常规武器条约 --译者)将几乎是主权核心的诸范畴均置于国际约束之下。认识到这是一场极不寻常的革命是十分重要的。这反映出核子时代为了保卫自身而首先必须准备毁灭自身的悖论。欧洲国家间避免核子灾难的共同利益已经充分到克服通常的不信任和不公开的战略思维。相互间的脆弱性变成共同的透明度。

后现代社会有如下的一些主要特性：

* 打破内政和外交事务的区隔。
* 在(传统)内政上的相互间干预，和相互间的监察。
* 拒绝使用武力解决争端和自我行为约束所必然的法律条文。
* 正在增大的边界的不适用性：这大致来自国家角色的变更和导弹、机动车辆加卫星这两大方面。
* 安全来自透明度，相互的公开性，相互依存性和相互间的脆弱性。

国际法庭的理念就是打破内政与外交事务分界最明显的后现代范例。在后现代社会里，“存在的目的”以及曾经规范现代社会国际关系的政治权谋上的马基亚弗利理论中的超道德性已经被国际和国内关系中采行的道德良心所取代：从而在新的利益下制定一场正义的战争。

虽然这样一个体系的确解决了“实力平衡”所未能解决的问题，但它并不一定导致民族国家消亡。虽然经济，法律的制订和防务可能被更进一步地引入国际架构，虽然国界或许变得不很重要，**但独特性和民主机制基本上为国家所保有**。因此在可见到的将来，传统的国家将继续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单元，尽管有些国家可能已经不再进行传统意义上的运作。

到底是什么促成了这种国家体系的基本变革呢？这基本点就是“世界变得诚实了”。 许多最具实力的国家不再想要打仗和征服了。正是这点共性托升了前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已经死亡，至少在西方列强中是这样。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就不应认为欧盟或者甚至北约是致使我们在西欧享有近半个世纪和平的本因。根本的事实是西欧国家不再想互相打仗。北约和欧盟仅仅是扮演了一个巩固和维持这一立场的重要角色。**北约所作出的最具价值的贡献就是缔造了公开性**。北约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巨大的西方间信心建设的工具。正是北约和欧盟提供了这样的架构使德国重新统一而又不像 1871 年的统一那样对欧洲构成威胁。这两个组织提供举行了数以千计的部长和官员们的会议，以使那些和战争与和平决策有关的人物们彼此有很好的了解。与过去相较，这种政治关系的品质和稳定性是前无古人的。

欧盟是后现代体系最成熟的样本。它代表着凭籍透明度而形成的安全，而透明度又通过彼此的依存度而达成。欧盟更像一个多国籍企业而非一个超国家系统，它更是一个自愿的多国联合会而非诸国对某一中央强权的臣服。一个大欧洲国家的梦想正是历史的前页所留下的。**它基于如下的假定，即民族国家从根本上说是危险的，且唯一制止诸国政治混乱的方法是对**

其强化霸权。可是如果民族的国家本身就成为一个问题，那么超级国家就决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欧洲国家不是后现代社会的仅有成员。欧洲之外，加拿大无疑是个后现代国家；日本倾向于后现代国家，但是她的位置有碍于她彻底地向后现代方向发展。美国是一个更值得怀疑的情况，由于美国政府或国会接受相互依存的需要或者愿望尚不明确，或者说是否有需要和愿望接受与现在欧洲同等程度的开放、相互监督和干预带来的必然后果。在其他地方，欧洲所发生的现实正成为对世界其他区域的一个鼓舞。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拉美的南方共同市场甚至非统组织都至少怀有对后现代状态的向往，尽管此种愿望似乎不会很快实现；模仿毫无疑问比创新更容易。

在后现代社会中，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威胁，也就是说其成员们无意于互相入侵。由于**在现代社会中，按照克劳塞维茨的格言，战争是政策的手段；而在后现代社会里，战争是政策失败的标志。**虽然后现代社会的成员们可能互相不构成威胁，但现代和前现代社会却会构成威胁。

来自现代社会的威胁是最熟悉的一种。在这种刚刚孕育出后现代社会的正统的国家体系中，一成未变，并继续以帝国的和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的准则运作着。如果稳定是存在的，那一定源自侵略性势力间的平衡。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存在着这种平衡的区域如此之少。而且来自某些区域可能很快在等式中加入核子元素的风险却陡增不已。

接纳双重标准的观念是对后现代社会的一项挑战。在我们之间，我们按照法律和公开合作安全的基本准则来运作。但是当对付那些欧洲后现代大陆之外的老式国家时，我们需要回复到先前的粗暴方式--暴力，先发制人的攻击，欺骗，总之使用任何那些仍然生活在 19 世纪的世界的国家之间交往所必须的手段去对付他们自身。在我们之间，我们保持法律，可是当我们在丛林中操作时，我们却必须使用丛林的法则。在欧洲相当长的和平时期中已经在物质上和心理上滋生出一种轻视防务的诱惑。这体现出了后现代国家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危险。

前现代社会所构成的挑战是崭新的一种。前现代社会是一撮失败国家的社会。在此，国家不再符合韦伯的存在一个正统权力使用垄断者的标准。它不是失去了权力使用的正统性就是失去了对权力使用的垄断性；往往是两者兼备。崩溃的例子是少有的，但是若干国家处在与时俱增的危险之中。某些前苏联的地区即可入选为这类，包括车臣地区。所有世界上的主要毒品产区都是前现代社会的一部分。直到最近为止，阿富汗根本没有一个真正的有权威的政权；在缅甸的内地和南非的一些地方也是如此，在那里毒枭们威胁着国家力量的垄断性。所有的非洲国家正处在这种危险中。这类社会中，无处不是危机四伏。这种地区中，混乱是一种常态，而且战争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即使那里存在着一个政府，他的运作方式也与一个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毫无二致。

前现代国家有可能过于虚弱甚至以致不能确保她的领土，更不必说构成国际威胁，但是她可能为那些对后现代国家意味着威胁的非国家分子提供基地。如果非国家分子，特别是毒品，犯罪或恐怖主义组织占据使用前现代基地去攻击世界上的那些更有序的地区，那么组织良好国家可能最终必须做出回应。如果他们变得太过危险以致使发达的国家无法容忍，一个自卫的帝国主义就不难想象了。西方对阿富汗的回应仍然殷鉴未远。

我们应该如何应付前现代式的混乱？卷入混乱地区是危险的；如果干涉久拖不止就可能在公众意向中变得失去支持；如果干涉失败就可能损害发起干涉的政府。但是，有如西方国家过去对阿富汗的所做的那样，任由那些国家破败下去其危险可能更甚。

干涉应该采取何种形式？对付混乱无序的最合乎逻辑的方式、而且在过去被采用得最广泛的就是殖民化。然而殖民方式对后现代社会来说是无法接受的(而且事实所验，在一些现代国家也是如此)。我们正在看到的前现代国家的出现正是缘于帝国主义的消亡。“帝国”和“帝国主义”在后现代国家里已经成为一种诋毁类的词汇。今天，没有殖民势力愿意接受这样的工作，虽然机会，或许甚至殖民的需求与曾经的 19 世纪时期一般强烈。那些被全球经济遗漏的国家存在着坠入恶性循环的危险。虚弱的政府意味着无秩序，而无秩序意味着投资下跌。在 19 世纪 50 年代，韩国的人均 GNP 低于津巴布维：一个已经成功地成为全球经济的一员，另外一个仍未成功。

所有帝国主义的条件是存在的，可是对帝国主义的供与求已经干枯了。然而弱者还需要强壮者，强壮者仍然需要一个有秩序的世界。一个内部有效率和良好管理的社会输出稳定和自由，而且它对投资和增长开放着——所有这些似乎超乎寻常地被向往着。

因而需要有一个新式的帝国主义，一个可接受人权的世界和普世价值观的帝国主义。它的轮廓已经呼之欲出：新帝国主义，像所有帝国主义一样，它以带来秩序和组织为目标，然而如今这些依照自愿的原则。

后现代帝国主义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自愿的全球经济帝国主义。这种模式一般由一个国际金融协议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而运作——这是多边性的新帝国主义的一个特征。这些机构对那些寻求重返全球经济并步入投资和繁荣之良性循环的国家提供帮助。作为回报，他们也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强调政治和经济的失败才是最根本的需要援助之处。今天的援助理念更加强调管理。如果国家希望获益，他们就必须将自身对国际组织和外国的干预开放(类似地，为与此不同的原因，那些后现代社会也开放了他们自身)。

第二种后现代帝国主义的模式可以被称作比邻帝国主义。邻国的不稳定构成一种不可忽视的威胁。在巴尔干的政治失败，种族暴力和犯罪对欧洲构成威胁。对此所做出的回应是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建立志愿的联合国保护区。毫无疑问这两处的最重要的介入者是欧洲。欧洲提供了最多的援助来保证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运转，同时提供了最多的士兵(当然，美国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稳定因素)。一个更进一步的空前的举措，欧盟向所有前南斯拉夫国家单方面开放了所有产品包括大多数农产品在内的市场。并非仅仅士兵来自国际社会，这其中还包括警察，法官，监狱管理人员，中央银行官员等等。选举的组织和监督都是由欧洲安全合作组织(OSCE)完成的。地方警察的经费和训练是由欧盟负担的。作为辅助性帮助还有上百的民间组织--在很多地区这类组织是不可缺少的。

另外一点值得一提。如果一个邻国被有组织或无组织的犯罪所占据那将是十分威胁的，这类犯罪往往由于国家的崩溃而形成。奥撒马.本拉登已经为那些尚未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们做出了证明，即现在整个世界，至少特别可能地在我们的邻国，都是如此。

巴尔干半岛是个特殊的例子。在中欧和东欧的其他地方，欧盟正介入一个最终导致大面

积扩展的进程。过去的帝国们总是强制实行他们法律和统治体系；在现在的情况下没有人强制任何事情。相反的，一场自愿的自我强制的行动正在进行着。当你成为一个欧盟成员国的候选国时，你必须接受所给的大量的法律和规定，就像其他成员国所做的那样。然而你获得的奖励是当你进入之后，你将在共同体中占有一席发言权。如果这个过程是一种自愿式的帝国主义，那么最终的状态可描绘为一个合作帝国。“共同体”(原文'Commonwealth' --译者)或许的确是个可取的名字。

后现代的欧盟为合作帝国提供了一个蓝图，一种公共自由和公共安全，它没有以往帝国的种族支配与中央专制，而且也不存在那种属于民族国家特征的种族排斥——这种排斥与无边界的时代是不相称的，它在类似巴尔干半岛的地区也是不可能实行的。

合作帝国主义可能成为最适合有着实质性改变的后现代国家的地方政治架构：这个架构中每一员都参与着政务管理，没有一个单一的支配性国家，而且其施政原则不是种族的而是法律的。从中心要求最少的介入；这个“帝国的官僚机构”必须是受到控制的、可靠的，而且是共同体的公仆而非主子。这样一个公共机构必须像它的组成成员一样专注于自由和民主。类似于罗马帝国，这个共同体将为它的公民提供某些它的法律，铸币和特殊的道路。

这些或许就是蓝图。能否实现？只有时间会回答。问题是到底还有多少时间。在“现代社会”里寻求核武的秘密竞赛正在进行。在后现代社会里，有组织犯罪包括国际恐怖主义的增长大于且快于后现代国家的本身。时间或许不会等待！

（原载英国 OBSERVER 杂志 Sunday April 7, 2002，参见 <http://www.observer.co.uk/worldview/story/0,11581,680117,00.html>，蓑笠译）

编后鸣谢

一本文集通常比较容易编辑，大会发言人提交发言稿，编者按某种逻辑排序，文字校对，即成一书。

这一本则劳力甚重。首先是同声传译人员的精神紧张，要同步完成意义的转换；然后是速录员以光速度记下的文字，其中会有莫名其妙的字眼，所以需要与西文原稿对照、校对并重译，这以后才进入一般文集的整理顺序。

这或许是2005年南沙论坛文集出版如此滞后的原因之一。虽然姗姗来迟，我们在此还是要深深感谢为该文集的成书、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大家。

邱寅晨组织了中国最好的法语同声传译的队伍，高虹、孙继文、李云蓓工作兢兢业业，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杨觉华和冯凤阁义务地为人民网的论坛进行翻译，黄晔、程小牧、梁爽对照法文原稿修改并排序，唐媛媛、齐文补译了部分缺失， 陈亮通读、校对，周易文字处理。最后，人民大学的舒颖岗和王小虎以闪电速度将文集付梓刊印，当然感谢出版社的朋友们鼎力相助。而这最后的突击战都是在人民大学陈雨露副校长的亲自指挥下进行的。

一部文集，最该感谢的是作者，他们是来自欧洲和中国各领域的佼佼者，从国家总统、总理到普通的外交官，从公民社会的思想者、行动者到大学研究者。感谢提出欧洲合众国的人文主义者雨果和创建欧洲的伟大理想主义行动者莫奈。感谢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Pascal Lamy），欧洲理事会会长罗勃特.库珀（Robert Cooper），他们既是欧洲的精英领袖，又是高瞻远瞩领时代之先的思想家。

谨以此书献给第一届论坛的东道主霍英东先生，虽然他无法再出席我们的论坛，但却为我们留下了为人类社会承担道义责任的光辉形象。感谢南沙这片平实的土地，感谢创造了它的南沙人，他们中有智慧刚毅的南沙创建者何铭思，有殷勤好客的管家人林锡鎏，有奇思独行的哲学教授何博传，还有含蓄儒雅的国际型企业家何建立。

于硕
2007年9月20日北京